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一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一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一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850x1168 1/32 印张11.625 插页9 字数 250,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平) 30,000

统一书号: 11094·108 定价: (平)1.10元

 网站编辑

会 长：何长工 副会长：李 新 胡 华

主 编：胡 华 副主编：陈志凌 杨世兰

参加本卷审稿成员：胡 华 彭 明 陈志凌 杨世兰

季之华 郭洛夫 卢 权 刘梦华 方大铭

唐纯良 郑洪泉 刘富恒 盛斯犹 高 军

陈文秀 陈瑞云 田炳坤 吕芳文

责任编辑：郭洛夫



李 达



高君宇



李 汉 俊



于 方 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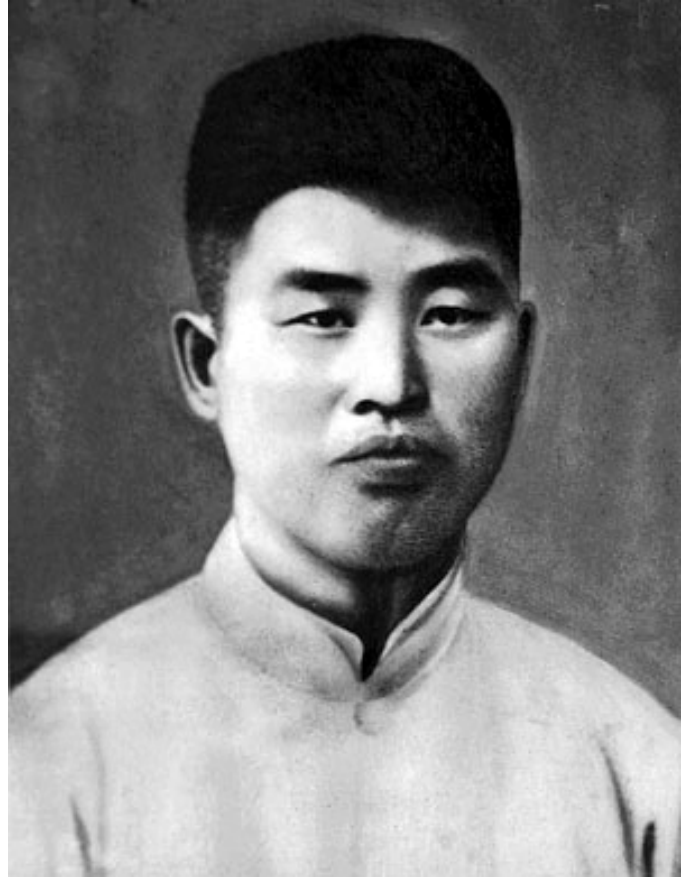
周保中



李兆麟



赵一曼



杨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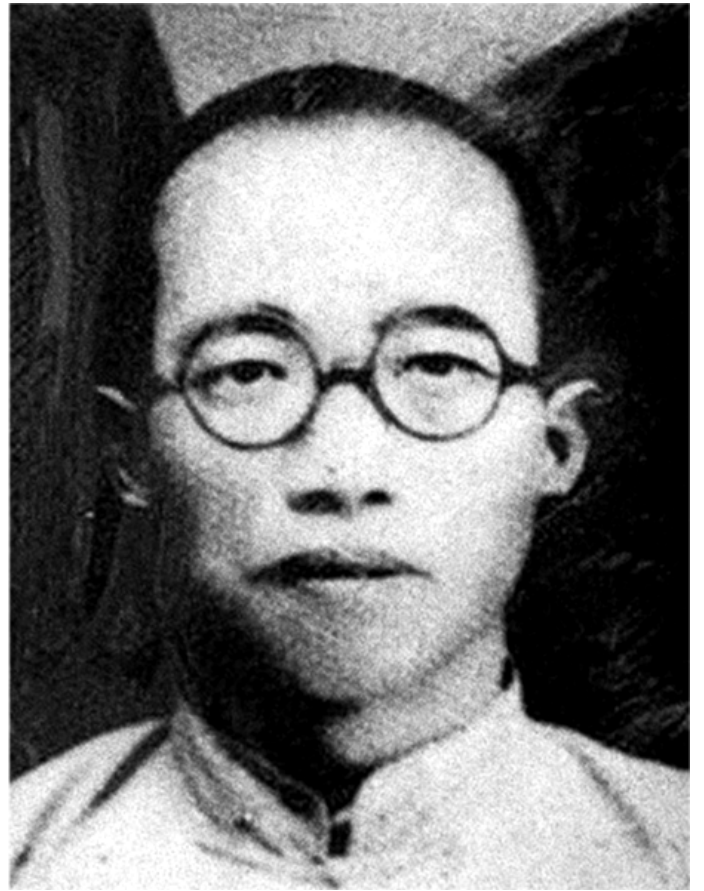
陈 浅 伦



黄 立 贵



李子芳



王尚德



方 方

目 录

李 达	宋镜明	熊崇善 (1)
高君宇	郭 杰 裴忠利	陈文秀 (76) 王庆华
李汉俊	陈绍康 骆美玲	田子渝 (109)
于方舟	窦爱芝	刘玉芝 (151)
周保中	李毓卿	李斌华 (166)
李兆麟	刘 枫	李颂鸾 (211)
赵一曼		温 野 (241)
杨 超	孙自诚	刘勉玉 (257)
陈浅伦	胡民新 范均升	刘国元 (271)
黄立贵	陈学明 吴稚航	唐志全 (281)
李子芳		郑山玉 (294)
王尚德	董建中 张守宪	梁星亮 (304)
方 方	陆永楝	刘子健 (323)

李 达

宋镜明 熊崇善

从爱国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一八九〇年十月二日生于湖南零陵县一个佃农家庭。弟兄五人，只有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

李达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六岁上私塾，十五岁考入永州中学，获得公费待遇。由此，他初步接触新知识，逐渐了解到列强的侵略和清廷的腐败。一次，学生们接到长沙寄来的《徐特立断指血书》。这份血书痛陈中国受列强欺凌，号召人民起来反日救国，大大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和同学聚集在操场上，当即议决抵制日货、练军事操两条爱国办法，把自己的日本制造的文具统统拿到操场集中焚毁，并要求学校弄两百支来福枪，教练军事操。李达日后回忆道：“这一类的反帝爱国运动在那时是年年都要举行的，每逢帝国主义者向清廷提出亡国性的侵略条件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就集合、游行、喊口号、发宣言，向清廷请愿。”^①少年李达积极参加了爱国运动。

^①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载《中国青年》1961年13、14期合刊。

一九〇九年秋，李达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他在赴京路上，目睹汉口、上海、天津等地到处都是外国的兵舰、商船、租界、军警、银行、教堂；目睹外国强盗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悲愤地觉悟到中国已经变成列强统治者的殖民地了。”^①虽然他抱着学好科学知识、复兴祖国的志向去学习，但他在优级师范读了两年，就感到学政腐败。学生身穿长袍马褂，戴着“顶子”，向孔老二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这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是由于科学不发达。只有发展教育事业，普及科学知识，唤起人民的觉醒，才能国富民强，于是他“有了教育救国的理想”^②。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李达感到兴奋。但不久，北洋军阀取代了清廷的统治，使他极为失望，“教育救国的理想”开始破灭。是年秋，京师优级师范暂时停办，他返回故乡。次年，他到祁阳中学教书半年，又就读于湖南工业专门学校。两个月后，因缺乏食宿费，转入湖南优级师范。这时，他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的思想影响，决定“放弃‘教育救国’理想，主张‘实业救国’”，“决定不学师范，改学理工科”。他“参加统考到日本去留学，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的”^③。

一九一三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在东京读了一年，因患肺病辍学回国。在家乡与一位中医师合办“博记药店”，“赔赚并没有计较，肺病算是好了。”^④一九一七年

①②③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载《中国青年》1961年13、14期合刊。

④参见茜频：《学人访问记：经济学和社会学名教授李达》，载《世界日报》1935年1月29日。

春，他再次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即帝国大学预科）学习理科。留日期间，他目睹日本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听到日本军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叫嚣，饱尝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留学生的欺凌侮辱，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痛感本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也使他“实业救国”的幻梦破灭了。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这时我们沉痛地感到，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这对我们仍是茫然的。当时我们就象在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①正当他找不到救国出路极端苦闷悲愤的时候，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象春雷乍响，使他和中国所有的先进分子一样，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感到无限的兴奋。他从日本报纸上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听说列宁领导的“过激派”实行“过激主义”，领导劳苦大众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工农政府，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沙皇俄国变成劳农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引者）的国家。他“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感到无限的喜悦，就留心看报纸上这一方面的消息，才知道‘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而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这才知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名称。”^②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介绍还很零碎，书报检查机关又横加禁止和删削，很难系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说：“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初步树立了

①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②李达：《十月革命和中国知识分子》，载《武汉大学学习简报》1957年11月7日。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对苏俄的向往。”^①从此他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积极投入中国留日学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并成为这个运动的带头人。

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卖国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军队开入东北全境，还要对占领军“尽力协助”、“供给兵器和军需品”、“交换军事地图和情报”。这个道道地地的卖国协定，我国三千留日学生闻之，无不义愤填膺。他们散发传单，集会抗议。五月三日，留日学生在大手町召集的会议上，全体议决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请愿，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并决定各省各校留日学生派遣先发队分赴北京和上海，筹备一切。湖南留日学生积极行动，于五月五日假东亚学校开会，被日警禁阻，捕去数人。李达是湖南留日学生代表、救国团的主要成员，并作为先发队的领队之一于五月七日晚附轮归国，偕同王希天、阮湘等十一人于十三日下午抵达天津，向报界说明救国团成立后的活动及其宗旨。次日，他们由津赴京后，李达立即同阮湘、黄日葵、龚德柏等到北京大学与学生领袖许德珩等人磋商。据许德珩回忆说：“我第一次认识李达是一九一八年春，他带领一百多名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的时候。当时，我是欢迎他们的北京大学学生首席代表”，“五月中旬，我们和他们的代表李达、黄日葵、龚德柏等人见了面，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开了欢迎会。”那次留日学生赴京救国团“为首的就是李达，当时号李鹤鸣。”^②经过几天的奔走呼吁，归国的留日学生和北

^①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②访问许德珩记录（1979年11月1日）。

大、高师、高医、高工、农专、法商等校学生约二千余人，在五月二十一日共同发起了向段祺瑞政府的请愿示威运动。这是我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影响遍及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由于发动群众不够，请愿运动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它为次年的“五四”运动作了准备，“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先导”^①。

这次反帝爱国斗争的实践，使李达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教育，“是他由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一步。”^②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象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③同年六月，李达毅然再赴日本，放弃了理科的学习，专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大量书刊，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和宣传者。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李达在日本，未能直接参加，但他密切注视国内时局的发展。当“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之际，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他由此看

①访问许德珩记录（1979年11月1日）。

②《李达文集》编辑组：《建党前后的李达同志》，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

③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力量，心情非常激动，积极撰文向国内报刊投稿，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声援国内斗争，为我国刚刚兴起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六月十八日和十九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公开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第一篇初步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论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极力划清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第二篇着重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剥削，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改掉十九世纪文明的弊病”，“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①李达的这些论述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政治上要消灭压迫，经济上要消灭剥削。在当时各种假社会主义鱼目混珠，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颇有市场的情况下，他的这两篇文章对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分清真假社会主义起到了启蒙作用。

六月十一日，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被捕。李达闻讯立即赶写了《陈独秀与新思潮》一文，在六月二十四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声援营救陈独秀的运动。这篇文章肯定了陈独秀的功绩，谴责了反动政府的暴行，热情地歌颂了新思潮，坚信新思潮是不可战胜的。“顽固守旧思想的政府能捕得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一人，不能捕得许多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人。纵使许多人都给政府捕去，那许多人的‘精神’还是无恙的”^②。同时，文章也表达了他用社

①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4—8页。

会主义的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的决心与信心。“今日世界里面的国家，若是没有把‘新思想’来建设改造了‘新国家’，恐怕不能立足在二十世纪！”^①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三日，他以《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为题，在《觉悟》副刊上连续发表九篇短文，向国内介绍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由于条件的限制，有些情况介绍得不够准确，但也说明当时他已经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萌发了积极参加建党的思想。从一九一九年秋到一九二〇年夏回国之前，为了系统地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以艰苦的劳动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三本著作，寄回国内出版。这三本著作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方面的丰富内容。仅《社会问题总览》一书就分三册，计二十一万字。值得重视的是，《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中还有一篇题为《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的附录，不仅简要说明唯物史观的产生及其划时代的意义，还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阐明唯物史观最精辟的论述辑录在一起。这对于帮助我国人民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中掌握它的内容是有积极意义的。李达在“译者附言”中说：“这部书是荷兰人郭泰为荷兰劳动者作的，解释唯物史观的要旨，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词义浅显，解释周到。”表明了他翻译三本著作的动机。在当时国内还非常缺乏马克思主义著作，许多人包括一些共产主义的信仰者还不能直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8页。

接阅读外文书籍的情况下，这三部译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二〇年三月，李大钊在他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通告上，就曾把李达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列为阅读文献之一。《唯物史观解说》于一九二一年五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截至一九三二年止重版过十四次。

李达上述译著和文章的发表，是他由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标志。从此以后，即使在他离开党组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也丝毫没有动摇过，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不懈地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

李达于一九二〇年夏离开日本，“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①

当年春，第三国际派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同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晤谈，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李达回到上海与陈独秀交换了意见，立即投入组党活动。陈独秀留他住在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内，两人交谈磋商十分方便。李达以留日学生会理事的身份，在上海博文女校参加领导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的工作，也以博文女校和《新青年》社作为掩护进行秘密组党活动的场所。

一九二〇年八月，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后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他们在《新青年》社举行会议，推

^①参见《李达自传》（1956年3月）。

陈独秀为书记，并草拟了一个简单的章程草案。在上海发起组的联系和推动下，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也相继筹备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十二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书记职务由李汉俊代理。翌年二月，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在通信中，谈到党的组织应采取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问题上，发生分歧，辞去了书记职务，由李达代理书记。从这时起到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党的上海发起组的全面工作由李达主持。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正是苏联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同时，他也参加改组后的《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为该刊撰写、翻译了许多重要文章。《共产党》月刊在黑暗的旧中国举起了共产党的鲜艳旗帜，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响亮口号，表明它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创建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奠定理论基础，指导中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它在社评性的《短言》中明确宣布：“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使命，一是政治使命。”^①号召中国无产阶级“举行社会革命，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②“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③它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列宁的建党学说。介绍十月革命的成就和经验，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消息，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思

①②③ 《共产党》月刊第5号、第6号、第1号《短言》。

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什么要建党？建立什么样的党？党在中国应该干什么？对这一些必须首先明确解决的原则问题，它都作了系统宣传，收到实际效果^①。它被各地共产主义者小组列为必读的教材之一，并在革命群众中广为流传，最高发行量达五千份，实际上成了一个半公开的刊物。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信谈到建党问题时，高度赞扬它“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②并设法将其中一些文章推荐到长沙《大公报》发表。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在一则《通知》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这个刊物。

《共产党》月刊在完成建党的历史使命以后，党的“二大”决定该刊停刊，代之以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向导》。《共产党》月刊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在建党的关键时刻所起的宣传、鼓舞和组织作用是永垂史册的。李达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办好这个刊物作了极大的努力。刊物的编辑部一直设在李达的寓所，最先在上海老渔阳里二号，他搬到南成都路辅德里二百二十五号后，编辑部也随着迁去，设在一个不到六平方米的亭子间里。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出版这种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种子、直接为建立共产党作准备的刊物是极其困难的，随时都有被反动派查抄的危险，因而只能秘密编辑、印刷、发行，文章也不能署真名。该刊第三号付印前，就曾被法国巡捕房没收过稿件，致使这期刊物首篇文章的第一页没有原文，而用开天窗的方法注明：“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以示抗议。刊物的经费也没有保证，李达常将自己写稿译书所得稿

^①参见段启咸：《〈共产党〉月刊的历史作用》，载《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

^②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费垫支。为了编辑出版这个刊物，他不仅亲自撰写社评性的《短言》、重要文章和消息，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一个人担负起从写稿、审稿到校对、发行的全部工作。

为了开展工人运动，在党的上海发起组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李达虽不负责工人运动，但他却十分关心这方面的工作。他深入工人群众，亲自参加了上海纺织工会的工作，还为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劳动界》周刊撰写向工人灌输马列主义的通俗文章。党的一大前后，他发表了《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工神圣颂》、《五一运动》、《对于全国劳动大会的希望》、《劳动立法运动》等文章，启发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为了开展青年团的工作，党的上海发起组决定由俞秀松主持，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租了新渔阳里六号一幢房子，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场所。这幢房子的门外挂着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分设英、俄、日语各班，学生主要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赴苏俄留学作准备。在学社里，由杨明斋、魏金斯基的夫人教俄语，李达讲授马列主义，也教过日文，还参加过一段时间的俄语学习。

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洛夫（也有人译为尼柯尔斯基——笔者），到上海和李达、李汉俊晤谈。李达报告了党的上海发起组的工作和各地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活动情况，认为组党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①。经发起组研究同

^①李达：《七一回忆》，载《七一》创刊号，1958年7月1日。

意，由李达代表发起组通知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东京的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东京的小组只来了一人，巴黎小组当时与国内联系较少，未通知）。他和李汉俊是上海代表。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李达担负了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大会期间，他除参加起草文件外，还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①。

“一大”会址和代表住处都是李达通过夫人王会悟筹划的。会前，他对王说：“我们要开个会，需要你帮助找个地方给代表住。你是上海人（原籍浙江嘉兴，久住上海，会讲上海话），上海你熟悉。”^②王会悟先向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借房三间，供代表住宿。她又想到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在外地避暑，李公馆的房子正好用来开会，同李汉俊商量时，李满口答应^③。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一〇六号李书城家中开幕了。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七月三十日晚八时。那天，会议开始不久，突然有一陌生人闯进会场，借找人找错了门，又匆匆离去。代表们警觉到是法租界侦探，便立即转移。一刻钟后，法国巡捕带来了十几个警察强行搜查。这个意外事情发生后，“一大”会议改在嘉兴南湖举行，也是王会悟安排的。当部分代表在李达家商讨转移会址时，王会悟表示：在上海找不到适当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娘家在嘉兴南湖之畔，那里风景优美，可以雇一只大画舫，代表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大家对此极表

^①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篇第6章。

^②访问王会悟记录（1979年11月7日）。

^③参见王会悟：《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载《革命史资料》第1辑。

赞成^①。李达让王会悟当晚便去上海北站了解赴嘉兴的火车班次^②。第二天黎明，她搭头班车先赴嘉兴，在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供代表歇脚，又雇好画舫，预订饭菜，等候代表到来^③。代表们乘第二班车离沪，十时左右到达嘉兴。王会悟立即把他们引到停泊在湖边的画舫上。他们带着酒菜、麻将牌登上画舫，划到湖心，宣布开会。人们以为是游客，并不注意^④。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放哨，发现别的游船有靠拢迹象，即用折扇敲击船板。代表们闻声会意，连忙“一索，二索”地高叫起来，好象是在打麻将牌^⑤。不久，天空落下毛毛小雨，游人渐散，会议顺利进行。这天是七月三十一日，是“一大”的最后一天。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来建设中国共产党。大会选举了中央局作为党中央领导机关，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正式改为支部。至此，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李达担任中央的宣传主任后，主持党的宣传工作，开辟和扩大了党的宣传阵地。

根据中央局的决定，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李达任主编。他的寓所就是

①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篇第6章。

②参见王会悟：《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载《一大前后》（2）。

③参见王会悟：《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

④参见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载《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

参见周佛海：《扶桑发影溯当年》、《往矣集》。

⑤《访问王会悟记录》（1979年11月7日）。

该社的社址，也是中央宣传部的办事处。《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曾发表该社成立通告，简要地阐明创办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还郑重宣告：“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的趋向，测定潮势之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为海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要求，特在此慎重声明。”^①为了供给广大革命者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需要，人民出版社原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者——笔者）丛书》十一种，其他九种^②。在短短一年之内，出版社就出版了《马克思全书》三种，《列宁全书》五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四种，其他三种，共十五种^③。其中有《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资本论〉入门》、《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列宁传》、《李卜克内西纪念》等书籍，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人民出版社是党的重要宣传阵地，它的出版物对于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李达为创办党的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发行各种革命书籍，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出版社的人员很少，著译书稿、编辑、校对、付印、发行

①②参见《人民出版社通告》，载《新青年》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1日。

③参见《出版新书》，载《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

都是他一人担任^①。

一九二一年十月，党为了开展妇女运动，创办了我党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校，由李达兼任校长，王会悟协助工作。该校设工作部、半工半读；学生分高级班和低级班，丁玲、王一知、王剑虹、钱希均等都是该校学生。李达亲自为学生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并请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沈泽民、高语罕、邵力子兼课。“各教师所选的教本，都是适应新思潮，又合乎平民的。”^②每周两小时专题讲演，教员轮流主讲平民女子切身问题。

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的《妇女声》半月刊，也在李达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他不仅为该刊许多重要文章审阅修改，并且还撰写和翻译了大量文章。如《女权运动史》、《女子解放论》、《女性中心说》、《产儿制限论》、《社会主义的妇女观》等。《妇女声》半月刊在提高妇女觉悟和促进妇女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是党成立初期在广大妇女中进行宣传的阵地。

为了回击共产主义的敌人对新生苏维埃俄国的诽谤，帮助党内外群众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撰写了《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一文，翻译了长达三百七十七页的《劳农俄国研究》一书。

建党前后，李达一方面参加建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一方面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他和陈独秀及其

^①参见李达：《回忆党的早期活动》，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

^②参见会悟：《入平民女校上课一星期之感想》，载《妇女声》第6期，1922年3月5日。

他早期共产主义者一道，以《共产党》月刊和《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发起对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左”倾思潮、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勇敢捍卫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策略和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一九二〇年冬至一九二一年初，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先后抛出《由内地旅行得之又一教训》、《现在与将来》、《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他们胡说中国“无劳动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无法兴起，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增加富力”，发展资本主义，造成“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才有“凭借”，而且中国将来只能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和平地演变到社会主义。按照他们的观点，既然中国谈不上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更没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了。

面对研究系的这种猖狂进攻，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坚决予以反击。李达就是这场“反击战”的主将。他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开始，陆续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等文章，揭露了冒牌社会主义，把斗争引向深入。一九二一年四月八日，他受党的上海发起组的委托撰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成为“共产主义者在反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斗争中进行笔战的中坚”^①。他在这篇战斗檄文中首先阐明这场论战的阶级实质是“社会主

^①参见张静如、江长仁：《李达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载《人民日报》1981年4月10日。

义与反社会主义”之争，是“知识阶级中表同情于资本家与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之争，指出梁启超是“明明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①的。

李达痛斥那种以为中国唯一出路是依靠资本家“开发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谰言。他指出在帝国主义“万国竞争”掠夺之下的中国，决不会发展资本主义，因为他们要使中国永远成为他们各自独占的殖民地。同时，他在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后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生存竞争完全消灭。生产消费完全可以保持均平。一人利用他人、压迫他人的事实绝对不会发生，也没有经济恐慌、人民失业的危险。”^②因此“劳动者非常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③；“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④

李达彻底揭露了所谓“矫正资本家”，“务取劳资协调”的改良主义政策。指出它的欺骗性表现在利用“资本阶级的国家的立法，施行几项温情政策，略略缓和社会问题”，^⑤“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⑥；它的反动性就表现在继续维护“现代社会中万恶的根源——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⑦。李达还进一步论述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问题，指出劳动阶级要谋求解放，只能采取“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这就

①②③④⑤⑥⑦参见《李达文集》第1卷第57、64、65、68、69、68页。

是直接行动的效验。”^①

李达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为依据，有力地驳斥了所谓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谬论。他认为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必须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②

在同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进行论战的同时，李达和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又投入了对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极力宣扬个人的“绝对自由”和社会的“绝对平均”，反对一切强权，反对一切权威。当时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潮”，在倾向革命的青年中，甚至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也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严重的思想障碍。因此，批判无政府主义，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早在一九一九年六月，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对无政府主义就进行过初步的批判，揭开了反无政府主义斗争的序幕。随后，他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以及他主编的《共产党》月刊中的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在国家问题上，李达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出无政府主义“各个分派的共同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③，其要害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所谓“一切国家

①②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72—73、74、80页。

都是祸害”的观点，就是不去区分国家的性质。他指出：说资产阶级国家“是特权阶级的所有是可以的”，“若说一切国家都是特权阶级的国家就不免是独断了。”“若嫌特权阶级的国家不好，只要把特权阶级打倒建设无特权阶级的国家就好了。”^①那就是将“资产阶级的独裁”“变成劳动阶级的独裁统治”^②，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自由问题上，李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阶级并不怕人提倡什么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的社会那种抽象的思想，他们所怕的，还是那种最有力的具体的即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③在生产问题上，他指出组织生产“非依赖中央的权力不可”。如果象无政府主义那样去组织生产，那“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差不多”地处于“混乱状态”^④。在分配问题上，他反对那种不顾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水平而主张立即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空谈，阐述了社会主义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理。同时，李达还追根溯源，清算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指出：“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⑤李达对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各派的理论内容和唯我论的实质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他的系统而又抓住要害的理论批判，对于澄清无政府主义制造的思想混乱，对于创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建设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李达还根据中国有不少革命青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蒙蔽的具体情况，非常注意把无政府主义的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区别开来。他申明无政府主义者“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

①②③⑤ 《李达文集》第1卷第80—90、27—28、81页。

④参见《李达文集》第1卷第49—50页。

同志”；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要约同这些朋友加入我们的队伍”^①。这对于促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者觉醒，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为了排除修正主义对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保证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李达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一道，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展开了批判，揭露他们搞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与资本家妥协”的“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②；批判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他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把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的原理、手段、方法及其理想中的社会概括成七条^③，比较准确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原理，给人们提供了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文中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虽以马克思主义相标榜，但实际上“马克思的真面目”却被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湮没殆尽了”^④。随后，他又写了《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逐个批判考茨基的“正统派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的“修正派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以及“组合社会主义”。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对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统一，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国家镇压反革命的职能和组织经济的职能，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等等。在当时我国多数共产主义信仰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不可能系统掌握的情况下，李达的这些论文对于奠定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起了很

①②③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78、27、30—31、34页。

大的作用。

党的“一大”闭幕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极左派在柏林成立了“第四国际”，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反对马列主义。“第四国际”的影响虽不如第二国际，但如果不同他们鼓吹的极左思潮划清界限，中国共产党就有离开马列主义轨道的危险。

一九二二年四月，李达写了《评第四国际》一文，就共产党的领导、如何对待黄色工会、对待资产阶级议会、联合农民等问题，系统地批判了第四国际的错误理论和策略，阐明了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在党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上，他深刻地表述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有纪律的先锋队，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于夺取政权实行劳工专政。政权必须用武装方能到手，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自由的组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①“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②他还着重指出：“共产党不仅在革命以前重要，即在革命时也是重要，革命之后又须监护劳农会，尤其重要。除非到共产主义全面实现的时代，共产党不可一日不存在。”^③这些论断，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在党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他认为第四国际鼓吹退出黄色工会是“关门主义的法子”，只会分裂无产阶级^④。指出他们鼓吹退出资产阶级议会也并不是真革命，“共产党若是抱定革命的目的跑进议会去，利用议会而不为议会所利用，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⑤他还认为他们反对联合农民

①②③④⑤ 《李达文集》第1卷第133、134—136、137页。

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是失败之途，“社会革命，工业劳动者固然是主力军，而非与农村无产阶级结合，就不易成就。”^①李达的这些基本观点，透彻地阐明了党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基本态度，为刚刚诞生的党制定战略、策略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篇论文进一步发挥和补充了他在“一大”以前的思想，表明了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以及马克思建党学说的认识水平又有了提高。

李达在建党前后的著作，也有不准确，不精当，乃至错误的地方，带有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他没有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对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社会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都还缺乏明晰的认识。

但是，过去有人说他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那是违反历史真实的。事实证明，他不仅没有拥护过“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恰恰相反，是同它作过坚决斗争的。他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阐述，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党的指导，坚持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坚持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等方面，在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当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实际活动和理论活动，表明了他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党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①《李达文集》第1卷第138页。

大革命前后的理论建树和实践活动

一九二二年五月，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并与毛泽东一起到衡阳指导工作。当时衡阳的省立第三女师已经建立了湘南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学运和工运广泛开展起来。五月下旬，三女师的某些进步学生因到水口山矿区作宣传工作，被反动学校当局强令开除，正在进行一场尖锐的斗争。毛泽东和李达亲自到该校了解斗争情况并给予正确的指导。这次湖南之行，使李达对湖南党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有了一些了解，决定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到自修大学担任学长。

一九二二年七月，李达出席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大第一天的大会，就在李达的寓所即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六百二十五号举行。李达是教育问题和妇女问题组的召集人，这个小组的活动地点始终在李达的寓所。会上，李达表示要到湖南自修大学任教，请求不再继任中央宣传主任职务。二大闭幕以后，他离开党中央，专心致力于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一九二二年秋，李达偕夫人携带不满周岁的女儿由沪返湘，与毛泽东一家同住清水塘。他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同研讨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怎样办好自修大学的问题。

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创办的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也是当时湘区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参加自修大学学习和工作的除了湖南地区最早的一批党员，如毛泽东、何叔衡、毛泽民、夏明翰、郭亮、夏曦、李维汉、罗学瓚、易礼容、陈佑魁、姜梦周等人外，还吸收了一批革命青年

参加。李达担任自修大学学长。他负责主持招生工作，“指导学友之自修，考察学友之成绩”^①，辅导学友学习马列主义，为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和初中部的革命青年系统讲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内容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发展史等。为了因材施教，他一天之内常给三个班的学员分别辅导、讲课，并且还亲自编写《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等教学资料，印发学员，人手一册。

一九二二年八月，自修大学开办不久，湖南反动当局在长沙举办了有各县教师参加的暑期学校，请冒牌社会主义者江亢虎来讲学。江亢虎大肆兜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货色，鼓吹“新社会主义”。面对反动政客的猖狂进攻，李达立即撰写了《社会主义与江亢虎》一文，在当月的长沙《大公报》上连载数日。他认为在政治、经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之下的中国“要想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首先要组织群众竭力打倒帝国主义，推倒国内军阀政治”^②，“必须由社会革命党励行无产阶级专政。”^③有力地驳斥了江亢虎散布的改良主义谬论，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宣传和自修大学的影响。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和李达为了宣传二大的纲领，探讨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李达任主编。刊物一问世，就受到国人注意和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这个刊物在《发刊词》中庄严宣告：“本刊出世的使命实在非常重要。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和其他

①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载《新时代》，1923年4月10日。

②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225、226页。

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李达主编这个刊物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二大宣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精神。当时党面临的任務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李达主编的《新时代》月刊把研究和宣传的重点放在“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这个有关社会和国家根本改造的问题上。毛泽东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和李达发表的《何谓帝国主义》、《为收回旅大敬告国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旧国会不死、大盗不止》等文章，都是围绕这一根本问题而写作的。李达在《何谓帝国主义》一文中，针对胡适美化帝国主义、粉饰封建军阀的谬论，明确指出：“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分析中国的乱源，知道搅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我们的民众要期待统一和和平，要获得自由和幸福，非先组织起来打破这两大障碍物，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①他还针对胡适等人散布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的谬论，写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和阶级状况，论证了党的“二大”宣言提出党的目的（即最高纲领）和当前的政治主张（即最低纲领），说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说：“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行到实行的时期了。”^②

^{①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192、202页。

李达还进一步研究中国如何“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推倒军阀政治的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上也是有基础的。”^①同时在制定正确的国共合作的方针和策略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这个问题上，他既不同意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也反对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观点。“中国国民党似乎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党派，有资本家、知识分子、劳动者三种党员，共产党至好是影响他们向左倾，将来民主革命成熟时，共产党至好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去。共产党应该单独的严整无产阶级的阵”^②。在民主联合阵线中，“共产党应该注重‘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的工作。时时要保持独立的存在，免受他党的影响”^③。接着，李达更进一步阐明了在民主革命成熟时，由于“国际的地位和阶级决战的勇气”^④，“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当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的资本主义促进到国家资本主义去”^⑤，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不必等待一切生产力完全发展。看看我们党走过的道路，重温李达在二十年代初的论述，说明他相当精辟地论述了民主革命中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关系，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也说明了他在把马克思学说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步伐。这时，李达还翻译了马克思的著作《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为了加深群众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他还翻译了《中国关税制度》一书。

由于自修大学及其机关刊物《新时代》月刊产生的影响日

①②③④⑤ 《李达文集》第1卷第 212、209、214页。

益深远，引起了湖南反动当局的极端仇视和恐惧。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反动军阀赵恒惕竟然以“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的罪名，派兵强行封闭。《新时代》月刊也被迫停刊。自修大学和《新时代》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陈独秀没有接受李达的正确观点，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早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陈独秀向李达表示，共产党应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党团，遭到李达的反对。一九二三年夏，李达由湖南到上海与陈独秀再次商谈国共合作问题。他赞成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但反对以整个团体加入国民党。可是陈独秀还没等李达把话说完，“便大发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认为李达在长沙不参加示威游行，没有资格作主张，甚至威胁道：“违反党的主张，要开除！”李达也很气愤，针锋相对地说：“开除就开除！我也不把你这个草莽英雄作领袖！”事后，李达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受了这样的刺激，顿时凉了半截”，“心里想：象这样的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领袖，前途一定无望”，“我当时即已萌芽了脱党的决心。”^①由于李达未能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以解决自己同陈独秀的意见分歧，回到长沙后，愤而中断了同陈独秀的联系，是年秋，正式离开党组织^②。这是他一生中政治上最大的失误。

李达脱党以后，仍同湖南的党组织一起战斗。湖南党组织没有因他脱党而嫌弃，有什么工作仍叫他做。他除继续坚持马

①《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②参见李达：《中国所需要的革命》，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1号，1928年7月16日。

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外，还协助党组织做一些外围工作，常常向长沙党组织的负责同志推荐进步学生入党。毛泽东、李维汉（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等，待他如党内的同志一样。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自修大学被封闭后，李达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任学监也任教授。后来该校改为湖南大学法科，他继续任教授，讲授唯物史观。他的讲课很受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引起强烈的反响，不少理科学生和长沙市的进步青年也都来听他的课。他把自己长期从事研究唯物史观的成果写成了《现代社会学》一书，于一九二六年六月正式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哲学专著，也是我国最早的系统论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之一。这部书以“唯物史观学说为根据”，从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后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的观点出发，论述社会的起源、发展、变革和社会意识、阶级与国家、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也论述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问题，该书指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夫民主革命之对象虽在颠覆帝国主义，而弱小民族内为虎作伥之封建阶级或帝国主义之代表，亦在推翻之列。”^①并尖锐地提出革命领导权的问题：“领导民族革命运动者，果为资产阶级乎，抑为无产阶级乎？”^②他的回答是：“能成为民族革命之中坚者”，“是弱小民族之无产阶级”，“是共产党”^③。他在推断了民族革命成功后的前景时指出：“民族革命成功时，小资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国家资本主义”^④，“国家资本主义乃社会主义之

①②③④参见《李达文集》第1卷第358、360、361页。

过渡。”^①他还强调了中国革命必须同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结成统一战线”，指出：“不与国际无产阶级相联合”的“机会主义之民族革命，较不革命尤为有害”^②。多年后，李达自认这本书只是“摸索写成的不成熟的著作”。但在当时，《现代社会学》确是很切合革命的需要，因而流传广，影响大，再版十四次。当时革命者“差不多人手一册”^③。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曾去湖大法科听李达讲社会学，他高度评价说：“李达老师是我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就是我听他课的讲义）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这部著作影响之大，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会忘却的”^④。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反动当局通缉李达的“罪名”就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⑤

大革命期间，李达除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外，还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汉，李达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邀请，来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生事宜，代理恽代英任该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到校后，他任政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也向学生讲授社会科学概论。

一九二七年春，总政治部成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由邓

①②参见《李达文集》第1卷第361、363页。

③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载《人物杂志》1946年第9期。

④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载《文献》1981年第4辑。

⑤参见1928年《湖南清乡总报告》卷3。

演达主持，李达与恽代英任常委。在此期间，李达还到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社会科学概论。毛泽东还曾委托李达去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唐生智后来回忆说：“记得一九二七年春，在武汉，有一次李达到我家来，他说：‘润之先生希望你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要我来问你，你干不干。’我说：‘干当然要干嘛！’”^①同年三月，毛泽东要李达回长沙与谢觉哉、夏曦、郭亮等筹办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省党校，由唐生智遥领校长名义，谢觉哉任秘书长，李达任教育长。李达动员了不少要求革命的青年投考党校。党校四月开学，五月二十一日上午补行开学典礼，就在当天发生了“马日事变”，李达接到党组织通知，转移到家乡零陵，躲避三个多月未出家门。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他在家乡亦无处藏身，又于同年九月秘密转移至武汉，由李汉俊（湖北省教育厅长，武昌中山大学校委会负责人）介绍到中山大学任教。十二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杀害，反动军警包围学校搜捕进步师生，李达正在赴校途中获悉被围的消息，在许德珩的资助下，偕同家眷，连夜潜往上海。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宣传

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李达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利诱、迫害，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利用合法讲坛讲授马克思主义真理，引导广大

^①参见《李达同志生平事略》，载《李达文集》第1卷第12页。

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达到上海，潜居在法租界一个偏僻的弄堂里。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各种渠道企图引诱他去给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担任顾问和其他事情，他一口回绝，并愤慨地说：“要我做刽子手的顾问，真是不把人当人”^①；“一个月给我一千元大洋，我也不干！”^②汪精卫、陈公博企图拉他加入改组派，他也坚决拒绝。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他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决不同反动派同流合污。与此同时，他与许德珩、张庆孚、邓初民、施复亮、黄松龄等发起组织“本社”，以“不忘本”、“保持革命之本”自勉，共同在《民众先锋》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要求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③。他还参加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顽强的斗争。他同上海地下党组织保持直接联系，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成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上反“围剿”的带头人之一。

一九二八年冬，李达与友人熊得山、邓初民、张正夫、熊子民等创办了昆仑书店，出版各种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针锋相对，重印了《现代社会学》，有力地反击了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昆仑书店还陆续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陈启修译）、《政治经济学批判》（李达译）和恩格斯的《反杜林

①参见《李达自传》（1956年3月）。

②参见李心天：《此身莫向沟中殒，犹上文坛作老军》，载《光明日报》1978年12月12日。

③访问许德珩记录（1979年11月1日）。

论》上册（钱铁如译）等经典著作，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华兴书局，给了当时出版界以积极的影响。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国民党颁布了反动的“出版法”、“出版法细则”、“宣传法审查标准”，一些比较进步的书店难以继续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李达于一九三二年要他夫人以“王啸鸥”的名义向当时英租界当局注册，创办了“笔耕堂书店”，自己出钱，自己买纸，自己托人印刷，然后用“笔耕堂书店”的名义出版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给革命者输送精神食粮。如他在同年七月，冒着风险重版了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一书（当时因译者已被捕入狱，故把译者改名为吴理屏）。

一九二九年上半年，上海法政学院三次请李达任教，他都未去。但是，当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共地下党员张庆孚通知他说：“这是党组织同意的”时，他便毫不犹豫，前往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政治学。一九三〇年秋，他又应聘暨南大学讲授辩证唯物主义。次年秋，该校社会学系主任许德珩辞职，张庆孚要他接任，他知道这是地下党支持的，立即应承。李达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把大学当作宣传革命真理的讲坛，勇敢地对广大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他的讲课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外校外系的学生也赶来听课。当年在上海法政学院听过课的一位老同志至今还记忆犹新地说：“李达老师来上课时，课堂里挤得满满的，而且鸦雀无声。”“倘若有人发出骚动之声是会立即把他撵出去的”，因为“有一部分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在维护着一位在黑暗年代里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老师的尊严。”这位同志满怀深情地说：“我是一直怀念和感谢李达老师的，因为在我的一生当中，他在我的思想上是最有影响的

一位老师。”^① 那些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反动派，对李达的革命教学活动极为嫉恨，经常进行刁难和捣乱，甚至借口搜查他的住宅。“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应暨南大学进步学生邀请，讲演有关当时政治和社会状况的问题，遭到特务暴徒的毒打，右臂骨和右锁骨都被打断了，住院治疗达七个星期之久，右臂还不能动。特务以为他的右手已残废，不能写作，高兴得眉飞色舞。然而李达对敌人的残酷迫害极端蔑视，毫无畏惧，坚毅地表示：“反动派想打断我的右臂，不让我拿笔，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我一定要把右手锻炼得和好手一样！”^② 他出院后，一面以顽强的毅力锻炼右臂，恢复写作能力，一面继续利用讲课和学生个别来访，宣传革命理论。一九三二年二月，暨南大学反动校长借“一·二八”迁校之机，将他解聘。同年五月，他受党组织之托，到泰山给冯玉祥及其身边人员“讲授列宁主义”。冯玉祥给予高度评价，说李达是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战士。”^③

在上海期间，他大力从事学术研究，力求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为此他翻译和撰写了许多理论著作。一九二九年发表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探讨了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他援引了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的大量统计资料，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经济状况及其趋势作了科学分析，得出明确的政治结论：“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

①东方既白：《缅怀李达老师》，载《光明日报》1978年11月5日。

②李心天：《此身莫向沟中殒，犹立文坛作老军》。

③参见冯玉祥：《我的读书生活》（2），1943年三户图书社刊印。

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解决土地问题。”^①关于中国革命力量的特点，这本书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境遇实在是非常残酷的”；“他们确是革命的急先锋”^②。他还就“近来农民运动的形势说”，农民“已经表现着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大力量，表现着为革命而奋斗的大功绩。”^③《社会之基础知识》是李达分析中国革命问题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它指出“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④《民族问题》一书，概述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着重分析了被压迫民族问题。“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枢纽”^⑤，而“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运动，已由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运动，转变为被压迫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⑥。因此，“要了解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就必得研究民族问题。”^⑦这些论述，初步表达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思想。

上述三本专著，都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以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正确地回答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对于当时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的人们，不能不发生积极的影响。国民党统治区不少进步青年，就

①②③④⑤⑥⑦ 《李达文集》第1卷第495、492、493、558、604、596、560页。

因为读了这些书，看到了中国的前途，走上革命道路。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李达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德积重远的《法理学大纲》、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与钱铁如合译）、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与王静、张粟原等合译，李达译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等著作。李达在这些译著的“译者前言”或“后记”中，说明翻译的目的是为了给广大群众以认识中国革命的武器。

一九三二年八月，李达由上海到北平。进步学生纷纷要求学校当局聘请他任教。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是李达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于是他就任该院教授，随后兼任经济系主任。当时中国大学是支持反动势力的，进步学生因为李达曾是党的发起人之一，讲的又是科学的经济学说，坚决要求校方聘请他。校方不答应，双方僵持不下，几乎闹成罢课，最后学校被迫让步，于是李达就任了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他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进步力量，推荐了黄松龄、吕振羽到中国大学任教。平大、中大的进步学生较多，李、黄、吕三人被进步学生和进步报刊誉为“红色教授”。李达讲课，外校、外系学生踊跃来听，“成为最叫座的教授”^①。他“学识渊博、造诣很深，为人治学，堪称楷模。”^②“他语言简洁，没有废话。课后

①参见逸文：《〈学人访问记〉的回忆》，载《新闻研究资料》1979年第1辑。

②参见侯外庐：《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载《光明日报》1981年6月18日。

复习笔记，恰象读一篇精采的论文。”^①他讲课态度十分认真。一次，他带病给学生上课，面戴一个大口罩，边擦黑板边写：“哑子上课，以笔代口，……”两节课写个不停，中间未休息，直到写完下课，没有一个学生提前离开。大家赞叹他高度的思维能力和飞快的板书本领，更敬佩他对教学高度负责的精神^②。

正因为如此，李达成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两校进步师生向反动派作斗争的一面旗帜。斗争首先表现在反对解聘进步教授的问题上。伪中央教育部规定，学校当局每年对教员“续聘”一次，没有接到聘书就算解聘。目的是为了打击进步教授。学生每学期都要进行斗争，要求续聘进步教授任教。从校方来说，如果没有进步教授任教，学生就要闹事，学校也招收不到好多学生。李达常对吕振羽说：“我们不来，学校就会关门，我们就抓住这个矛盾进行斗争。”^③他们因此得以占据大学讲坛，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达同反动派的斗争，还表现在极力支持吕振羽反对蒋介石的理论顾问陶希圣的斗争。他对吕说：“现在各派别的人都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你看哪些人是最凶恶的？”吕回答说：“我想抓住陶希圣。”李达高兴地说：“对！陶希圣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以他为首的新生命学派是国民党的御用学派，陶希圣是危险人物，我们要与他斗争，老弟，你有条件。”并建议说：“你可以到政治系教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他唱对台戏！”^④当时，陶在北大、清华、师大等校教中国政治思想

①②参见尹进：《鹤师早年在北平教学二三事》，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③④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与吕振羽的交往》，载《文献》1980年第4辑。

史。吕振羽在中大开了这门课以后，引起强烈反应，北大、清华、师大等校有不少学生也来听他的课，买他的讲义。陶慌了手脚，请黄松龄向吕振羽讲情，要求吕把中大这门课让给他教，理由是北大、清华、师大的课都由他教，应该由他统一起来。李达听了很气愤，对吕振羽说：“如果他要你把中大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课让给他教，那就叫他把北大、清华等校的这门课让你教，叫你统一起来，问他同意不同意！”^①陶希圣再也不敢吱声了。李达还支持吕振羽参加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论战中，吕写成了史学专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李达非常高兴，亲自校阅，亲自作序，并推荐给人文书局出版。吕振羽生前回忆当时的斗争情况说：“李达同志的品德很高尚，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在白色恐怖下从未动摇过。他坚持身体力行，对我的影响很深。”^②

李达关心政治，重视宣传工作，利用一切条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他对友人侯外庐说：“我的目标大，不便在社会上公开活动，你年轻，可以多做一些工作。”^③在他的支持下，侯外庐利用校内外的各种讲坛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李达不仅在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经常接待倾向进步的学生，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当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回忆李达教育青年学生的往事

①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与吕振羽的交往》，载《文献》1980年第4辑。

②访问吕振羽记录（1979年9月12日）。

③参见侯外庐：《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载《光明日报》1981年6月18日。

时说：“他和进步学生的关系好，联系多，我们有事找他，他都接见。”“他对形势的分析是相当准确的，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抗日战争前夕，我曾想转学到其他地方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就会全面入侵中国，我们呆在北平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你转到别的学校去学不到东西。’他劝我利用短暂可贵的时间，多学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作为斗争的准备。以后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我听从了他的劝告，受益非浅。”^①随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位同志去到延安，当他向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报到时，张闻天十分关心地询问李达的情况，并对李达向青年学生讲授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不减当年，非常高兴，称赞不已。

一九三三年五月，李达再次受党组织的委托去张家口为冯玉祥讲学，说服冯玉祥联共抗日。冯玉祥欢迎李达去讲学也是有目的的。有一次冯玉祥拿着他的日记本来陪李达吃饭，饭后把日记本留下走了，李达想：冯玉祥为人机警，日记本不是粗心大意丢下的，一定是故意留下的。他只好把日记本拿来翻看。日记本中有一些打油诗，好几处说到要抗日、要反蒋，特别强调要联俄抗日。李达看后，了解了冯玉祥的意图，就借此机会和他谈起抗日救国问题。冯说：“抗日必须联俄。”他所说的联俄是要从俄国得到接济，李说：“联俄必先联共。”冯反问：“联共如何联法？”李答：“我可以转达北京的党组织派人来找你面谈。”冯表示满意。于是李达写了一封信托人转给北京的地下党组织派人到张家口去。几天以后，李达将党组

^①李其驹：《坚持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李达在白区的斗争》，载《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

织派来的人领去同冯玉祥见面，他就回到北平教书去了。此后不久，冯玉祥在张家口树起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一九三四年六月，在党的领导下，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建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宣言，其基本内容就是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在宣言上签名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九名有影响的人士，李达是十名领衔签名者之一。当时北平的教育界对于抗日救国的问题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以胡适、傅斯年、蒋梦麟为首的北大“独立评论派”，他们的口号是组织国民阵线，主张国际联盟来调查解决，实际上是拥护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另一派是以李达、陈豹隐、王之相等为代表，号召组织人民战线，拥护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双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反对全民抗日，蒋介石提出一个“和平不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反动口号。胡适之流的御用文人们极力鼓吹。李达针对这个谬论，在课堂上公开讽刺：“照这样说下去，读书不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读书，抗日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抗日了。”^①一针见血地揭露蒋介石投降主义的丑恶嘴脸。

自从李达到北平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和宪兵第三团一直监视他的行动。他常常戴上大口罩，以躲避敌人的监视，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师生则多方面保护他。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他无所畏惧，对反动派的监视、威胁、恐吓，只是一笑置之。“他身边一直放着一个铺盖卷、毛巾和牙刷，随时准备坐

^①参见紫红：《我所知道的李达老师》，载《中国青年报》1980年10月7日。

牢。”^①“还做了大皮袄，准备冬天在监狱里坚持写书。”^②正因为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国民党对他的抗日反蒋言行极为仇视，企图以“侮辱领袖”的罪名解聘他。伪教育部长王世杰密电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下令解聘李达、许德珩、陈豹隐、沈志远、程希孟五教授。随后，伪教育部还派了总务司长来督办此事。由于徐诵明、白鹏飞不同意，僵持了几个月。同年五月，白鹏飞偕同李达到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说理斗争，未获结果，随后去庐山（因反动当局正在庐山召集有各大学校长参加的“谈话会”），又遭到反动当局的顽固拒绝。伪教育部某头目还狡诈地说：“政府方面颇拟请白先生及陈豹隐、李达、许德珩、程希孟诸君，到南京帮忙。”白鹏飞和李达当即拒绝。六月二十一日，他们愤然下山，白鹏飞回北平，李达因父亲病重，回湖南家乡探望。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南北交通断绝，李达由零陵转赴上海暂住。北平沦陷后不久，李达的家被日本兵抄了，夫人也遭到审讯和毒打，逼她交出李达。后来知道李达确实不在北平，才释放她。

李达在北平的五年，不仅是不畏强暴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的五年，也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翻译和撰写许多有价值著作的五年。在哲学方面，他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社会进化史》两本专著，以及《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等论文，还与雷仲坚合译了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经济学方面，他撰写了《经济学大纲》、

^①李心天：《此身莫向沟中殒，犹上文坛作老军》。

^②访问尹景瑚记录（1980年2月6日）。

《货币说概论》两本专著和《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长篇论文，还与熊得山合译了拉比杜斯等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李达在这个时期内的理论造诣比以往更加成熟。他的著译在各地影响很大，其中尤以《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影响最大。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出版，很快流传到延安。毛泽东仔细阅读了此书，并作了眉批，称赞“这部书翻译得及时”。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仅半年时间，毛泽东就用毛笔、红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了近一万三千字的批语。”^①除批文外，还用了约十种符号在书的原文中分别作出标记。毛泽东看了这部论著的两个版本（一九三五年六月第三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第四版），其中一九三五年的版本，从头到尾都作了批注、圈点和勾画，这部书的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段文字批注有近千字。在这些批注文字中“有不少是联系中外历史以及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进行分析对比得出的结论和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等。在这些批文中还提出了一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重要价值的政治问题和哲学观点。”^②这本译著在白区也有很大影响，曾在监狱绝食斗争后阅读过此书的魏文伯，在一九七九年将他珍藏了四十多年的这本书交给国家出版局建议再版，并在该书的扉页上写道：“此书曾于一九三五年狱中绝食斗争结束后第一次学习过。一九三九年郭洪涛同志于

^{①②}折中：《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

去延安起程前曾以此书赠我，不幸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在日寇对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的‘扫荡’中被日寇‘剔抉’以去。一九四三年在日寇扫荡鲁中后的某村火堆中再得此书，‘四人帮’被粉碎后，此书于一九七八年无恙归来。”^①以上历史情况，生动地反映出李达的这本译著在当时深受革命者欢迎的情景。

《经济学大纲》是他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晶。一九三五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出版。毛泽东在延安向理论界推荐此书时说，“李达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②李达写此书的目的是，把“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姿态、特殊的特征”，进行剖析，以期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经济理论，掌握“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了解“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③。基于上述指导思想，他在《经济学大纲》中具体考察了中国经济的现状，指出了“三个相互交错的过程：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民族资本萎缩的过程和封建农业崩溃的过程。”由于“第一个过程占据统制地位”，所以“现在的中国经济，是处于帝国主义宰割之下的，工农业陷于破产状态的经济，……是国际资本主义殖民地化的经济。”这样，中国国民的生路“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整个中国自求生存，自求解放的问题。”显然，他从

①参见武达功：《李达著作历险记》，载《湖北日报》1981年1月7日。

②参见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解放军报》1978年12月28日。

③李达：《经济学大纲》绪言。

中国经济现状分析中得出的政治结论是，只有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社会学大纲》为四十余万字的哲学名著，是李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日寇侵占东北，窥视华北的时候写成的理论著作，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收到李达寄去的《社会学大纲》后，“读了十遍”^①，并作了详细的眉批，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了这本书，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在十年反动时期有这样一本书是难得的。毛泽东还写信给李达，希望将此书再寄一些到延安去^②。当时刘少奇也曾向干部推荐这本书。为了适应广大革命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新华书店于一九四八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重新出版此书。直到一九六一年八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见李达，还建议将此书修改出版^③，认为对当代的读者仍有现实意义。

《社会学大纲》完稿于一九三五年，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讲义印发，一九三七年五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李达在初版扉页上的题词写着：“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他在此书的四版序言中指出，撰写此书的目的是，“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此指导我们的实践”，去“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

①参见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解放军报》1978年12月28日。

②③参见《李达文集》编辑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 李达同志》，载《红旗》1981年第2期。

《社会学大纲》以缜密的逻辑，充分的论证，独特的见解，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全书共分五篇。因为它是以社会学命名，故唯物辩证法只写了一篇，历史唯物论写了四篇。

《社会学大纲》的唯物辩证法虽然只写了一篇，但实际上唯物辩证法是贯穿全书的一根红线，其份量约占全书的一半，写有四章。第一章，详尽地考察了“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和“唯物辩证法的生成及发展”的历史过程，说明唯物辩证法“是人类全部知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①，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实践概念的批判的意义，指出：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践概念，寓于唯物论之中，“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②。第二章论述了辩证唯物论的一般特征、唯物辩证法的对象以及世界的发展与世界认识史的概观，阐明了“辩证法、认识论与论理学是同一的科学”^③。他唯物而又辩证地分析了意识的能动和受动的两重作用。指出“唯物辩证法首先是世界观”，“同时它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第三章中，李达首先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系统地阐释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从论述“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与辩证法的发展观”的对立入手，论述了发展的原理；分析了事物的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的辩证关系，认为“一切运动本身都是矛盾。”^④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强调认识事物的特殊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抓住那表现发展的链子中的特殊的环”，说明了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是

①②③④ 《李达文集》第2卷第69、57、104、126页。

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活的灵魂。文中接着阐明了对立物的同一性和互相渗透及其斗争性的关系，指出这三者“是理解辩证法的核心最根本的条件”^①；指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关系，认为：“一切拮抗（或敌对）都是矛盾的发展阶段，而一切矛盾，不必都发展到拮抗的阶段。”^②李达还进一步着重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明确指出：“对立物的统一的法则，是在于说明客观对象是对立物的统一，因其内在的矛盾即对立物的斗争而运动而发展，由一种形态转变为别种形态。”^③“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根本法则，包摄着辩证法的其余的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法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因果性的法则，形式与内容的法则等。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他一切法则的关键。”^④其他法则，“可以说是对立统一法则的不同的显现形态。”^⑤“对立统一的法则，和唯物辩证法全体一样，都是行动和科学的研究之指导。”^⑥第四章，详尽地考察了人类认识和思维的辩证过程，系统论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先指出人类认识是一个辩证的过程。那就是“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其中包括着由物质到感觉及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的发展过程。”^⑦接着强调感觉是认识的出发点，“在世界的具体认识上，都必须由感觉出发。”^⑧再次，他深刻地论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是互为条件的。“随着对于外物的感觉的发展，人类对于外物的理解更趋于深刻，……对于外物有了理解，就能更正确、更深刻地感觉外物。”^⑨所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李达文集》第2卷第126、130、128、163、134、209、223、234页。

以“论理的认识，比较感性的认识，更加深刻地反映现实。”并且进一步阐明社会历史的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和地位，强调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由感觉向思维推移的根据和契机，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认识的目的。所以，“认识的深化运动，也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显现的”^①。认识的正确与否，“只有实践才能给以最后的证明，只有实践才能把握对象之历史的具体性。”而且“实践与认识是不可分离地统一着。实践不但证明认识的真理性的，并且依据认识的真理性的而积极的变革客观世界。”^②最后，他概括地提出了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总规律，即“‘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这是采取圆形运动而发展的”，“这个圆的运动，不是形而上学的循环，而是辩证法的发展。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所以，认识的这种圆运动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发展过程。”^③

《社会学大纲》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包括“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等四篇。它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论的对象，并结合批判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般原理，剖析前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经济构造，着重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各自的一般特征以及两者的根本对立；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国家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

他首先阐明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内在联系与统一，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是

①②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235、266页。

社会的研究方法，是社会的实践南针”，“是现代最进步的阶级普罗列达里亚（按：无产阶级）能动地推进现代社会发展的学说。”在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时，它阐明“生产力是生产关系运动的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等观点。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李达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包含着生产力的诸要素的发展，而生产力诸要素的发展，是在技术发展的影响之下显现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准，由技术的水准所测定。”^①“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动因”^②，“为了要使科学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有力的要素，就必须使科学参加于生产过程而在技术上去应用它。”^③李达在着重剖析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后，还说明敌对社会中适应于生产力而形成的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由助长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而转化为它的桎梏，“当现代社会发展到障碍生产力发展的帝国主义时代”，“就是现代社会的经济构造已届转变的时代。”^④他进一步说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阶级的冲突”。就是说，经济构造的转变必须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进行。在论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时，李达着重论述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在论述了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而且“对于经济基础却又给以一定的反作用”之后，深刻地指出：“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从基础得到发展的力量而来的。可是这些上层建筑作用的结果，只在它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

①②③④ 《李达文集》第2卷第368—369、369、371页。

之时，才能持久，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方面，反作用虽也能延缓，并障碍经济发展的过程，却决不能变更这发展过程的倾向。而经济的必然性，结局是必须打开它的进路而前进的。”

这部著作始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第一版的序言中，说明全书原计划分六篇，第六篇是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准备系统地剖析中国社会。这一篇虽因故未整理出来，但是，他把研究所得的结论简要地指了出来，认为“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殖民化过程中的社会”，中国人现阶段的“历史使命”是“要使中国从这种过程中解放出来，……以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中国社会，进行社会革命的理论和方法，论证了中国的出路在于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即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它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精神和革命要求，也对我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总的说来，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虽然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李达仍是坚持革命，继续为党工作的。他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颠沛流离中苦斗

抗日战争期间，李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日军的追捕下，受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但他始终坚持为党工作，保持革命气节，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

①②《李达文集》第2卷第292、5页。

述和宣传。

“七七事变”后，李达应聘到广西大学任教。可是，当他由上海绕道香港经广州到达桂林时，就被解聘了。不得已又回到故乡零陵。一九三七年农历八月二十日，其父去世，在家料理丧事，忧国思亲，哀痛不已。

一九三八年二月，原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就任广西大学校长，李达才再次被聘到该校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深受学生欢迎。这年秋，李达因病不能上课，黄逸峰教授代他上课几星期。黄逸峰在回顾这次代课的情景时，深有感触地说：“李达同志当时在学生中的威信是很高的。他著有《社会学大纲》，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有启蒙作用，吸引青年深入考虑世界观的改造，考虑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社会，分析社会和改造社会。也吸引同学们联系实际和关心研究当前抗战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他还说，通过这次代课，“不少同学都愿和我接近，经常和我讨论抗战问题。”^①

一九三八年冬，冯玉祥路过桂林，邀李达同去重庆。他们途经贵阳，于次年元月到达重庆，住在南温泉。李达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并为他及其研究室人员讲辩证逻辑，还代邀黄松龄、邓初民讲经济学和政治学。李达同在冯玉祥研究室工作的共产党员赖亚力一道推动冯玉祥同共产党合作。冯玉祥之所以坚决反对蒋介石投降、分裂、反共的政策，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赞成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①黄逸峰：《中国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读李达〈社会学大纲〉》，载《书林》1980年第4期。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是与李达“讲解辩证唯物论，对冯玉祥有帮助”^①分不开的。李达无论在什么地方，其学识、其人品堪称楷模，都为大家敬重。邓初民谈起当年对李达的印象时说：“李先生学识湛深、践履笃实，蔼然学者。其说话、写文章，一如其人，简洁、明确、朴质、实际、澄澈，对于现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具有真知灼见，对于任何问题，抓得住中心环节，而且立身处世，心有所主；不为富贵、贫贱、威武世俗之物所摇撼，实有足多者。”^②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董必武对李达关怀备至，毛泽东还从延安给李达寄来一信，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欢迎他到延安去^③。周恩来让吕振羽去看望他时，也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说：“去延安，只要有碗饭吃，我都愿去。”^④这时，恰巧周恩来出国治病，董老也不在，主持南方局的一位同志误认为“只要有碗饭吃”是讲条件，反感地说：“到延安，是干革命，还要讲什么条件？！”^⑤于是，去延安之议作罢。时值平江惨案之后、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李达对吕振羽说：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环境怎样恶劣，我这个‘老寡妇’是决不“失节的。”^⑥后来周恩来返渝得知此事，非常生气，说：“干革命难道不吃饭吗？李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⑦为此，周恩来深为惋惜，李达也颇后悔。

一九三九年九月，李达离开重庆，并留有长信给冯玉祥，劝他退出国民党，专事抗日民主运动，还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

①参见赖亚力谈李达在重庆给冯玉祥讲课的情况（1967年）。

②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载《人物杂志》第9期。

③访问武纤生记录（1979年11月23日）。

④⑤⑥⑦参见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

“冯将军读过此信后，把有些地方加以浓圈密点，有些地方还加上顶批。说道：‘这里算得我的箴言宝典，我要置之座右，我要终身不忘’，然而，李先生去志甚坚，冯将军虽嘉其言而不能留。”^①

李达返回桂林，原拟回广西大学教书，可是校长白鹏飞已被撤职，他所聘的教授均被解聘，李达因而失业，被迫在七星岩附近的祝圣里摆杂货摊为生。是年初冬，周恩来由重庆拍电报给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曹瑛，让其前往看望，给以政治上的鼓励和经济上的接济。李达也多次应邀去办事处讲授唯物辩证法。“他非常谦逊，他说学习唯物辩证法最好的老师是毛润之。”^②

一九四〇年春，李达因长期失业，被迫回到故乡。是年秋，他应聘到广东中山大学教书，未满一年，又被国民党教育部直接电令解聘。主持该校教务的林励儒因不同意解聘李达，也被免职。李达只得再返家乡零陵。从一九四一年九月以后，他长期困居家乡，受到反动当局和特务分子的监视。可是，他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著述，并于九月在《文化杂志》第二号发表《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

一九四四年八月，零陵沦陷，日军追捕，他同妻子石曼华背井离乡，逃往道县瑶山避难。途中遭土匪抢劫，粮食、衣物、被褥均被洗劫一空，包括他长期辛勤写作的手稿和珍藏多年的毛泽东在延安给他的亲笔信。他们一家住破庙，吃野菜，东躲西

①参见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

②参见曹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载《人民日报》1981年4月28日。

藏达一年之久，几乎饿冻而死^①。然而，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当局，却丝毫没有放松对他的追捕和迫害，使他完全失去自由。反动势力对李达也曾采用收买、利诱的一手，统统遭到他的严辞拒绝，表现了革命者坚贞不屈的高尚品格。

战斗在岳麓山下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李达回到家乡。他同所有善良的中国人一样，满以为颠沛流离的生活从此终结。那知，短暂的和平、民主，很快被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所破坏，人民大众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李达本人也仍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毫无行动自由。家境也很困难，“不得不靠卖酒谋生”^②。

一九四七年初，李达经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协助，由友人李祖荫介绍到湖南大学任教。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学校当局对他规定“三不准”：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发表演讲，不准在家里接待学生，并把他列入黑名单的第一名，作为随时可以逮捕的对象。但李达仍然积极支持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在这年五月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他对来访的进步学生公开表示：“国民党反动派不垮台，人民就要遭殃！”^③一九四八年湖大举行形势座谈会，讨论新民主主义问题。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主题是讲中国非改革不可，旗帜非常鲜明^④。

①访问石曼华记录（1979年11月6日）。

②访问龙秋初记录（1981年5月10日）。

③参见紫红：《我们知道的李达老师》，载《中国青年报》1980年10月7日。

④访问朱剑农记录（1980年1月14日）。

还有一次，他因病不能出席座谈会，就事先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同学们。当讨论会上宣读他的意见时，全场响起了极其热烈的掌声^①。尽管在反动派看来，他是眼中钉、肉中刺，然而在进步师生心目中，他享有很高的声誉。因为大家感到“他是一位可以完全信赖的老师。”^②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和进步师生是患难与共的战友，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他为进步学生加入地下党感到由衷的高兴，并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在这黎明的时刻，要特别当心留意！无谓的牺牲是没有价值的。”^③老师关心学生，学生更加爱护老师，特别是当他列入黑名单，随时可能被捕时，地下党组织的进步学生全力保护他和其他同志，晚上还站岗放哨^④。

湖大当局惧怕李达宣传马克思主义，有意刁难，不许他讲授熟悉的社会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指聘他为法律系教授，讲授他不熟悉的法理学。在法理学讲授中，他仍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法律现象，以巧妙的方法抨击国民党法西斯专政虚伪的反动本质。用李达自己的话说：“要我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办不到！”^⑤他以顽强的毅力，不分昼夜，不畏寒暑，不顾病痛的折磨，发愤著述《法理学大纲》。盛夏酷热，臀部磨破，溃烂生疮，不能起坐，他便把两个凳子架起扁担，支撑腿部，坚持写作^⑥。

①⑤参见尹世杰：《忆李达同志》，载《新湘评论》1979年第5期。

②参见紫红：《我们知道的李达老师》，载《中国青年报》1980年10月7日。

③参见龙秋初：《回忆李达教授》（1980年1月24日）。

④访问朱剑农记录（1980年1月4日）。

⑥访问石曼华记录（1979年11月6日）。

在这部著作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着重阐明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法律的现象与本质，对西方各个法学流派，也作了简要介绍和深刻批判。在批判资产阶级法学家的超阶级观点时，他指出，他们“站在工钱奴隶制的基础上，提倡法律是正义，是公平。”然而，这种法律的正义、公平“只是不公平的公平，不正义的正义。”因此，资产阶级的法理学，“是受他们的阶级的存在之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是想把自己阶级的意志加入统治万人的法律之中。”^①所谓超阶级的法理学是根本不存在的。这部未正式发表的著作，“是我国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也是他对我国法学的重大贡献。”^②近几年来，它受到法学界的重视，法律出版社拟全文出版。李达不仅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这期间，他还重新整理出版了《先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社会学大纲》、《货币学概论》等书。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间，中共湖南省工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可以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局部和平的指示精神，决定积极开展策动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起义的工作。湖南地下党组织负责策反工作的余志宏同李达过从甚密，了解他和程潜的顾问方叔章（程潜任天水行营主任时的秘书长）熟识。因此，党组织委托李达去做程潜周围高级人士的动员工作，再通过他们去影响程潜，使其弃暗投明，走和平起义的道路。李达欣然允诺。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方叔章对和

①《李达文集》第1卷第709页。

②参见韩德培：《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平起义的意义有了较深的认识以后，就以他出面约请便宴为名，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岳麓山桃子湖方叔章的住宅，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座谈会。应邀出席的除了李达、余志宏以外，还有省保安副司令肖作霖，省府秘书长邓介松，程潜的族兄弟、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程星龄，民盟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湖大教授伍蕙依。座谈的题目是：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湖南怎么办？程潜向何处去？其目的是影响邓介松、肖作霖，消除他们的顾虑，促使他们积极支持程潜起义。大家在一块漫谈时局，分析形势。李达就当前的形势、湖南地位及中共政策等发表了很有说服力的谈话。他们向李达探询：“在这样的形势下，程颂公（程潜号颂云——笔者）究竟怎样处理才好？”他剀切周详地说：“颂云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是一向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孙先生生前就已深知，只有和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他最后是这样做的，事实也证明了他从实践中得来的真知灼见。以颂云先生的经历，当然应该有更深的体会。从孙先生逝世到今天的历史事实，又该领受不少教训了。孙先生早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今天已经这样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的潮流，难道颂公先生还没有看清楚吗？我想是不会的。”^①他坦率地指出：“程颂公应当替湖南人民着想，坚持和平。蒋介石已经管不着湖南了，只有白崇禧这一点残余的武力，可能还要同共产党较量一下。今日的问题是集中对付桂系，这一点要早作准备。”^②他力主程潜以湖南三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他还建议把程潜的长子从上海叫到长沙来，让

^{①②}肖作霖：《湖南起义亲历记》，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他们父子多商量。实际上是要在上海办进步刊物的程博洪回来做他父亲的工作。事后，肖作霖等向程潜详谈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特别是李达讲的一席话，使程潜大受影响。据肖后来回忆：“他（指程潜）对李达所说的话，也频频点头表示赞赏，说：‘本来就是他说的这样，现在确实没有别的路好走了。’”^①程潜决心起义，要求和湖南地下党组织联系，李达立即通过余志宏报告省工委书记周里。中共湖南省工委也通过李达向方叔章转达党对程潜的要求，程潜得知后表示全部照办。一九四九年元月下旬，李达因患胃穿孔在湘雅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方叔章和程博洪去看望他时说：程潜愿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但顾虑“战犯”头衔。因为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第一批战犯名单中，有程潜的名字。李达请他们转告程潜：只要决心走和平道路，新政府决不当作战犯，还会以礼相待，委以重任。申述了我党对于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过了几天，程潜托方叔章表示：“只要共产党不把我当战犯，于愿已足。”^②随后，程潜还帮助李达去北平，希望能将他的意愿直接上达毛泽东主席，并要求与湖南地下党组织正式代表见面。

一九四九年四月，程潜派人向李达暗示，特务机关即将逮捕李达。四月十六日，在中共华南分局的安排之下，李达由李梅彬、陈力新护送北上。本来，一九四八年初，毛泽东曾三次电报指示华南分局设法护送李达到解放区，并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带信给李达。这封密信写的非常巧妙：“吾兄系本公司发起

①肖作霖：《湖南起义亲历记》。

②参见《李达自传》（1958年3月）。

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①只是那时未能成行。这一次，李达化装离开长沙，四月二十日秘密抵香港，五月十四日到达北京，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五月十八日李达与阔别多年的毛泽东彻夜长谈。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形势和程潜要求和平解放湖南的意向^②。后来，程潜回忆说：毛泽东给他的信中，谈到从李达那里得知他有起义之心，鼓励他下决心弃暗投明。

李达到达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建国的筹备工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党中央根据他的申请和他几十年的表现，由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刘少奇作介绍人，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要候补期。这是对李达脱党后二十余年政治表现的最好的结论。

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在教育 and 理论战线上又战斗了十七个春秋。他先后担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兼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武汉分院院长，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常委、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国法律学会理事、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

^{①②}参见陈力新、李梅彬：《毛泽东同志和李达同志的友谊》，载《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3日。

席，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行政）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常委兼文教委员会主任；还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湖北省委委员。

在解放后的十七年中，李达主要是担任学校校长职务，为党的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他认真执行党的教育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发展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他能按教育规律办学，明确办学的指导思想，坚持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国家输送大量有用的人材，把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办成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

一九五〇年二月至一九五三年元月，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他一到任，便以“改造旧湖大，建设人民的新湖大”为宗旨，贯彻“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科学知识”三位一体的教育方针，在教学过程中，强调把“爱国主义教育”与“业务教育”结合起来。他说：“在教学中，必须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离开了爱国主义精神，教的学的都是空谈，不切实际，是人民大学的教育所不需要的。”^①办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教？为什么学？教，是要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材；学也是一样，学习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干部。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这

^①李达：《在学生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载《人民湖大》1951年4月23日。

就是人民大学教育的目的。”他明确指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系的教学，都要贯彻科学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和大众的方向。教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都要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国防服务，所有各门学科的讲授，都力求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①他还反对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囫圇吞枣”，“理论与实际脱节”；主张“死书活读，精简不必要的篇幅，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灵活联系，并且加深对新鲜事物的强烈认识。”^②这些办学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当年李达在湖大，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改造旧教育制度，进行新教育制度的建设的。首先，他紧紧抓住思想改造这一中心环节，组织全校人员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党史、《实践论》和时事政策。他亲自动员，带头讲课，并且主编《社会发展史讲义》，同时还组织师生参加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等各项运动。通过这些措施，提高了广大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觉悟。他还以极大的努力，大抓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取消了含有毒素的课程，添设和十分重视政治理论课，成立教学研究部、院系教学委员会和各科教研组，使教学计划化、组织化，“培养学习研究风气，提高教学水平。”他提出“一切服从于教学，教学服从于政治”；并要求“把提倡新学术的风气作为校风。”^③同时，对某些课程作了必要的精简，使各门课程和各系的培养目标密切配合，从而减轻了学生的负担，提高了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党的领导下，李达带领全校师生员工，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湖南大学无论在形式上、实质上初步走上了轨道，

①②李达：《在学生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会上的讲话》。

③李达：《本期教学与行政工作的总方针》，载《人民湖大》，1951年10月8日。

使其面貌焕然一新，使它“由一个破落的旧型大学，改变成为人民的新型大学。”^①

一九五三年二月，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怎样把武大这样一所旧教育和旧传统影响根深蒂固的老大学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他虽然年逾花甲，却以赤子之心全力以赴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他在武大就职时的欢迎会上号召大家团结一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办好武大。他认为我们党要领导好高等教育，如果没有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到校后抓的头等大事，就是亲自筹建马列主义教研室并兼主任，亲自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师资。当年暑假他就率领该室的中青年教师上庐山备课，亲自审阅他们的教学大纲，指导“马列主义基础课”内容的改革。他不顾校务繁忙，年高体弱，还亲临教室听课。为了提高教师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办好学校，他又创办了马列主义夜大学，在自愿的原则下，组织教师和干部学习。他亲自拟订夜大学的教学计划，选派任课教师，作动员报告。开学后，他每周听一次学习情况的汇报，并且亲自担任哲学课的讲授。每次课前，他都将写好的讲稿印发给大家，然后针对大家自学中提出的问题讲授。“武大的一些老教师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他教的”^②。他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讲世界观、方法论的，对一切科学和各项工作都有指导作用。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学不首先抓马克思主

①参见：1953年1月28日《人民湖大》关于《全校师生热烈欢送李达校长》的报道。

②齐民友：《应当实现老校长办好武大的遗愿》，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义哲学的教育，是办不好的。一九五六年，他重新创办武汉大学哲学系（武大原有哲学系，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合并到北京大学），亲自兼任系主任，亲自编教材，抓试验班，为该系首届学生讲哲学。他年逾花甲，精力不济，但仍坚持讲课，站着讲有困难就坐着讲，板书有困难就请助手帮忙，克服种种困难，每次都坚持讲两三个小时。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使大家深为感动。

李达始终把教学和科研作为学校的中心工作，对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抓得很紧。对“三材”即人材、教材、教学器材的基本建设极为重视。他特别重视人材。他常说，要办好一个学校，就要有几个名教授，办好一个系，就要有几个拔尖的人，也就是要有学术上的带头人。“大学是最高学府，教师要有最高学术水平才行。”^①“教师的教学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水平，是反映学校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出成品’，‘出人才’的最基本条件”，“必须把师资提高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列为学校的中心工作之一”。为此，他注意培养中青年教师，还广开才路，到处招贤纳士，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充实学校师资队伍。他尊重专家教授，经常登门拜访，促膝谈心，征求办学意见。为把武大办成名符其实的重点大学，赶上国内外先进水平，为发展祖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李达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九五五年，中央提出“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李达认真贯彻执行。他反复强调：“贯彻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关键，在

^①李达：《在文科系主任汇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7月4日），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于教师树立全面负责的思想。”^①他要求教师教书教人，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能生动活泼地全面发展。他认为，只有这样，高等学校才能为国家培养和输送真正合乎规格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才能赶超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

但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李达的办学思想和主张遭到“左”倾思想严重的人的各种非难，工作遇到很大阻力。然而他矢志不移，以极大的勇气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坚决抵制那些打乱教学秩序、妨碍教学质量提高的各种“左”的错误，态度鲜明地反对一九五八年教育战线上的“革命”。他赞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反对让师生长时间下乡下厂单纯劳动、影响专业学习的错误作法；他赞成知识分子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但反对“拔白旗”，师生“打擂台”，让学生编讲义放“卫星”，贬斥专家教授的作法。当时有人不仅要打倒许多有学术成就的教授，还提出“打倒牛顿”、“打倒爱因斯坦”的口号，李达曾说过：“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②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学校也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他忧心忡忡地对主持日常校务工作的副校长何定华说：“七反八反，把教师都反光了，还怎么办学？”在此以前，他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进行过抵制。

一九六一年，高教六十条颁布后，李达极为兴奋，认为办好武大有了准绳，亲自带领全校师生坚决贯彻执行。他在党委会上明确指出：“教育革命把教学计划打得稀乱，把基本理

^①参见《学术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扩大）》，载《新武大》1956年1月14日。

^②参见海波、王鲁，《纪念和学习李达同志——哲学系教师座谈纪要》，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论、基础课搞得四分五裂，教学质量降低了，教学秩序、国家的许多制度打乱了，使党领导的学校成为无政府、无组织，师生关系，青老关系，党群关系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大声疾呼恢复教学秩序，立即纠正由助教担任教研室主任和系主任的荒唐作法，要求各系总支书记不要总揽教学行政大权，要由有经验的教师担任基础课教学”，“要恢复各项规章制度”^①等等。一九六二年以后，随着教学秩序和教学制度的恢复，他指出教学要求的日益提高和师资力量的薄弱是武大当前的主要矛盾，培养和提高师资是当务之急，是学校能否办好的关键。他多次召开校务会议和系主任会议，“希望各系主任找点有培养前途的教师，以三至五年为期，十年八年在学术界出现几个有地位的，把中级骨干充实起来”。他还进一步要求“各位系主任拿出六分之四的时间带个头，向学术方面进军。”他从革命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指出：“科学上没有长足进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能。”^②在他的领导和号召下，学校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到一九六六年，各系的教学骨干队伍基本形成，初步达到了他提出的三、五年为期的预定目标。

李达很重视科学研究，强调高等学校要出科研成果。他既是学校科学研究的组织者，也是模范实践者。全国解放以后，他撰写了一百多万字的论著，还带研究生，为培养科研人才作出榜样。他还亲自组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积极开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

①李达：《在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5月22日）。

②《李达同志讲话、信札选登》，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总之，全国解放以后，李达在担任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的领导工作中，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抵制各种错误倾向，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宣传、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战斗到最后一息

新中国建立以后，李达除了担负教育行政工作以外，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原则，积极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李达对人民领袖毛泽东十分尊敬。他把认真学习、积极宣传、准确解释毛泽东思想当作自己的光荣职责。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毛泽东的《实践论》重新发表。他怀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敬心情，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宣传这篇光辉的著作，半年时间，就撰写出《〈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怎样学习〈实践论〉》、《〈实践论〉学习提纲》等文章和《〈实践论〉解说》一书，还为湖南大学师生作了《关于学习〈实践论〉》、《怎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报告。这些论著和报告，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实践论》的基本观点，论述了《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他在《〈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的长文里，专门写了一节《〈实践论〉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具体论证了这一点。这篇论文作为首篇收入到《〈实践论〉解说》一书中。他指出，《实践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这是中国革命行动的理论，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

科学总结。”因而“是一个极其富有指导意义的革命文献”。

“我们应当把它当为一个革命行动的指南来学习。”^①为了准确地解说毛泽东思想，他把打印本寄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百忙中亲笔作了一些修改，并于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给李达回信，称赞“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作用。”还鼓励李达说：“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写些文章。”^②

一九五二年四月，毛泽东的另一篇哲学著作《矛盾论》重新发表，李达又用了半年时间，撰写了《〈矛盾论〉解说》，并寄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及时回信，特地告诉他说：《矛盾论》的原文中关于“无论什么矛盾，也无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一句话中的“也无无论在什么时候”这八个字应删，并且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请李达在解说时加以注意^③。为了深刻阐述《矛盾论》的基本思想和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以及它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李达还撰写了《〈矛盾论〉——中国革命的辩证法》、《〈矛盾论〉——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等论文。

李达撰写的两本“解说”及有关的论文，是五十年代中国哲学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成果，是当年辅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良师益友。两本《解说》

①李达：《〈实践论〉解说》第1、11页。

②③参见毛泽东给李达的信（1952年9月17日），载《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

自五十年代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两本“解说”得以重新出版，使作为宣传辩证唯物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通俗的优秀作品得到更为广泛地流传，将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发挥战斗作用。

一九五四年，李达撰写了《胡适思想批判》和《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这两篇文章寄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在几天之内就给他回了信。毛泽东在信中对文章给予好评，并希望他“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未知以为如何？”^①接着，李达又写了《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对实用主义的反动本质作了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

一九五九年，李达虽已七十高龄，仍然满腔热情地同年轻人一道编写哲学教科书。他说：“我是一个老兵，我应当上阵！”他不但自告奋勇地要求分担编写任务，而且主动地为湖北省编书小组作了关于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发展的报告。不久，他病倒了。除了原有的胃溃疡、高血压、糖尿病外，冠心病已发展到引起浮肿的程度，不得已于一九六一年夏天遵医嘱到庐山休养。那时，毛泽东也在庐山。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约李达畅谈，又一次肯定李达在十年内战时期写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还说，这本书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也还有意义，应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李达说自己精力有些不济，手颤得厉害，怕不行了。毛泽东鼓励他带几个助手帮助修改。他立即接受了毛泽东

^①毛泽东给李达的信（1954年12月28日）。

当面交待的光荣任务，并于八月二十八日写信给当时武大哲学系的副主任余志宏，对这一工作作了部署。信中说：

我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了，旧病未去，新病续增，今年增加了两种病症，其一是四月间新添的浮肿病，今尚未愈，据说这与一般的浮肿不同，而是一种与年老有关的病；其二是心脏病，据武汉医学院来信报告心电图的结果说：“冠状动脉硬化，供血不足，宜小心在意。”后一种病可能是送终病，这不能不做思想上的准备。

日前见到毛主席，在谈话中，主席嘱咐我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我说，现在精力不济，他说可以找几个得力助手帮忙，我表示照做。因此，我想回校后立即开始这一工作。至于助手呢？德麟、玄武是合适的，但他们有教学任务，至多只能拿出一部分时间来相助，我还希望你在所有毕业生中选派两位能想能写的人跟着我干。这样做，对于他们提高教学质量是有益的，请你替我考虑一下，并大力予以支持。

假我数年，拟首先完成以下几项工作：

一、《唯物辩证法》——即社会学大纲上半部分的改写，至于下半部不拟改写了。

二、《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已有些轮廓。

三、修改《〈实践论〉解说》。

四、修改《〈矛盾论〉解说》。

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后记。

六、《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上面六项工作如能在三年之内完成，并且那时我还能

活着，就再进一步搞别的东西，这是后话^①。

这就是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接近生命终点时所想到的一切，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回校后，他立即抽调教师、助手，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开始工作。但是，一接触到具体修改《社会学大纲》，他的想法又不同了。因为，尽管毛泽东对他的专著作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这本书毕竟是二十多年前写的，没有概括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新的哲学研究成果，没有反映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和发展。这样一部旧著仅仅作些一般的修改是不能适应当前斗争需要的。因此，他毅然决定动手大改。他对助手们说：“苏联人写了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世界上到处流传，我们就不能写一部跟他们唱对台戏吗？革命人民很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书不但要写给国内的人民看，而且要写给全世界人民看，尤其要写给亚非拉人民看！这本书就叫《〈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吧！要写五十万字！”他还很动感情地说：“苏联的书（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引者）是院士、博士、教授们写的。我们一个都没有，能不能写呀！我能写！只要下苦功夫，一定能写好。”^②

从此，他不管死神的随时降临，坚持写作近五个春秋。五年中，他每天打针吃药，仍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地坚持工作。他亲自查阅各方面的材料，亲自拟提纲，和助手们反复讨论。

^①李达给余志宏的信（1961年8月28日），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②陶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载《书林》1979年第2期。

定稿时，他又亲自过目，仔细修改，或者提出修改意见；遇到难题，往往琢磨好几天，一旦有了新想法，即使是深更半夜，也要跑到他住宅旁边的研究室唤醒助手及时讨论。有位领导同志看到他写字双手颤抖，心痛地劝他说：“李老，你这么重的病，总要休息一下吧，何必自苦如此呢？”他回答说：“我已经是风烛残年，来日不多了，我还能为党做什么工作呢？就靠这支笔了。我这支笔不能停。哪一天我不行了，我就掷笔而去！”^①一九六五年下半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即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脱稿了。他极为兴奋，送请工厂用四号铅字印了少量的稿本，分送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审阅。这时，他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家已搬到北京居住。但为了赶写该书下卷，特地在一九六六年初又赶回武大，指导助手们拟提纲，写初稿，他感叹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快八十岁了，要赶快做！”^②但是，一场浩劫不仅使他完成全书的心愿无法实现，而且连脱稿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也未看到正式出版，就抱恨终天了。

《唯物辩证法大纲》是他主编的最后一部有价值的哲学著作。它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系统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较好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党性与科学性、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对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本专著论述深入浅出，文字简练，概括了大量哲学史材料和自然科学成就。它的出版，有助于广大读者完整地、准确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

^{①②}参见陶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

原理^①。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建国以来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

李达不仅为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呕心沥血，而且对实际工作中或理论战线上的错误倾向极力抵制，用自己的生命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

一九五八年以后，他对我党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及其严重危害，有较敏锐的觉察，并出以公心，不怕打击，坚决抵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地刮起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错误。他公开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象这样搞下去，共产主义会变成破产主义，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会变成人民空社。列宁说过不能剥夺农民，我们为什么要剥夺农民？违反客观规律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他针对陈伯达等人鼓吹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谬误，在报刊上发表了《关于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等文章。并且在当时召开的中共武汉大学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的重要发言，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不能混为一谈；要看到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和发展水平毕竟还是相当低的，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消费品的分配还不得不适应按劳分配的原则。”因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不但不会取消，而且要继续发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

^①参见人民出版社关于《唯物辩证法大纲》的出版说明（1978年5月）。

取消。”^①他还提醒人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决不能“降低共产主义标准，助长平均主义倾向”。^②

一九五九年九月，他在青岛休养期间，得知庐山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对身边的助手说：“现在本来应该反‘左’，怎么反右来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不会是‘反党集团’。”不同意对他们的那种批判。他谈到彭德怀等同志的革命功勋和高尚品德时，激动地说：“这些人会反党？不可能！党内出了怪事！”一直“想不通”^③。一九六一年八月在庐山与毛泽东畅谈时，他披肝沥胆、直言不讳地讲了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党的工作中“左”的错误的看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一九六二年九月，他以“人大”代表身份去湖南零陵视察工作，仔细地询问了故乡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调查了“五风”的危害，严肃批判了“五风”造成的严重恶果，根据调查所得，公开表示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④并就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零陵县委和湖南省委去信，反映真实见闻，提出了改进意见。

虽然一九五八年的“左”倾错误后来逐步有所纠正，然而窃居高位的林彪一伙并未铲除，李达同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六三年以后，林彪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

①②李达：《关于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载《七一》，1959年3月15日。

③④参见陶德麟、肖莲父：《怀鹤鸣师》注6，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工农兵学哲学”的名义下，通过报刊杂志散布了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诸如学习马克思主义可走“捷径”，记住几个条条就行了；讲系统性、逻辑性就是脱离实际，背几个“警句”就算“活学活用”等等。李达对林彪一伙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深恶痛绝，他严肃地指出：“在科学的大道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捷径！”

“写教科书不能没有系统性，不能不讲逻辑性，联系实际也不能生拉硬扯，不要赶热闹，要有科学性。我们还是要坚持从老祖宗讲起。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你不讲马克思、列宁的东西，怎么讲得清毛泽东思想？总得有个来龙去脉嘛！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①李达还针对林彪所谓“毛泽东思想处处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谰言进行了分析批判，主张把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讲深讲透，要实事求是，反对牵强附会。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林彪的险恶用心，提出讲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讲得合乎科学，不要硬讲成到处都发展，结果真正的发展反而被淹没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林彪的“顶峰”论在一些报刊上大肆宣扬起来，李达惊愕地说：“是‘顶峰’！不发展了吗？”有人当场提醒他：“这是林副主席讲的啊！”他愤慨地回答：“我知道是他讲的，我不同意！”“不管是哪个讲的，不合乎唯物辩证法，我都不同意！”^②“有些人对毛泽东思想一窍不通。”^③面对着林彪这个已经篡夺了党和国家部分权力而且野

^{①②}参见陶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

^③参见尹世杰：《忆李达同志》，载《新湘评论》1979年第5期。

心正在恶性膨胀的“庞然大物”，李达用这样蔑视而有力的语言予以痛斥，这种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大无畏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就是这句话，触怒了林彪、康生一伙和那些“紧跟”他们“造反”起家的人。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康生一伙就对李达发动了突然袭击。他们指使爪牙聂元梓等在北京“揪出”了所谓“三家村”“黑帮”不几天，也在武汉大学制造冤案，宣布“揪”出了“三家村”“黑帮”。这个“黑帮”包括两百八十多名干部、教师和工人，李达被诬陷为“黑帮”总头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他创办的哲学系诬蔑为“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子”，把他主持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诬蔑为“裴多菲俱乐部”，把这个研究室的党支部诬蔑为“国民党支部”，还强迫停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一书的编写，查抄了全部资料，赶走了他的助手。林彪还煞有介事地“点名”诬蔑他是“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面对这些戴着“红”色面具的败类，李达毫不退缩，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对查抄他家的人，提出强烈抗议，拄着拐杖站在研究室门口，流着悲愤的热泪说：“你们把我的助手赶走了，资料不能拿走！写书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助手，我自己写！我拚了这条老命，一天写五百字，也要把书写完！”^①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以后，李达受到了种种侮辱与迫害，逼他承认“反毛泽东思想”，不让他知道就非法“开除”了他的党籍。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在高等教育部接见群众时，竟信口雌黄：“现在清楚了，李达开除

^①陶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

了党籍，他是叛徒，对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他们有那么一帮，现在夺了他们的权！”面对这种种卑劣的诬陷和残酷的批斗，李达一面写信向毛泽东申诉，一面顽强地据理驳斥。他始终坚持真理，威武不屈。在批斗会上，他从不低头，经常遭到按头、击腰的毒打，但他仍然反驳强加给他的诬蔑不实之词。有人骂他是“叛徒”，他昂首高声说：“我不是叛徒，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人骂他是“地主”，他立即驳斥说：“如果我收过一粒谷子的租，可以砍我的脑壳！”有人诬蔑他“反毛泽东思想”，他针锋相对地回答：“我学得不深不透，但我对毛泽东思想是极端信奉的！”^①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神折磨、肉体摧残，这位以毕生精力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含冤离开了人间，终年七十六岁。

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相继被粉碎以后，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李达的沉冤于一九八〇年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党籍，恢复了他的名誉，推倒了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被颠倒的历史终于颠倒过来了。

综观李达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也是笃志嗜学的一生。从五四运动以来，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为党工作。他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在法学、货币学、史学等领域中也有较高的造诣。他的理论活

^①参见陶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

动与中国革命的脉搏息息相关。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思想界经历的道路，是一份珍贵的遗产。他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研究他的生平和著作，对于党史和现代史的研究，都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李达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体系并为之献身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激励着我们前进！

高君宇

郭 杰 陈文秀

裴忠利 王庆华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言志诗，正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

高君宇，名尚德，字锡三，君宇是号，曾先后用过天辛、江越、记清修等化名。他于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出生在山西静乐县峰岭底村（现属娄烦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高君宇的父亲高配天，先在乡教学，后改营商业，曾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经常给儿女们讲义和团的悲壮故事，使幼小的高君宇萌发了一种朦胧的反帝爱国思想。因此，他常和本村的儿童们，手持木制刀矛，做着“义和团痛打洋鬼子”的游戏。一九〇六年，高配天和本县的一些绅士，

经谷思慎、南桂馨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的革命活动和对国事的议论，使十岁的高君宇耳濡目染，渐渐地对清朝腐败统治产生了不满。

一九〇九年，高君宇和哥哥高俊德一起考入静乐县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高君宇怀着“立意深造”^①的热望，于一九一二年春^②来到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在同学中，他的年龄最小。但他勤学好问，成绩优异，尤以国文见长，“所作诗文，多有奇气”^③，常被老师推荐“贴堂”，同学们争相传抄，视为范文。当时省立一中是山西新思潮的中心。高君宇在这里阅览了孙中山、章太炎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一九一五年后，《晨报》和《新青年》等报刊，更是他每日必读的报刊。他经常和进步同学讨论国事，“举动甚轩昂，言谈亦卓犖不凡”^④，深受师友的赞赏。

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依旧处在黑暗之中。有一年晋西北大旱，赤地千里。高君宇假期返乡，亲眼看到饥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而政府官员根本不理民间疾苦，他“愤懑填胸，嘘唏浩叹”^⑤，返校途中，便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部分银元和衣物，分赠给穷苦农民。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高君宇以极大的义愤参加了这一斗争。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他还将李大钊代表留日学生会起草的《警告

①③④⑤高君宇墓志铭。

②高君宇墓志铭记为民国2年春，据高君宇胞弟高全德及高君宇一中同学回忆为1912年。

全国父老书》等文章寄回家中，劝告父老兄弟要关心国事，奋起反抗。一九一六年夏天，高君宇在《各述尔志》的毕业试题中，挥洒笔墨，写下了自己的坚定志向：“当此之时，君宇已蓄革命之决心矣”^①。

(二)

一九一六年，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进一步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教育。五四前后，他赞同《新青年》提出的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专制。他极力拥护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举凡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新闻研究会等组织，他都踊跃参加，被人称为进德会“出类拔萃的会员”^②。在新闻研究会里，他听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演讲以及邵飘萍的办报经验的报告，这给他以后编辑《向导》准备了有利条件。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喜讯传到中国后，对高君宇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九一八年，高君宇从李大钊那里看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了解到十月革命的详细情形，开始接受马列主义。他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同学，经常聚集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或家中，共同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等问题。

一九一八年五月，中国留日学生为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

^①高君宇墓志铭。

^②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帝国主义签订的旨在控制中国和干涉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警的殴打、拘捕。他们不畏强暴，组织救国团，推举李达等为归国代表，罢课回国，以便联合北京等地学生，共同向段祺瑞政府进行斗争。这一爱国行动立即得到北京爱国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二十日，高君宇和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学生，到车站欢迎归国代表。第二天，高君宇等组织北大、高师等校两千余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新华门，包围了总统府，怒斥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次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使他们深感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事后，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以及张国焘等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叫“爱国会”），并派黄日葵、许德珩南下串连，扩大学生救国会的影响，并准备出版《国民》杂志，但遇到资金的困难。高君宇慷慨解囊，解决了部分资金问题，并积极投入筹组《国民》的工作。在这前后，高君宇还加入了宣传新文化的《新潮》社，担任该社职员，负责广告工作，后在改选三届职员时，被推为文牍干事。

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蛮横地将德国强占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并拒绝中国关于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正义要求。消息传来，全国震惊！高君宇和《国民》杂志社成员于五月一日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行动部署。他还同邓中夏、黄日葵等同学将李大钊当天发表的《五一杂感》中明确提出的“直接行动”的口号，传到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中去。一场大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五月三日晚，北大全体学生在法科礼堂举行大会，高君宇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主张游行抗议当局。

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爱国游行；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全国各省于“五七国耻纪念日”统一行动。会议于深夜十一时结束，高君宇等彻夜未眠，为第二天游行示威进行筹备。

五月四日，高君宇和北大爱国学生勇敢地冲破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和警察的阻拦，奔赴天安门广场，带头参加游行示威。游行群众沿途高呼“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走到东城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门前时，高君宇和一部分爱国学生攀墙冲进曹宅，殴击了正在曹家的卖国贼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曹宅。反动军警闻讯赶来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和市民，高君宇立即协助李大钊为营救被捕同学而日夜奔走。五月七日，北大被捕同学被释放归来，高君宇和北大同学在二院操场举行了欢迎大会。五月九日，北京政府传令嘉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并要传讯被释放的爱国学生，追究五四运动的“主使人”。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爱国学生的更大愤怒。高君宇受北大全体同学的委托，毅然担任了北大驻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他广泛进行组织宣传工作，领导学生酝酿着新的更大的斗争。五月十八日，北京学联在北大二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实行总罢课，发表罢课宣言，开展街头宣传活动，并决定派黄日葵、许德珩等人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发动全国规模的斗争。许德珩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五四后我和黄日葵到各地串连，这是李大钊的点子，高君宇同志坚决支持。”后来，高君宇还以北京学联代表的身份，到天津组织抵制日货活动；并专程回到山西指导太原的学生运动。

五四之前，高君宇通过王振翼（仲一）与山西进步青年学

生贺昌、李毓棠^①、武灵初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曾利用假期，召集进步青年进行座谈讨论，向他们介绍北京新思潮的传播情况，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罪恶行径，宣传爱国思想，启示和鼓励爱国青年学生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山西学生闻风而动，立即成立山西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学生开展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斗争。为了推动山西学生运动，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高君宇回晋进行指导，使山西学生爱国斗争的烈火更加迅猛地燃烧起来。

六月十一日，陈独秀因在北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李大钊、高君宇等人立即奔走营救，并动员社会舆论强烈谴责反动政府，使陈独秀得以获释。

在五四运动的急风暴雨中，高君宇因四处奔波呼号，以致积劳成疾，曾两次吐血。但是，“宇之志益坚，宇之猛烈益甚。”^②

五四运动挫败了日本鲸吞山东权益的阴谋，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失败。一九二〇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竟然又向北京政府提议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高君宇当即著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要求直接交涉的罪恶目的，是要“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他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对德宣战时，已宣言废弃中德间一切条约，山东一切物权租让都收归了”，因此，“日本便也不能因为有攻取青岛的‘功劳’便占有青岛”，“日本人

^①李毓棠字叔荫，山西省忻县人，当时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学生。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派赴苏联东方革命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被党派到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1928年霍州会议期间，因受“左”倾路线排斥而脱离组织。

^②高君宇墓志铭。

不能拿我们没承认和约来强迫我们奉行”，这就“证明日本人要求直接交涉的没根据了”。他大声疾呼：“为了国权，为了人道”^①，我们要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反对浪潮中被迫通知日本，声明“未便与贵国开议”。因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未能得逞。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使高君宇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改造社会。因此，他在一九一九年十月毅然参加了邓中夏主持的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并成为讲演团的主要骨干。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在讲演团的第三次常会上，选出了以邓中夏为总务干事、高君宇为文牍干事的新的领导机构，并确定了“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的活动方针。四月三日至八日，他们利用春假的机会，组织团员分成数组，深入到以丰台、长辛店、通州为中心的乡村、工场进行讲演。

高君宇是第一组成员，到丰台向群众讲演，这是他首次与工农结合的尝试。从五月到十一月之间，高君宇和邓中夏、杨钟健、张国焘等还到北京南城模范宣讲所屡次讲演。每逢假日，特别是遇上庙会，他们就打着旗帜，敲着锣鼓，到街头闹市宣讲五四精神。高君宇先后以《人的生活》、《什么叫“自治”——它的意义、形式和功能》、《私产制度与婚姻》等为题，进行了多次激动人心的讲演。在讲演活动中，他们经常遭

^① 《我们为什么反对直接交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0号，1920年3月1日。

到军警的阻拦，但是高君宇等不畏强暴，总是据理力争。五月三十日，高君宇和邓中夏、杨钟健等人在南城模范宣讲所讲演时，遭到该管区警察的阻拦。高君宇对台下群众高声讲道：“列位呀，我们平民教育讲演团，无非是要平民受同等的教育。现在他们连教育都不准你们享受了！”立时激起了听众对反动军警的仇恨情绪，“台下掌声如雷，很有愤怒的样子”^①。他们的宣传活动是很有成效的。

高君宇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深入工农中接受教育，很快成为一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三）

一九二〇年三月，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等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当时，马克思主义书籍是被北洋军阀视为“异端邪说”而遭查禁的，高君宇和研究会的成员冒着危险，千方百计地寻找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学习、研究。他们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晚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交流学习心得，常常到深夜十二点过后才去安寝。在研究会里，有些同学阅读外文著作有困难，英文程度较高的高君宇便主动辅导他们。

同年五月一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这天，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以北大学生会负责人的身份，

^①1920年6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组织上街讲演，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就在这一天，高君宇还发表了两篇关于工人问题的文章。一篇是高君宇应陈独秀之约，请其在晋的好友调查了山西大同、太原各行业工人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后撰写的长篇报告。该文揭露说，在阎锡山统治下工人的工资“比苍蝇的翅膀都薄了”^①，童工更是食不果腹，过着牛马生活。另一篇题为《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高君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指出：“社会的种种组织都作根在经济组织上边。社会的争斗，压制、贫困……都是经济‘不平’使然。”劳动人民要得到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把一切生产机关从资本阶级收归，按照自由共有的大义，建设新的经济组织”。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得首先“破坏政权”^②。这表明高君宇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飞跃。

一九二〇年春，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来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研究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高君宇跟随李大钊，多次参与了这位共产国际代表与北大进步学生召开的座谈会、讨论会。李大钊等经过一段酝酿准备，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十月宣布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十一月首先创办了《劳动音》周刊，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号召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从事实际活动。高君宇和邓中夏等根据小组指示深入工人中大力开

① 《山西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② 《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5月1日。

展秘密的革命活动。这年冬天，他们又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白天为工人子弟上课，晚上给工人传播革命思想，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第一批骨干，为以后成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奠定了基础。他们还把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逐步办成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外围组织，每逢星期天和假日，就到工人中宣传社会主义，以启发他们的觉悟。十一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等在北大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四十余人，高君宇被选为书记。会后，他领导团员积极在工人和学生中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在党团的建设工作中起了较大的作用。

一九二一年三月，高君宇等与来华的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格林取得了联系。北京青年团根据格林的要求，于三月十六日召开特别会议，选举何孟雄为出席少共国际大会的代表，并通过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三月三十日，在团的第四次会议上，高君宇被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北大二院举行团的第五次会议，参加的有高君宇和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等十六人。这次会议安排了五一节的活动，并议决派人到唐山发展组织。会议在讨论如何营救被拘禁在黑龙江陆军监狱的赴苏代表何孟雄时，李大钊一方面请北大校长蔡元培出面保释，一方面提出筹募营救资金的建议。高君宇不仅完全赞同，并当即带头捐款，表现了他对战友的深情。

会后，高君宇被派回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到太原后多次邀请贺昌、王振翼、李毓棠、武灵初等众多的进步青年

座谈。在一次讨论人生观问题的座谈会上，高君宇说：一个有为的青年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报效国家、造福人民的宏愿。他希望青年在流行的各种主义中，一定要深思熟虑，认定一条正确的道路，绝不要随波逐流，步入歧途。座谈中，高君宇了解到无政府主义在太原的流传及其危害情况，当即对其反动性予以揭露。他针对无政府主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一核心论点，详细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指出，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国家的，不过我们在消灭阶级之前，还是要国家的，只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才能彻底进行革命^①。他的话击中了无政府主义的要害，使与会青年受到很大教育。高君宇在逗留太原的短短几天里，多次和进步青年商谈建立革命组织的问题。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工作，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这年的五月一日正式成立，成员有王振翼、贺昌、李毓棠、武灵初等。高君宇主持了团的第一次会议，会议推举王振翼为组长^②。

为了使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高君宇和贺昌、王振翼等改组了五四后期为宣传新思想而创办的《平民周报》编辑部。改组后的《平民周报》后来在宣传马列主义，引导青年进行革命斗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该报揭露阎锡山在山西巧取豪夺的罪行，反映人民的疾苦；抨击胡适、江亢虎在太原散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谬论等方面，都是旗帜鲜明、颇有说服力的。因此，它引起阎锡山的忌恨，一九二二年五月被勒令停刊。高君宇得知此事后，把《平民周报》编

①彭真 1961 年 12 月的回忆，存太原市委组织部档案科。

②《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五一特刊》，1922 年 5 月 1 日出版。

辑部迁到北京，亲自主持编印，然后由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太原，继续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高君宇在太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就回到北京，但他以后仍经常关心山西的革命斗争。例如一九二一年七八月间，他委托王昉等人利用暑假回家探亲之机，帮助太原青年团发动进步青年以入股的方式集资创办了晋华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以及《新青年》和后来的《向导》等大批革命书刊，成了山西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据点。后来高君宇在北京得知晋华书社因经费困难无法维持时，便奔走于京、津等地为其筹措资金，使书社得以坚持下去。由于书社的影响日益扩大，终为阎锡山所不容而被查封，但它已在山西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一九二二年冬，高君宇发动贺昌等在太原第一中学成立了“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的青年学会，并出版刊物《青年》，以教育团结进步青年^①。后来，青年学会由傅懋功（彭真）、王瀛等继续主持，把吸收会员的范围扩大到校外，教育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为山西培育了一批革命干部。

高君宇在太原的一系列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开拓了道路，也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阎锡山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除将《平民周刊》和晋华书社封闭外，还指令武植林利用与高君宇的同学、同乡关系加以拉拢，但遭高君宇严词拒绝。阎锡山恼羞成怒，下令缉捕，高君宇依赖进步青年和群众的掩护，跳出了魔掌。

^①贺昌：《太原青年团体》，《先驱》第12号，1922年10月15日。

高君宇在北京和太原紧张地组建青年团的同时，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观点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二一年夏，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在北京作了《中国人的到自由之路》的演讲，鼓吹中国只有国际共管，才能走向“自由之路”。高君宇针对罗素的谬论发表了《到“自由之路”究竟在那里？》^①的文章，质问罗素：“所谓国际共管是不是要把一个国家压在更大的国际资本主义之下？”接着他说：“这那里是指给我们的到自由之路？这不过是英国第三个半阶级的一位绅士指给我们不可识别的陷阱！”

一九二〇年十月，高君宇由徐彦之、孟寿椿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由于这个团体的成员十分复杂，主张各异，目的不一，因而斗争相当激烈。高君宇和李大钊、邓中夏等北京会员中的共产党人，曾多次同国家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一九二一年七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北京的会员为了准备大会提案，于六月十七日召开了一次谈话会，围绕“本会应否采取某种主义”这一中心议题展开讨论。高君宇等提出“有采取一种主义的必要”^②。这一主张得到多数会员的赞同，大家推选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等共产主义者为出席南京大会的代表。七月一日，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在鸡鸣寺召开。因北京会员黄日葵、邓中夏、刘仁静尚未赶到，高君宇临时动议，将原定关于学会宗旨的重大议题与二日的议题互换，结果一致通过。在二日玄武湖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二十三

① 《觉悟》，1921年7月24日。

② 《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学会消息》，1921年9月1日。

位代表，围绕学会的宗旨及政治活动等重大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国家主义者左舜生和陈启天顽固坚持学会只能做社会活动，而不能做政治活动的主张，借以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会员参加革命斗争。高君宇有力地驳斥了左舜生等的谬论。他说：“人不可无一主义，是无疑的。学会会员为创造少年中国便于分工互助，不可无一种共同主义，这亦是无疑的。……我不赞成先做各种事业，以求产生共同主义的话。因无共同主义，在先所做的事，尽有背道而驰的，无可以产生共同主义之理。”^①他还以十月革命为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意义。他的发言得到南京分会代表沈泽民等人的赞同。这次大会虽然由于遭到国家主义分子的反对，未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但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等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得到了不少会员的同情和支持。

为了同国家主义分子作斗争，为了把少年中国学会引导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后来高君宇还参加过在杭州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在那次会议上，高君宇再次旗帜鲜明地倡导说：“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我相信无明显的主义便不能做出什么事业。”他明确提出当前的任务是：“除反对军阀以外，我们应于任何可能范围内揭示帝国主义的恶魔。”^②但是，这次年会声明，对各项决议只能表示意见，不要求多数人服从。因此，高君宇的意见只能起到宣传作用，未能彻底改变学会的方向。学会选举

① 《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学会消息》，1921年9月1日。

② 《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学会消息》，1922年6月1日。

高君宇为候补评议员。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高君宇被吸收入党了。北京党组织为了更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决定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青年和培养党的积极分子的机构。高君宇和研究会的同志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几经讨论之后，决定由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等出面，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招收会员的启事。他们还自筹资金，购置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建立了一个附属于该会的小型图书馆，取名为“亢慕尼斋”（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后来，研究会和共产国际建立了秘密联系，又订购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外文原著和介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高君宇等人认真研读了这些书籍，还定期举办了讨论会、讲演会，邀请非会员参加，以扩大影响。这样，研究会就由秘密走向公开，会员与日俱增，不久就由最初的四五十人发展到三百人左右。

（四）

一九二二年一月，高君宇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是由北京出发，经满洲里，取道西伯利亚赴莫斯科的。途经伊尔库兹克时，曾给家中去信，叙述旅途情况。

会上，共产国际号召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远东各国代表介绍了本国革命运动的情况。高君宇兴奋地聆听着、记录着国际的指示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伟大导师列宁虽未出席大会，但在百忙中仍接见了张国焘等

人，对中国革命作了重要指示。

大会闭幕后，高君宇和邓恩铭、王尽美等留苏学习访问一段时间。他们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一面考察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经验，还参观了工厂、学校、部队和农村，并参加了“共产主义星期六”的义务劳动。这一切使高君宇对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而更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一九二二年四月，高君宇等人为了避开白匪的袭击，便取道柏林、巴黎，从海路回到北京。五月，他到广州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七月，他又出席了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他和其他同志传达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传达了列宁和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希望，介绍了苏联的情况。会上，高君宇被选为中央委员。接着，他又参加了党中央八月在杭州召开的特别会议。他同意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这次会议决定出版《向导》周报，作为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舆论工具，由蔡和森担任主编，高君宇任编辑。

高君宇在致力于编辑《向导》期间，自己也写了许多论文，分别发表在《向导》和《政治生活》等报刊上。他在这些文章中，反复阐述了我党民主革命的思想，对唤起工人和人民群众参加民主革命斗争，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促进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这些文章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说：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公共的殖民地，他的经济生命被他们宰割了，同时支配政治的又是这些海盗们和他们扶植成的封建势力。”^①因此，“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交相压迫下的中国，是决定他急于要做国民革命”^②，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军阀，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但怎样才能打倒这两个敌人呢？他指出：“要想来推倒军阀的压迫”，搞什么请愿或示威是不够的，而是要把“群众立刻武装起来”，“把一切军阀官僚当一个整个，〔对〕准着他们一起开火起来！”^③在这里闪耀着武装斗争的思想。

其次，进行国民革命，必须由共产党这个先锋队来领导。高君宇在介绍印度革命经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出：“有了一个阶级受压迫或是几个阶级并受压迫的事实，这种环境就决定要发生革命了。”“革命是压迫环境的必然结果，是阶级对阶级的群众行动”。要革命，就“需要有革命的组织”，更“需要有领导群众实际势力的先锋队”^④。在中国，真正能充当领导革命重担的，“只有一个共产党。”^⑤

其三，要反对强大的敌人，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九二二年十月，他就对孙中山酝酿改组国民党一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国民党宣告改组，从新估定他的纲领，我们

① <读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向导>第4期，1922年10月4日。

②④ <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向导>第4期，1922年10月4日。

③ <属江西人民>，<向导>第3期，1922年9月27日。

⑤ <工人需要一个改党——<京汉工人流血记>后序>，1923年3月24日。

不能不赞许这是很合实际需要的一件事情。”^①他认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②，不仅需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通力合作，而且需要“中国的工人、农民、智识者、学生、小商人以及一切派别的社会主义、民治主义者”的大团结^③。只有这样，民族民主革命才能“迅速成功”。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④，因为“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无产阶级那一时总是较多数”，“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革命的。他特别提醒人们不要误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的真意，他说：“联合”绝不是“指大家滚和在一起来革命”，不是将“工人和雇主混合”。他强调“无产阶级要独立的组织起来”，深刻地指出在统一战线中，不可“放松了他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斗争”^⑤。

其四，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取得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高君宇根据列宁的教导，正确地分析了世界形势，指出“欧战后的世界大势，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猛烈的冲突和渐就颓败，一方面是工人与被压〔迫〕民族的联合。”^⑥他吸取了土耳其反帝斗争胜利的经验，认识到这一胜利“将使一切被压〔迫〕民族确认：只有苏俄是助他们得着解放的真正朋友。”^⑦所以他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要取得最终胜

① <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

②④⑤ <读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

③ <我们应当怎样纪念今年的五一>，《工人周刊》第63期，1923年5月1日。

⑥⑦ <土耳其国民军胜利的国际价值>，《向导》第3期，1922年9月27日。

利，只有把反帝斗争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潮流中，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才能推翻共同的敌人。

基于这一正确认识，高君宇针对北京政府迟迟不与苏俄派来的全权代表越飞谈建交问题，于一九二二年十月著文指出，苏俄是能够“助中国而又站在平等地位的”国家；“中国要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是和他（指苏俄——引者）建立亲密的关系”^①。后来高君宇又针对北京政府破坏与苏俄代理外长加拉罕来京会谈的行径，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再次著文论述了中苏建交的重要性：“与苏俄成立亲交的关系，共同来反对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国家，争得中国之独立与自由”，“是第一重要”的^②。同时，他针对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对中苏谈判建交所作的种种诽谤，指出中国“对外脱离帝国主义之羁绊而独立，对内消灭军阀之宰割而自由，为了此种使命而去联络苏俄，不但理论上是应当的，而且事实上是可能的”^③。后来高君宇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北京各界千余人追悼列宁的大会上，报告列宁生平伟绩之后，再一次提出中国应与苏俄建交。北京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才在这年五月三十日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式与苏建交。

《向导》自创刊之日起，就受到反动军阀的百般阻挠和破

① 《日俄会议及中俄会议》，《向导》第5期，1922年10月11日。

② 《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向导》第42期，1923年9月30日。

③ 《“赤色帝国主义”吗？》，《晨报》副刊第285号，1923年11月9日。

坏。一九二二年十月，《向导》编辑部迁到北京后，更是充满危险和困难。但是蔡和森和高君宇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以巧妙的方式，使《向导》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得以顺利进行。他们把印刷厂设在偏僻的小巷，以承揽市民印刷品为掩护，来对付暗中窥视的密探。为了让《向导》迅速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他们设法通过民信局和铁路工人发往上海、北京、广州、武昌、济南、南京和成都等地，再由各地书店经售。例如，发往太原晋华书社的《向导》等革命刊物，就是在高君宇的指导下，通过铁路工人秘密运往太原的。

在《向导》的编辑工作中，高君宇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身体不好，常常带病坚持工作。有时为了反映突变的斗争形势，要争取时间，他往往只买些芝麻饼和烤红薯，在写字台前边吃边写，甚至通宵达旦地挥笔疾书。他患有严重的肺病，每当劳累过度时，就剧烈的咳嗽、吐血。同志们看到他那日渐消瘦的面容和布满血丝的眼睛，劝他休息一下注意身体，他总是—笑置之。当时党的经费很困难，高君宇便将自己的生活费拿出一半来补充刊物的经费，自己过着节衣缩食的清苦生活。

高君宇在编辑《向导》周报的同时，还兼任《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编辑，以后还兼任《政治生活》的编辑。在这些刊物上，他都发表了不少的文章。这些文章象锋利的匕首刺向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象响亮的号角鼓舞着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战斗。尤其是《向导》周报，在指引和鼓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进行斗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被读者誉为“把一般醉生梦死的人们惊醒”的“警钟”^①。有的读者曾以“笔底惊雷万鬼

^①《读者之声》，《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

苦，天昏月黑一星赤”^①这样的诗句，高度赞赏和评价《向导》所起的伟大作用。

（五）

这一时期，高君宇还参加了其他社会政治活动，特别是对当时已经开展的工人运动极为关注。他除随时撰文报道消息，揭露反动派镇压工人运动的阴谋和罪行，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工人外，还直接参加了工人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中国海员为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举行大罢工，掀起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这次罢工，得到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人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等人的声援，成立了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并邀请京汉、京奉、陇海、京绥、正太各铁路工人参加，长辛店工人决定每人捐助一日工资，其他各路也作了捐助。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友爱精神。

一九二二年八月，高君宇和缪伯英、蔡和森等根据党的指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便同国民党及其他社会团体和人士结成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在八月二十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会上，高君宇、缪伯英、蔡和森、范鸿劼、刘仁静等八人被选为筹备员，负责起草章程，筹备成立大会等各项事务^②。接着，即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名义，在报上发表了《启事》，宣告“凡有志民权运动的兄弟姐妹都

^①《读者之声》，《向导》第25期，1923年5月16日。

^②北京《晨报》1922年8月21日。

一律欢迎”^①。二十四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四百余人，高君宇也出席了大会。

一九二二年五月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从而促进了北方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高君宇和邓中夏等人，以长辛店为中心在京汉铁路沿线积极开展活动，创办工人俱乐部，组织职工联合会，领导北方早期工人运动。他们通过长辛店铁路工会（俱乐部）领导工人进行反工头、反帐房司事等斗争，取得了胜利。在长辛店工人斗争的影响下，京汉铁路各段工人纷纷起来组织工会，并推动了开滦等地的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十月，著名的开滦五矿大罢工爆发了，罢工工人遭到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屠杀。高君宇遵照党的指示，与宋天放到《晨报》社工作，口诛笔伐，声援工人。他还在《向导》上揭露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罪行，指出这是“军阀与外国的武力通力合作，谋巩固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呼吁中国人民对这种“联合着向中国苦百姓的进攻”，必须“一致的团结方能抵抗”^②。

继开滦五矿大罢工之后，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工人为反抗英帝国主义的走狗直系军阀的野蛮压迫，掀起了震撼全国的“二七”大罢工。高君宇、何孟雄、李梅羹、罗章龙等冒着被军警逮捕的危险，经常驻守北京前门车站，昼夜不眠，随时与长辛店、郑州、汉口等地联络，了解斗争情况，掌握敌人动向，统一指挥罢工运动。二月七日，直系军阀对工人进行了野蛮的大

^①北京《晨报》1922年8月25日。

^②《美国驻兵——英国巡捕——中国警察》，《向导》第7期，1922年10月26日。

屠杀，并通缉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高君宇也在被通缉之列。

“市街要道，密布探捕”，而高君宇“镇定机警”，毫不畏缩，仍然四处奔走，处理惨案的善后工作。他一日数易其装，使“探者见亦不能识其为高君宇也”^①。

二月十日，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颁布了一道颠倒黑白的命令，诬蔑“二七”惨案是京汉“铁路工人偶因集会细故，率尔罢工，竟与军警冲突，致有死伤。”还气势汹汹地指责工人：“罢工为刑律所不容，何得遽以罢工为要挟，置身咎戾……”^②。高君宇当即著文严加驳斥说：“明明是军阀破坏约法，工人为保障共和国民应享的自由而抗争，总统反说成是‘细故’，明明是军阀任意残杀工人，反说是工人‘竟与军警冲突’。照此命令，不但将军阀一场残杀的罪恶替他轻轻遮掩了过去，且将保障‘约法’的工人说成了罪戾，且要制造出新的桎梏，让军阀去做更大的摧残了！”^③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黎元洪的总统府“只是军阀的政府”^④。

为了全面记述京汉铁路工人斗争的光辉业绩和总结罢工的经验教训，北京党组织指示罗章龙和高君宇迅速编写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由《工人周刊》社出版。党中央在六月召开三大时，曾将此书散发给各代表，对总结“二七”惨案的经验教训起了一定的作用。高君宇在为该书写的后序——《工人需要一个政党》中，分析大罢工的失败“有两个原因：一是军阀武力的摧残。一是工友的组织还未完善”。他指出，只有工

① 《高君宇传略》，《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3月28日。

②③④ 《助军阀残民之总统命令》，《向导》第20期，1923年2月27日。

会的组织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计划和统帅全工人阶级利益的争斗”的“参谋部”，而这个“参谋部”“就是共产党”！他大声疾呼：“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驱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①高君宇在“后序”中还激励工人绝不要气馁，“应当比过去还勇敢努力”，那么，就一定能“打倒摧残我们的军阀，争到我们未获得的自由。”《京汉工人流血记》于五月下旬出版后，在北京铁路工人中秘密广泛流传，对鼓舞工人的斗志和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扫除因反动派的高压政策而滋生的失败情绪，鼓舞工人重整旗鼓，继续战斗。高君宇不顾被反动派通缉、捉拿的危险，于一九二三年五一劳动节时，毅然参加了北京各团体联合发起的五一纪念国民大会。大会在天安门前召开，高君宇与何孟雄、缪伯英等相继在会上演说，历数当时内政的腐败、浑浊，呼吁国民“起而澄清”。同时他又在《工人周刊》上发表文章，再次总结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教训。他说：“这些情形，证明军阀存在一日，洋资本国的势力存在一日，中国工人的团结便不得自由，便日日要受摧残危害，甚至根本不使其存在”。他呼吁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小商人等一切被压迫者，都要来纪念五一，“不辟艰苦地团结起来，去打倒军阀和洋资本国的势力”，“一致的去争自由”。他结合二七惨案后的实际情况，向北京政府提出强烈的要求：“（一）恢复被封工会；（二）立即释放因罢工被捕者；（三）立即恢复因罢工被开除工人之工作；（四）政府须拨一定的款抚恤被害工人之家属；

^① 《工人需要一个政党》，《京汉工人流血记》后序，1923年5月北京《工人周刊》社出版。

(五) 立即惩办屠杀工人的祸首——吴佩孚、肖耀南、曹锟、赵继贤……等；(六) 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①高君宇这种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对帝国主义、军阀政府的无情揭露，以及他提出的正义要求，极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

(六)

一九二三年高君宇参加了党召开的“三大”。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以便贯彻杭州会议的精神。在会议的激烈争论中，高君宇坚决支持马林、陈独秀的意见，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大会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

会后，高君宇担任了党中央的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从此，他以主要精力投入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革命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建立。高君宇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总务股主任。接着，高君宇又受北京党组织的指派，准备回山西筹建党组织和筹划山西地区国共合作等事宜。五月二十一日，也就是高君宇动身的前一天早晨，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他们的秘密工作地点——北京黄化门腊库胡同十六号。高君宇住的是门房和厨房之间的一间简陋小屋，因此，没有引起军警的注意。他急忙将党的秘密文件销毁，化装为厨师，手提菜篮，走出门去，机警地躲过了军警的搜捕。与高君宇同住一院的张国焘在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了李大钊、高

^① 《我们应当怎样纪念今年的五一？》，《工人周刊》第63期，1923年5月1日。

君宇等的党员身份。北京当局下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①。但高君宇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乘车到了太原。

高君宇到太原后，秘密住在省立第一中学的青年学会里，加紧进行建党活动。这时，王振翼、贺昌已调到外地工作，高君宇便介绍社会主义青年团骨干分子李毓棠、侯捷庵（士敏）^②、潘恩溥（字泽清，又名刘兰兴，山西文水县南齐村人，一九三一年叛党）三人于六月入党，建立了山西党小组，由李毓棠负责。这年秋天，又有一批团员转为党员，乃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由张叔平^③、傅懋功（彭真）和纪廷梓^④三人负责，张叔平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从此，山西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高君宇这次到太原，还积极促成了山西地区的国共合作。他来太原之前，国民党右派分子苗培成、韩克温等人，已经由

①1924年6月19日《北洋政府内务部密咨张国焘口供致各地电》称：“北方李大钊为首领，时常商量党务的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君宇（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见《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侯士敏字捷庵，又名侯成功，山西平遥县营里村人，当时为省立法政专科学校学生。1925年10月到苏联留学，1927年回国后，被党派到军阀张发奎部队任教导团营长，率部参加广州暴动时壮烈牺牲。

③张叔平，山西方山县大武镇人，太原党支部第一任书记，1925年调上海任沪东区委书记，1927年任上海码头总工会委员长，参加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在杭州被捕，英勇牺牲。

④纪廷梓，太原市南郊小店镇人，当时为太原进山中学学生，1925年派赴苏联东方革命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曾担任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先后任中共顺直省委巡视员、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长等职。1930年12月遭敌逮捕后牺牲于狱中。

京回太原，以平民中学为据点，发展国民党员，创办太原《晓报》，鼓吹反共。高君宇到太原后利用和苗培成是省立一中同学的关系，向苗提出执行国民党“一大”决议，实行国共合作，为苗培成所拒绝。后经高君宇一再努力，双方才达成原则性协议，共同派人组成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

高君宇回太原后的秘密活动，很快被阎锡山的密探发现，阎锡山立即下令缉捕。高君宇在群众的掩护下，化装成火车司炉，机警地离开了太原。事后，老奸巨滑的阎锡山又伪善地托人转告高君宇说：“我是故纵不捕”。

高君宇从山西脱险后，经上海到达广州。这时，广东已呈现出国民革命日益高涨的景象，工农运动正蓬勃兴起。

七月，党领导沙面工人为反对英帝国主义歧视中国人民的“新警律”举行大罢工。根据党的指示，高君宇以学生联合会领导成员身份，和其他同志一道，积极发动和组织沙面洋务工人进行斗争。罢工坚持一个多月，终于迫使英帝国主义取消了“新警律”。沙面罢工胜利后，在国民党工人部之下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建立了工人武装——工团军。

这时，以谢持、张继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书》遭到孙中山的抵制和批评后，又放出“防止国民党共产化”的澜言，来反对共产党。高君宇便积极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他针对右派所谓共产党“要将国民党共产化”之类的谬论指出：“要将各阶级合作的及带有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化为无产阶级独有的共产党，共产党人何至如此做梦？”并质问右派说，你们能拿出“要将国民党共产化之证据”^①来吗？

^①《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政治生活》第12期，1924年8月10日。

为了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的斗争，高君宇语重心长地劝告革命分子：“现在国民党已到了一种新的境地，你们旧日一味只知合作的态度不能适用了！你们亟需要起来做种拥护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精神的奋斗；当了国民党要为一种恶影响所弥漫的时候，若革命分子不起来努力，坐听国民党革命精神消失，那便是对国民党怠工，那便是国民党莫大的罪人！”他还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事物总是要变化的，所以“对国民党分化，不但不要痛心他之不可避免，且当欢迎此种分化之已来。”因为只有经过革命洪流之冲刷和淘汰，“才能使他们组织上真正革命化”^①。他还指出：“右派无论将离国民党而另立团体，或压服左派而主宰国民党，其所要团体，必是不革命的。”^②

高君宇对右派谢持等人的无情揭露和严正批判，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的斗争。一年以后，我党联合国民党左派，给西山会议派以严厉制裁。

在此期间，高君宇受党的委托，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孙中山工作。他那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卓越的才能，深受孙中山的赏识和器重。苏联朋友几次会晤孙中山，都是由高君宇引见的。

同年十月，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陈廉伯、陈恭受等，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商团叛乱”，制造了武装骚乱广州全市的“双十惨案”，企图推翻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权。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毅然下令讨伐。高君宇立即和工团军一起投入战斗。在巷战激烈之际，他冒着枪林弹雨，乘着指挥车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不料一弹飞来，洞穿

①② <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

车窗玻璃，伤及高君宇。但他不顾个人安危，裹伤奋战，直到胜利^①。

商团叛乱平定不久，冯玉祥在十月发动“北京政变”，他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号召“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高君宇等陪同孙中山北上，于十二月底到达北京。这时，把持政权的段祺瑞竟以善后会议来对抗国民会议。高君宇当时已身染重病，住进德国医院治疗。当他得知我党和孙中山积极准备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以抵制段祺瑞的阴谋时，便带病协助孙中山和李大钊等人，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

（七）

高君宇本来就有肺病，经常咯血，在广州的紧张战斗生活，使他的身体更加孱弱。随孙中山北上，一路劳顿，病情愈加沉重。他在北京住进德国医院后，仍一心想着党的事业，想着和段祺瑞的斗争，想着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召开。因此，当病情略有好转时，就一再要求出院，德国主治大夫可棣只好答应他的请求，但嘱咐他：“出院后一定要静养六个月，不然是很危险的。”

出院后，党组织为高君宇休养的安全着想，让他住进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并派专人进行护理。在这里，高君宇与前来探望的赵世炎、范鸿勳等多次交谈，共同筹划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有关事宜。在促成会筹备工作的紧张时刻，他明知自己身体

^①1924年高君宇给石评梅的信，原件存山西省博物馆。

上的“数架机器不堪耐用”^①，但仍然不顾一切地投入了战斗。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高君宇被推选为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虽重病在身，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参加了会议。对于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他是多么兴奋啊！万没有想到，他这时又突患急性阑尾炎。三月二日突感腹痛，他没有介意，仍带病开会。四日，腹痛不支，急送协和医院，经抢救无效，延至五日凌晨与世长辞，终年二十九岁。

高君宇逝世后，《向导》、《中国青年》和《北京大学日刊》等报刊纷纷发表悼念文章，称赞他“不仅是一个革命的实行家，也是一个革命的议论家。”^②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北京党组织以北大学生会的名义举行追悼大会，赵世炎、邓颖超、范鸿劼、贺昌、张叔平、舒大桢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等参加了追悼会，李大钊、邓中夏、王若飞等送了花圈、挽联。追悼会后，根据高君宇的遗嘱，把遗体葬于他生前从事过秘密活动的北京陶然亭湖畔，并树立了汉白玉纪念碑。他的爱人石评梅在墓碑上刻下了本文开头引述的高君宇生前最喜爱的“我是宝剑，我是火花”那首诗；并在诗的旁边写道：“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石评梅还在墓周亲手栽植松柏百余株，以作纪念。其后，她又写了许多“絨情寄向黄泉”的悼念文章，寄托哀思。

① 《高君宇传略》。

② 《征求高君宇遗稿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4月3日。

石评梅原名汝璧，是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名新文化战士，也是我国新文学创始时期的一位女作家，曾参与创办《蔷薇》、《妇女》等刊物，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鼓吹妇女解放运动，被誉为“女界杰出之秀”^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才华、又向黑暗势力作过抗争的新女性，在人生的道路上曾一度踌躇徘徊，诗文中充满了忧伤、低沉的情调。高君宇于一九二二年春在北京山西会馆结识了她，为了引导她走出个人感伤的小圈子而投身革命，经常给她讲人生、讲社会制度、讲革命斗争。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针对石评梅的那种“说不出的悲哀”^②，给她指出，当代青年苦闷根源来自社会，所以，要免除痛苦就要改造这个社会。他说：“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社会享受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要我的意志和努力完全贯注在我要做的‘改造’上去了。”^③高君宇还经常给石评梅送一些革命刊物，其中就有《向导》，有时还带领她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群众集会和讲演会等。石评梅后来在一篇散文中追述高君宇对她的帮助说：“往日，我怕恶魔的眼睛凶，白牙如利刃；我总是藏伏在你的腋下越起不敢进，你一手持宝剑，一手扶着荆棘的途径，投奔那如花的前程！”^④在另一篇文章中，石评梅追述道，有一次深夜，高君宇被敌人追捕甚急，他镇静地对石评梅说：“不要怕，没要紧，我就是被捕坐牢也是不怕的，假如我怕，就不做这项事业了！”^⑤在高君宇这位“人生向导”的教育、影响下，石评梅逐渐对人生、对

① 《石评梅纪念集》，1928年出版。

②③ 1922年高君宇给石评梅的信，原件存山西省博物馆。

④ 石评梅：《墓畔哀歌》，载《涛语》，1932年北新书局出版。

⑤ 石评梅：《狂风暴雨之夜》，载《偶草集》，文化书局出版。

社会、对革命有了认识，她同情革命，并给予高君宇不少帮助。

“二七”惨案后，高君宇被北洋军阀“通缉”，石评梅不顾个人安危，一次又一次帮助他脱离险境。他俩在“改造”社会的共同目标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但是，高君宇追求高尚的爱情，更追求革命的真理；他忠于圣洁的爱情，更忠于崇高的革命事业。他曾在给石评梅的一封信中明确说道：“……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①高君宇这些炽热的语言，使石评梅感到温暖，受到激励。他们这样处理革命和爱情的关系，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大革命失败后，国事日非，石评梅愈加悲愤，也更加怀念高君宇，终于忧郁成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与世长辞。人们按她的遗愿，将她葬于高君宇墓旁，世称“高石之墓”。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日，周恩来在审查北京市城市规划总图时，就保留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葬、墓碑时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教育青年人也有教育意义。”可是，高、石的墓碑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掀起的极左恶浪中被砸毁了。周恩来总理获悉，十分痛心，于一九七三年委托邓颖超主持，将高君宇的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①高君宇给石评梅的信，原件存山西省博物馆。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高君宇未发表的诗文、家信及著述。
2. 彭真、薄一波、罗章龙、许德珩、邓颖超、廖梦醒、乐天宇、武灵初等以及高君宇的胞弟高全德的回忆材料和访问记录。
3. 《五四运动回忆录》、《五四运动爱国资料》、《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党史研究资料》、《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北京大学校史》、《中国工运史料》、《中国共产党新闻杂志研究》（日文）等书刊。

李 汉 俊

陈绍康 骆美玲 田子渝

(一)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俊，又名李人杰，一八九〇年四月（光绪十六年三月），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垵埠垵（今杨市公社袁桥大队）一个教书先生之家。其父李金山（1844—1919年），字凤亭，在潜江县城私塾任教。李金山共有七个孩子（三男四女），长子李书麟早丧，次子李书诚^①早年留学日本，李汉俊排行第三。一九〇二年，仅十二岁的李汉俊，在李书城挚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求学。他在日本，初“进法国教会学校晓星中学校，升入日本高等学校后，改为清政府的官费学生，以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②。他们兄弟二人早年赴日之前，李金山曾以军事、工商业为富国强兵之道，训勉

^①李书诚，即李书城（1881—1965），字晓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发起人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时曾任黄兴的参谋长。1924年任北京临时执政府陆军部总长。1949年与张难先等发起湖北和平运动促进会，为和平解放湖北，奔波于豫湘鄂数省。解放后担任全国人大和政协常委，曾任农业部长。1965年8月病逝于北京。

^②李书城致觉明的信（1964年9月12日），见《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2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9月版。

李书城习军事、李汉俊学工商业，“各成专材以备国家用”^①。但是李汉俊在世界新思潮的影响下，认识到学工商业是不能“富国强兵”的。要“富国强兵”，首先必须打破“如铁似茧重重层层包围”着的黑暗环境。他在帝国大学就读时，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②有师生之谊，受河上肇之影响，从“最喜欢数学”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

一九一八年底，李汉俊从帝国大学毕业后，怀着救国热忱和革命激情，回到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路北，与同乡詹大悲为邻。翌年春，董必武以鄂西靖国军司令蔡济民遇害事，到沪向各方申诉，与张国恩^③一起，住渔阳里路南。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结识了李汉俊，二人过从甚密。李汉俊向董必武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将“日本新出的杂志和《黎明》、《改造》、《新潮》等”^④进步刊物介绍给他们，向他们展示了一个新的天地。董必武后来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

①甘云鹏：《潜江李府君墓表》，见《潜江庐类稿》卷61。

②河上肇（1879—1946），190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后去欧洲留学，回日本后为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1932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他的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作，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有较大影响。

③张国恩（1883—？）号眉宣，梅先，湖北黄安高桥人。1911年为同盟会鄂支部评论员之一，1914年与董必武赴日，考入东京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习。1920年秋与董必武、陈潭秋等组建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不久自动退出。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任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抗日战争初期，客死南京。

④董必武的回忆（1928年4月1日），原件存湖北省博物馆。

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①。董必武在借读了李汉俊带来的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日文书籍后，“逐渐明了俄国革命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②。

李汉俊从日本带回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他以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止，仅在上海一地，他以李漱石、李人杰、人杰、汉俊、汗、海镜、海晶、先进、厂晶等笔名，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九十余篇译文和文章。

回国不久，李汉俊便为《星期评论》撰文，其后参加了《星期评论》社的编辑工作。一九二〇年初，他迁居到白尔路（今西门路）三益里十七号，这儿是《星期评论》社的总发行所及编辑所。当时，《星期评论》和《每周评论》被称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③。经过他和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等的共同努力，《星期评论》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在《星期评论》发表文章与译文达三十八篇之多。

李汉俊以满腔热情欢呼十月革命，希望中国走俄国人的

①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71年8月4日），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

② 《董必武与武汉中学》，沈德纯整理，《武汉春秋》1982年第4期。

③ 《教育潮》第5期书刊介绍，1919年11月出版。

路，依靠人民改造社会。他发表的第一篇译文是日本进步人士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文章说：“俄国革命发生以来，世界形势，日日变化……世界实在向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方面，正在突飞猛进”。文章还批评了无政府主义首脑克鲁泡特金认为知识阶级者新思想运动和平民暴动不是革命的观点。李汉俊十分赞同作者的意见，他在译后写的“我有几句话要说”的短言中指出：“山川菊荣所说的平民阶级呼应结合意识的永续的运动，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决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他以十分轻蔑的语气，揭露在新思潮面前打着各种新牌号的官僚政客，如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林长民的劳动代表，徐世昌的民生政策等等实是欺骗民众的东西，提醒人民不要为时髦的名词迷惑，要用脑子想一想，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在短言最后他公开表明自己不属于武人、官僚、黑暗的力量，“我只是平民，民众，无产阶级……的一分子。”^①

这年三月，他号召学习俄文，直接研究俄国的革命经验，认为学习俄文“将来的用处，实在大得很呢！”^②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八日出版的《星期评论》上，他通过翻译肖伯纳的《强盗阶级》（笔者按，指资本家阶级）赞美了列宁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革命。后来他还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中，翻译了《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我在新俄罗斯生活》和《苏维埃共和国产妇和婴儿及科学家》等文，用铁的事实驳斥了反动派对苏俄的攻击和诬蔑，使中国人民透过浓雾看见了

①见1919年9月5—7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②先进：《研究俄文印度文的必要》，见1920年3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曙光。

李汉俊在介绍俄、美、法、英、日等国劳工运动现状与理论的同时，特地撰写《劳动者与“国际运动”》等重要文章，系统地论述共产国际运动史，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了较翔实的介绍。

李汉俊十分重视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他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呼吁：“懂得外国文字的人，最好能够随时少做高谈的短篇文字。放下工夫，多翻译几本书籍。尤其以社会科学书籍最要紧”^①。他的意见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反响。第三天，海关藏书楼主任周恂恂，就写信向他表示“愿意把许多书，预备有愿意翻译的人（男女不限）向我借用，借费是不要的”^②。李汉俊特别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在《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关于产业制度，尤以关于劳动问题，在生产上以生产关系（土地及资本）为公有，在分配上以劳动的比例为报酬的”^③。在译文《道德底经济基础》和通信《改造要全部的改造》中，阐述了制度、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物都是由金钱（即经济）所支配的理论。在《怎么样进化？》一文中，他又介绍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人类进化与生产发展的历史，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跛子社会”，指出劳动者“言论的自由被剥夺了，生产的机关被占据了，市场的经济被垄断了，政治上的地位被剥削

①先进：《文化运动的粮食供应》，见1920年3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随感集》。

②《翻译专门书籍的机会》（周恂恂与先进的通讯），见1920年3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③见1920年5月30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了，这是弱小国民的困苦境遇。”^①他认为，要改变这种困苦境遇，只有发动广大民众起来，进行阶级斗争，实行彻底的改造。

李汉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他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发表的《强盗阶级底成立》一文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人类经济的发展史，从物品到商品，从商品到货币，再从货币到商品。掠夺阶级就是在“货币换商品，从商品换货币”的交换中，掠夺劳动人民的血汗。到了近代大工业时期，资本家购买到一种发财致富的商品，这种“奇妙不可思议底商品”，“就是劳动者的劳动力”。资产阶级的全部秘密就是掠夺劳动而发财致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家是强盗，资本家阶级是强盗阶级”^②，号召人民觉醒起来，打倒强盗阶级。

与此同时，李汉俊将德国米里·伊·马尔西著的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通俗读本《经济漫谈》介绍给中国人民。由于马克思的经典巨著《资本论》内容十分丰富和复杂，“不是脑筋稍微钝的人们所能了解”^③的，而马尔西的《经济漫谈》则将“马格斯经济学说底骨子即商品、价格、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用很通俗的方法说明了出来，说得这样平易而又说得这样得要领的。在西洋书籍中也要以这本书为第一。”^④所以李汉俊“考其内容，审其作用”^⑤，改名为《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在翻译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他将其中

^{①②}见1919年8月17日《星期评论》。

^{③④⑤}李汉俊：《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序，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9月出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

“抽象之处”，“费点思索不能了解的地方，又略略加了点注解”^①。社会主义研究社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之第二种。在他的辛勤培育下，这朵来自马克思故乡的介绍《资本论》的通俗读物的鲜花，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吐出芬芳。

当胡适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争论之际，张东荪又祭起基尔特社会主义大纛，从另一方面向马克思主义展开攻击。李汉俊立即写文章给予痛击。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张东荪在《解放与改造》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一文，这篇文章鼓吹：“我们主张社会主义既不象工行的社会主义建立一个全国工行，又不象多数的社会主义组织一个无产阶级专制政治，更不象无治的社会主义废去一切机关，复不象国家的社会主义把所有生产收归国有。乃是浑朴的趋向”。李汉俊从主义均含有确切的内容出发，逐条驳斥了张东荪的谬论，指出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是“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张东荪是“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者”^②。针对张东荪的“在今天只希望工人对于工人讲互助，而不希望工人对于资本家相冲突”的谰言，他从经济商品的基本实际情况入手，分析了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鼓励工人应该觉悟起来，对资本家进行“自决行动——就是阶级争斗”^③！

有一个叫陶乐勤的人，以大家同走一条路为由，写信给李汉俊，企图调解这场争论。李汉俊写了《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

①李汉俊：《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序。

②③汉俊：《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是劳动运动意见》，见1920年5月16日《星期评论》第50号。

给予回答，旗帜鲜明地宣布自己和张东荪表面上看都在宣传社会主义，但走的并非一条路。针对陶乐勤所说争论不要闹到人身攻击的话头，李汉俊写道：“我们研究问题探求真理的时候，只能认识问题、真理，不能认识人；我们既不能以人废言，亦不能以人取言；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说的话是我们所认为对的，就是他和我们是背道而驰的，也要赞成他底话的；如果这个人所说的话是我们所认为不对的，就是他和我们真在一条路上走的，我们为维持我们所谓真理起见，也是应该反对的。”^①

当时，“互助论”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颇有市场。阶级斗争学说得到广泛传播后，又有人将“互助论”和阶级斗争论揉合在一起。李汉俊在《星期评论》上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互助上面可以加上阶级两个字。天下有这样好的互助方法，恐怕太阳要从西方出现呢？”^②

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在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出类拔萃的。陈望道翻译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就“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③。李达翻译《唯物史观》遇到困难，李汉俊热情相助。李达在“译者附言”里致谢道：“我有一句话要声明的，译者现在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说的那些补遗的地方，大得了

①汉俊：《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见1920年5月30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②先进：《三益主义》，见1920年3月14日《星期评论》第41号。

③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见1920年9月30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援助。”^①

李汉俊热心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是我们择取方向时候的指南针”。“我们只要有了这个指南针，我们就可以随时施設，应机修正，不至于死守盲撞了。”^②

李汉俊极力称颂中国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就提出“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③的主张。对中国资产阶级，他在《强盗阶级底成立》一文中作了初探，他说：“中国本来是没有这一个阶级的。在欧美日本之经济的帝国主义，侵到中国来，以国家底威力，强迫着和中国人做交换。强迫着中国开放市场，消费他们那一种剩余生产品……从此以后，中国才发生这一种阶级来”^④。他进一步指出，这个阶级与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联系。这个分析虽然是粗浅的，很不完整的，但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值得称颂的。

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他发出战斗的呐喊：“希望解放和改造的国民啊！解放和改造，是要从‘努力’和‘奋斗’当中去求，‘冥想’是不中用的”^⑤。要彻底砸碎中国的“死牢”，

①荷兰郭泰著、李达译：《唯物史观》，上海中华书局1921年5月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

②汉俊：《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

③先进：《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见1919年10月26日《星期评论》第21号。

④见1920年5月1日《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

⑤先进：《时局怎么样？》，见1919年9月21日《星期评论》第16号。

必须实行彻底的改造，“只有大破坏，大创造”，才有“大建设！”^①

(二)

一九二〇年初，李汉俊和陈独秀、李大钊便开始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在中国建党的思想，李汉俊在一九一九年秋就开始萌芽了。他在《世界思潮之方向——译后的几句话》中写道：“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②他参加《星期评论》社的编辑工作后，与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联系。杨之华后来回忆说：“一九一九年年假，我去上海星期评论社……那时他和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方面都有联系……我到《星期评论》社的目的本是为了去苏联学习，李汉俊曾对我有许多帮助。他带我去日本、朝鲜的进步朋友家，他还介绍我在一位俄国朋友那里学习俄文。”^③

一九二〇年三月，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派出代表魏金斯基（中文名吴廷康）及其随行人员一行来华，帮助中国建党。魏金斯基等人先到北京会见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四月到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和“共学社”等杂志社和一些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同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进

①李人杰：《改造要全部改造——一封答朋友的信》，见《建设》第1卷第6号，1920年1月1日。

②见1919年9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③《杨之华的回忆》，见《“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25—26页。

行接触。通过交谈，陈独秀、李汉俊等进一步了解了苏俄十月革命和苏俄共产党的情况，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并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五月，在魏金斯基的帮助下，李汉俊和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负总责，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是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八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等七人发起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对这段历史，李达曾回忆说：“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我参加做发起人。……首先拟定一个类似党章的东西，是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格纸写的。所谓党纲，只有‘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八个字。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①

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后，他们立即在工人中积极开展活动，八月十五日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劳动界》是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早尝试。李汉俊担任该刊的主编。他和陈独秀以发起人的身份在《民国日报》上署名发表启事，办《劳动界》周刊，“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希望该刊“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②。他用工人的语言在该刊撰文，解释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道理。他写道：“钱不过是代表劳力的一种东西罢了”，“如果没有工人和农民的劳力，钱是没有什么尊贵的”，“如果说钱尊贵，劳力就比钱

^① 《李达自传》（节录），见《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② 见1920年8月17日上海《民国日报》。

更尊贵了”^①。文章还用具体事实说明“劳工神圣”的道理，指出资本家剥削工人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号召工人、农夫“牢记在心”^②，起来与“强盗阶级”作斗争。

《劳动界》周刊一出版，便在工人中不胫而走，受到热烈的欢迎。《劳动界》第五册上刊登了杨树浦电灯厂一位工人给陈独秀的来信，说：“现在有了你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的工人明星呵”。这位工人抑制不住激情，高呼“《劳动界》万岁！”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影响下，北京、广州共产党小组先后成立，《劳动者》、《劳动音》相继诞生，形成一股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浪潮。

同年九月，李汉俊和陈独秀、俞秀松等联名致函上海工商友谊会，表示愿意帮助他们办《店员周刊》。他还负责教育与组织工人的工作，派李中（即李声澍）在杨树浦组织机器工会、李启汉在小沙渡组织纺织工会，使上海地区的工人组织初具规模。

九月，上海发起组决定将《新青年》月刊从八卷一号起改为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赴广州后，李汉俊、沈雁冰、李达等为编委。

李汉俊在上海发起组中，还负责和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络的工作，约在一九二〇年夏，他写信给湖北的董必武，约他在武汉筹组党的组织。董必武接函后立即与陈潭秋等商约建党。陈独

①汉俊：《金钱和劳动》，见《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

②汉俊：《工人如何对米贵》，见《劳动界》第8册，1920年10月3日。

秀在上海发展了湖北鄂城人刘伯垂入党，随即派刘伯垂返回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等筹组党的组织。这时，李汉俊和刘伯垂作为入党介绍人，介绍董必武加入了共产党。同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六人，在武昌抚院街董宅成立了湖北党的组织。不久，李汉俊又介绍魏金斯基的助手马迈耶夫夫妇到汉，住在董必武寓所，以教英文为掩护，帮助湖北党组织开展工作。同年冬，李汉俊由上海回故乡，途经武昌，曾作短期逗留，在董必武寓所讲了唯物史观，还介绍了各派社会主义学说。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去广州办教育。上海发起组就由李汉俊代理书记，《新青年》也由李汉俊和陈望道主编。为了不耽误《新青年》预定的排印日期，他时常连夜赶写文章和审定稿件。

李汉俊重视青年问题。一九二〇年八月，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支持建团工作。他还参加培训团员与青年的“外国语学社”的〔法文〕教学工作，创办了教育委员会。这是党和团最早培养进步青年的基地。翌年春，包惠僧到上海，李汉俊请他担任教育委员会主任，杨明斋为副主任。该委员会选派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优秀青年赴俄留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一九二一年春，李汉俊介绍沈雁冰入党。同年六月，李汉俊和陈独秀、李大钊等十五人，在上海发起筹办新时代丛书社，旨在“普及新文化运动”，通讯处就设在望志路一百零八号（今兴业路78号）李汉俊、李书城住宅里。

由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日益广泛的结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也日臻成熟了。一九

二一年春，陈独秀为了召开党的成立大会，将草拟的党纲寄给李汉俊征求意见。这份党纲草稿中专门有一条写的是集权制。由于李汉俊对陈独秀独断专行的作风不满，错误地认为集权制将助长陈独秀的这种专断作风，故反对集权制而主张分权制。李汉俊的这种想法与提法毕竟是错误的。虽则未使他和陈独秀之间的争论导致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分裂，但对其后他们的相互关系无疑投下了阴影。

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立即和李汉俊、李达等商议，并与广州的陈独秀进行联系，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

七月二十三日，在李汉俊、李书城的寓所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汉俊和李达作为上海地区代表出席了大会。党的成立大会是在秘密状况下举行的。三十日晚上，在举行第六次会议时，忽被侦探发觉，代表们立即中止会议，迅速离去。李汉俊为了掩护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应付敌人。十分钟后，一群法国巡捕警探蜂拥而至。一个巡捕用法语问道：

“你们开什么会？”

“我们在编辑新时代丛书，不是开会！”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镇静地用法语回答。

“他们都是什么人？”

“北大的教授。”

“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

“也是北大的教授，趁暑假之便来沪谈谈。”

巡捕问不出什么破绽，便瞪起眼睛，指着书架问道：

“你们家为什么要藏这么多社会主义书籍？”

“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什么书都要看。”^①

巡捕搜不到什么东西，只好悻悻离去。

党的“一大”会议在讨论党章时，李汉俊认为无产阶级尚幼稚，无产阶级还缺乏革命的思想准备，需要先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知识分子，然后再去教育工人。这个意见不尽确当，一些代表也不同意他的主张。李汉俊未坚持己见，而是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他热情地参加建党大会的工作，大会向共产国际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草，经大会通过的^②。

“一大”后，李汉俊倾注全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革命活动。一九二二年元旦，他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两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和《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这两篇文章后来收录在党创办的“新青年社”发行的《社会主义讨论集》一书中。李汉俊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作了剖析，分析了混乱的原因，批评了张东荪之流宣扬的“中国产业幼稚，物质条件不具备，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谬论，提出了结束中国混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根本主张。他充满信心地说：“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只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走去的一条路；中国底混乱又要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才能终止；我们要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

①参见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306页；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同上书第179页；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同上书第422页。

②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929年12月31日），见《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3期。

止，自然非努力使中国赶快走上社会主义的路上不可了。中国底同胞！努力罢！”^①他坚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激励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前途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一月二十八日，即农历正月初一，李汉俊参加了上海党组织筹划的送“贺年帖”活动。这天，“上海共产党全部党员及中国朝鲜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百余人，工人五十人，上午分散‘贺年帖’（内载鼓吹共产主义的歌）六万张于上海市内”^②。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③。这项活动轰动了上海。

不久，李汉俊由于同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遂离开上海，返回武汉进行革命活动。

（三）

一九二二年李汉俊回武汉后，“为掩护计，曾在武汉市政督办公署挂名义”^④，同时在武昌中华大学（今武汉市第三十三中学）担任社会学教师，还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湖北教

①汉俊：《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见1922年1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②《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见《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年—1923年），第1—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3月版。

③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8期。陈望道回忆这次活动的时间为1921年新年。记忆不准，应以陈独秀当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时间为准，陈报告中说是“一九二二年正月一日”，即公历1月28日。

④李书城致华觉明的信（1964年9月21日）。

育学院) ① 历史社会学系执教。他以教师为职业, 利用讲台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共武汉区委为了培养干部, 设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除吸收一部分党团员外, 还招收在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参加研究会活动。李汉俊支持党的这项工作, 常去作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告。

六月六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李汉俊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一文。他说: “我希望我们底同胞, 不要把现在先进各国所有的社会现象视为‘对岸之火’, 取‘与我无关’的态度, 也把彼底由来、内容、结果, 拿来仔细推究”; 并且明确指出: “对于现在先进各国社会现象底由来、内容、结果, 观察得最切当, 研究得最深刻, 解说得最透彻的, 在现在只有马克思”。在文章中, 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研究它应抱的态度, “马克思学说, 可以分作理论与政策两方面。理论底方面, 又可以分作‘唯物史观说’、‘经济学说’、‘阶级斗争说’三大部分。”而“阶级斗争说”是一条金线把三大理论连成一个整体。“政策底方面, 就是所谓‘社会民主主义’部分。”他强调“马克思学说是一个有机的体系”, 既要看“研究马克思学说全貌的书,”又要看“专门研究一部分的书”。为此他具体列出了当时我国已出版的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书目。

李汉俊对妇女解放运动十分关心。早在上海时, 他就是

①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为张之洞办的方言学堂, 辛亥革命后改为武昌军官学校, 1923年1月改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 1925年9月又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为简便计, 文中统称武昌高师。

“妇女评论”社的社友，在《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了《妇女问题底重要性》、《女子怎样才能得到经济独立》、《妇女弱点底由来》、《男女社交应该怎样解决》等文。他说：“现在社会上既然有一部分人掠夺了生产劳动者底剩余价值，其余的人自然就受了这一部分人底支配了。现在应当支配人类的生产劳动者和女子之所以反受了人底支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换句话说，就是现在社会有一部分人直接掠夺生产劳动者底剩余价值，直接支配了生产劳动阶级，又间接支配了一切劳动者和女子。”“所以一切劳动者和女子要解脱这被支配的地位，只有打破现在有一部分人能够掠夺生产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制度”^①，妇女问题和劳动等问题才能彻底解决。

湖北女师是全省唯一的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教师多半是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培养的老秀才、老举人。校长王式玉是一个顽固的封建卫道士。学校在这伙人的把持下，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学生出入、与人来往书信，均要受到检查，俨然象一座修道院。党十分重视这所学校，董必武、陈潭秋、黄负生、刘子通等先后到该校执教，宣传革命思想，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颇受学生欢迎。学生受到进步思想熏陶，纷纷要求打破封建礼教制度，向学校家长式的统治提出了挑战。她们的革命行动使学校和反动当局惶恐不安。一九二二年初，王式玉以宣传“赤化”、“煽动学潮”的罪名，解聘了刘子通。学生们得知，非常气愤，在夏之栩、徐全直等进步学生的发动下，掀起了要求学校挽留进步教师的学潮。

^①汉俊：《妇女问题的关键》，见1921年2月26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为了推动女师学潮深入下去，六月，中共武汉区委机关报《武汉星期评论》出版了“妇女运动号”。李汉俊在这一期“妇女运动号”上发表了《第三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和《第四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他指出：所谓第三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主张在现在资本制度下，求经济的独立；而第四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则主张打破资本制度，妇女才能获得解放。这两篇文章在女学生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争论。李汉俊除撰文论述妇女解放运动外，还直接指导进步学生与反动当局作斗争。他的家是进步学生活动的一个据点。夏之栩等举办的妇女读书会常在他家开会。他常给读书会作报告，讲“社会学、简单的资本论、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当时风行一时的女子参政实质是“资产阶级的花瓶”，指出“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妇女就不能解放”^①。在董必武、李汉俊等启发下，学生们明白了反对王式玉的封建奴化教育仅是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一部分，只有彻底推翻反动的社会制度，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暑假，妇女读书会在武昌朱家巷举办了妇女暑假补习班，“为失学女子唯一的补习机关”^②。李汉俊是该班最得力的支持者之一，常去那里为进步学生补课。

面对如火如荼的学潮运动，王式玉在学校挂牌公开宣布开除夏之栩、徐全直等五名进步学生。十一月八日，湖北督军肖耀南下达指令，令警务处派警队将夏之栩等“送交各该家长或

^①访问夏之栩记录（1981年7月15日）。

^②姜皮：《湖北全省妇女运动》，见1927年8月22日《中央副刊》第149号。

保证人严加管束”^①。斗争僵持不下，董必武、李汉俊等一方面鼓励进步学生不要气馁，坚持斗争，并通过《武汉星期评论》等报刊制造舆论声援学生；另一方面又联络陈时、刘觉民等五位社会贤达出面干预，迫使王式玉“当众辞职”^②，女师学生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李汉俊还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之中。武汉地区无产阶级的力量相当雄厚，产业工人超过十万，仅次于上海，为全国第二大工业中心。党十分重视这一地区的工人运动，组成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领导工人运动。一九二一年底，在党的领导下，汉口租界六千余工人举行同盟大罢工，迫使英、法帝国主义作出让步，答应了工人的正当要求。李汉俊欢呼这次胜利，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了《汉口人力车罢工底教训》一文，说：“社会上因为看见了他们这回的大胜利，也觉悟了一切劳动者都是有力量者，觉悟了劳动者团结的力量，觉悟了劳动者底实力比一切绅士老爷们底实力还要大。”劳动者一旦觉悟到自己的实在能力，定会“在生产关系上主张自己应有的权力，以握到支配权。”^③

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和同时发生的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工人的罢工，预报了武汉地区工潮的“潮讯之至”^④。在斗争中，武汉工人阶级感到应成立工人统一的联合团体，迅速把各个分散的工人团体组织起来。一九二二年七月下旬，在劳

①转引自武汉市妇女联合会：《武汉妇女运动大事记》（未刊稿）第3页。

②见1922年11月28日《武汉星期评论》第52号。

③见1922年1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④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31页。

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领导下，武汉工团联合会诞生了。十月十日又成立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林育南被选为秘书长，总理一切会务，项英被选为组织主任委员，李书渠（即李伯刚）被选为宣传委员，李汉俊被选为教育主任委员，施洋受聘为法律顾问。李汉俊和林育南、项英、许白昊、李求实、施洋等，均为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武汉地区罢工怒涛一浪高过一浪，最后和“二七”大罢工的怒涛相汇合，形成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特大洪峰。

李汉俊还号召青年学生走出书斋，到社会大课堂中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有一个叫刘弄潮的青年，是四川成都高师的学生，因参加学潮遭四川军阀通缉，经恽代英介绍到武昌，投宿李汉俊家中。李汉俊常常利用吃饭时间，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一次，李汉俊指着满架的书籍说：“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光从这些经典著作里去寻求，主要是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做到言行一致。”这时，京汉铁路工人运动正在蓬勃展开，他把刘弄潮介绍给施洋、李书渠，希望他在实际斗争中和工人打成一片。后来刘弄潮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身份和成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名义，去郑州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典礼^①。

一月三十日夜晚，李汉俊亲自带领武昌高师历史社会学系学生任开国、赵春珊、张作范、徐考祥等四人到汉口江岸车站，随同林育南、陈潭秋、施洋、林祥谦等，搭车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①访问刘弄潮记录（1981年7月31日）

到郑州后，任开国、赵春珊等见各地代表和来宾都带有礼物，觉得也应该送一份礼表示武汉学生的心愿。李汉俊高兴地同意了学生的打算。他们四人买了五尺红绫，按照施洋的意见，写上了“大地赤化”四个大字，敬献给了大会。

二月一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冲破反动军阀的阻挠宣告成立。由于反动军警的野蛮镇压，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将总工会迁往汉口江岸，并于二月四日午刻举行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以回击反动军阀的镇压。会后，李汉俊和林育南等立即乘车返汉。

在郑州期间，围绕与反动军阀斗争的策略问题，李汉俊和张国焘的“左”的主张展开了斗争。当时的中共武汉区委成员李书渠在后来的回忆中感慨地说：“郑州开会时，我留守武汉没有去。听李汉俊回来说，在郑州讨论罢工要求条件时，张国焘主张提十几条，涉及面很广，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有少数同志（李汉俊在内）不同意多提，主张只提要求吴佩孚派人送还总工会的东西一条。因为罢工原因是要吴佩孚承认总工会……。张国焘只看到工人代表群情激昂的一面，没有对客观具体情况全面分析，所提条件不策略，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导致罢工失败。”^①

二月四日，一千多公里的京汉铁路线上罢工的汽笛长鸣，象春雷震撼神州大地。反动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镇压这次大工潮。武汉三镇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李汉俊义愤填膺，奔走于武昌、汉口之间，参加各种会议，商讨斗争策略，

^①李伯刚：《武汉建党初期的回忆》，《武汉文史资料》第3辑，1981年6月。

并和正在武汉讲学的李大钊联系，研究情况。

七日，肖耀南悍然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了江岸分工会和工人住宅区，将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逮捕杀害。反动军阀的魔爪也伸向李汉俊。当天夜晚，有位工友提着灯笼，赶到他家，将凶讯相告，嘱其速离。李汉俊怀着悲愤的心情，立即乘车北上，到北京李书城处暂避。

(四)

“李先生回来了！”在金风送爽的时节，武昌高师的进步学生奔走相告，不约而同地跑到首义路东鄂园南面的李宅拜望他们所敬仰的教授。半年不见，李先生还是那样瘦弱，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穿着一件中式兰布长衫，态度仍是那样诚恳。

“李先生在京是怎样渡过的呢？”这是学生们关心的问题。后来他们才知道李汉俊在北京，和京汉铁路工人代表一起，联络国会议员胡鄂公到国会请愿；动员胡鄂公等鄂籍议员在国会提出弹劾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解散京汉铁路总工会案；要求公布工会法，企图取得工会的合法地位。这些行动当然不会有什么实际结果，但进一步揭露了吴佩孚的反动面目。他还通过李书城的关系，曾担任北京政府外交部秘书，“常与苏联驻京大使馆有联系，并与李大钊经常交谈。”^①当时报纸透露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曾打算聘他为“社会学系主任”^②，但他的心却系念着武汉地区的斗争，形势稍为缓和，便返回了家乡。

^①李书城致觉明的信（1964年9月12日）。

^②《上海大学革新之猛》，见1923年6月22日《晨报》。

“李先生还讲唯物史观吗？”学生问道。

“讲的。”李汉俊吸着烟，平静地说。学生们欢快起来，因为他讲的唯物史观是学生们最爱听的课。

没过几天，学校布告栏上果然挂出了李汉俊讲课的牌子。这一天，李汉俊讲课的教室，里里外外挤满了人，外系的许多同学也来旁听。

李汉俊通过浅显易懂的道理，从生物界讲到人类社会，讲到社会组织是随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最后得出了要人类社会前进，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结论。

李汉俊主讲的《唯物史观》综述了各种哲学流派，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讲义的开篇是详尽的唯物史观公式，使学生一目了然。

长期以来，学生们接受的是“三界唯心”的教育，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世界的一切都是人心——意识想出来的。听了李汉俊的讲课才知道，世界是物质的，“经济条件，决定人类的意志”^①，人类的意志是经济条件的反映，开始懂得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他的讲课在学生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许多青年受到他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的高足历史社会学系的任开国、季永绥和外文系的陈昌绪、生物系的陈端本、附中的郭树勋等，均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湖北教育界为“两湖经心派”的势力所把持，他们攻击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共妻，攻击李汉俊讲学是“赤化宣传”。他们与武昌高师某些权欲熏心的教师串通一气，唆使部分学生贴出“揭

^①李汉俊：《唯物史观》（讲义），现藏赵春珊处。

帖”，企图驱赶李汉俊和耿丹、胡小石等进步教授。这个阴谋，立即遭到广大师生反对。他们一计未逞又施一计，竟与肖耀南、吴佩孚相勾结，一九二四年春反动军阀下令“通缉李汉俊”^①。

李汉俊怀着宣传真理、服膺真理的精神，和进步教授们一道，在董必武、陈潭秋等支持下，团结广大学生，同反动当局及其走狗反动文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时，在李汉俊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至关重大的事，即他离开了中国共产党^②。李汉俊虽然离开了党，但他并未放

① <武昌师大风潮之真因与经过>，见1924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

②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当事人又相继去世，而他们留下来的文字资料说法也不一致，以至于他为什么出党，什么时间出党都成了疑点。包惠僧说李汉俊是1922年被党开除的。陈潭秋1936年的回忆说：“李汉俊因为一贯保持其右倾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政客相结纳，放弃了党的立场，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但蔡和森1926年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却写道：“直到第四次大会都对汉俊表示同情”（见<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可见李汉俊“四大”时已不是党员。我们认为此事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22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实际上离开了党中央工作岗位，回到武汉。党的“二大”时，他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意见书。从蔡和森提供的资料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不赞成民主集中制。陈独秀曾致电请他参加“二大”。但他托振法将意见书从河南带至大会，自己却“始终没有到会”。随后便和“玄庐、望道等退出党”（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曾做过他的工作，根据马林建议，党的“三大”在他未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为“五名候补委员”之一。一九二四年，鉴于他自动脱党，中共中央便正式将其“开除”了（奇：<冤哉枉也李汉俊>，见<布尔什维克>第11期，1927年12月）。据蔡和森的回忆，当时“大部分同志认为李汉俊等退党是陈独秀同志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同时他的被开除与张国焘的打击也不无关系。

弃信仰马克思主义，未离开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斗争的战场。

他在历史社会学系筹建了历史社会学研究会，一些进步师生纷纷参加，共产党员任开国、季永绥等主其事。他们在学校内办起图书室，内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进步书刊，吸引了许多学生。李汉俊以历史社会学研究会为核心，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展开活动，“形成了政治思想上的左派”^①。

为了扩大宣传阵地，在邵力子的支持下，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武昌高师历史社会学研究会编辑的《社会科学特刊》在上海《民国日报》上与读者见面了。在当时的报纸上，由一个学校办一个特刊是罕见的，也说明李汉俊介绍社会科学是不遗余力的。特刊每两周出一期，李汉俊写了“发刊旨趣”，表明该刊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的宗旨。特刊上发表的李汉俊的《社会主义底派别》，季永绥的《产业革命》、《唯物史观》，任开国的《经济学之阶级性》等文，都获得读者好评。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激起了武汉人民强烈的愤慨。李汉俊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和武汉民众一道，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学生开始罢课，英美烟草公司工人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罢工的浪潮很快汹涌整个江城。

六月十一日，英帝国主义悍然出动武装士兵，开枪袭击广大群众，“立毙八人”^②，伤者无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汉口惨案”。

翌日，武汉三镇全体罢市。武汉人民涌上街头，愤怒声讨

^①曾昭安的回忆记录（1972年12月），原件存武汉大学档案室。

^②见1925年6月13日《晨报》。

帝国主义的新暴行。十五日，汉口英、日工厂的中国职员、工人一律罢工。武汉学联组织长途演讲宣传团分赴各地，进行爱国宣传。同时，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纷纷举行集会、游行，一个新的反帝浪潮席卷全国。

江城反帝运动遭到湖北督军肖耀南的疯狂镇压。惨案发生后，督军府出告示诬指为“流氓滋事”，派出大批军警，在武汉街市头巡逻，逮捕了肖英和武汉学联负责人许鸿等十余人，并以“赤党”罪名，将肖英等八人枪毙。肖耀南对李汉俊早已恨之入骨，下达了缉捕李汉俊、王仲友、褚汇宗等人的通缉令^①。白色恐怖笼罩着江城。

肖耀南辱国媚外的罪行，更加激怒了武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武汉人民展开了持续几个月的斗争。六月三十日，武汉各界齐集阅马场举行示威游行，“惩办凶手”、“收回英租界”、“废止不平等条约”、“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云霄。七月六日，湖北各工团召开联席会议，公推李汉俊等四人为“对汉案应提条件”的审查员，向政府提出对英先决七项条件^②。九月七日，李汉俊和董必武、蔡以忱等参加了武汉十余万民众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水陆大游行。

五卅运动爆发后，武昌高师校长石瑛^③秉承肖耀南的旨意，提前放假。大部分学生离校，因而没有考试。秋季，学生

①见1925年6月20日《晨报》和1925年7月1日《工人之路特号》。

②见1925年7月11日《晨报》。

③石瑛（1879—1944），号衡青，湖北阳新人，前清举人，曾留学日本、西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后在重庆病死。

返校后，石瑛又令补考。武昌高师附中学生极力反对，“不允受考，嗣经学校当局强制执行结果，留级者竟达百名，全校哗然”^①。

石瑛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和居正、郭聘帛等一起，反对董必武领导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正是这个石瑛在武昌高师扶持“孙文主义学会”，形成一股以他为首的右派势力。这股势力或明或暗与军阀相勾结，迫害进步势力，深为师生痛恨。因此，陈潭秋、钱介磐（即钱亦石）等决定借此事件发动驱赶石瑛的学潮。学潮发动后，李汉俊立即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参加了学潮。

十二月初，附中四年级学生首先倡议全校罢课以示抗议，同时以附中学生自治会名义发宣言，痛斥石瑛追随反动军阀，迫害学生的罪行。一天清晨，附中全体学生整队到武昌高师本部，将校长办公室围住，跟石瑛评理。石瑛仗恃校长“权威”，破口大骂。学生大怒，齐声喊打。石瑛不得不交出校印，答应辞职^②。

肖耀南闻讯，立即派军警拘捕学生领袖，强命学校“暂行停闭，听候查办”^③。李汉俊等立即发动大学的进步学生举行罢课，声援附中学生。十二月二十一日，武汉地区各学校一致罢课，前往督军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④。

石瑛迫于形势，只好辞去“国立武昌大学校长专职”^⑤。石瑛离校后，李汉俊、黄季刚等教授出面，组织了校务维持会，主持工作。

①③④见1925年12月16日《晨报》。

②见1925年12月13日《晨报》。

⑤见国立武汉大学编印《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23年）。

这年秋天，陈独秀致函李汉俊，请他到上海大学执教。一九二六年春，李汉俊到上海，接替郑超麟在社会系的教学工作，主讲《唯物史观》。

（五）

党的“三大”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以推动国民革命的方针。李汉俊拥护这一正确的方针，积极参加统一战线工作^①，并做出了成绩。

夏斗寅原是鄂军混成旅旅长、前鄂军总司令李书城的旧属，与李家兄弟交谊甚笃。在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初，李书城通过李汉俊做夏斗寅的工作，晓以大义，劝他顺应历史潮流，率部参加北伐。夏斗寅遂委第二团团长方殿甲代行他的职务，“请假一星期”^②，于五月十六日与叶琪“秘密逃汉”^③，“只身改装”迳往上海^④，与正在上海大学教书的李汉俊相遇后，转赴广州，宣布起义，夏被委任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师长。七月十一日，率部抵达长沙。

①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李汉俊在“二大”时，曾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但后来事实却说明李汉俊是此政策的拥护者。此事可做如下两种解释：（一）李汉俊在“二大”时，并非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蔡和森误解了李的意思；（二）“二大”后，李汉俊改变了自己的反对立场，拥护党的统一战线。但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这种矛盾现象只能暂作存疑，有待进一步考证。

②见1926年5月10日《大公报》。

③见1926年5月18日《晨报》。

④见1926年5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

同年夏，李汉俊作为湖北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副团长抵达长沙，和团长董必武同住在夏斗寅的司令部。代表团向北伐军提供武昌敌军军事情报，催促北伐军迅速进攻武汉。此时李汉俊参加了国民党，被委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与挚友詹大悲聚首长沙。随后他们一起随北伐军回到武汉。

这时武昌城尚未攻克。李汉俊一方面协助董必武，为支援北伐军攻打武昌城而奔波；另一方面积极参加湖北省政权的建设工作。九月二十三日湖北政务委员会宣布成立，李汉俊和詹大悲等出席了第一次会议，邓演达为主任，李汉俊为政务委员兼接收保管委员会主席委员^①。政务委员会下设四个科，其中教育科长原为郭沫若，因郭坚辞不就职，李汉俊复兼任教育科长。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人选是蒋介石指定的，所以是一个“鱼龙漫衍的模范政府。”“委员会五花八门地是什么人都有。有的昨天还是罪该万死的旧军阀，而今天便一跃而成为了功高千古的革命功勋。”李汉俊和詹大悲却是“铮铮佼佼的第一流人物”^②。

十月一日，在政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经李汉俊提议决定成立“湖北教育讨论会”。李汉俊为该会主席。他聘请了董必武、钱介磐、耿丹、邓初民等九人为会员，负责“改造及振兴”全省教育事业^③。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在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上，李汉俊、董必武、钱介磐等十五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四月十日，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取代“湖北政务委员会”。李

①见《湖北省政府公报》1926年第1期。

②见郭沫若：《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③见1926年10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

汉俊和恽代英起草了成立宣言。李汉俊和董必武、恽代英、詹大悲、邓初民、张国恩等为省政府委员，李汉俊兼教育厅厅长。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湖北省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李汉俊和项英、刘少奇等出席了大会开幕式，李汉俊还在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演。他称颂“农工是世界解放的钥匙，无农工世界不能存在，无农工世界亦不能解放”^①。二日，武汉人民举行庆祝北伐胜利及国民政府中央党部迁鄂纪念大会，李汉俊在武昌的庆祝晚会上发表长篇演说^②。九日，在武昌学联举行的游艺会上，李汉俊和恽代英等发表了演讲。十日，在中国济难会湖北总会招待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集会上，李汉俊以济难会交际股主任的身份，致欢迎词，号召大家为全国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努力。二十一日，汉口市党部工人运动讲习所开学，李汉俊主讲《三民主义》。二十四日，他参加了董必武为所长的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开学仪式，并在该所担任教师。他鼓励学员“要站在农人和工人方面”，“要跟着民众而变成被压迫阶级的工具”^③。与此同时，他还在汉口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冬令讲学会教授“社会学大纲”、“人生哲学”。他积极参加了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筹备工作，农讲所正式开学后，他主讲“世界政治经济状况”。还在武汉军校兼课。

为培养革命人才，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昌高师、湖北商科大学、医科大学、文科大学、法科大学等学

①②见1927年1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

③见1927年4月30日《汉口民国日报》。

校合并成立武昌中山大学。二月九日中央党部和政府二十二次联席会议指定李汉俊和徐谦、顾孟余、章伯钧、周佛海等五人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委员”^①，实由李汉俊负责。二月二十日，武昌中山大学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邓演达、董必武等到会祝贺，李汉俊在会上报告了筹备经过。他主持校务，聘请董必武等为校务委员。陈潭秋、恽代英、陈雨苍、邓初民等一些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知名人士到校任职或演讲。共产党组织还派包泽英、王平章、邬聘三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学校学习或工作，

四月十二日，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会成立，李汉俊在会上说：“我们要牺牲个人的利益，为全部分的整个利益，故学生会必须团结，全体会员为各级痛苦民众利益而奋斗”^②。二十八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北京，李汉俊为挚友的遇难而悲痛，在武昌中山大学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号召学生们踏着革命先烈的足迹走下去。他说：“常有一般号称革命同志，均自以为我是重要分子，我不能随随便便的牺牲，牺牲了必须有很大的代价，这完全是错误思想，我们必须无论何时何地，均必须有牺牲的决心”^③。

李汉俊经常抽空关心教学，亲自授课，抽查学生作业和试卷。刘仲衡遵董必武嘱考入武昌中山大学法科。毕业考试时他写了《法学通论》一文，其中对《周易·蒙卦》中“法刑人”一句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刑”与“型”相通，“法刑人”不

①见1927年2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见1927年4月13日《汉口民国日报》。

③见1927年5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

是绳之于刑法之意，而是效法典型的意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因此，他主张法律也应以教育为主，注重改造人的思想，树立典型，将犯人改造成新人。李汉俊看后大喜，在卷面上批道：“民主思想的法学”。随后，李汉俊把这篇文章送给董必武阅，董也十分赞赏^①。

革命洪流奔腾向前，蒋介石叛迹渐露，一九二七年初，蒋介石窥探武汉政权已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所控制，遂反对迁都武汉，擅自宣布迁都南昌。

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立即发起了“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活动，重申建都武汉。二月十九日，湖北省国民党省党部执监会召集武昌、汉阳、汉口各级党部开联席会议，董必武为大会主席，李汉俊作政治报告。他义正辞严地说：“中央迁鄂是在广东经全体中央执委议决者，在外交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均属必要，若推翻原案，不仅违背多数党员的意志，且违反客观的事实及人民的要求，吾们要破除封建制度，必须力量集中于最高指导机关，以运用大多数的意志，决不能依照少数人的自由意志，否则非民主集中制，乃个人独裁制，如此不惟违背本党总章，且破坏了党的生命。”他号召党员“宜一致努力运动”，诊治“独裁”的“病象”^②。

二十四日，陈公博奉蒋介石令到汉“刺探”情况。李汉俊和詹大悲入夜见陈，对蒋介石破坏革命的行径痛加斥责。陈公博为蒋的行径辩解，双方争论半夜。陈公博怀疑他俩是受共产党的“操纵”^③，最后不欢而散。

^①访问刘仲衡记录（1982年6月7日）。

^②见1927年2月23日《汉口民国日报》。

^③见陈公博：《苦笑录》第73—74页，香港中文大学亚洲中心出版。

二十七日，以湖北省阳新县商会会长为首的反动分子，用煤油将该县县党部工作人员和农民运动领袖等九人活活烧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阳新惨案”。消息传到武汉，三月二日，李汉俊和钱介磐、郭树勋等，出席了董必武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集的紧急会议。会议作出紧急决议：派专员会同政务委员会立即前往阳新调查，严肃处理；组织惩治土豪劣绅条例起草委员会，敦促政务委员会迅速派遣部队镇压土豪劣绅的暴乱。会后，省政府派出警卫一团两个连的军队前往阳新，就地枪决了两名反革命分子，把县商会会长押到省城，交司法厅审理。董必武、李汉俊等及时处理“阳新惨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两湖日益兴起的农民运动，沉重打击了蒋介石之流的反革命活动。

四月四日，李汉俊在湖北省省党部纪念周上作政治报告说，麻城、天门、京山、黄梅、松滋、江陵、随县、钟祥等地，发生遏阻农运的事，“这一方面固然是表示为封建基础的土豪劣绅，更猛烈的向革命势力进攻；一方面也是表示革命更深入了农村，革命主力军的农民是更猛烈地进行，这可以说是湖北现真正的入了革命的状态”^①。他尖锐地指出：土豪劣绅是“革命势力以外的势力”，正在与“革命势力以内的势力”联系起来进攻革命。而这个“革命势力以内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他历数蒋介石“近年反动的情形”后说，“可知全国的反革命势力，现正以本党军队的总司令蒋介石为中心，在联合起来围攻革命势力，革命正面临着“危机”^②。十一

^①李汉俊在省党部纪念周之政治报告，见1927年4月13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见1927年5月18日《汉口民国日报》。

日，李汉俊参加了董必武主持召开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二十五次执委会。会上作出了呈请中央速免蒋介石职务的议案。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李汉俊立即和武汉民众一道愤怒声讨蒋介石。

五月十七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受蒋介石指使，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发动叛变。李汉俊力主讨伐夏逆。十八日，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两党部“为夏逆斗寅叛背党国，举兵犯顺”举行执监联席会议，董必武为会议主席，李汉俊参加了会议。会议议决“通电声讨夏斗寅”，武汉三镇召集群众大会，“宣布夏斗寅叛党罪状”，“发表告十四师士兵及各界宣言”等六项决议^①。当时李书渠任夏部十四师政治部宣传科长，被夏斗寅驱逐回汉，李汉俊立即动员他写一篇夏斗寅叛变经过的文章，在报上发表以揭露夏斗寅的反动本质。二十七日，他赴首义公园，出席“讨奉讨夏大会”。会上，他和郭沫若等相继发表演说，谴责夏斗寅为蒋介石的“小走狗”。五月三十日，他在“纪念‘五卅’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及济难运动周宣传大会”上讲话指出：“现在帝国主义又利用新军阀蒋介石作他们的新工具，来压迫革命的民众，革命的民众，大家要起来奋斗”^②。

新旧军阀在帝国主义怂恿和支持下，对武汉国民政府实行经济、军事封锁，形势日益恶化。汪精卫也暗中加紧策划反革命阴谋。六月下旬，在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省、县、市联席会议上，汪精卫代表中央训词，对董必武主持的省党部工作大加

^①见1927年5月18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见1927年5月31日《汉口民国日报》。

责难，对湖北农民运动极为不满。李汉俊作为会议总主席，在会上针锋相对地充分肯定省党部的工作，对农工运动尤其称颂，指出农工的力量是革命的基础，提出“为巩固革命的基础”，“非武装农民不可”，枪支不够“只有到军队中去找枪”^①。他提请中央注意，农运中出现一些偏差，主要是因为乡间政权混杂有土豪劣绅、不良分子，至于“阻挠税收问题”，也不全然是“人民幼稚”，“有些是由于官吏贪污所引的。”他提请中央应该“建设真正的廉洁政府”，“建立健全的乡村自治”^②。在他的主持下，会议通过宣言，指出：“一切反动势力，因革命势力之发展，亦结成反革命的联合战线，张牙舞爪，希图蠢动，并且千方百计，想摇动革命的新根据地，但终为伟大雄厚的革命势力所镇压”^③。

这个时期，鉴于李汉俊的一贯政治表现，董必武与陈潭秋等曾向中央提议，恢复李汉俊的党籍，但由于陈独秀的拒绝，使李汉俊最后失去了回到党内的机会^④。

（六）

汪精卫分共后，政局纷纭多变。在这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李汉俊一度陷入苦闷、彷徨之中。一方面，他反对清洗共产

①见1927年6月28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见1927年6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③《中国国民党湖北第一次省县市联席会议宣言》，见《党务周刊》第1期，1927年7月10日。

④访问王慧文记录（1982年6月20日）。王慧文，字风藻，湖北麻城人，1921年在武汉参加共产党，1928年脱党。解放后在武汉市石油公司工作，1982年病故。

党，曾对李伯刚说：“国民党这样清党，把一点力量都清去了，国民党也就要完蛋了，革命的希望还是共产党”^①。但他又不同意共产党的武装暴动政策，与他的朋友邓演达、施存统、许德珩等思想一致，希望在中国出现第三党，“团结农工及小资产阶级来作国民革命”。他将这个想法和唐生智谈过几次，老奸巨滑的唐生智表面同意他的一些看法，故他“对唐存在一些幻想”^②。这时，董必武和李富春等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给他指明了方向。七月中、下旬，董必武为安排一部分同志向南昌转移事而去九江的前夕，曾找李汉俊谈话说：“这次党的撤退，没有布置后卫，原来同党合作的人，要留下做点工作。”^③李富春也对李汉俊、邓初民指出，应该坚持革命，不过可以继续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守住摊子，说：“你们的摊子能守多久就守多久。”^④于是李汉俊和詹大悲、邓初民、张国恩等留在国民党湖北省（市）党部和政府内，运用合法的身份，团结国民党元老孔庚、李书城，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特殊的战斗，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董必武等领导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省政府，早被汪精卫之流所忌恨，咒骂为共产党的“窝子”。“七·一五”后，汪精卫立即下令对其进行改组和清洗。七月二十日，汪任命孙科、潘云超、孔庚为湖北特别委员会委员，负责湖北省党务清洗工作。同日，武汉国民政府免去了董必武、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湖北省政府委员的职务。李汉俊和孔庚、李书城、詹大

①②③李伯刚遗稿：《回忆李汉俊》，见《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7期。

④邓初民《九十述感》，见《湖北文史资料》第3辑，1981年9月版。

悲、邓初民等留在省政府，李汉俊仍兼教育厅厅长。二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定李汉俊和孔庚、孙科、罗贡华、邓初民等九人为湖北省党部改组委员，负责改组全省党务。三十一日，湖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李汉俊为青年部长，邓初民为宣传部长，张国恩为农民部长。

汪精卫之流组织湖北省特别委员会，成立湖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的目的是清洗共产党。李汉俊和詹大悲、邓初民等在孔庚、李书城的支持下，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国民党右派从省、市党部和政府内清洗出去。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李汉俊以青年部长、教育厅长和武昌中山大学负责人的身份，把一些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安插在这几个单位工作。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受到他的保护。他不让右派担任教学工作，聘请了李达、林可彝、刘云门等左派教授，稳定革命师生的情绪，守住了这块“赤化的学校”阵地。

大革命时期，湖北全省中、小学校长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孙科以武汉国民政府青年部长的身份，下令成立湖北教育委员会，派亲信主持会务，将李汉俊排斥在外，叫嚷要清洗全省中、小学校的共产党员。李汉俊通过省改组委员会第五次常委会，被决定为教育委员会七委员之一，把孙科提名的焦斐瞻、赖特才排斥在外。他还预先通知一些担任校长的共产党员，使他们安全脱险，挫败了孙科的阴谋。

国民党右派攻击“湖北政权由左倾分子李书城及亲共分子李汉俊、詹大悲所主持”^①，阴谋取而代之。八月，以湖北省党

^①见1927年12月16日《顺天时报》。

部改组委员、省政府商民部长罗贡华和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刘叔模为头目的国民党右派，秘密组织了三民社，打着维护三民主义的旗号，“暗中煽惑青年”，企图“抓着武汉政权、党权、教育权，使共产党无立足之地”^①。

李汉俊等掌握这些情况后，于九月二十七日晚，趁他们还在刘叔模处开会之机，将其头目全部抓起来，移送湖北镇压反革命委员会严加管押审理。十月六日组成了李书城、朱霁青、叶琪三人特别委员会审理此案。同日，省党部贴出通知，“以前误入三民社者，皆须自首及呈报该社一切印刷物，得于免究，否则一经查出，即行严办”^②。随后，公开审判了罗贡华、刘叔模等，并于十一月三日判决，将“三民社解散，罗贡华、刘叔模取消改组委员职务，开除党籍”^③。

蒋介石被迫下野后，九月十五日桂系军阀纠合国民党各派在南京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南京特委会），行使国民党中央最高权力。九月二十一日，汪精卫与唐生智在武汉宣布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之相对抗。十月十九日，南京特委会组成西征军，分三路进攻武汉。

形势日益恶化。李汉俊和詹大悲产生了去日本的念头，曾找董必武商量。董必武“当时很不赞同”，劝他们“不应该随便离开革命战线”^④。他们遂决定留下来坚持斗争。西征军到达武汉前夕，李汉俊和李书城等以湖北省政府的名义，“将

①见1927年10月9日《申报》。

②见1927年10月8日《申报》。

③见1927年11月5日《申报》。

④董必武的回忆（1928年4月1日）。

当时在武汉被捕获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二三百人全部释放”^①，使他们免遭桂系军阀的杀害。

十一月十四日，西征军进驻武汉。南京特委会派出“党务整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整委会”），企图控制湖北省（市）党部大权。李汉俊和詹大悲等以省（市）党部改组委员会名义，发动民众在武汉三镇遍贴“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派人整理湖北党务”等标语，并在《汉口民国日报》上抨击“整委会”。

“整委会”则以《新民日报》为喉舌，攻击省（市）党部。“两相争持，各不相下”^②。十一月二十九日，“整委会”致电南京特委会，攻击“湖北省党务夙为共产党及投机分子所把持”，李汉俊、詹大悲、张国恩、邓初民等“皆为附共”之“罪魁”^③。同日，“整委会”强行接收了汉口特别市党部和《汉口民国日报》、《楚光日报》。当反动势力向进步力量扑来的危急时刻，李汉俊等与“整委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二日下午，他们发动工人、学生收回《汉口民国日报》和《楚光日报》，并登载启事，痛斥“整委会”是反动派。

李汉俊派武昌中山大学的学生深入工厂，发动工人与“整委会”作斗争，爆发了“武昌震寰纱厂事件”。

事件的导火线是“整委会”与该厂厂主狼狈为奸，以“共产”及剪发为罪名，开除了几个女工领袖。十一月二十八日，武昌中山大学的梅玉珂等女生在该厂附近演讲，被厂主及工贼开枪杀害多人。第二天，李汉俊通过青年部发动了五六百学生到震寰纱厂抗议厂主及工贼的血腥暴行。工人群众和学生站在

①李书城答觉明的信（1964年9月12日）。

②见1927年12月2日《申报》。

③见1927年12月3日《申报》。

一起，质问厂主。愤怒的工人、学生当场捕获凶手五人，在厂内空场上举行有三千余人参加的审判大会，枪毙了凶手。

李汉俊、詹大悲等的行动引起了反动派的仇恨。“整委会”“请国府明令缉拿”李汉俊、詹大悲，并贴出打倒及捕缉李、詹的标语。十一月下旬，李汉俊和詹大悲相继呈文省政府请假或辞职后，躲匿于汉口租界中街（今胜利街上段）四十二号。董必武就住在附近，他们时有来往，互相鼓励，互相关心。十二月十六日，报上披露了董必武“潜伏”日本租界事。李汉俊和詹大悲十分关心董必武的安全。次日中午，请潘怡如专程到董寓，希挚友“注意”^①。董必武关照：“你们危险比我大”^②，希望他们保重。果不出董必武所料，当天下午五时左右，桂系军阀胡宗铎通过日本驻汉领事，派出“便衣干探数名”会同日本巡捕，至李汉俊、詹大悲寓中，将其“拘获”^③。同时被捕的还有潘怡如、危诰生和洪青等三人。

李汉俊被捕时十分坦然。他安慰了妻子后，便随军警走出了大门。他的妻子目送李汉俊消失在昏暗的灯光下，心情凄楚。

董必武惊悉恶讯，立即托朋友营救。李书城也与程潜交涉。反动当局根本不加审讯，将李汉俊等从武汉卫戍司令部押到汉口特别市公安局。

晚八时，从伪公安局到济生三马路（今单洞门内）的大街上，岗哨林立，一群士兵押着李汉俊和詹大悲向空场（今焕英

①董必武的回忆（1928年4月1日）。

②田海燕记董老谈话（1961年）。

③见1927年12月23日《申报》。

里)走去。

詹大悲满腔激愤，面向荷枪实弹的士兵发表了简短的演讲，痛骂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屠杀工农，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禽兽！

李汉俊临刑前向漆黑的夜空呼道：“胡宗铎的手段真辣啊！”

十二月十七日晚九时，随着一排枪响，李汉俊和詹大悲壮烈牺牲了，革命者在战斗过的江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李汉俊和詹大悲牺牲后，董必武怀着悲痛心情，挥笔写文沉痛悼念亡友的战斗生涯。一九五二年八月，毛泽东主席为李汉俊同志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作者附记：本文参考资料除文中已注明出处者外，还访问了夏之栩、李文宜、袁溥之、刘子谷、张申府、刘仁静、郑超麟、杨玉清、郭树勋、王慧文、陈端本、赵春珊、兰叔文、刘仲衡、刘弄潮、钟复光等，和李汉俊的亲属薛文淑、李声馥、李声馥等。

于 方 舟

窦爱芝 刘玉芝

于方舟，原名兰渚，又名芳洲，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五日（农历八月二十二）生于天津市宁河县俵口村一个农民家庭。俵口离天津不足百里，直接受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祸害。于方舟幼年时，母亲就常给他讲述当年八国联军侵略者的罪行；父亲于际刚，也经常给他讲述林则徐、关天培等抗英故事和义和拳反帝斗争的英勇事迹^①，使他在家教中受到了反帝爱国的启蒙。

于方舟六岁开始在本村念私塾，十三岁入俵口小学堂乙班读书。他最爱听国文老师讲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课后还经常阅读这类书籍，并给同窗学友讲述民族英雄的事迹，以英雄们的崇高思想和行为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在小学读书时，一同学因家境贫苦，不能按期缴纳学费，校方勒令其退学。于方舟知道后，跑去同学校当局交涉，学校以“不可破例”拒不答应，他便毅然用自己的钱替这个同学把学费交齐，老师称赞他是：“秋月阳辉桂一枝”^②。

一九一七年秋，于方舟考入设在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中学校，编入普通科第七班^③。初到天津的于方舟，目睹外国侵略

①②烈士四兄于汉才的回忆。

③见民国7年直隶省立第一中学校的《同学录》。

者在中国的土地上开租界，设岗哨，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心中充满了忧愤。

十月革命胜利和苏俄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消息传入中国后，于方舟极为兴奋。他立即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举行座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俄的对华政策，憧憬祖国的美好未来，谋求救国之道。当时，学校成立了三育促进会，并创办《进修》周刊，于方舟因踊跃投稿被聘为该刊的编辑员。一九一八年十月，他署名于兰渚在《进修》周刊第二十一期至第二十三期上，连续发表纪实小说《庚子癸余记》，描写“因庚子之役，京地大乱”，一个小康之家由京都逃难，流寓僻乡后的凄惨遭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①。他还以芳洲为名，撰写《蠹矢录》，揭露社会豪强依仗权势、欺压善良的罪恶现象。于方舟面对军阀混战、神州破碎、恶吏贪残、百姓饥荒的凄惨景况，忧心如焚，决心以天下为己任，遂以“方舟”为名，自期自奋，愿作“渡人之舟”，把祖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他在《方舟歌》里写道：“苍茫大海中，方舟一叶如萍梗，帆樯了不具，问君何以济群生？”立志使自己具备救国救民本领，“以济群生”。他自警道：“狂澜四面严相逼，群生彼岸须舟亟，方舟负任一何重？方舟遭境一何逆？”激励自己“努力壮尔神，努力执尔舵，战胜眼前魔，何愁沧海阔？”表现了一个革命青年拯救祖国人民的坚强决心。他在《方舟歌》后的“自志”中写道：“佛家谓慈航普渡，而今之最习用语。亦恒以今世为过渡时代，究之茫茫宇宙，林林众生，何时不在过渡，而过渡时代亦何曾有已时乎？以方舟名，盖以渡人之舟，

^①见《进修汇刊》第21期。

窃自期也。而入世之初，已遭颠扑，瞻望前途，如何自奋乎？吭歌数句，聊用自警……”^①。于方舟正是为了实现“渡人之舟”的宏伟抱负，进行了拯救祖国的不懈战斗。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海河两岸，于方舟立即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洪流。五月六日晚，天津各中等以上学校推举代表，在北洋大学举行紧急会议，直隶一中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回校后，立即组织了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救国团，推举于方舟为团长^②。五月七日，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组成，于方舟作为直隶一中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且参加了“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示威游行的组织领导工作^③。五月十四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于方舟被选为天津学联会评议会的委员^④，随后又被推选为参加天津各界联合会的学生代表之一^⑤。五月二十三日，于方舟带领直隶一中的学生冲破反动校长王梦臣的种种阻挠，积极参加了天津十五所中等以上学校的罢课斗争。在于方舟的带领下，直隶一中学生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

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天津一些革命社团相继诞生。周恩来等发起组织了觉悟社，于方舟等倡导的新生社也应运而生。这两个革命团体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为了“发表新生社的主张和成绩，与

①于兰渚：《方舟诗稿》，见《同乡会季饒》第1期。

②刘家俊：《五四运动中直隶省立第一中学的一些活动》，见《五四运动在天津》。

③少痴：《烈士于方舟》，见《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2集。

④邓颖超1957年给冀东烈士陵园的信。

⑤王贞儒：《于方舟烈士传》，见《天津历史资料》1964年第1期。

介绍新思想”，新生社于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创办了《新生》杂志。这是一个“带社会主义色彩”的刊物^①，在五四运动中为团结天津进步青年、传播真理、开展爱国斗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为推动运动深入发展，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了讲演部，于方舟被选为学联宣传科及演讲队职员^②。他积极发动直隶一中的进步学生，成立演讲队，经常到东门脸、东北角等地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罪行，号召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给听众以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学生演讲队在街头出现不久，天津警察厅就严令禁止，不服者立予逮捕，同时“劝令”学生复课。天津学生不畏强暴，坚持罢课、讲演。八月二十三日，正当于方舟在街头演讲，揭露山东镇守使马良枪杀爱国民众的罪行，号召天津各界人民援助山东人民的革命斗争时，被反动警察抓去，拘押了半个月，出狱后，他仍无所畏惧地进行爱国宣传^③。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天津各界联合会在南开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践踏我国主权的罪行，于方舟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会后，举行游行示威。于方舟始终与游行队伍在一起，沿途讲演，带领队伍高呼口号，在警察厅门前坚持斗争到深夜。

运动不断发展，斗争日益激化。反动派对爱国学生的迫害也日益加紧。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爱国学生数千人，在周恩来等率领下，为要求释放被先后捕去的二十多名各界

①《天津的文化运动》，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

②刘家俊：《五四运动中直隶省立第一中学的一些活动》。

③王贞儒：《于方舟烈士传》。

代表，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反动当局竟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酿成流血惨案；于方舟与周恩来等四人作为请愿代表，也被捕入狱。

在狱中，于方舟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写下了“爱国不怕进狱门”、“买办洋奴休横行”的壮烈诗篇^①。二月六日，于方舟与被捕的其他代表一起，从营务处被移往警察厅。当天下午，他就给警察厅长杨以德写了一张质问拘捕理由书^②，揭露反动当局逮捕爱国青年、镇压爱国运动的罪行。警察厅反动警官问他：“你们到省公署何事？”于方舟慨然回答：中国“外交要失败，正在‘一发千钧’的时候，所以请愿省长，让他代打电报给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代表，惩办镇压学生的杀人凶手。于方舟反问警官为什么要拘留大家。反动警官无词以对，只好回答说：“这个我也没法，都是省长的意思，我们小机关不得不服从。”于方舟进一步严词质问：“你们既无权处理，何以滥行职权拘捕我们，独不顾及中华民国国家的人格吗？”^③这一席话，把反动警官问得瞠目结舌。

为了揭露敌人，唤起各界同情，抗议非法拘捕学生，于方舟和周恩来等领导狱中难友进行了绝食斗争。在社会舆论的声援下，警厅不得不于四月七日把各界被捕代表移送到地方检察厅。被捕代表还争得了读书聚会的权利。当日，他们就订阅了《时事新报》、《晨报》、《益世报》、《泰晤士报》等多种报纸，并且成立了“书报公司”，凑钱购买新书阅读。于方舟与周恩来一起办起了读书会，组织难友们学习英文、历史、数

①少痴：《烈士于方舟》。

②③周恩来：《警厅拘留记》，见《五四爱国运动》（上）。

学、中文等科学文化知识，研究社会问题。他与周恩来等被推为“永久研究社会问题委办”，专负对社会问题研究之责^①，规定晚上举行各种内容的演说会。周恩来用五个晚上的时间向难友们系统地宣讲马克思学说，于方舟演讲了“平民教育实施的办法”^②。他们通过召开各种类型的讨论会，如职业讨论会、商业讨论会、天津平民运动方法讨论会等，共同研讨重大社会问题。他们还在狱中开展爱国文化娱乐活动，周恩来演南开新剧《一元钱》，于方舟积极为演出进行各项准备，并与别人一起多次演出滑稽剧。他还被公举为庶务员，“专管同拘的人衣物洗濯的事”。他热心办好这件事，认为“借此尝试劳动的生活”^③。于方舟虽身居囚室，却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于方舟入狱的消息传到家乡，他的父亲赶来探望。当时宁河有个绅士以“关心青年前途”为名，也前来“劝说”于方舟以读书为要，说什么不在其位，不要谋其政。于方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予以谢绝^④。

在天津人民积极声援和全体被捕代表的坚决斗争下，检察厅不得不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六日至七月八日开庭公审。在法庭上，于方舟与周恩来等义正词严地进行答辩斗争。七月七日的公审中，于方舟就检察厅判他们四个人为“骚扰罪”而严厉质问检察官：“试问省长是中国行政长官，学生是中国学生，以中国学生请愿于中国行政长官，何得谓之触犯刑律？倘省长为日本省长，学生为中国学生，加以骚扰罪名，或可有之。”寥

①②③周恩来：《检厅目录》。

④《于殿选访问记》。

寥寥数语，把反动军阀亲日卖国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七月八日，他与周恩来等又答辩道：“检察官以学生请愿为合法，而又依据刑律一百六十四条起诉，是检察官自相矛盾。”把反动法官置于被告地位。最后，检察厅只好强捏罪名，以“聚众骚扰罪”判处他与周恩来等四人有期徒刑两个月，用非法监禁的日数与刑期相抵的手法，于七月十七日宣布“期满”释放^①。

铁窗生活，使于方舟经受了斗争的磨炼，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教育，更加深了与周恩来等的战斗友谊。一直在积极寻求革命真理，苦心摸索改造中国之路的于方舟，当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就为这光辉的理论所吸引，并从中吸取前进的力量，以崭新的姿态，开始了新的战斗。

于方舟获释后，被学校开除了学籍^②。他怀着对反动派的强烈仇恨和拯救国家危亡、解除劳动大众疾苦的迫切心情，来往于天津、宁河之间开展革命活动。

这时候，宁河县政府通过了县议会议长、劣绅刘瑞五提出的每亩盐、碱、薄、洼地增征二钱六厘银子附加税的提案。反动县政府发布了增税的告示，进一步压榨农民。于方舟决定发动农民进行抗税斗争。他走村串户，以宁河县旅津学生同乡会的名义，召集暑假回乡的进步同学，与贫苦的农民、渔民去县政府请愿。于方舟当面质问刘瑞五：为何巧立名目，增加附加税？刘瑞五心怀鬼胎，无以回答。于方舟向刘瑞五严正指出：你身为议长，既不体贴民苦，又讲不出附加税的正当用处，盐、碱、薄、

^①周恩来：《检厅日录》。

^②人权：《于兰渚等遭学校开除》，见《觉悟》1921年4月5日。

洼之地，又多数不在你们地主豪绅之手，如此的附加税，岂不是危害于民吗？他代表请愿群众指出：当局必须立即宣布撤销原案，撤回增收附加税的告示^①。外面的群众也应声呐喊。宁河县当局生怕闹出乱子，只得当场宣布免征附加税，斗争取得了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和铁窗生活的锻炼，更加坚定了于方舟追求革命真理、拯救国家危亡的崇高志向。他积极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和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取得了联系，成为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通讯会员。一九二〇年夏秋之间，于方舟等组织了天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发行了会刊^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对天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一九二〇年五月以后，随着上海等地共产党小组的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各地建立起来。十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于方舟和张太雷分别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两个团小组。一九二一年春，张太雷赴莫斯科后，于方舟又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将原来天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③。

一九二二年九月，于方舟借用本村于绍舜的名字，巧妙地避开反动当局的耳目，考入了南开大学文科。他一面认真探求科学知识，一面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为了广泛团结社会力量，在同乡旅津学生的支持下，于方舟于一九二二年秋，重新整顿了处于瘫痪状态的宁河旅津学生同乡会，由于他“能力过人，

①于文郁：《回忆父亲于方舟的二三事》，见1961年8月18日《天津日报》。

②③《李大钊传》。

热心于事”，在同乡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会长^①。他不负众望，竭诚工作。在他的倡导下，创办了《同乡会季鏊》，作为联络同乡，讨论问题，交流情况，互相促进，共同学习的园地。他撰写文章，揭露社会黑暗，抨击社会腐败现象，主张改造社会。他指出：“中国时局之乱极矣，中国人民之苦极矣，四万万同胞无片刻之安生，数百万方里无尺寸之乐土”。他还指出：中国之所以如此纷乱，就是因为：政治之不良，法律之不善，教育之不普及，实业之不振兴。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谋求国家“根本之改善”。他还提出了改造社会的具体方法，呼吁大家“起而行之”^②。

一九二二年，于方舟重新组织了天津学生联合会，被选为执行部部长^③。一九二三年，经李大钊介绍，于方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三年冬，党中央派蔡和森到天津指导工作，指示于方舟筹建天津的共产党组织。于方舟接受这一任务后，和天津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江浩、李锡九等积极进行筹建工作。一九二四年春，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领导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法租界二十四路普爱里三十四号（现和平区长春道普爱里二十一号）召开成立大会，于方舟当选为地委书记。

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也于同年三月九日在高等工业学校召开成立大会。于方舟在会上做了报告，传达了中央通告，说明了团组织在津活动的范围、方法和态度^④。

① 《同乡会季鏊》第1期。

② 于兰渚：《地方问题发端》，见《同乡会季鏊》第1期。

③ 王贞儒：《于方舟烈士传》。

④ 天津S.Y.地委致团中央报告。

李锡九、王卓吾、邓颖超等也分别做了报告，对团组织决议宣言、国民党事项、内政外交以及纪念五一节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会议确定了团组织的工作任务和行动方法，选举于方舟、李廉祺、王乃宽、邓颖超、王卓吾等十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于方舟任委员长。

团地委建立后，首先决定加强对团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规定《向导》、《中国青年》、《共产党宣言》等为必读书刊。同时，邀请“马克思派学者”进行讲演，帮助团员提高理论水平和阶级觉悟。以于方舟为首的团地委还决定，由团员组织天津学术讲演会，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①，并要求团员深入工厂和农村进行革命宣传，以增强团员与劳动人民的感情，唤起工农民众的觉悟。团地委还组织团员协助党组织开展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于方舟根据党的指示，代表直隶省参加了大会，并被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会后，于方舟回到天津，积极筹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领导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他与共产党人李锡九等共同努力，于二月底在天津法租界普爱里十九号（现胜利路义庆里四十号）建立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该党部委员均为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于方舟被选为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孙中山由上海绕道日本抵达天津，去北京商讨国事。以于方舟为首的中共天津地委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发动五十多个爱国团体，组成了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先生

^①天津 S.Y. 地委致团中央报告。

大会筹备会。筹备会动员和组织了工人、学生、市民一两万人^①，在码头欢迎孙中山；于方舟等也亲自前往迎接。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起程赴京，于方舟与天津各界、各团体代表二百余人，手持“国民会议”、“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领事裁判权”等标语旗子，前往车站欢送^②。一九二五年初，天津各界人民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于方舟当选为宣传科主任。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宣传活动从市区深入到县城。很快，各县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建立了起来。

三月一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于方舟、邓颖超等代表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出席了大会。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不幸病逝，于方舟等在天津组织各界人民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追悼大会。会后，举行了反帝、反军阀、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游行示威。

中共天津地委建立后，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派党员到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创办平民学校，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于方舟也亲自到学校讲课，还以“反对不平等条约”、“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内容，为学员编写“识字册”、“造句册”、“短文”等课本，向工人灌输爱国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通过平民学校，他们发展了一批党员，逐步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会组织。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天津人民第一次公开召开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会上，于方舟做了讲演，详细介绍了五一节的由来，指出了劳动人民求解放的方向。

^①魏宏运：《孙中山年谱》。

^②天津《益世报》1925年1月1日。

这期间，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天津、河北地区的领导，派李季达任天津地委书记，于方舟任组织委员^①。于方舟与李季达等紧密合作，领导了天津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

一九二五年五月，控制天津电车公司的比利时商人，企图实行电车票加价，引起市民的反对。中共天津地委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发动一次罢工斗争，并决定派于方舟负责这一工作。于方舟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开展宣传活动，亲自编写、散发传单，揭露比商敲诈市民的罪行，号召群众起来参加斗争。他还秘密深入到电车工人宿舍，召开小型座谈会，了解工人生活以及对车票加价的反映，解除工人对举行罢工的顾虑。在于方舟的发动和组织下，终于形成了全市电车工人罢工的高潮，使全市电车停驶^②，打击了外国资本家，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反帝风暴。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天津后，中共天津地委迅速将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成立沪案后援委员会，各界联合会也随即召开恢复大会。八月六日，天津二十几个工会联合会成立了天津总工会，于方舟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勉励工人同心协力，继续坚持斗争。

“五卅”运动后，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内的国民党右派，要求召开国民党直隶省代表大会，重新选举省执行委员，阴谋排除于方舟等共产党人在省党部的领导，篡夺领导权。为了揭露其阴谋，于方舟同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协商，同意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会前，于方舟做了各种准备工作，在天津召开

①吕职人：《于方舟烈士传》。

②少痴：《烈士于方舟》。

了全省共产党员代表和天津全体党团员大会，国民党左派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会代表三十余人。会上，于方舟报告了《政治现状的决议案（草案）》，阐明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并利用大会召开之机，建立和健全了各县的国民党党部，规定了县代表的推选办法和代表人数等限制国民党右派的措施，为国民党直隶省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国民党直隶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开展工、农、妇、青、商等群众运动的决议，选举了以于方舟为主要负责人的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会。击败了国民党右派的篡权阴谋。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顺直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京东玉田举行武装暴动。十月十八日举行的第一次玉田暴动受挫后，顺直省委决定派于方舟前去领导第二次玉田暴动。

于方舟带领一批军事干部来到玉田后，立即将起义军余部集中到遵化城北的王爷陵。在那里，于方舟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成立京东革命委员会和京东人民革命军以及重新攻打玉田城的决定，听取了起义领导同志的汇报，批判了原省委农民部部长、京东特委负责人叶善枝解散起义队伍、放弃武装斗争的错误。会议期间，将参加起义的农民自卫队改编成为京东人民革命军，建立了指挥机关，制定了第二次攻打玉田城的计划。人民革命军制做了绣有镰刀斧头及“土地革命”四个大字的红旗和指战员佩戴的袖章，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经过整编，全体指战员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在于方舟的率领下，高举革命红旗，从遵化向玉田进军，沿途张贴“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取缔警察民团”、“取消苛捐

杂税”、“实行土地革命”等标语。与此同时，人民革命军还打土豪，夺取反动派的枪枝，壮大革命队伍，积极准备进行新的战斗。

十月底，部队进入遵化县东南部，按计划首先埋伏在农会基础较好的刘各庄一带。一天，指战员们化装成赶集的农民，三五成群来到平安镇上，在预定地点集中，出敌不意地向敌人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打死打伤警卫民团数十人，缴获长短枪十五支，没收了税务局和地主豪绅的财物，分给贫苦百姓。当天，部队在平安镇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土地革命政策和人民革命军的任务，宣布取消向反动政府交粮、纳税，号召农民起来参加斗争。于方舟等领导的平安镇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使玉田、遵化一带群众的革命情绪重新振奋起来，要求参加革命军的群众日益增加。部队到鲁家峪时，已发展到四百余人^①。

鲁家峪位于玉田、遵化、丰润三县交界处，地形复杂，农会基础较好。于方舟等计划从这里进入玉田。当地有个恶霸地主刘玉梨，拥有团丁二十多人，和附近村庄的地主武装建立了“联防”，特别是与西面的恶霸地主吴殿三之子掌握的反动武装联系密切。这些恶霸地主横行乡里，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群众恨之入骨。人民革命军当夜向鲁家峪发起进攻，刘玉梨部依墙顽抗。人民军因地形不熟，天色又晚，加之长途行军的疲劳，激战一小时，未能攻入。当夜，人民革命军撤出战斗，计划翌日再战。不料，刘玉梨连夜串通周围数十村的反动民团两三千人，于拂晓前将鲁家峪重重包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人

^①张明远：《玉田暴动》，见《天津历史资料》1964年第1期。

民革命军又缺乏战斗经验，没有及时组织突围，遭致重大伤亡，部分领导骨干英勇牺牲，三四十人被俘。敌人从三面包围进逼，人民军被迫分散突围。于方舟、杨春林、解学海、刘自立等起义领导人率领一部突围，行至丰润县沙流河附近时，与当地民团遭遇，于方舟等四人不幸被捕，起义终遭失败。

于方舟被捕后，化名于绍尧，被解押到玉田县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和种种酷刑下，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顽强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特有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革命品德。

于方舟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党组织及其家属曾多方设法营救，并准备武装劫狱。但凶恶的敌人却抢先于一九二八年一月的一个寒风凛冽、乌云滚滚的夜晚，将于方舟等押往玉田县城南门外刑场。临刑前，于方舟从容自若，视死如归，高唱《国际歌》，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于方舟壮烈牺牲了，时年仅二十八岁。

周保中

李毓卿 李斌华

早年的戎马生涯

周保中，原名奚李元，号绍黄，云南省大理县湾桥村人，白族，生于一九〇二年二月七日。父亲奚发霖，是个皮鞋匠，母亲务农。全家七人（父、母、兄、三个弟弟和保中），仅有七、八亩薄田和两间草房，终年辛勤劳动，仍然不得温饱。

周保中七岁上学。先在村里读了两年私塾，后入大理节孝祠小学读书。一九一三年，考入县立高小学堂学习。小学毕业后，又上了一年中学。后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继续供读，不得不中途辍学。

一九一七年，周保中离家投军，到云南陆军第一师教导营当学兵。同年八月，学兵期满，他被编入护国第五军充当军士。这时，孙中山正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进行“护法”斗争。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为了扩充地盘和捞取政治资本，也接过了“护法”旗号，把护国军改编为“靖国军”，向贵州、四川等省进兵。周保中所在的护国第五军改编为靖国第八军。他随军经贵州进入四川、鄂西和陕南等地，参加“靖国护法”战争，由中士、上士擢升为少尉排长、中尉代理连长。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周保中被派做靖国第八军参谋长的随

员，到重庆参加南部各省靖国军将官会议。一九一九年二月，他由靖国八军转入靖军川军，任上尉副官。一个月后，他离开重庆，经汉口、上海到广州，然后去韶关到驻粤滇军第六军任中尉参谋。

周保中从军后的两年中，在“靖国护法”的旗帜下，转战各地。目睹滇桂军阀借“靖国护法”之名，行争权夺利之实，广大劳动人民深受连年军阀战争之害，苦难重重。他决定脱离旧军队，不再为军阀卖命。一九一九年九月，周保中离开驻粤滇军，回到家乡云南大理，打算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度日。

连年军阀战争给云南人民带来了灾难。云南军阀把庞大的军费全部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他们用加税增厘、滥发纸币、发行公债、预征田赋等各种手段搜刮人民财富，使本来就很贫瘠的云南农村更是满目疮痍。周保中回乡后，一贫如洗，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无法维持。因此，他不得不于一九二〇年三月再次离乡到昆明，重新回到滇军，在唐继尧的靖国联军总司令部任职，以后又转任上尉连长。

一九二三年春，周保中被选送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习。

周保中后来在回顾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时说：“从少年读书时代到参加云南陆军出征四川、贵州、湖北等省那一时期，我充满着军国主义、富国强兵和从军出头的思想。直到一九一九年，思想起了变化，开始对现实政治不满。一方面由于实际生活的教育，另一方面由于自己经常寻找宣传新思潮的报纸杂志阅读，我对于中国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如‘废督裁兵’，反对军阀混战，对内民主自由，对外独立解放等，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年这一时期，受到孙文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而受孙文主义学说的影响尤

为强烈，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的苏维埃制度也在鼓动着自已。”^①

一九二四年秋，周保中以优异的成绩从云南讲武学校第十七期工兵科毕业。这时他已经有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他决定脱离唐继尧军阀系统，到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东去。因此，从讲武学校毕业后，他就以返籍结婚为由，回到家乡大理。并于一九二五年一月由滇西出境进入缅甸，然后绕道南洋，四月经香港到达广州。当时杨希闵在广州任驻粤滇军总司令。他曾在一九二三年初率领滇军，联合刘震寰的桂军，击败军阀陈炯明，迎接孙中山回粤建立大元帅府。因而给人一种“拥护革命”的印象。所以周保中到广州后，就加入了杨希闵的驻粤滇军。但一个多月后，杨希闵、刘震寰因阴谋叛乱，企图推翻革命政府而遭到镇压。驻粤滇桂军全部瓦解。周保中对突然发生的事变毫无思想准备，只得暂时离开广州。

一九二五年八月，周保中在河南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三军教导团参谋。同年十月，他随军进入陕西。十一月，调到国民军第二军第六师任工兵营第一连连长，并随军由陕西经河南出征河北，参加国民军讨伐奉直鲁军阀的战争。十二月，国民军占领天津。周保中参加了马厂、唐官屯、静海及天津等地的激烈战斗，并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擢升为工兵营营长。四月，国民军在奉直鲁军联合进攻下失败，放弃豫、直、京、津等地，退往西北。周保中离开国民军，经开封、郑州南下广东。

^①周保中：《略历》（1942年）。

在大革命激流中

一九二六年五月，周保中在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在后来他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自己这时的思想时说，“我于十五年（指民国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春在西北国民军失败后重回广东，此时已深能了解中国的环境是需要革命的。外受帝国主义的种种压迫，内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摧残，中国人民不但丧失了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连生命也快难保了。这时不急起直追努力革命，尚待何时？我有了这种认识后，便坚定地向着革命的道路走去。这并非我个人有什么天才，更非喜欢动乱，以流血为快，实乃物质环境所驱使，历史使命所召示，更加上现制度的催迫着。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站到革命战线上，勇往直前地向着目标走。”^①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口号下，国民革命军由广东出师北伐。当时周保中在六军十九师五十六团任上尉副官，随军转战湘北、鄂南各地。

北伐军在打败吴佩孚主力后，把攻击的主要矛头转向东南的孙传芳，江西成为主要战场，六军和二、三军成为江西战场的主力。一九二六年九月，六军由鄂南进入江西境内作战，周保中调任五十六团第二营营长，随军奋不顾身地参加了历次激烈的战斗，在十月中旬第二次攻打南昌时，光荣负伤。在十一月上旬第三次攻夺南昌的战斗中，他立下了突出的战功。当时六军十七、十九两师担负攻战乐化、中间突破、切断南浔路的

^① 《周保中致赵荣光信》（1928年7月）。

艰巨任务。六军于十一月三日拂晓开始攻击，敌人全力阻击，双方激战一天，六军进展不大。四日拂晓，六军继续攻击，敌人增援部队向六军猛烈反扑，六军伤亡甚重，五十六团团长阵亡，军心发生动摇。在这紧急时刻，六军军部决定由周保中担负五十六团指挥责任。周保中立即进行了战地动员，重新鼓起了全团官兵的士气，他们再次向敌人阵地冲锋，终于将敌人击溃。接着，周保中率领五十六团，同兄弟部队一起乘胜向敌人分途追击，一举攻占乐化、桃花岭等地。残敌放弃铁路线，狼狈逃窜。十一月八日，北伐军胜利占领南昌。这次战斗后，周保中正式任五十六团副团长。

北伐军占领江西全境后，六军于一九二七年初进入皖南，占领了芜湖等地。三月十五日，六军和二军分三路向南京进攻。在攻击牛头山的战斗中，周保中的团担任正面主攻。负责防守南京的直鲁联军副司令褚玉璞调派了一部白俄士兵投入作战，战斗极其激烈。全团苦战三昼夜，终于将敌军打垮，占领了牛头山阵地。这时六军军部制定了一个以精干部队由牛头山西面绕行，奇袭雨花台的计划，并要挑选一名团营级干部，担任这次奇袭的指挥。在研究这次突击战斗的会议上，周保中挺身而出，自告奋勇要求承担这项艰巨任务，经军部批准后，他率领突击队立即出发，向雨花台急速前进。在周保中英勇机智的指挥下，奇袭雨花台获得成功，南京守敌大为震恐，褚玉璞慌忙渡江逃往浦口。三月二十四日，六军胜利占领南京。这次战斗后，周保中成为六军著名的骁勇善战的中级指挥员。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在南京向第六军发动突然袭击，将六军击散。接着，蒋介石又用几万元巨款收买了六军总参议兼十七师师长杨

杰。杨杰在去投奔蒋介石的前一天，来找周保中说：“现在大局已定，天下归蒋。我明天就要过去了。我们是同乡，我一向很器重你，你要和我一起行动。”又说：“一个人要忠。历史上关圣人忠于刘皇叔，岳夫子忠于宋皇室。我们要忠于老蒋。”周保中轻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没有理睬他。不久，程潜在九江重建第六军，周保中任六军十八师参谋长。五月，周保中赴武汉，任第六军教导团少校团长兼先锋营营长。夏斗寅叛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向武汉进攻时，周保中奉命率部由武汉出发前往鄂西反击杨森的川军，参加了沙洋、天门等地的激烈战斗。击败川军后，返回武汉，周保中调任五十二团团长，晋升为上校。

一九二七年七月上半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正积极准备新的反革命大屠杀，大革命已处于最后失败的危急关头。在这中国革命最困难、反动势力最猖獗的时刻，在革命的共产党人大批地被屠杀，不坚定的党员大量脱党、叛变的时刻，周保中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在经历了十年曲折的道路后，作出的正确选择。从此，周保中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党，交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交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保中根据党的长江局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进行党的秘密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程潜提升周保中为十八师少将副师长兼五十二团团长。一九二八年一月，程潜命周保中率领两个团驻防醴陵，兼任湘东警备司令。二月底，周保中接到党中央代表和湖南省委的指示，要他组织驻在长沙的六军十八师全师起义。由于这项计划被叛徒出卖，周保中率领的部队被调回长沙改编，他本人被解职，调到司令部任少将军事参议。四月，由于党的湖南

省委遭到破坏，周保中被通缉。他被迫离开长沙，经杭州到达上海。此后，在党中央军委领导下，他曾秘密到南京、浙江、湖南和河南等地从事兵运和联络工作。

一九二八年底，党中央派他去苏联学习军事。他的妻子金氏和四岁幼子由他五弟伴同，在上海乘轮船回云南，不幸在香港附近轮船失事沉海，三人遇难。

周保中到莫斯科后，党组织改派他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反对王明宗派小集团的斗争。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米夫借苏联共产党清党的机会，在学校中把几百人打成所谓“托派”或“托派嫌疑”，周保中也被他们定为“托派嫌疑分子”，并被宣布开除党籍，送到莫斯科一个机器制造厂当工人。半年后恢复党籍。一九三〇年八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送他入国际列宁学院学习。

一九三一年九月，党组织派他回国。十一月，他经北平、天津等地回到上海。

团结、领导抗日救国军 推动吉东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加强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派周保中去东北。

一九三二年初，周保中由上海出发，经大连到达哈尔滨，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书记。三月，满洲省委派周保中到宁安组织和领导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当时这一地区的抗日部队主要有李杜、丁超领导的吉林自卫军和王德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有几万人。他们大部分是原东北军的正规军，装备比较好，兵额也比较足，在人民群众抗日要求的推动下，广大将士

的抗日情绪比较高昂。但是，这些军队的有些上层领导者由于对南京政府抱幻想，等待南京政府出兵抗日，因此实行着消极抗日的方针；同时，这些军队内部各派系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周保中到宁安后的主要任务是，设法打入救国军或自卫军，争取和领导他们抗日。

五月十日，周保中正在宁安县花脸沟进行群众工作，被吉林自卫军的当地驻军发现。因他南方口音很重，自卫军士兵以为他是朝鲜人、日本侦探，就把他绑了起来。经过排、连、营，一直押送到自卫军左路总指挥部，正遇着一部分自卫军将领在开会。当他们听说押来一个“日本侦探”时，就停止了会议，都来审问这个“日本侦探”。

周保中先对他们简单摆了一下个人历史，然后说：“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从关里来的，是抗日援马团的。马占山投降了日本，听说你们抗日，才奔你们来的。”

当自卫军领导人问周保中对东北局势有何见解时，周保中从世界形势讲到东北战局，并对自卫军应采取的救国方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目前这样与日军隔河对垒，时间久了对我不利。我军应主动出击，袭击敌人后方，破坏其交通线，夺取其给养，再前后夹击，迫使敌人撤退。（二）自卫军士气高昂，但纪律不好。我们抗日军队如得不到民众的支援，是难以取胜的。因此，必须整顿纪律，加强教育，清洗坏兵，改善军队素质。（三）在城乡普遍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抗日。

（四）在牡丹江地区建立根据地，制造军火弹药，设立被服厂、野战医院。（五）财政经济方面要有长期打算，要减轻民众负担，解除民众痛苦。周保中还指出，不要幻想南京政府派兵打日本，也不要寄希望于“国联调查解决”，国联不能制裁

日本，它实际上鼓励了日本侵略中国。他还强调，自卫军要与救国军和其他抗日军队联合一致，共同抗日。

周保中滔滔不绝地谈了一个多小时。这一席话使自卫军将领们确信他不是日本探子，而是一位有胆有识的爱国志士。于是决定留他在左路总指挥部宣传部工作。

同年八月，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聘请周保中为救国军总参议。不久，王德林又根据周保中的要求，派他到前线去指挥作战，委任他为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

王德林的部队最初是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山林队，有二三百人，活动于吉林东部地区，后来被东北军张作相收编，编为吉林陆军第十三混成旅七团三营。“九·一八”事变后，王德林在汪清县蛤蟆塘率领三营暴动，成立抗日救国军，王德林任总司令，孔宪荣任副司令，吴义成任前方总指挥。不久，许多农民自发抗日武装以及其他从旧东北军中暴动出来的抗日队伍都来参加。几个月内，救国军就发展到万人之众，活动在宁安、东宁、汪清、穆稜、延吉和安图等地。中共满洲省委很早就重视王德林的救国军。延河中心县委和绥宁中心县委早已分别派进去胡泽民、李延禄、孟劲清、金大伦（李成林）和陈陇（刘汉兴）等七、八名党员干部，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

周保中到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后，和胡泽民等建立了党的支部，逐步在进步青年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如著名抗日英雄陈翰章就是在这时由周保中培养入党的），积极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救国军广大官兵的爱国主义觉悟。与此同时，周保中率领救国军向日寇发动了一系列攻击战斗。

七月，他率领救国军和一部分农民自发抗日武装进攻宁安县东京城镇。

七月底，他率部攻入安图县城。

九月初，周保中指挥救国军和安图、桦甸的抗日武装进攻敦化。经两昼夜激烈战斗，我军攻入敦化县城。在摧毁了敌人防御工事，歼灭部分敌军后，我军主动撤出，向宁安转移。

十月，周保中指挥了著名的三打宁安战斗。第一次攻打宁安时，他亲自带领“敢死队”涉过水深及颈的牡丹江，攻入宁安城内。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击毙敌酋小岛少佐及日兵若干人。在撤出战斗时，他腿部受伤，一颗子弹卡在小腿的两根骨头中间。但他忍着剧痛沉着地指挥部队转移。战斗结束后，他才让别人用镊子把子弹拔出。十二天后，他带伤指挥第二次攻打宁安。救国军从东、南两面攻入城内，消灭了很多敌人，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

在上述一系列战斗中，周保中不仅坚决勇敢，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而且表现出高度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一天，在前方总指挥部，吴义成对周保中说：“从前，刘备三顾茅庐请了个诸葛亮；如今，我们一条绳子绑来个参谋长。”又说：“别人都说我吴傻子精，可是再精也精不过你周蛮子。”

周保中不仅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而且关怀和保护战士，因而深受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的拥戴。在三打宁安后，孔宪荣来到前方总指挥部召集军事会议。他在会上提出：部队向后退缩，退到中苏边境；一旦形势不利，马上越境。周保中坚决反对向后退缩，消极避战的方针；主张向敌后挺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孔宪荣在道理上讲不过周保中，竟耍流氓手段。他指着周保中说：“你是红帽子，是苏联派来的。”并掏出枪来要枪毙周保中。这时，很多士兵闻讯赶来，一致反对孔宪荣的蛮横态度，并说：“谁要动

一动周保中，就别想活着回去！”孔宪荣感到众怒难犯，没有敢开枪。

一九三二年冬，由于旧军队内部派系斗争的影响和日寇的挑拨离间，救国军和自卫军的矛盾尖锐起来，不断发生冲突和摩擦。根据中共绥宁中心县委的决定，周保中竭力从中调解，暂时制止了两军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并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建立了自卫军、救国军联合总司令部，丁超任总司令，李杜、王德林任副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两军的联合，使日寇不得不推迟向牡丹江东岸的进攻。

但是，救国军和自卫军的联合仅仅维持了两个月。由于日寇的阴谋挑拨和两军的某些领导者不顾大局，勾心斗角，终于使联合破裂，自相残害起来。日寇趁此机会，于一九三三年初大举东进。自卫军和救国军的主力相继被打散。丁超投降了日寇，李杜、王德林、孔宪荣带领一部分部队退入苏联境内。中东路东线最后一段和吉林东部各县被日军占领。

当自卫军和救国军主力失败时，周保中和吴义成正率领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由东宁向宁安开进。听到这一消息后，吴义成也主张撤往苏联，被周保中竭力劝阻了。遂决定由吴义成任救国军代理总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收集救国军余部，重整旗鼓。他们将分散在宁安、敦化、额穆、安图等地的救国军部队整编为五路，由姚振山、柴世荣等担任各路司令，继续开展吉东和辽吉边区的游击战争。

六月十六日，周保中和吴义成率领救国军主力，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一举攻占安图县城。一时救国军声势大振，远近来归者不少。救国军总部控制了安图县全境和桦甸、抚松、敦化、蛟河等县的一部，开辟了辽吉边区抗日游击区。

但是，吴义成在胜利面前丧失了警惕。他接受了安图县伪公安局长的贿赂，私自将其释放；并派新收编的伪军留守安图，而调走了基干队伍。结果伪军与地方汉奸、走狗勾结叛变，安图失守。这时许多士兵对吴义成不满。吴只得率领一千余人离开安图，转移到东宁、汪清等地活动。

吴义成率部东去后，周保中任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主任。他带领其余一千多人，以大蒲柴河口为基地，坚持辽吉边区的游击战争，在大青川、汉阳沟、两江口、寒葱沟和榆树川等地多次袭击日伪军，给敌人以很大打击。

创建反日同盟军 开展绥宁游击战争

一九三三年，党中央向东北各级党组织发出了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的“一·二六”指示信。根据这一指示信的精神和党的吉东局的决定，一九三三年冬，周保中带领一部分“辽吉边区军”赴宁安，着手组建党领导的反日同盟军。

当时在宁安的东南山、西北山和南湖头一带活动着几十支由几十人到几百人的抗日队伍。他们有的是自卫军、救国军余部，有的是农民自发抗日武装，其中以东南山的工农义务队抗日最坚决。工农义务队原是李荆璞、于洪仁领导的一支农民抗日武装——平南洋总队。一九三三年初，改名为东北工农反日义务总队，简称工农义务队。五月，中共绥宁中心县委派进去张建东等四名党员，并批准李荆璞等入党，队内建立了党支部（于洪仁为书记），确立了党对工农义务队的领导。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周保中率领“辽吉边区军”一、三连来到宁安东南山唐头沟平日坡与工农义务队会合。一九三四年

二月十六日，以“辽吉边区军”和工农义务队为中心，联合救国军余部柴世荣旅、王毓峰团、傅显明团、裴振东团以及八道河子自卫队等成立宁安反日同盟军（后改为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周保中任办事处主任和同盟军党委书记。同盟军设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总政治部，周保中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建立，标志着这一地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部队的正式诞生，它立刻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注意。一九三四年春，日寇调动长春警卫旅和宁安等地的警察大队同日军相配合，两次进攻平日坡。在周保中领导下，“边区军”和工农义务队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打死打伤敌军三十多人，冲破了敌人的“讨伐”。同时，工农义务队和“边区军”还收缴了宁安境内汉奸队伍和卧龙屯警察署的枪枝六十余支，除了充实和改善两队的装备外，周保中还用其中一部分武装了新成立的宁安游击队。

与吉东建立反日同盟军的同时，我党在东满地区建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一九三四年夏，满洲省委指示吉东党组织，要周保中“联合吉东各部队配合东满冲破敌人第二期‘讨伐’。”根据这一指示和同盟军党委的决定，周保中率领同盟军主力，在“向人民革命军学习”的口号下开赴东满。他们会同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联合进攻汪清的崔通大甸子，战斗了两天一夜，后因敌人大量援兵赶到，我军主动撤出。在退却时，周保中负了重伤，但他仍然沉着地指挥战斗。他看到部队撤退时很慌乱，就大声喊：“大家别把人民革命军丢下！”命令同盟军部队掩护人民革命军首先撤出。战斗结束后，周保中率部回到宁安。为了便于集中指挥，周保中把“边区军”和

工农义务队全部充实到宁安游击队。

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二月，日寇连续向以宁安为中心的吉东地区进行了秋季和冬季大“讨伐”。周保中指挥绥宁反日同盟军采用“化整为零”、“避实击虚”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同数倍于我的敌人周旋，进行大小战斗三十余次，胜利地冲破了敌人的两次大“讨伐”。在一次战斗中，周保中腹部受伤，肠子流出体外。他当即用手将肠子塞回肚里，硬是坚持到战斗结束。后来用草药敷上，用绑腿缠好，继续坚持行军和指挥作战。他的实际行动，使同志们深受教育，大家同仇敌汽，奋力杀敌。宁安游击队在反“讨伐”战斗中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发展，成长为完全崭新的人民抗日武装——吉东游击队。

领导抗联五军 坚持吉东抗战

一九三五年初，根据吉东特委的决定，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加入第五军的除原绥宁反日同盟军所辖各部（吉东游击队、柴世荣旅、王毓峰团、傅显明团）外，还有原救国军的王汝起团和反日山林队“爱民”（姜子荣）等部。周保中任军长和党委书记，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建东任参谋长。下辖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李荆璞，政治部主任关书范；第二师师长傅显明，副师长姜子荣，政治部主任李光林。

同年夏，东满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主力由晖（春）汪（清）游击区转移来到宁安，归五军军部指挥。

为了更有力地开展吉东广大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周保中

根据吉东特委的提议，分别派出东、西两个派遣队，开辟新的游击区。五月初，由一团二连、四团一连和军部警卫连组成的东部派遣队在胡仁率领下东进。五月中旬，进入穆稜地区，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开辟了穆（稜）密（山）勃（利）游击区。八月，由五军一、二、四团和二军的两个连及青年义勇军组成的西部派遣队在柴世荣、李荆璞等率领下西去额穆、敦化，开辟新区。这时有的同志提出放弃宁安游击区。周保中认为，既要开辟新游击区，也要坚持旧游击区，如果旧游击区完全放弃，就会便于敌人集中兵力进行“讨伐”，新区也难以开辟。因此，周保中继续率领五军军部留在宁安，联系东、西两个派遣队，并直接指挥五军三、五、六、七团和二军留守部队，转战绥宁地区，出没老黑山、南湖头、北湖头、长岭子、莲花泡、朝阳沟、东大泡、西大泡和塔尔站等地，到处袭击敌人，使日寇陷于顾此失彼、惶恐不安的状态。

一九三六年二月，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号召，我党领导的东北各抗日武装发表《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和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军，周保中领导的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五军。这一宣言的发表，表明在我党领导下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统一和加强。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抗日联军成了它的“心腹之患”。为了巩固满洲这块侵略基地，一九三六年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所谓《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对抗日联军进行更加残酷的“讨伐”。首先，日寇对抗联加紧进行政治围攻和经济封锁，千方百计隔

绝抗联同群众的联系。他们强迫散居农户全部集中到交通便利、易于控制和监视的地方组成大屯，即所谓“集团部落”。对“集团部落”以外的小村落和散居农户，一律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其变为广大的无人区。在此基础上，日寇对抗日部队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断绝抗联的粮食、食盐、棉布、医药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来源。其次，在军事“讨伐”的作战方法上，日寇将过去的周期性的定期“讨伐”改变为不间断的长期“讨伐”。先将游击区分割包围封锁，然后依仗其优势兵力，进行“纵横扫荡”、“来回拉网”，采取所谓“篦梳式”、“踩踏式”，实行长期的连续不断的“讨伐”、“清剿”，“肃清”一地，“巩固”一地，然后再向其他地区进攻。

一九三六年，日寇在绥宁地区加速建立“集团部落”，给抗联五军的活动造成极大困难。如果坚持死守一地，五军将要遭到严重损失。因此，在一九三六年春，五军一、二师主力和副军长柴世荣、军政治部代主任张中华等，陆续转移到中东铁路哈绥线以北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林口、勃利、依兰地区。

为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向北发展，周保中和五军军部暂留在铁道南。他率领五军留守部队（三、七团，警卫营和教导队）和二军二师部队以宁安为中心，西出敦化、额穆，东达绥芬河、东宁，在图宁（图们——宁安）铁路两厢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一九三六年初，周保中率部袭击三道河子，破坏敌人公路建筑，并救出被日寇强制修路的数百名群众。二月中旬，我军在烟筒沟伏击伪军一个连，缴获枪枝九十支，子弹一万发。三月六日，我军消灭马兰河自卫团，缴获枪枝三十支。五月二十七日，我军袭击图宁铁路三台站，消灭日寇

数十名，缴获枪枝和物资甚多。九月十二日，我军在中东铁路代马沟水平站截击日寇东行兵车，击毙日寇官兵九十余名，重伤五十多名，全歼日寇一个工兵连。我军神出鬼没般的游击活动使日寇大为震惊和恼怒，因此，他们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搜寻和进攻五军军部。为了同敌人周旋，周保中和军部人员不得不长期在山沟、荒甸或丛林露营，并且差不多一、两天就换一个宿营地，经常以野菜、山果充饥，有时几天吃不上一顿饭，甚至把黄烟苗当成了最好的食品。在这样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周保中不仅指挥着直接率领的五军留守部队和二军二师部队的活动，而且还通过交通员指导五军一、二师主力部队的活动和绥宁地方党的工作，并不断派出交通员沟通同抗联一、二军的联系。每天部队宿营时，他总是忙着接待各部队来的交通员，看报告，写指示，或是开会研究战斗部署。他还常常利用战斗间隙和露营休息时间，给战士们上课，教警卫员识字，给大家讲革命道理和游击战术，鼓励同志们克服困难，坚持抗日到底。

五军一、二师主力越过中东路进入林口、勃利、依兰地区后，逐步向桦川、方正、汤原、富锦等地扩展，取得了许多胜利，开拓了新的游击区，并同抗联三、四、六、八、九军取得了联络。但是，由于部队缺乏坚强、团结的领导中心，在组织上和活动上都比较分散。为了加强对五军的集中领导，提高五军的战斗力，周保中认为自己应迅速北进，直接领导五军主力部队；同时，周保中又接到上级党组织指示，要他赴道北组建中共吉东省委，这就更增加了周保中北进的必要性。

为了部署在自己北进后绥宁地区的抗日斗争，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周保中在宁安以东十八里的泉眼头主持召开了

二、五军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五军政治部代主任张中华，二军二师政委王润成、参谋长陈翰章，二军二师四团团长侯国忠等。会议作出了以下重要决定：周保中率领五军军部和教导队北进，同五军一、二师主力会合；五军三、七团，教导营和二军二师留守道南，坚持宁安、额穆老区游击战争；在二军二师师长史忠恒治疗期间，由陈翰章代理师长；将吉东地区宁安县委和东满地区东部各县委合组为中共道南特委，由张中华任特委书记，王润成、陈翰章和地方党组织两名负责人为常委。

泉眼头会议后，周保中率领五军军部及直属队越过中东铁路北进。为了绕过敌人的封锁，他们选择荒僻小径，穿越荒山密林，而且常常晓宿夜行。周保中还利用行军间隙，对沿途各反日山林队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诚挚地希望他们同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团结一致，互相配合，共同抗日。经过二十余天艰苦行军，他们于十月中旬到达林口附近我军游击区。十二月中旬，周保中到达依兰县牡丹江西岸的四道河子，同五军副军长柴世荣等汇合。

在依兰、汤原、勃利、方正地区活动的抗联部队，除了五军以外，还有三军、六军、八军和九军的部队。周保中来到后，一面集中五军部队，进行训练和整顿；一面加强同三、六、八、九军的联系，以便协同作战，更有力地打击日寇。

为了加强抗联各军的团结，统一吉东、北满党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某些具体政策上的认识，一九三七年一月，周保中顶着狂风大雪，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过松花江到小兴安岭，同抗联三军和北满临时省委负责人会见。六月，周保中再次过江出席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同抗联三军和北

满临时省委负责人就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东北党组织的路线和政策，抗联各军的团结和今后的行动方针等问题交换意见，通过了《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关于拥护党的一致的通告》。周保中为维护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团结和统一，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精神，得到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钦佩和赞扬。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的信中写道：“保中同志北来后，在联军关系的周旋上，在联军会议场上，在党内斗争中表现着布尔什维克的诚恳和真挚，是正确的。”同年八月十五日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给吉东省委和抗联五军的信中，也赞扬保中同志“解决一切复杂问题是把握了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的。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依兰县洼洪举行了北满抗日联军各军联席会议，周保中和八军军长谢文东、参谋长于时光、九军军长李华堂、三军一师政委李熙山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协商，确定了抗联各军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对各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正确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抗联三、五、八、九军的团结。针对日寇在依兰、勃利、方正、富锦等地疯狂构筑“集团部落”的罪恶活动，会议认为要积极动员群众，竭力破坏和阻挠“集团部落”的建立。为配合这一斗争，会议决定对依兰县城进行一次突袭。

依兰城位于松花江、牡丹江交汇处。由于日寇四出“扫荡”，城中守备兵力薄弱，只有日军一百五十人、伪军六百人。因此，周保中等认为，集中依兰附近的抗联部队，对依兰城实行突然袭击，歼灭日军，瓦解伪军，占领该城一日以上，夺取军械弹药，破坏仓库、银行及敌伪政权机关是可能的。三月十九日午夜十二时，周保中指挥抗联三、五、八、九各军联

合部队共七百余入攻击依兰，从西、北两面攻入城内。但是，由于我军在移动和集中过程中，敌方作了充分准备，抵抗很顽强。激战至二十日清晨六时，我军主动撤出。这次战斗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但它显示了抗联各军的团结一致和攻击力量，给日寇很大震动，迫使日寇调集重兵防守依兰，因而阻滞了依兰附近“集团部落”计划的进行。受此战役影响，号称“满洲帝国御林军”的伪军第二十九团六百余人于八月二十八日在依兰暴动，哗变反正，投到抗联这方面来。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周保中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托，在四道河子主持召开吉东党员干部会议。会议改组道北特委为吉东省委，选举原道北特委书记宋一夫为省委书记，周保中、刘曙华、于化南、王光宇为省委执行委员。

在此前后，周保中逐步完成了对五军的整顿工作。首先改组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加强了部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接着重新任命了各级干部：关书范任第一师代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原师长李荆璞一九三六年冬由吉东特委派往苏联远东地区执行联络任务），王毓峰任副师长；王光宇任第二师师长（原师长傅显明一九三六年二月在密山县黄泥河子战斗中牺牲），王汝起任副师长，王效明任参谋长，宋一夫兼政治部主任。通过整顿，全军的政治觉悟、组织性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整顿以后，按照五军党委的决定，一师向依兰、勃利、穆棱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同道南二军二师部队相呼应；二师向依兰、桦川、富锦、宝清一带伸张活动；周保中率领军部直属队继续以四道河子为中心，在牡丹江下游两岸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并同三、八、九军保持密切联系。

为了推动抗日高潮，恢复被日伪割断的吉东、北满与南满

的联系，周保中决定将跟随五军活动的二军五团改编为第二军独立旅，向南满远征。周保中亲自对战士们作动员，讲明远征的意义。部队由方振声、伊俊山带领，于四月初从依兰、方正间的大小罗勒密和三道通出发，历尽千辛万苦，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于第二年五月初，带着五军和二军指战员们的战斗情谊，在辑安的老岭地区同第一军会合，将周保中的信交给了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

建立第二路军 转战三江地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给了东北人民和东北抗联极大的鼓舞。七月十二日，伪宁安森林警察大队一百五十人在大队长李文彬率领下于三道河子起义。他们处决了日本指导官和教官，焚烧了防所，并将日寇派来监视的伪军五十人缴械，然后开赴四道河子，参加抗联五军。周保中将该部改编为第五军警卫旅，李文彬任旅长，张镇华（原五军二师参谋长）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隐蔽起义部队的踪迹，免遭日寇报复性袭击，同时为了加强起义部队的革命化建设，五军党委决定：警卫旅由周保中亲自率领一个时期，往依东地区转移，相机开展有利活动。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周保中率领警卫旅在依东、桦川一带同日军激战四次，击毙日寇大佐以下官兵五十余名。九月初，周保中离开依东西返牡丹江流域。警卫旅由二师师长王光宇领导，与二师部队协同开展依东、宝清地区的游击活动。

九月二十九日，周保中在四道河子主持召开了吉东省委执委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爆发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的形势和任务，认为目前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不但是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满洲，而且是为了钳制日寇主力入关，支援全国抗战。因此，必须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不断打击和扰乱敌人。为了加强吉东地区抗日部队的集中指挥和互相配合，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会议根据上级党组织负责人的原有提议，决定以抗联四、五军和二军二师为中心，联合东北义勇军姚振山部，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以后又有抗联七军和八军加入），由周保中任总指挥。会议还研究了抗联四军的状况和加强四军的领导力量问题，并决定派周保中赴宝清地区指导四军的整顿工作。

为了贯彻吉东省委执委工作会议精神，十月中旬，周保中带领精干卫队东进。他们渡过牡丹江，穿越图佳路，机智地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绕过日寇的巡逻队，于十一月十九日到达宝清县梨树沟五军东部队（二师和警卫旅）前方指挥所。周保中在这里召开了五军东部队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分析了形势，传达了省委执委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当前作战部署和明春游击战争方针。根据吉东省委决定，周保中宣布警卫旅改编为第三师，李文彬任师长，季青任政治部主任；张镇华调任二师师长，王效明任二师政治部主任。十一月底，周保中赴四军军部。

抗联第四军是在一九三四年秋以原救国军游击军和密山游击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军长李延禄。一九三六年三月，党派李延禄进关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由李延平代理军长。四军在牡丹江以东、图佳铁路两侧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但是由于军部领导力量不强，部队活动分散，发展不快。一九三七年十月，李延平亲自到四道河子，要求吉东省委加强对抗联四

军的领导。周保中到四军军部后，按照吉东省委制定的方案对四军进行了整顿。为了加强四军的领导力量，任命原五军二师师长王光宇为四军副军长。为了加强四军游击活动的系统性和计划性，调整了四军的组织，规定了各部游击活动的大致区域：第一师与第四师合编为第一师，以勃利、依兰、宝清边界为主要活动区域，与五军一师取得联络；第二师与第三师合编为第二师，以富锦、宝清为主要活动区域，与五军二、三师密切联系。

周保中原来准备再驻四军军部一个时期，直接指导四军的活动，但正在这时，中共下江（乌苏里江下游）特委和抗联七军的代表来到宝清，要求吉东省委派负责人去饶河帮助整顿下江特委和七军的领导机构。周保中详细了解了下江特委和抗联七军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亲自去饶河。

饶河是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较早的地区。一九三二年秋，在中共饶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成立了饶河反日游击队。一九三五年，饶河游击队扩编为抗联第四军第二师，次年又扩编为抗联第七军，陈荣久任军长，由下江特委领导。下江特委是在饶河中心县委的基础上建立的，由于党内无原则纠纷和宗派斗争，造成了党内和军内的不团结。一九三七年三月，陈荣久在战斗中牺牲，七军的领导力量受到削弱。这时特委领导人去省委汇报工作，由郑鲁岩代理书记。郑鲁岩不仅没有促进团结，反而准备另建抗联第十一军，“和七军竞赛”，使下江地区的抗日队伍面临分裂的危险。

周保中到饶河后，以吉东省委代表的身份指导召开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特委委员，虎林、饶河两县县委委员，七军党委委员，各师

长（党员）和连以上党支部代表共三十五人出席了会议。周保中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和总结。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总结了过去的工作，揭发、批评了特委的错误，改组了下江特委和七军党委，确定了一九三八年游击活动的方针和计划。会议决定下江特委和七军党委受吉东省委领导，选举产生了下江特委临时工作委员会，张文清任临时工委主席；选举崔石泉、李学福等七人为七军党委委员，崔石泉为书记；选举李学福为七军军长（在李养病期间由崔石泉代理）。会议对各师、团的领导人也作了调整。此外，关于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反日山林队的政策和军民关系等问题，会议也进行了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这次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下江党组织和抗联七军得到了统一和巩固，对坚持下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大的意义。

周保中在领导抗联四、五、七、八军开展抗日游击活动的斗争中，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同全国的抗日战争相配合；全东北必须建立集中统一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而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但是，从一九三五年起，由于敌人的封锁和党中央随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央对东北党组织的领导关系中断了。从此，东北党组织便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不久，中共代表团决定撤销原满洲省委，分别建立南满、东满、吉东和松江四个省委，随后即派代表到吉东特委，指导全东北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初，吉东特委机关被破坏，特委领导人被迫到苏联海参崴。中共代表团只得通过联络员同各地党组织发生联系。但到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东北党组织同中共代表团的联系也完全断绝。周保中曾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日和四月三十日两次写信

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在组织领导上的严重缺点，并要求中共代表团建立东北党组织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为了解决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各项迫切的重大问题，为了通过中共代表团建立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周保中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渡过乌苏里江到苏联远东的比金，并写信给在海参崴的中共代表团联系人“石达干诺夫”（化名）。“石达干诺夫”回信说：由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一九三七年秋起即已停止领导东北党组织；东北党组织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周保中要求得到同党中央联系的具体办法，“石达干诺夫”没有明确回答。周保中只得写了一个报告，请“石达干诺夫”转送党中央。同时，周保中同苏联红军比金边防军建立了必要的联系，要求他们转递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文件及在可能条件下支援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

二月二十四日，周保中渡江西返。这时日寇集中大批骑兵埋伏在乌苏里江西岸，企图活捉周保中。周保中一行受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在没腰深的大雪中，行动十分困难。同行同志劝他暂时折回苏联。周保中深知东北抗日斗争已处在严重困难时刻，自己必须迅速回来担负起艰巨的工作，他说：“即使战死，也要头朝西！”他们机智地摆脱了敌人，在深可没顶、茫无人迹的大雪原中艰难地行进，以马肉充饥，以雪水解渴，终于在半个月后回到宝清县梨树沟，正式建立第二路军总指挥部。

坚毅顽强 突出重围

一九三八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进入极其艰苦的阶

段。

日本帝国主义在隔断南、北满抗日游击区域，并迫使吉东、北满的抗联主力汇聚于三江地区之后，于一九三八年调集二万五千日军和一万多伪军，在已经完成归屯并户的基础上，向三江地区实行全面大“讨伐”，妄图将吉东、北满抗联主力“围歼”于三江地区。

为了粉碎敌人的罪恶计划，打通与南满第一路军的联系，第二路军总部决定四、五军主力从三江地区突围，向西南远征。一九三八年春，周保中同四、五军领导人反复研究，制定了远征计划：由柴世荣、李延平、王光宇等率领五军一、二师和四军主力，先南进，后西征，即首先进入宁安、东宁地区，汇合陈翰章领导的二军五师部队，破坏“集团部落”，攻袭小城镇，恢复和发展旧游击区；然后分兵西进，向五常、舒兰地区发展，并与南满第一路军取得联络。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掩护远征军突围，决定第二路军总部和周保中继续留在宝清。

一九三八年七月，远征军从牡丹江下游地区出发，越过老爷岭，进入苇河、延寿、珠河等地。八月，继续西进至五常、舒兰地区，与汪雅臣领导的抗联第十军汇合。这时，日寇调动哈尔滨、长春、吉林和牡丹江等地的大批日、伪军向五常、舒兰地区集中，妄图“围歼”我远征部队。在此严重形势下，继续南进，打通与南满第一路军的联系已无法实现。十月，柴世荣、关书范和远征军的大部不得不向中东路以北转移，后来回到牡丹江东岸刁翎地区；小部由李延平、王光宇、陶净非等带领，继续留在五常、舒兰山区，开展游击活动。

远征军虽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遭到重大损失，吉东省委书记、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也因经不起考验而叛逃。但

是远征计划的实施，粉碎了日寇在三江地区对我军“聚而歼之”的阴谋，使我军能继续坚持吉东、北满地区的游击战争。

远征军出发后，周保中指挥四军留守部队、五军三师和七军，在敌人重兵“讨伐”之下，艰苦转战于宝清、富锦、虎饶等地。五、七军联合部队曾袭击宝清中兴堡警察署，并不断破坏敌人密宝（密山——宝清）铁路的修筑，还将宝清东南三、四区的“集团部落”全部破坏。

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周保中率领二路军总部离开宝清向依兰、方正地区牡丹江下游转移。

在转移前，周保中根据吉东省委的决定，对下江地区的斗争作了全面安排：成立二路军总部下江参谋处，统辖四、五、七军下江部队，由二路军总部参谋处长王效明负责军事指挥；建立吉东省委下江三人团，由季青、王效明、鲍林组成，季青为书记，统一领导下江地方和军队的党组织。关于下江游击活动方针，周保中指示：力求在完达山脉站稳脚跟，进入虎（林）饶（河）抚（远）同（江）广大山区，蓄养实力，打击敌人。

十月初，周保中率领二路军总部到达刁翎，后又转移到牡丹江西岸莲花泡附近。

二路军总部西移后，日寇“讨伐”的重点也随之西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寇集中重兵，以“围歼”二路军总部和五军主力为主要目标，对依兰、方正、林口和勃利等地的牡丹江两岸进行长期的大“讨伐”。敌人采用依靠据点，稳步推进，大包围套小包围的办法将我军严密封锁包围。

十一月中旬，周保中率领的二路军总部和直属队共八十余人，被敌人严密包围在莲花泡夹皮沟直径只有二十里小的圈子

内。敌人大圈、小圈层层包围，每天派飞机到处搜寻。最后，我军八十多人全部转入事先筑好的密营。这密营是挖向地下的，因此在里面锯柴烧炕、开会谈话，外面都听不见。有一次，日军在二百步远的地方经过，在下坡三里远的地方宿营，但却一直没有发现我军。四十天后，周保中估计敌人粮食已尽，将自动撤退，派人到山上瞭望。第三天，敌人果然撤退了。于是他带领全体队员截击敌人后部，击毙日寇三十多人。事后，战士们问他为什么预先知道敌人将撤退。他解释说：敌人九百人中有三百民夫背粮，此后并未运来给养，近来飞机渐渐不来搜寻了，这都表明快要撤兵了。

十二月下旬，周保中率领总部转移到牡丹江东岸，并同五、九军军部取得联络，积极筹划突围战斗。

面对敌人的重兵包围和空前严重的困难，极少数干部和战

贩卖罪行义愤填膺，一致表示要高举民族革命战争的旗帜，战斗到底，决不丧失革命气节，玷污伟大革命战士的光荣称号。

由于周保中的坚定立场和果断行动，终于克服了五军的危机，粉碎了敌人政治诱降的阴谋。

处死叛徒关书范后，联军各部决定分途突围。周保中率二路军总部和九军向老爷岭西侧的方正、延寿方向前进。二月上旬，他们在原始森林中连续行军七天，越过老爷岭到达方正县陈家亮子附近。二月八日，袭击日寇山元木场，击毙日寇多人，夺得部分给养。这时敌人在岭西山林区以重兵设置了多道封锁线，我军如继续西进，将有极大危险。因此，周保中只得率队撤回老爷岭东。二月十五日，到达葫芦崴子半拉窝集。这时，周保中又得悉柴世荣、黄玉清（四军政治部主任）率领的四、五军主力部队虽然突破敌人乌斯浑河封锁线，但未越过图佳铁路封锁线，现已回到牡丹江西岸喀上喀一带。我军第一次东、西两路突围均未成功。二路军总部决定各部暂在现地作短期休整。

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一日，周保中在四道河子主持召开了吉东省委扩大会议，有省委委员和重要军事干部二十三人参加。会议制定了新的突围计划。周保中在会议最后再次强调要保全革命气节。他说：“现在我们确实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但是，同中外革命斗争史上曾经遇到过的困难相比，我们还不算遇到了特大的困难。抗日联军遭到了重大损失，但是并没有根本失败。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我们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我们必须整顿和巩固现有的力量，前仆后继，坚毅顽强，以必胜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坚持战斗，担负起中国共产党目前在东北的抗战任务；扰乱和破坏日寇后方，牵制日寇主力，

支援全国抗战。”他接着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明天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但是，中华民族的解放，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要靠我们用鲜血和生命去换取。目前是中国人上历史考场的时候。我们不要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暂时猖狂而屈服。我们应该在考卷上堂堂正正地写上‘中国人’三个字，而不要写上‘亡国奴’三个字。对于我们来说，现在不仅是在考中国人，看谁有中国人的人格；而且是在考中国共产党党员，看谁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有的同志总想脱离目前艰苦、危险的斗争环境而追求‘个人的革命选择’。我肩负着重要的领导责任，也千方百计要在这样严重的困难环境中保存干部，保存实力，以利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事情并不完全由主观决定。我们现在处在几十倍敌人的包围中，形势十分危急。这次突围能否成功，没有完全把握。因此我们必须时刻准备上刺刀和敌人短兵相接，作最后的冲锋肉搏。临到我们革命者牺牲的关头，就应该慷慨就义。我们要决心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被压迫民族解放之花。”周保中高瞻远瞩的气魄，沉着镇静的态度，坚毅顽强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决心，强烈地感染着大家，与会者个个斗志昂扬，坚贞不屈，决心打好新的突围战斗。

四月十日，周保中、柴世荣指挥五军主力和二路军总部警卫队，在葫芦崴子利用起伏的山地和错杂的地形伏击尾随追击的日军，给敌人重大杀伤，然后按照省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进行分路突围。柴世荣、王克仁（五军政治部主任，突围中牺牲）率领五军主力向东南前进。他们机智地穿过日军空隙，经三昼夜隐蔽行军，在林口以南的向阳车站附近越过图佳路，然后折向南进，越过中东路，冲出敌人的长期重围，不久即与宁安镜

泊湖一带陈翰章领导的二军五师部队取得联系，后来又与被隔断在舒兰、蛟河地区的四、五军远征军余部和南满第一路军取得联络。在五军主力南进突围的同时，周保中、黄玉清率领二路军总部和四军主力向东隐蔽前进。他们把队伍编成单行，后面的人踏着前面的人的脚印走，最后的人拖着树枝扫盖脚印。带的粮食吃完了，就吃野菜；找不到野菜，就勒紧裤腰带继续行军。有一次，周保中饿得昏倒在地，经同志们抢救苏醒过来后，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前进。他们绕过一队队“扫荡”的敌军，通过一层层封锁网，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五月到达宝清西南的梨树沟二路军总部留守处，胜利完成突围任务。

到下江地区后，周保中立即同分散在虎林、饶河、抚远、同江等地的四、五、七军各部恢复联系，了解情况，给予必要指导。他和张镇华（五军三师副师长）率领小分队转战依东、富锦和宝清等地，破坏日寇的公路建筑和交通运输，袭击小股敌人，夺取武器和给养。为了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和加强军队的思想教育，周保中还在戎马倥偬之中写了《告民众书》、《告日本军将兵书》和《告满洲军警官吏职员书》等宣传品以及《政治学常识》、《社会学常识》和《军事学常识》等临时教科书。

十月六日晚在京石泉，周保中和抗联女战士、二路军总部秘书王一知在总部第二党小组会议上宣布结为亲密的革命伴侣。

十月八日，周保中带少数警卫人员东进。十五日，到达虎林土顶子五、七军后方基地。这时，日寇对抗联下江部队开始了冬季大“讨伐”。周保中与王效明等研究、制定了反对敌人冬季大“讨伐”的周密计划和按照“紧密编制”、“精兵主义”

的原则整顿七军的方案。

总结经验教训 坚持抗联旗帜

由于得到苏联远东军区负责人的邀请，同时，为了与北满党组织和第三路军领导人讨论加强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为了争取苏联远东边防军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物质援助，并通过苏联远东军的帮助同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周保中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再次渡过乌苏里江到达伯力（哈巴罗夫斯克）。

在伯力期间，周保中同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以及原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赵尚志连续举行了十多天的“三人讨论会”，最后一致通过了由周保中起草、经三人共同修改的《关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新提纲》。《新提纲》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总结了八年来浴血奋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东北党组织在抗日时期的根本任务、斗争策略和各项具体政策。《新提纲》的制定，大大有助于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团结统一的加强。

这时，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还同苏联远东边防军代表进行了多次会谈，正式确定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指挥部同苏联远东边防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以互相支援。

周保中等还要求苏联远东边防军负责人帮助中国东北党组织建立同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一九四〇年三月，他们再次联名致信党中央（信件请苏联边防军转递），信中说：“我们固然在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下，坚固自信，忠实彻底的继续进行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然而我们设想到现实环境和中国共产党东

北党组织的久远前程，使我们不能不感到东北党组织四年来同中央断绝了联系的苦痛。因此，我们现在向党中央唯一的请求，就是要得到联系的建立和新的指示。”^①然而，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投降，东北党组织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一九四〇年三月底，周保中回到饶河七军临时指挥所。四月三日至九日，七军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由于在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无法召开吉东省党代会，因此这次代表大会行使省党代会的部分职权）。周保中在大会上代表吉东省委作工作报告。会议拥护并接受《关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新提纲》，选举产生了吉东省执行委员会，周保中当选为省委书记。

七军党代会后，周保中率领第二路军总部和直属队西移，在宝清、富锦、勃利、依兰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不断袭击和破坏敌人占据的交通运输和林木矿产。自春末到秋初，共与敌人战斗八次，消灭日寇六十多名，炸毁敌人机车两辆、客货车二十余辆，桥梁两座，攻陷“集团部落”一处，缴获各种枪枝四十余支，马牛六十匹（头）和许多粮食、军需品。

一九四〇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

由于日寇残酷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抗联部队整年累月在荒山密林露营，粮食服装极端困难。他们常常十几天、甚至几十天断粮，靠山果、野菜、树皮、草根以至破靴鞅鞋底充饥。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寒冬里，有的指战员还穿着单衣，耳朵冻出

^①1940年3月24日周保中、冯仲云致中共中央信，复制件存黑龙江省档案馆。

水，脸颊冻破，鲜血直流。篝火成了野营生活中绝不可少的东西。在残酷的战斗和艰苦的生活中，部队大量减员，干部不断牺牲。自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上半年，第二路军的许多重要干部，如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第二路军政务处主任黄玉清，第五军政治部主任王克仁，第七军军长李学福，第四军第二师师长王毓峰，第五军第三师师长李文彬，第二支队长王汝起等相继英勇牺牲。此外，民族败类谢文东、李华堂在一九三九年先后投降了日寇，充当了汉奸走狗。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周保中志坚如钢，继续领导第二路军余部在东起乌苏里江、西至牡丹江的广大区域同日寇作殊死的搏斗。他总是鼓励大家说：“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他还说：“虽然我们不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但中央会知道东北人民子弟兵正在英勇顽强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假如我们在胜利以前倒下去了，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为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献身的先烈们的。”

九月底，苏联远东边防军代表来电邀请东北抗联各路军负责人到伯力参加抗联领导干部会议。周保中带领二路军总部和警卫队于十月三十一日渡过乌苏里江，十一月十八日来到伯力。同时应邀来参加会议的还有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篈、政委冯仲云，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原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第二路军参谋长崔石泉、第二支队长王效明、第五军军长柴世荣、政委季青以及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代表三人。

会议期间，苏联远东边防军负责人提出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属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这一意见还得到极少数抗联领导人的附和。

周保中和大多数抗联领导人坚决反对了这种取消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张。周保中指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虽然遭到严重挫折，走向低潮，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没有解决，东北抗日斗争的基本条件和群众基础并未丧失，抗日斗争必将得到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必将同全国抗日战争一道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无论环境多么困难，绝不能取消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必须坚持抗联的旗帜，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周保中还认为，苏联边防军不能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他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在失去中共中央领导关系的特殊条件下，与苏联远东边防军司令部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接受远东红军的指导和帮助。这种指导和帮助对于中国东北抗日斗争的意义是很大的。但是，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这种指导和帮助必须根据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政治路线、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适应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要求来进行，而不应该抛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将中国东北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任意划分为几个区域，因为这只是图谋片面的工作利益，而没有注意到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全局。

为了求得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周保中上书苏共领导人。苏共领导人肯定了周保中的正确意见，否定了取消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错误主张，严厉批评了那位苏联远东边防军负责人的错误态度。

由于周保中等同志的坚定立场和积极斗争，这次会议确定了坚持抗联旗帜这一不可动摇的原则。同时会议正确地估计了东北的斗争形势，确定了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

会后，周保中受与会者的委托继续留在伯力，等候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

一九四〇年冬，一部分东北抗联人员分别在苏联远东边疆的双城子和伯力附近组成了南野营和北野营。他们自己动手伐木盖房、开荒种地，建立了临时休整基地，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周保中担任了这两个野营的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人。他一面指导这两个野营的整顿训练工作，并从野营不断派遣游击小部队回国；一面继续指导吉东和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活动（一九四一年二月，在南野营举行的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干部会议上，决定原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属下的地方和军队党组织由吉东省委领导）。

加强军政训练 迎接抗战胜利

一九四〇年后东北抗日斗争形势更加恶化。抗联人数锐减到一千人以下，几乎完全失掉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潜居深山密林，活动更加困难。为了保存力量，并根据共产国际的正式决定，抗联主力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边疆的南北两个野营进行集中整训；另外组织十五支小部队在东北继续活动。小部队由最有游击活动经验的抗联中级干部担任队长和政委，挑选最优秀的抗联战士做队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侦察、联络群众和抗日宣传，在可能的条件下发展地方抗日武装。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抗联主力统一改编为野营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篈任政治副旅长；并建立了东北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崔石泉任书记，周保中等为委员。

在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和周保中的领导下，两个野营的抗联战士进行了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在军事方面，进行了射击、投弹、侦察、滑雪、跳伞和无线电通讯等军事技术的训练，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方面的教育。在政治方面，进行了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的目前战局和发展前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队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教育。周保中还详细调查了抗联各军的发展历史，系统地总结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军政训练中，周保中一面号召大家严格训练，掌握杀敌本领，随时准备返回祖国东北消灭侵略者；一面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以普通一兵的姿态积极投入各项训练活动。

这一阶段，周保中还继续领导着留在我国东北的各小部队的活动，不断给他们必要的指示。

在苏联集中整训期间，生活上安定了，但周保中最苦恼的问题——同党中央的联系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向苏联同志提出请求，希望他们帮助我东北党组织建立同党中央的联系，但都没有取得结果。东北抗联和党中央仍然处于隔断状态。但是，周保中和抗联指战员们的心始终向着延安。周保中对来自延安的任何消息和材料都十分珍视。当时他从苏联同志那里能得到一些不完整的《新华日报》和少数中共中央的书籍、文件。他从《新华日报》上看到中共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消息后，就提议在东北党组织内开展整风运动。他们组织了整风委员会，学习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文件，对照东北多年斗争实践，进行了干部的思想整顿，政治水平有很大提高。一九四五年四月，周保中和抗联指战员从收音机里听到党

的七大召开的消息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莫不欢欣鼓舞。当苏联同志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的军事报告的译自英文通讯的俄文稿（摘要）送来时，周保中心情十分激动，立即亲自将这两份珍贵的文件译成中文，作为抗联全体干部、战士政治教育的基本教材。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清晨，苏联红军攻入中国东北，给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消息传来，周保中和全体抗联干部、战士无比兴奋，整个野营一片欢腾。八月十日，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在野营召开了战斗动员大会，周保中作了题为《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本关东军，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动员报告。他指出：由于苏联红军对日作战，大大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最后崩溃，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即将到来，长期以来我们同党中央隔断的状态将要结束，我们将要在东北同八路军会师，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

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周保中和东北地区党委的同志们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们分析了苏军进入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后东北形势发展的几种可能，以及在各种形势下自己的任务和方针；确定了抗联干部的分配和力量的部署；选派伞兵队，随同苏联伞兵队飞向日军后方着陆；派遣抗联主力协同苏联红军进入同江、佳木斯等地作战。

正当他们欢欣鼓舞地准备迎接最后胜利的时候，传来了国民党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王世杰到莫斯科谈判并签订中苏条约的消息。条约规定，苏军解放东北后，将把东北主权交给国民党政府。周保中和东北地区党委的同志们意识到未来的斗争将是极其复杂艰巨的。考虑到中苏条约的规定，他们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抗联回到祖国东北后的任务和方针：（一）帮

助苏联红军维持占领区的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二）利用参加苏联红军军事管制的合法地位进行建党建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三）在苏联红军和我国八路军之间起向导作用和桥梁作用，迎接党中央，迎接八路军；（四）万一八路军被反动势力隔断，不能进入东北，东北完全被国民党占领，则准备继续在东北开展长期游击战争，坚决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

八月二十二日，周保中带领抗联干部、战士一百来人从伯力出发，飞到长春，担任苏联红军长春中央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其他抗联领导干部也率领所部同时分赴我国东北五十多个市、县，执行东北地区党委规定的任务。

在解放东北的战场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保中立即投入了解放东北的斗争。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辽吉军区司令员、吉林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和吉林省政府主席等职务，在党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东北军区司令部的领导下，驰骋疆场，呕心沥血，为解放东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解放战争初期反对蒋介石篡夺东北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中，周保中在东北局领导下，同其他抗联老干部一起，以原抗联部队为骨干，在东满、北满地区大力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建立东北人民自卫军，肃清敌伪残余，建立地方民主政府。同时，他又以原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的身份，向广大人民讲述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十四年艰苦抗

战的历史，揭露国民党“九·一八”后出卖东北，出卖民族，“八·一五”后篡夺东北抗战胜利果实的罪行。这样就使我党在同国民党反动派争夺东北的斗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在以自卫战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进攻的斗争中，周保中曾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旬指挥我军攻占长春，歼敌近两万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在我军战略防御阶段，周保中在吉林省委领导下，以延边地区为基本军事基地，指挥吉林军区部队，在吉南和吉北同时出击，配合北满，策应南满，威胁敌人的侧背，并始终切断吉海（吉林——海龙）路交通线，阻止敌人南北联络，有力地支援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作战，同时巩固和扩大了东满解放区。

在我军战略进攻阶段，周保中率领吉林军区部队积极配合主力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先后解放了桦甸、伊通、双阳、磐石、九台、德惠和农安等县，迫使吉林省境内的敌人固守于吉林、长春、四平、四平街等孤城之内。

在著名的辽沈战役中，周保中率领吉林军区部队，配合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担任封锁、包围长春的任务。他多次到围城前沿研究计划，部署斗争或巡视部队，鼓励士气。他还同吉林省委研究决定，从吉林省后方抽调一百五十余名干部加强围城地区各县工作队力量，与围城部队联合组成长春西南、东南和东北各区的“围城斗争委员会”。他指示各“斗争委员会”一定要认真执行包围、封锁的各项具体任务：断绝敌方交通；封锁物资，特别是严禁粮食流入敌区；清匪锄奸；对敌宣传，开展政治攻势；收容逃兵；保护和帮助群众生产，救济灾荒

等。

在东北解放战争的三年中，吉林军区部队共作战八百余次，歼敌四万余名，缴获各种枪枝二万八千余支。在建军方面，三年来向主力部队输送兵力十八万九千余人，其中成建制的有一个军、四个师、二十二个团和十九个县大队，支援了东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

在生活上，周保中保持了抗联时期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例如，吉林军区司令部决定供给周保中全部细粮，他坚持按东北军区后勤部的规定吃半粗粮、半细粮，把多余的大米全部交回。再如，一九四八年冬，吉林军区后勤部给军区干部每人做一件新大衣，周保中坚决不要，说“我还有一件旧大衣可穿”，把新大衣又交还了后勤部。

在云南解放初期的日日夜夜里

一九四九年春，周保中在北平参加了第四野战军高干会议，听取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传达，听了毛泽东的简要讲话，朱德关于形势与任务的讲话，刘少奇关于城市政策问题的讲话，周恩来关于同南京政府和平谈判问题的讲话。会议期间，毛泽东和朱德分别接见了。毛泽东细心地询问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肯定了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在历史上的功绩和作用，同时指出，也必须检讨历史的经验教训。关于周保中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对他说：“原来曾考虑把你留在中央军委，但云南省地处西南边疆，同缅甸、老挝、越南接壤，地位重要，情况复杂，那里必须有适当的领导干部。你是云南出

生的，因抗日的关系在云南群众中有威望，因此与朱德总司令、少奇同志商量后，决定派你到云南去。”周保中愉快地服从了党中央的决定。

八月，周保中回东北移交工作。九月，周保中离开东北到北京，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开国大典。不久，周恩来接见了，向他详细、具体地布置了到云南去的工作。但是，正当他积极准备南下时，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住进了北京医院。经医生检查，他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心房已经扩大，必须进行长期治疗和休息。组织上和同志们都劝他把病治好再走，但是他说：“多少同志倒下去了，我这点病又算得了什么！多年来的理想——解放全中国，就要成为现实，我决不能掉队。”他不顾重病在身，决心尽快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十二月十七日，周保中离京南下，向阔别了二十五年的故乡——云南进发。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是蒋军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地盘。在我军占领贵阳、重庆，歼灭白崇禧集团后，国民党云南省省长卢汉将军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上旬在昆明宣布起义。但盘踞在云南的蒋军第八兵团却继续与人民为敌，企图控制云南。一九五〇年一月，我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奉命昼夜兼程，由广西进入云南，在我党领导的地方游击队——滇桂黔边区纵队配合下，歼灭了负隅顽抗的蒋军第八兵团。

二月十五日，周保中在云南罗平同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会合。二十日，陈赓、宋任穷、周保中在云南各族人民十二万人的夹道欢迎中进入昆明市。

周保中来到云南后，担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府副主席和昆明市军管会副主任以及中共云南省委委员、统战

部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和省民族委员会主任等职，因省政府主席、军管会主任陈赓有繁重的军事任务，所以，由周保中负责主持省政府和军管会的工作。

云南是长期受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残暴统治、毗邻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多民族地区，又是和平接管、解放较晚的省份。解放初期的云南，遭到严重破坏的工农业生产亟待恢复；残留与潜伏的土匪特务必须肃清；军政人员的供给必须得到保障；波动的物价必须使之平稳；烟毒、民族仇恨等旧社会的遗毒必须加以清除；灾荒和失业必须予以救济和安置。真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周保中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每夜住在省政府办公楼里，晚上听汇报经常通宵达旦。

周保中不仅对人民的事业极端负责，还对人民的生活极端关心。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丽江、鹤庆、剑川等地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伤亡和损失。周保中获悉后悲痛得热泪横流。他立即召开了省军政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和省政协的紧急联席会议，成立了震灾救济委员会，制定了抗震救灾的紧急措施。会后，他亲自率领省工作组赴震区慰问和领导救灾工作，冒着余震的危险，走遍灾区各地，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带给灾区人民。一位纳西族老大爷含着热泪激动地说：“省主席都亲自到我们村里来慰问，我活了七十岁从未见过。各位同胞！我们不要害怕了，我们有了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是一定可以战胜震灾的。”^①一九五二年夏天，云南降雨量特别大。一天晚上，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周保中焦急得彻

^① 1952年1月21日《云南日报》。

夜未眠，一直坚守在办公室里，通宵查问昆明附近二十多个县的雨量和水位情况，及时指示各地采取紧急措施预防水灾，直到各地安全渡过险情。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周保中调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长。

长期的艰苦的游击战争生活和紧张的奋不顾身的忘我工作，严重地损害了周保中的身体健康。一九五二年冬，他的心脏病更加严重了，医生再三劝他赶快休养治疗。他没有听从医生的吩咐，继续坚持工作。一九五三年夏，周保中的病情严重恶化，发展到心力衰竭，连端起一杯水的力量都没有了。这时，他才不得不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先后在重庆、黄山和贵阳等地治疗和休养。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派专机将他接到北京疗养。

在北京又发现他还患有严重的胆结石症，每次发作都严重威胁着心脏，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他始终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待自己的疾病。只要病痛稍有减轻，他就忙着看文件，整理历史资料，接待来访同志或出席会议。他还多次提出要求工作。为了总结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育青年一代，他在病中写了《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情况》、《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等革命回忆录。

一九五四年后，周保中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一九五九年四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周保中在北京不幸逝世。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共中央组织部所存的周保中档案。
2. 周保中：《一个普通人的回忆》（1960年）。
3. 周保中：《自传》（1944年）。
4. 周保中：《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情况》，油印件，存东北烈士纪念馆。
5. 周保中：《游击战争日记》。
6. 张麟：《抗联名将周保中的故事》，《红旗飘飘》选编本第1集。
7. 魏东明：《周保中将军传略》，东北书店1946年4月版。
8. 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第四野战军军史资料》，存东北烈士纪念馆。
9. 吉林军区司令部：《吉林军区军史》。
10. 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烈士纪念馆、云南省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文档资料。
11. 王效明、王一知、季青、李荆璞、彭施鲁、李范五、胡成梁、苏北虹、孙平、乔书贵、肖茂荣、胡真一、张启龙、孔原、唐天际、袁仁远、马逸飞、魏璞、郑祖志、刘巨海、崔维舟、王福、张冲、马曜、欧根、李世璋、唐友章等人的谈话记录。

李兆麟

刘 枫 李颂鸢

(一)

李兆麟，曾用名张寿箴，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日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小荣官屯一个农民的家庭里。父亲李文彬早年在外读书，后来也一直在外谋生。一九一六年春，刚满六岁的李兆麟被他的祖父送进学堂；一九二二年于小荣官屯高小毕业后，又到大荣官屯上了二年私塾。他孜孜不倦地读了很多经史古籍。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禹王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在治水十三年中，三过家门不入的故事，对他影响颇深。他当时精心绘制了一幅大禹治水事迹图，赞扬禹王的功绩，憧憬着自己未来也要为老百姓干一番大事业。

一九二五年父亲去世，家境窘困，李兆麟不得不辍学务农。这期间，他曾主动替一位被霸占土地的妇女打官司，为她写呈子告到法院，结果官司打赢了。从此李兆麟对于法律有了兴趣，开始攻读他父亲读过的法律书籍，期望将来能通过法律，解决社会的弊端。他在书箱门上刻了“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八个大字，表达自己未来的远大抱负^①。

^①见《东北烈士纪念馆抗日战争陈列简介》。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在国民党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政策下，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

年轻的李兆麟，目睹祖国东北的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践踏，三千万骨肉同胞被蹂躏，愤怒的火焰在胸中燃烧。他暗暗地发誓：绝不当亡国奴，要抗日救国。恰好这时，同乡的爱国青年张一吼已在北平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寄信给李兆麟，让他迅速到北平参加抗日活动。李兆麟当即把要去北平的打算讲述给母亲。已经失去了丈夫的母亲舍不得让唯一的儿子离开自己。李兆麟理解母亲的心情，就耐心地给她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表明自己是一个青年人，怎能眼看敌人宰割我们的国土不挺身而出呢？李兆麟的母亲杨长秋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妇女。她听了儿子一番述说之后，终于同意了儿子的要求，并和儿子一起说服了年迈的公公。李兆麟把刚收获到家的一车大豆卖掉作路费，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离开家乡，奔赴北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北平的东北籍同乡立即于奉天会馆召开会议，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救国会的常委和执委中，有我党的地下党员。他们通过救国会在东北青年中进行工作，号召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①。

李兆麟到北平后，化名李烈生，经张一吼介绍，认识了在抗日救国会担任常委的地下党员冯基平(化名冯乃革)和执委夏尚志。李兆麟见到他们象找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高兴，便热情地介绍东北辽阳一带自发的反日武装的情况，并建议党组织

^①访问冯基平、夏尚志记录(1964年5月、1980年9月)。

派人去加以领导。冯基平和夏尚志见李兆麟救国心切，态度诚恳真挚，对党的认识也比较清楚，就吸收他加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此，这位热心寻求真理，立志抗日救国的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新的战斗生活。

在北平期间，李兆麟在地下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步很快。他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完成组织上分配的任务，便缴纳一笔学费进入了华北大学，以一个大学生的合法身份为掩护，曾到过门头沟煤矿和西郊农村，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

一九三一年底，在北平团市委工作的胡乔木根据党组织的部署，派共青团员林郁青同李兆麟、张一吼一起回东北组织辽阳一带的义勇军。对此，李兆麟十分高兴。他找党组织派人回东北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心愿终于实现了^①。

一九三二年刚过完春节，北平市委决定冯基平作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代表，同李兆麟、杨寿天一道来到辽阳。不久，孙志远、夏尚志、林郁青等也到了辽阳。在冯基平领导下，经过讨论研究，决定由李兆麟利用同乡和同学的关系公开出面进行活动。李兆麟骑着家里的一匹白马，冒着风险，奔驰在辽阳一带自发的反日山林队和义勇军之间。经过李兆麟的奔走和工作，以苏景阳的骑兵为基础，把在辽阳地区活动的“长江”、“燕子”等山林队和一部分自发的抗日队伍都联合起来，共有一千多人，于同年旧历二月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苏景阳任司令。李兆麟把冯基平带去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委任状发给了苏景阳。

^①胡乔木给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复信（1980年6月14日）。

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成立以后，活跃在辽阳一带。在攻打铍子沟矿井的战斗中，活捉了日本矿长久留岛；在辽西地区，义勇军以优势兵力包围了投降日军的洪盛团，消灭了这支三百多人的土匪队^①。后来，这支抗日队伍在日寇疯狂进攻下失败了，但是它在辽阳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兆麟等在组织义勇军的同时，还在小堡、小荣官屯一带建立起农民抗日救国会。李兆麟的家就是当时进行革命活动的联络点，前后有十几名地下党的领导同志曾在他家里居住过。李兆麟不仅自己献身革命，而且把他的母亲、妹妹和堂兄弟等亲属都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他把家里的八十元钱拿出来作为活动经费，并派人到奉天城里买回来两台油印机。夜深人静时，他和几个同志围坐在小油灯下，刻蜡板、印传单，然后组织农民和儿童中的积极分子，秘密到双龙寺、三块石、十里河和铍子沟等地散发和张贴。敌人虽然到处追查，但却什么线索也没有找到。

经过这一段实际斗争的锻炼，李兆麟的觉悟更加提高了。一九三二年五月，他加入了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奉天特委派李兆麟到本溪煤矿工作，化名孙正宗，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反日活动。他通过爱国青年杨坚白的介绍，进入本溪煤矿当了矿工。接着奉天特委又派地下党员侯薪（化名侯维民）和孙己泰（化名王子明）来到本溪。他们三人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李兆麟被选为负责人。

李兆麟和侯薪、孙己泰一边从事挖煤、推车、看水泵等劳动，一边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启发工人觉悟，把进步

^①访问冯基平记录（1964年5月、1980年9月）。

工人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很快地建立起秘密的抗日救国会，会员迅速发展 to 三百余人。

在本溪煤矿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李兆麟亲身体会了旧中国矿工的悲惨处境，尝到了挖煤工人的辛酸。他受过日本监工的气，挨过工头的打，吃过发了霉的窝窝头……。所有这些，使他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沉重的劳动，紧张的工作，使李兆麟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一九三三年二月，他被奉天特委调回奉天休养治病，组织上还派人从乡下把他母亲接来照顾。李兆麟在奉天一面治病，一面工作。病愈后被分配在奉天特委军委任干事兼青年士兵委员会负责人。这时，他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兵运工作中去。他在治病期间通过乡亲关系结识的崔军医，是伪靖安军中一位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他以找崔军医看病为名，经常出入于北大营和东山嘴子的伪靖安军兵营。一些士兵和军官经过李兆麟的教育和帮助，都表示愿意走抗日救国的道路。策动伪军起义的工作，进展很顺利，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这时，奉天特委被破坏，特委的领导人和许多共产党员被捕入狱。李兆麟的家被搜查，母亲和妹妹也遭逮捕。敌人的镇压愈疯狂，李兆麟革命的意志愈坚决。他在险恶的环境中一个人又坚持了四十多天的工作。但由于和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加上叛徒特务的监视，使他无法在奉天继续活动，遂决定去哈尔滨寻找党的组织。

(二)

一九三三年八月初的一天，李兆麟来到了哈尔滨。第二天，他在道外天泰客栈同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接上了关系。

李兆麟向冯仲云汇报了奉天特委被破坏的情况，在谈到许多被捕的同志可能牺牲在狱中时，他的泪水夺眶而出。这两位初次见面的战友为党的组织遭到破坏而难过，他俩互相勉励，表示要为革命挑重担，弥补党的损失。后来，冯仲云在回忆这次会见时说：“兆麟同志当时还是个青年，他的英俊和诚恳，在我的脑海里立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此后，党分配李兆麟担任了满洲省委军委的领导工作。

中共满洲省委于一九三三年五月接到了中央一月二十六日《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后，召开了扩大会议，作出了贯彻中央指示的决议。会后，李兆麟（化名张玉华）受满洲省委的派遣，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先后到北满的巴彦、海伦巡视工作，传达“一·二六”指示信和省委决议，帮助当地组织和建立抗日游击队。

同年九月，赵尚志、李启东等七名同志，从孙朝阳部拉出来与珠河县委取得了联系，准备建立一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武装队伍。中共满洲省委得知这个消息后，派李兆麟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赴珠河。

李兆麟到珠河后，见到了赵尚志和李启东。他们一起经过细致的讨论和研究，制定出建立游击队的原则和活动计划。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珠河反日游击队正式宣告成立，赵尚志任队长。从此，珠河地区便出现了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这支武装很快地发展成珠河地区反日武装队伍中的核心力量。

当时在珠河地区除有党领导的这支游击队伍外，还有数十

^①冯仲云：《东北抗联中领导者之一张寿箴》（1946年2月）。

支山林队和义勇军的队伍。这些队伍首领的出身、反日程度、对群众态度各不相同，对珠河反日游击队所持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为了扩大反日统一战线，游击队与反日义勇军订立了反日作战协定。一九三四年初，满洲省委为加强对珠河县委和游击队的领导，派秘书长冯仲云到珠河县委工作，派军委负责人李兆麟（化名张寿箴）到珠河游击队工作，任游击队副队长。

李兆麟到珠河游击队后，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协助赵尚志召开了各义勇军和山林队的首领代表会议，建立了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①。游击队与义勇军初步联合之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联合军的势力越来越大。这时珠河游击队的队员发展到一百三十余人，再加上义勇军和山林队，联合军共有近五百人的队伍。珠河游击队领导人为了打击敌人，以壮军威，决定西进攻打宾州城。

赵尚志与李兆麟于五月中旬率领联合军攻到宾州城下，被围困在城内的守敌惊恐万状，一小时内给哈尔滨的日军连打七次电话求援。敌人由哈尔滨派来四五架飞机、近千人的增援部队。我军与日伪军展开英勇战斗，用木炮攻城，打死打伤敌人七八十名，还击落敌机一架。“木炮打宾州，威震敌胆”，被传为抗日佳话^②。

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珠河反日游击队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召开了党团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在珠河反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吸收山林队和义勇军，建立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

①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巡视珠河给党团省委报告之三》（1934年3月9日）。

② 《中共满洲省珠河县委报告》（1934年8月26日）。

队的决定。第二天召集指战员大会，宣布了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正式编成。哈东支队设司令部，司令为赵尚志，李兆麟为政委，参谋长为梁佐术。

哈东支队司令部下辖三个总队。赵尚志率第一总队活动于宾县三岔河一带，李兆麟率第二总队活动于珠河铁道南游击区，韩光率第三总队活动于珠河铁道北。他们时分时合，痛击敌人。为了打击敌人从秋季开始向我军“讨伐”的反动气焰，扭转与我联合的山林队、义勇军由于“黄炮”、“九江”队叛逃后而出现的动摇情绪，哈东支队在赵尚志、李兆麟的领导下，决定攻打五常堡。

五常堡是哈尔滨东南重镇，守敌约有五百多人。我军在赵尚志、李兆麟率领下，集中了三百余人的兵力，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经过一场激战，攻克了这座重要的城镇。五常堡战斗，是哈东支队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扭转了义勇军中存在的动摇情绪，而且振奋了军队的士气，扩大了党和哈东支队的政治影响。随着哈东支队的发展和巩固，珠河游击区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大。到一九三四年秋，游击区的范围比游击队建立的初期扩大了三倍。从原来的珠河，发展扩大到延寿、宾县、五常、双城五个县的十二个区。根据地内党领导的群众反日会组织和农民武装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哈东支队为基础，吸收地方青义军等队伍参加，正式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被分配到二团任政治部主任，和团长李熙山一起，率队活动在珠河铁道南和五常、双城一带。

一九三五年一月第三军宣告成立以后，日寇对这支队伍的“讨伐”一次接着一次。敌人在春季“讨伐”失败之后，紧接着又发动了夏季的“讨伐”，其主要目标和重点又是集中对着三军和珠河游击区。三军司令部为避开日伪军对我主力部队和游击区的连续进攻，决定于五月下旬率一团向东转移。这时，李兆麟由二团调到一团，随司令部一同到牡丹江沿岸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并按照省委的要求，与汤原、饶河游击队取得联系，配合作战。当部队到达方正大罗勒密一带时，遇到大量日伪军在牡丹江沿江一带的阻击。赵尚志和李兆麟临时改变计划，决定在延（寿）方（正）一带进行活动。从地理上看，这里可以建成我军后方的根据地，三军司令部和一团着手在这里建造密营。

延、方地区是义勇军“三省”、“五省”的活动地盘，对三军在此开辟游击区，建造后方密营不给予支持和合作，双方出现了一些摩擦。就在这时，随三军一起活动的谢文东、李华堂的队伍，产生了脱离三军的倾向。他们表面上同意与三军东进，暗中却凭借三军的威信恢复自己的势力，阻止三军东进和在延、方建立后方根据地。由于出现这些情况，赵尚志率三军司令部返回珠河游击区，留下李兆麟、刘海涛率领的一团在此地继续开展活动。

李兆麟十分注意贯彻党的政策，善于团结兄弟部队，重视同其它部队搞好关系、协同作战。当他和刘海涛率三军一团活动到方正大罗勒密地区三家子屯时，主动地与李延禄率领的四军会师。李兆麟和一团的干部在四军军部看到了经吉东特委转来的党的《八一宣言》，并与李延禄一起学习领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酝酿建立联军、协同作战等问题。最后两军

决定联合攻打南刁翎，拔掉敌伪据点。

九月十六日，联合部队对南刁翎发起进攻，胜利地占领了这个镇子，伪军保安队一百余人反正，伪警务营长率部投降。我联合部队乘胜前进，紧接着又占领了林口。李兆麟和他的战友们用战斗的胜利，来纪念“九·一八”四周年纪念日。

(三)

一九三五年夏，三军司令部在赵尚志率领下从延、方地区回珠河游击区。这时，敌伪的夏季大“讨伐”开始了。他们集中了六个县的几千名敌伪兵力，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对珠河游击区反复地进行“扫荡”和烧杀。珠河县委在八月十一日关于敌人烧杀游击区的情况向省委的报告中说：“敌人铁蹄所到之处一片烟云火海，我路南游击区除离铁道线十余里地之地方未被焚烧外，几乎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已成一片焦土”。敌人对路南游击区疯狂地进行焚烧之后，又对路北游击区继续进行烧杀，被烧毁的房屋，“也有三分之二以上”。

在敌人推行“匪民分离”的政策下，失去房屋的广大群众被赶进新归并的大屯，使我军与群众的关系被断割。珠河县委决定赵尚志率主力部队向松花江下游地区转移，到汤原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李兆麟率领三军一团留在这一带活动。为贯彻《八一宣言》的精神，十一月间三军司令部在勃利西青山里召开了会议，讨论了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改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会后，赵尚志率三军司令部与五团过松花江，经通河到汤原，李兆麟、刘海涛率一团暂留依勃一带继续坚持活动。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赵尚志在汤原县境召开了北满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李兆麟出席了这次会议，被推选为会议的执行主席。会上根据《八一宣言》精神，经过协商于一月二十八日通过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决议》，决定设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被推选为总司令。会后，各军分开活动，三军与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队联合进攻夏亮子河金矿，取得了胜利。在三军帮助下，汤原游击队于一月三十日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被派到六军担任代理政治部主任。此后，三、六军共同着手建立汤旺河后方军事根据地，组成了由李兆麟为主任的三、六军后方留守处。留守部队是由三、六军各抽一部分队伍编成的。李兆麟担负起领导建立汤旺河后方军事根据地的任务。三月十九日李兆麟接到联军司令部赵尚志的命令，要他迅速组织部队，坚决、彻底地消灭盘踞在查巴旗、老钱柜一带以“四炮”为首的森林警察大队，以便把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兴安岭汤旺河一带控制在我军手中。李兆麟接到司令部的指示后，立刻召集汤原三、六军留守部队和六军四团等部队，传达了司令部的指示，进行了战斗部署，并亲自担任这次战斗临时指挥部的总指挥。他率领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向汤旺河前进。经过一天的急行军，首先到达汤旺河西岸小兴安岭西南山的岔巴旗——森林警察大队的第一道卡子。经过一场激战，活捉了黄毛、丁山、张保安、宫四炮四名警察中队长及全部森林警察，缴了他们的枪枝和弹药。我军乘胜前进，第二天黄昏到达老钱柜，一举歼灭了盘踞在这里的森林警察大队，击毙日本指导官以下七人，俘虏警察一百五十余人，缴获其全部枪枝弹药和一部无线电发报机。战后，李兆麟率领战士满载着胜

利品返回驻地。这次战斗完全达到了预定目的。三、六军在汤旺河一带建立了许多密营，在沟里还建立了小型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和医院，成了三、六军进行整休和训练的后方基地。三、六军在沟里还建立了军政学校，校长由赵尚志兼，李兆麟担任教育长。这所学校连续办了三期，学员们在这里上政治课，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坚定抗日救国的决心，同时也进行军事训练，为北满抗联各军训练和培养了许多骨干。

一九三六年一月，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决定撤消满洲省委，按东北已有的四个游击区分别建立四个省委。北满的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领导人，于九月十八日在汤原县帽儿山北坡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当时在巴（彦）、木（兰）一带活动的李兆麟被选为北满临时省委委员。此后，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为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核心。一九三七年初，北满省委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正式改称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下辖三、六、九军和祁致中领导的独立师，仍由赵尚志任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

这期间，李兆麟在参与指挥战斗的同时，还紧张地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南北两岸地区，为统一北满各军的思想，加强部队团结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四）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已扩编成十一个军。这支抗日队伍，在白山黑水之间，纵横驰骋，打击敌人，钳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日本侵略者为把东北作为向中国内地进攻的后方基地，在“七七”事变前后，疯狂地破坏东北地区我地下党的组织，“围剿”我抗日联军，压缩我抗日游击区。它以大量的日伪军从中东路、牡丹江、老爷岭向西，从宾县、珠河然后向北，在巴彦、木兰、庆城、铁力、海伦一直到黑河地区形成一个包围圈，逐渐把北满抗联各军压缩到松花江下游地带，企图达到“聚歼”的目的。针对这种形势，北满临时省委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召开了执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活动在三江平原地区的抗联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包围，到小兴安岭西麓敌人暂时统治薄弱的黑嫩平原，依托山区开辟新的游击区域。为加强对抗联三军的领导和作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会议根据赵尚志的提议，决定李兆麟兼任三军政治部主任职务。李兆麟回三军后，根据省委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精神，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在与军长赵尚志研究之后，决定向各师发出指示，号召全军发扬艰苦奋斗、联系群众、英勇杀敌的作风。经北满临时省委同意，他还将军事学校的教官和学员全部派到三、六军各部队中，以充实和加强军政工作的骨干力量。这些措施对抗联三军的发展和巩固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年八月，抗联三军和六军根据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议开辟新区的决定，派出了西征先遣队。李兆麟以北满临时省委代表、联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各军之间，为协调各军之间的关系，整顿部队，做好开辟新区的准备，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的艰苦工作。他在回忆自己这段历史时说：“与我共同工作的任何同志都是热心救国的‘萍水相逢、他乡之客’，我实愿意将抗日救国之主张深入到每个中国同胞的脑海里。他好能同我携着手共同去进行光荣的神圣事

业”^①。

十一月间，在工作十分紧张、繁重的情况下，李兆麟拿出了十天的时间做独立师师长祁致中的工作，耐心地给他讲解党的政治主张和如何建设一支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的道理，坚定他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在党的帮助下，祁致中领导的独立师改编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

一九三七年冬，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东北抗日联军集中活动的松花江下游地区的进攻。战争空前激烈和残酷。我抗日联军虽奋力反击，歼灭了大量敌人，但部队损失较大，游击根据地日益缩小，衣、食、住和枪枝弹药均发生困难，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斗争时期。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军军长戴洪滨率队护送北满省委代表赵尚志赴苏商谈重大问题。为配合这一行动，三军决定发起一次对敌的攻势，指定三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率三军十师和六军二师共二百余人、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率一百二十余人，分别攻打鸭蛋河和萝北县城。此举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在敌集中大部兵力切断我军退路的危险关头，三军一师和六军二师被迫撤到苏联境内。李兆麟率一百余人攻打鸭蛋河之后冲破敌人的封锁，来到萝北老龙岗附近又与二百名日军相遇，在作战中我方牺牲四名战士，再次冲破敌人的包围，把队伍带到富锦，在四区一带活动。这时，下江的形势更加险恶，日伪军集中兵力向松花江下游两岸的依兰、勃利、桦川、富锦、密山一带进行疯狂的大“讨伐”。同时，日伪军、警、宪、特机关于一九三八年三

^①张寿箴：《关于三军与八军关系纠纷问题的信》（1937年6月20日）。

月十五日进行大搜捕后，党的地下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部队和群众失去联系，粮食、弹药的来源中断，战士不但每天受到饥饿的威胁，而且还要遭到几倍、几十倍敌人的袭击。

四月间，李兆麟出席在依兰县境青山里召开的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议。这次会议刚结束，敌人就进山袭击省委机关，省委书记张兰生率省委机关向西北方向转移。李兆麟率领部分队伍把敌人引向与省委机关转移的相反方向，边打边退，保证了省委机关的安全。接着，在依兰四块石，他们甩掉了追踪的敌人。

此后，李兆麟率六军教导队向萝北、绥滨地区转移。在路过格金河时，打退了三、四百名敌人的追击。经过长途行军，部队到达萝北梧桐河，与六军一师、五师、二师、四师会合。这时候，李兆麟接到了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北满临时省委给他的信，对他的活动进行了表扬，信中说：“由于你的机智积极，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你实为布尔什维克的勇士，如有你这样的不屈精神积极的努力……一定能使下江各地的各种复杂问题得到解决。”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根据下江地区形势的急剧变化，于六月初在通河县境内召开了第八次常委会议。在进一步讨论下江地区形势之后，决定各军要尽快地突破敌人对下江抗日部队的包围，组织三、六、九、十一军向西北远征。为加强对远征部队的领导和开辟西北地区的工作，要求建立西北指挥部，并指定李兆麟参加西北指挥部准备工作的会议。根据三军在赵尚志去苏后无军长的情况，决定李兆麟以抗联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领导三军工作，并任命金策为三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承担了领导和指挥北满抗日部队的重任。

李兆麟没有能参加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议，但是，他在接到省委指示后，积极贯彻常委会议做出的关于组织部队突破重围，进行西征的决定。七月间，他在萝北老等山召开部队师团以上干部和下江特委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会上分析了下江的形势之后，一致同意和拥护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议关于西征的决定。

八月间，各军主力部队按计划陆续踏上西征的路途。为了牵制敌人，支援西征主力部队，做好下江留守部队的整顿工作，李兆麟以北满临时省委代表身份留在下江，于萝北、富锦、宝清一带，坚持游击活动。他曾积极帮助兄弟部队摆脱险境，还冒着生命危险，带队帮助四军在富锦境内的一支留守队伍突破敌人的重围。九月间，他带领部队到宝清县境的完达山麓，与十一军张中孚、于天放率领的队伍和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率领的队伍会师。李兆麟代表北满临时省委向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和徐光海传达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关于高禹民留下江坚持斗争，负责领导下江地区全部工作的决定。为加强部队与地方的联系，让高禹民以总司令部特派员的身份，与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共同负责领导下江留守部队。李兆麟在传达了省委决定之后，要求他们相互配合，在艰苦条件下继续坚持下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十月间，李兆麟率领六军教导队一百八十余名队员营救被围困的十一军李景荫部，并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整顿巩固这支队伍，带领他们一道踏上了西征的路程。

十一月间，李兆麟从宝清来到了汤东老白山下江留守部队总部的密营。夜晚他给北满临时省委写信，报告下江地区主力部队八月间西征后，下江地区工作部署的状况，在信的最后一

部分，他饱含革命情谊，深刻地表达了抗联战士和他个人在艰苦环境中的乐观精神和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他说：我是无钱、无粮、无干部，过了四个月残酷斗争生活，今天正是身边最后一个铜元都花净的日子，革命热情燃烧着我，非常高兴地向着抗日的光明处狂奔^①。根据三、六、九军一致西进的情况，李兆麟率六军教导队和十一军队队伍，离开下江，翻越小兴安岭，向黑嫩平原远征。

这时，北满已是千里冰封的严冬季节，到处白雪皑皑。李兆麟率领的最后一批西征部队，行进在不见人烟的林海雪原中。战士的手和脚都冻得皴裂了，胡须和眉毛上挂着厚厚的冰霜。他们白天分成小部队行军，夜晚集中宿营，身上带的粮食很快就吃光了，每天只能从倒木上找一些干蘑菇吃，甚至把皮带剁成小碎块煮一煮吃下去。有一次他们在第一、第二批西征部队的宿营地找到了一些已经发霉的马皮，战士们用火烧烤时，虽然也发出一些糊香味，但放在嘴里难嚼难咽。李兆麟鼓励大家说：“同志们，为了抗日，我们必须保住生命。”他一边说，一边和大家一起吃掉了这些烂马皮。有一位大家都叫他小陈的同志，在没腰深的大雪里走着走着就倒下牺牲了。李兆麟和全体战士含着眼泪用白雪就地掩埋了他的遗体，继续在风雪中前进。

夜晚，部队在零下四十多度的森林里露营，战士们围着篝火，烤着湿透了的脚布和靴草，烤着烤着就睡着了。有一位战士因饥饿和劳累，失去控制，一头扎到火堆里牺牲了。李兆麟更加热爱自己的战士，以后每当宿营战士入睡后，他仍坐在篝火旁边，一面向火堆加柴，一面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研究第

^① 《寿镜给省委的报告》（1938年11月16日）。

二天部队的行动计划。英勇的抗联战士，在李兆麟的率领下，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战胜了饥饿和严寒，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到达小兴安岭西麓的海伦县境内，在白马石后方基地与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北满抗联部队的西征，是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决定下，在李兆麟、金策等的具体安排、组织和率领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分批完成的。这次西征大军，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终于取得了胜利，保存了北满抗联的一部分主力部队和骨干力量，为后来在广阔的黑嫩平原，依托山区开展游击战，奠定了基础。

在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中，在西征的艰苦岁月里，李兆麟和他的战友们编写了一首著名的《露营之歌》。这首由四段歌词组成的战歌，是李兆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不同地点、不同季节，一边指挥部队战斗，一边同几位同志一起切磋琢磨编写出来的。

《露营之歌》第一段歌词，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帽儿山南坡四块石山上编写的，内容是：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哟！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
光华万丈涌。

第二段歌词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松花江北岸的梧桐河畔编写的，内容是：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哟！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
黑暗一扫完。

第三段歌词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末，在伊春汤东老白山密营编写的，内容是：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
弟兄们！镜泊瀑泉唤醒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
片刻息烽烟。

第四段歌词是一九三八年底，在西征途中编写的，内容是：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露营之歌》是李兆麟和抗联战士浴血奋战、英勇斗争、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它充分反映了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这支歌在东北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成为鼓舞抗联战士坚持斗争，英勇杀敌，夺取胜利的有力武器。

（五）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了第九次常委会议。根据开展嫩海地区工作的需要，决定成立中共嫩海地区代表团。会后，由李兆麟领导的嫩海代表团正式组成。接着，又建立起讷河、肇州两个县委。为加强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李兆麟将西征后胜利到达小兴安岭西海伦后方游击根据地的北满抗联各部队，统一编成四个支队和两个独立师，并设立了龙南、龙北两个临时指挥部。支队和独立师的总指挥为李兆麟，政治委员为冯仲云，副总指挥为许亨植（即李熙山）。第一、第二支队归龙北指挥部领导，负责人由李兆麟兼任，所属部队活动于嫩江、讷河、五大连池、龙门、通北、克山、克东一带。第三、第四支队和两个独立师，归龙南指挥部领导，负

责人由许亨植兼任，所属部队活动于绥棱、海伦、绥化、庆城、铁力一带。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四月十二日召开了执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改北满临时省委为北满省委，选金策、李兆麟、冯仲云三人为省委常委，金策为书记，李兆麟为组织部长，冯仲云为宣传部长。这次会议还决定撤消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以三、六、九、十一军为基础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并建立起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总参谋长。根据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于五月三十日在德都东北朝阳山后方军事根据地正式编成，并发表了成立宣言和通电。全军这时共有五百余人，从数量上看部队人员是减少了，但部队的政治素质却有很大的提高。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龙北部队，在李兆麟的指挥和领导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四月下旬袭击了通北警察署，北进中又击破了龙门附近的紫霞宫警察分署和军用飞机场。五月五日进攻龙门火车站，接着又打进讷东九十里的三合屯。六月二十日攻入北安附近的李桂方屯，同日还缴了德都县红花尔基警察所的枪枝和弹药；二十三日袭击讷河县高四阎王院套，获步枪八支；二十七日破曹乃修屯。七月末破红火鸡警察署。八月十五日一度攻陷老龙门车站，二十二日破克山北兴镇。九月十八日攻占讷河县城。十一月三军八团与六军一师联合进攻德都县伪警察署，经一天战斗毙敌百余名，缴获步枪百余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的龙北部队，到处袭击敌人，打得日伪军惊恐不安，使敌人大吹大擂的三省汇攻和“五大连池会师”计划彻底破产。

根据作战需要，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将原来编成一、二、三、四支队，按照全东北抗联部队的统一编号，改成为三、六、九、十二，四个支队。改编后，各支队的力量有了充实和加强。它们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避实击虚，各队时分时合，到处袭击敌人。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三九年六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北部地区我抗联第三路军各部队，在四十几次战斗中，取得了三十多次的胜利，共缴获各种武器五百多件，消灭敌人二百五十多名，其中日军占百分之四十，俘虏敌军五百多名，攻克城镇七、八处^①，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同年七月，李兆麟和北满省委委员张兰生在总指挥部驻地朝阳山举办了两期短期干部训练班。十四日，驻嫩江日伪军一百余人尾追我攻打科锥村的部队，突然闯进山里。当我军发现时，总指挥部已被包围。我教导队坚守阵地，一天内打退敌人数次冲锋。李兆麟和教导队战士一起坚持战斗。三支队政委赵敬夫为了总指挥的安全，率队突围护送李兆麟转移。这次战斗中，共击毙伪森林警察大队长董连科以下多人；我教导队十余名战斗人员和北满省委委员张兰生英勇牺牲。三支队政委赵敬夫在护送李兆麟和部分教导队员突出重围又返回接应部队时，不幸中弹，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同年秋，在一场暴风雨之后，北安和德都间的南北河河水猛涨，低洼地已成一片汪洋。活动在河东地区的李兆麟和他的二十几名战友，被围困在森林里，经受了一次严峻的饥饿考验。他们吃完粮食，杀战马，吃完马肉，吃马皮。二十几天过去了，溢出河外的河水不退，大家只好吃野菜。北国大地寒霜

^① 《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40年3月13日）。

早，一场秋霜之后野菜都枯黄了，抗霜的野菜“大耳朵毛”也被吃光了。男同志饿得躺倒起不来，女同志每天坚持爬出去拣榛子和蘑菇。这些刚强的女战士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她们虽然饥肠咕咕，但拣到的榛子、蘑菇，谁也不肯往自己嘴里放，都是带着它爬回来，如数地交给总指挥，请他来分配。李兆麟总是让先给伤病员，然后是年老体弱的和女同志，轮到他就没有几颗了。大家不忍心让总指挥少吃，就把自己分到的送给他一些。李兆麟说：“你们到外边活动，应当多吃点，我在驻地活动少，应当少吃。”他虽然饿得全身无力，还乐观地给大家讲古代伯夷、叔齐二人宁肯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的故事，鼓励大家战胜困难。他说：“我们宁肯饿死，也要忠于祖国，绝不能动摇抗日到底的信念。”^①河水渐渐地退了，党终于派人给他们送来了粮食。李兆麟和他的战友，艰苦地度过了五十天断粮的日子，最后和战友们一起跨过南北河回到部队所在地。

抗联第三路军朝阳山总指挥部被袭，我方损失较大，敌人以为这就是他们“围剿”抗联的最后胜利，于是大肆宣扬“东北抗日联军已被最后消灭”。就在敌人准备庆祝所谓“最后胜利”的时候，在龙江北部活动的我第三、第九两个支队，按照总指挥李兆麟的部署，在冯仲云、王明贵的指挥下，于九月二十三日，联合攻克了龙北重要县城克山，在龙江南部活动的第十二支队于九月十二日袭击了肇州县丰乐镇之后，又于十一月八日一举攻占了龙南的重要县城肇源。我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的各支队，在龙南、龙北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

^①引自东北烈士纪念馆馆藏资料。

了敌人，而且有力地戳穿了敌人宣传的“东北抗日联军已被最后消灭”的谎言，坚定了东北人民的抗日信念。

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增调重兵进驻东北。我们口联军处境更加困难。在抗日的残酷条件下，东北上

望已久的“夺回我河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东北的大好河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根据东北党委会的决定，八月二十三日，李兆麟率百余名抗联干部，随苏军经牡丹江进驻哈尔滨市^①。

李兆麟深知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的关系。到哈市后，当即成立起抗日联军哈尔滨市办事处，李兆麟为办事处负责人，抓人民武装的建设工作。为了尽快地建立起一支人民的武装，李兆麟派抗联干部王景侠、马克正到阿城、一面坡，派张祥、单立志到巴彦等地发展武装。李兆麟在哈尔滨很快地组织和建立起三个保安大队。同时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于十月一日成立了滨江省政府。李兆麟以中共代表身份出任副省长，同时兼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职务。

李兆麟为了宣传我党实现和平民主、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主张，以推动建军建政工作的进展，进城后首先接管了哈尔滨电台，运用这个现代化的重要宣传工具，播放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

为了保卫人民抗战果实，抗战胜利后，我党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派遣大批干部率领十万人民军队进入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十月十日，党中央派来松江地区工作的钟子云等到达哈尔滨市。以钟子云为书记的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党的领导下，李兆麟满怀着胜利的喜悦，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战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

这时哈尔滨的情况十分复杂，抗战虽已胜利，但东北人民

^①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所《访问录选编（周保中同志专辑）》（1980年11月）。

仍处于决定命运的历史关头。蒋介石为了窃夺人民经过十四年斗争取得的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从陆、海、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兵的同时，还利用特务破坏解放区；哈尔滨地方的敌伪残余势力摇身一变，也成了“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和“先遣军”。他们互相勾结，招摇撞骗，造谣惑众，严重地破坏社会治安。根据形势的发展，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松江军区，卢东生为司令员，钟子云任政委，李兆麟兼任副政委。李兆麟的工作更加繁忙，他不仅与苏军一起接管日伪政权，收缴敌伪物资，恢复社会秩序，组织民众团体，振兴贸易，安定民生，使人民获得民主自由，还要为党中央派到北满、西满地区开辟工作的干部和部队做好接待、转送、保卫、联络和物资装备供应等工作。

昼夜十分繁忙的李兆麟竟抽不出时间接待从辽阳家乡来的阔别十二年的长子李玉，他让秘书先把孩子领到家里，一直等到第三天午夜才脱身回来，父子二人亲切地谈到东方发白。终日劳累的李兆麟打了一个盹，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国民党侵占了山海关。我军根据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又主动撤出锦州、沈阳和长春等地。这时，控制哈尔滨市的国民党反动派气焰也十分嚣张，使我党在哈尔滨的活动受到很大威胁。为了全局利益和为最后的胜利准备条件，滨江地区工委于十一月二十日召开会议，决定工委和军区领导机关于二十一日主动撤出哈尔滨，迁到宾县蜚克图。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决定李兆麟辞去副省长的职务，专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留在哈尔滨。

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接收”大员关吉玉、杨綽庵、

余秀豪来到哈尔滨。李兆麟以共产党和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经常同国民党省长关吉玉、市长杨绛庵、警察局长余秀豪等上层人物打交道，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他又经常深入基层广泛接触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破坏一月十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和发动内战的阴谋。

李兆麟在工人、绅商、文艺工作者和青年中间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他的倡导下，哈尔滨市音乐工作者组织了一个“音乐促进会”，演唱《流亡三部曲》、《露营之歌》等革命歌曲，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二月份他给哈尔滨医科大学即将毕业的学生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同学们，你们现在已毅然踏上了进步的途径——探求真理的大道。并告诫大家：要加倍警惕，绝不能以此微微的胜利冲昏头脑，要用斗争来巩固和平。

在哈尔滨各界妇女于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召开的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李兆麟发表演说。他从东北沦陷时期祖国同胞的悲惨命运，讲到中国人民经过怎样的艰苦斗争才赢得了今天的胜利，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内战的阴谋，号召妇女同胞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为自己的解放事业，为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他慷慨激昂、动人心弦的讲演，教育了群众，刺痛了敌人。

国民党反动派对奔走在和平、民主事业第一线的李兆麟又恨又怕，一伙穷凶极恶的国民党特务和敌伪残余，多次策划暗杀李兆麟。一次，李兆麟参加马迭尔饭店的宴会，特务准备下毒药，企图毒死他，但阴谋未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特务又把《哈尔滨日报》社的干部李钧误认为是李兆麟，将其刺杀在中

苏友好协会的门前。李兆麟深知国民党特务的卑鄙和凶残，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他曾向一位负责同志说：如果我的鲜血能洗亮人民的眼睛，能唤起人民的觉醒，我死了也是值得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下午，伪装进步打入中苏友好协会为会员的国民党特务、杨綽庵的秘书孙格玲打电话给李兆麟，诡称杨綽庵要与他商定“国大”代表事宜，因办公室人多不便，邀他去水道街九号。当时李兆麟刚从钟子云处开会回来，路上，他乘坐的一辆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旧汽车出了故障，警卫员李桂林帮助司机修理停在地段街上的汽车，李兆麟改乘路过的别人的马车，回到了中苏友协。李兆麟唯恐有误工作，忘却个人安危，决定自己独身先去。他匆匆地在办公桌的日历上写下了“下午三时应邀去水道街九号商定国大代表”几个字后，便让秘书转告警卫员修好汽车回来时，立即到水道街九号找他^①。

李兆麟来到这间国民党特务匪徒早已做了周密布置的房间，刚坐下喝了一口“茶水”，立刻发觉味道不对，原来敌人在茶水中投放了毒药。这时，室内潜伏的凶手们跳了出来。身材魁梧的李兆麟只身同敌人搏斗，他虽已被刺伤多处，还操起木椅奋力向敌人投去，但终因寡不敌众，跌倒在地。凶残的敌人又朝他的头部和胸部连刺数刀，李兆麟就这样惨遭国民党法西斯暴徒杀害。这位在东北战场上同日本侵略者奋战了十四年的民族英雄，没有牺牲在饥寒交迫的林海雪原和兴安峻岭之中，也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的松花江两岸和辽阔的黑嫩平原。他的

^① <东北日报> 追悼李兆麟宣传要点(1946年4月2日)。

征衣和背囊曾多次被敌人子弹打穿，都没有负伤。敌人以数万元伪币悬赏他的头颅，都成为狂言妄想，因此抗联战士当时都称他为“福将”。而今天，这位“救国救民精神惊天地，除敌除寇壮志撼山河”的民族英雄，却在抗战胜利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中。这怎不使一切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无比愤慨和悲痛！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哈市人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将李兆麟的遗体安葬在道里松花江畔一座公园内，并将这座公园命名为兆麟公园。哈尔滨解放后，又为李兆麟建造了墓碑，上刻：“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之墓”。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所：《东北抗日斗争史文件选编》第1、2辑。
2. 冯仲云：《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史》（1946年）。
3. 东北烈士纪念馆：《李兆麟卷宗》。
4. 尚志县党史资料卷：《珠河抗日根据地变化情况》。
5. 《珠河县委报告》（1935年4月4日）。
6. 《北满临时省委关于目前工作任务与工作意见给张寿篈的信》（1938年11月24日）。
7. 《北满临时省委给张寿篈同志的信》（1938年7月）。
8. 张寿篈：《关于北满部队活动的情况给参谋长许亨植同志并转北满省委负责同志的信》（1939年11月19日）。
9. 《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40年3月13日）。
10. 蔡近葵：《抗联斗争史片断》（1945年6月23日）。
11. 《英勇奋斗的东北抗联第三军》，载巴黎《救国时报》1937年9月18日。
12.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所：《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历史资料》。

13.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所：《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第十二支队历史资料汇编》。
14. 冯仲云、李延禄、冯基平、夏尚志、孙己泰、杨坚白、杨寿天、林郁青、杨一辰、王明贵、张光迪、王钧、李敏、宋兰韵、夏凤林、赵乃禾、杨长秋、李树香、李兆宾、金伯文、李玉等回忆李兆麟的材料或访问记录。

赵 一 曼

温 野

冲破封建网罗

著名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参加革命后用名一超，在东北从事抗日斗争时化名赵一曼。

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白杨嘴村^①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李鸿绪，曾花钱捐了个“监生”的功名，后自学中医，为乡里看病。母亲兰明福，操持家务，共生六女二男，一曼排行为七。她八岁入“私塾”，学习成绩良好。十三岁时父亲逝去，由封建思想严重的大哥李席儒和大嫂周帮翰管家。

这时，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了传播。一曼的大姐夫、革命青年郑佑之把当时的新思想带到了白杨嘴这个距县城一百二十多里的深山沟里。郑佑之也是宜宾县人，任柳家乡高等小学校长。他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家乡进行革命活动和发展团的组织工作^②，

①今宜宾县黎明公社赵一曼大队。

②郑佑之一九二六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川南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合川县委书记、四川省委委员，一九三一年末在重庆被捕，英勇就义。

经常给一曼讲述革命道理，启发她觉醒，帮助她冲破剥削阶级思想的羁绊和封建家庭的束缚，还把《向导》、《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送给她阅读。一曼被这些新书报吸引住了，她接受了新思想，眼界扩大了，渴望了解更多的革命道理。但管家的大哥大嫂却反对一曼阅读新书报。他们趁一曼不在屋时，把这些革命书刊搜出来，一把火给烧掉了。

一曼在家里自学受到哥嫂的限制，所以想离家到宜宾城里进学校读书。她向哥嫂提出后，遭到他们的反对。一曼忍受不了封建家庭对她的束缚，在郑佑之的帮助下，她把自己受压迫的苦痛写成一篇文章，题为《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用一超的笔名，发表在向警予主编的一九二四年八月六日出版的《妇女周报》上。她在文章中写道：“我自生长在这黑暗的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死把我关在那铁围城中，受那黑暗之苦。”“我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哥哥专横，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读书……请全世界的姊妹们和女权运动者，帮我设法，看我如何才能脱离这个地狱家庭，如何才能完全独立？”这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发表后，受到许多革命青年的声援和支持，当地团组织也同她建立了联系。

一曼在团组织和郑佑之的热情关怀与教导下，思想进步很快，一九二四年上半年由郑佑之和何 秘 辉用通信方式介绍，经成都地方团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①，

^①赵一曼入团的时间，从郑佑之的遗信看是1923年冬介绍、1924年上半年批准的，也有说她是1923年入团的。确切时间尚待进一步查证。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曼入团后，按照上级团组织的指示，积极在家乡开展宣传工作，准备建立团的组织和妇女群众团体。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白花场正式成立了团支部，一曼任支部书记。在团支部领导下，十二月十三日在曾家湾石板寺又召开了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大会，推选一曼的二姐李坤杰（团员）为会长，一曼名义上担任文书，实际负责会务工作。

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后，积极为妇女办事，受到妇女群众热烈拥护，会员很快发展到一百八十多人。妇女会还在白花场办了一所义务女校，贫苦农民的女孩子和成年妇女，第一次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一曼的革命活动，引起封建卫道者的仇恨。他们要李席儒对她严加管教，并尽快找个婆家嫁出去。在封建势力和兄嫂的压迫下，一曼在家里自学和开展工作都很困难。为此，上级团组织同意她脱离家庭，到城里去读书，团支部和妇女会的工作由李坤杰等人负责。一九二六年二月中旬，一曼趁哥嫂不在家之际，终于冲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进入宜宾县城，住到当时宜宾团地委机关所在地武庙街郑家院子里。从此，她踏上了新的革命途程。

参加学生运动

赵一曼到宜宾后，在团组织和团员郑秀石、郑兔如的帮助下，抓紧复习了数学、国文等课程，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考入宜宾女子中学（现宜宾第二中学）一年级二期第三班读书。在宜宾女中，她主动接近同学，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把

自己订的《妇女周报》送给大家看，还给同学们讲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和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现状。她说得悲愤激昂，同学们深受感动。大家觉得这个乡下来的姑娘很有见识，因而都和她亲近起来。她象一块磁石，把同学们紧紧地吸引和团结到自己周围，革命思想迅速在同学们中传播着。

一曼在同学们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她被选为女中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股长。五月四日宜宾学生联合会改组，一曼代表女中学生会参加学联，任常委，负责宣传工作。宜宾妇女联合会成立时，她又当选为妇联常委会主席。

这时宜宾开始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宜宾团地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宜宾特别支部，部分团员转为党员。一曼因政治上比较成熟，又担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的重要职务，也转为党员，同时担任宜宾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

“五卅”运动在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帝反封建浪潮。恰在“五卅”运动一周年的时候，宜宾的大奸商李伯衡贩运的英国煤油由英国籍货轮“川北”号从重庆运来宜宾。宜宾党团组织^①和叙府外交后援会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通过学联发动学生，掀起一个“抵制仇货”的爱国运动。

一曼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她按照党的指示，和其他党团员一起，积极在同学中进行宣传动员，说明贩运“仇油”就是帮助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一定要坚决抵制。六月九日学联通知各学校举行罢课，发动学生赶走这只“仇轮”，不许它在宜宾靠岸。一曼带领女中学生，冒着大雨

^①宜宾旧称叙府。

跑到南门外金沙江边盐码头，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们一起高呼口号，并向油轮投掷石块，使油轮不敢靠岸。李伯衡雇了几只小驳船，企图偷运油桶上岸。一曼和同学们发现后，鼓动搬运工人，把油桶扔到江里。李伯衡偷运不成，就买通城防司令辜勉之派兵镇压。辜勉之以“调节”的名义召开各界代表举行谈判，却乘机下令扣押了谈判代表。这件事激起了爱国师生的义愤，党团领导小组决定发动各界群众掀起全市性的反帝爱国斗争。一曼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码头工人、店员和市民也加入了游行行列，整个宜宾城都愤怒起来了。学联还用快邮代电，向省学联和全国学联总会发出呼吁，请求声援。辜勉之迫于形势，释放了被捕代表，所有“仇油”折价拍卖。学生的爱国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反动当局对带头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进行报复，下令把赵一曼等十三名女中学生开除学籍。党团领导决定组织“退学团”以示反抗。一曼正确执行了组织决定，领导女中中学部的三个班学生宣布退学，迁到禹王宫去住，并派宣传队上街讲演，散发传单，揭露反动当局迫害学生的罪行。

这时，北伐革命军已经打到了武汉，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宜宾，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公开成立，一曼当选为县党部第一届妇女部代理部长。我党用县党部的名义，在宜宾市将军祠（今市立医院院内）创办了一所中山中学，安置因参加爱国运动被开除和不满反动当局而自动退学、转学的学生。同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山中学正式开学，一曼进入该校女生部继续读书。开学后不久，正值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招生，党组织为了培养一曼，同意她去投考该校。一曼从此远离家乡，走向更广阔的革命天地。

在白区做秘密工作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曼考入设在原武昌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入伍生总队政治女生大队。她在军校的紧张生活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也进一步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但由于学习、训练劳累，三月间她原有的肺病又复发了，学校把她送进了医院。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曼听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非常气愤，不顾病弱的身体，从医院跑回学校，参加了军校学生编成的独立师，开赴纸坊前线迎击夏斗寅叛军。平叛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形势仍不断恶化，军校被迫停办。“七一五”以后，一曼按照党组织安排，脱下军装，转移到上海。九月间，党组织又派她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她被编入相当于中学水平的第六班，学生证号码是八〇七。在这里，她和在大学班学习的原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中共党员陈达邦接触较多，并产生了爱情。一九二八年四月间，他们结成了革命伴侣。

由于学习过累，一曼的肺病又加重了，而且怀了孕，身体非常衰弱。党组织考虑苏联寒冷的气候对她的病情不利，同时国内又急需妇女干部，便决定让她提前回国工作。一曼服从组织安排，离开莫斯科，于一九二八年冬回到上海。

赵一曼回国不久，党组织派她去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为进出四川转运文件和护送干部。一九二九年二月一日，一曼即将临产。可是就在这时，房东老太婆却撵她搬家，并把房门锁上不让她进屋。原来宜昌这一带有个风俗，妇女在哪里怀的孕，孩子就得生在哪里，不是在他们这里怀的就不能生在这

里，否则不吉利。赵一曼被房东撵出来，无处安身，眼看孩子就要生在街上。此时，隔壁一位好心的搬运工人收留了她，腾出自己的半间棚子，并让他的妻子护理接生，一曼才得以平安的生下孩子。她生了一个男孩，取个乳名叫“宁儿”。不久，因组织暴露，一曼抱着未满月的婴儿，坐船潜回上海。

同年秋，党中央又派她去南昌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一九三〇年一月下旬，因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到破坏，一曼深夜抱着孩子跑到郊外，钻进一个稻草垛里躲避。她想尽快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告组织被破坏情况，以便营救被捕同志。因此，天一亮便上了路。沿途讨水要饭喂孩子，晚上才走到赣江边。当时她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只得把陈达邦送给她的怀表拿出来做船钱，并经过许多艰险，才辗转回到了上海^①。

在紧张的工作中，她感到带孩子实在不方便。她同当时在党中央工作的陈达邦的堂妹陈琮英商量，决定把孩子送到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家里抚养。四月间，一曼去汉口，把孩子放在陈家。返回上海后，被分配在中央机关工作。此后，他们母子再也没有见过面。

奋战在抗日前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从事抗日斗争，赵一曼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九三二年春，赵一曼来到沈阳，在大英烟草公司和纺纱厂做女工工作。

^①赵一曼在白区工作材料，主要依据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保存的郑秀石、郑奂如等写的回忆录。

同年秋党又派她到哈尔滨，先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一九三三年十月又兼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她曾参加领导一九三三年春天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她还两次去海伦巡视工作，并与中共海伦县支部书记李辉、抗日游击队负责人孙玉久等一起，组织队伍袭击当地的伪自卫团，击毙团总国占山等十余人，有力地推动了哈北地区的抗日斗争^①。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赵一曼经常与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同志接触，还给他们讲过政治课。她自己有时也写些文艺性作品，在总工会办的地下刊物《工人事业》上发表。据熟悉赵一曼的方未艾回忆，她有一首题为《滨江述怀》的旧体诗，写得气势磅礴，充满革命豪情，读了使人振奋，深受鼓舞。这首诗的诗句是：“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②

一九三四年春，哈尔滨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省委决定赵一曼转移到外地工作。七月间，她到了哈尔滨东南山区的珠河（今尚志）县抗日游击区，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她在发动群众、建设和保卫珠河根据地、支援游击队打击敌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赵一曼来到滨绥铁路南的三股流根据地。东北农村的生活习惯和江南有很多不同，但她尽力克服各种困难，与群众打成

①张险涛：《赵一曼烈士在东北的抗日革命活动》，存赵一曼纪念馆。赵金镶：《海伦抗日游击队》，《海伦报》1982年5月22日。

②方未艾：《赵一曼在哈尔滨》，《哈尔滨日报》1982年11月14日。

一片。她一面在群众家里帮助妇女们烧火做饭、看孩子、补衣服，一面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很快把抗日妇女会组织起来，并领导妇女们给抗日游击队做军衣、军鞋，站岗放哨，送情报、运给养，支援游击队打仗。她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珠河县城，把地下党从伪军手里买的十几支手枪和一些子弹，装在大粪车里，巧妙地运到城外，用来武装游击队打击敌人。

一九三四年秋天，日寇调动大批兵力对珠河游击区进行疯狂的大“讨伐”。赵一曼的工作更加紧张，几乎整夜不睡地在各个村子里活动，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这时她的脖子上长了一块疮，疼得抬不起头来，由于敌情紧张，在群众家里住不下去，就到游击队的流动医院去治疗。这个医院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助手，伤员有十几个，没有固定住处，天天转移。赵一曼到医院后，主动地担负起医院的政治和护理工作，还帮助站岗放哨。有一次医院被敌人搜查非常危险，赵一曼机智地和伤员们躲到屯子边上一块刚割倒的大豆地里，身上盖着“豆铺子”^①，没有被敌人发现。

一九三五年春，县委决定派赵一曼任铁北区委书记。她深入到滨绥铁道北侯林乡一带，积极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在侯林乡组织起一支农民自卫队。她指挥这支队伍，在关门嘴子伏击了前来“讨伐”的日军，获得了胜利^②。这支农民自卫队越战越强，后来改编成地方游击连，有时配合赵尚志领导的东

^①割倒在地的豆秸，东北群众叫“豆铺子”。

^②据尚志县亮珠公社一曼大队社员张国臣、张殿坤、高奎文、温喜良等回忆，此次战斗打死一名日本军官和二十来个鬼子兵，缴获二十来支枪。这些回忆材料，存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赵一曼的档案。

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部队作战。同年秋，珠河根据地遭到敌人的残酷烧杀，三军主力部队向方正、勃利、汤原一带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县委决定将赵一曼带领的游击连编入三军一师二团，由她担任团政委，率领二团留在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的兵力。由于根据地被敌人破坏，部队的生活很艰苦，赵一曼特别关心和爱护战士。一到休息时，她就一边给战士们缝补衣服，一边和大家谈心，讲革命斗争故事，鼓舞战士们的斗志。战士们都很尊敬她，爱戴她，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

负伤被俘坚贞不屈

由于敌人的疯狂进攻，二团所处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困难。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赵一曼和团长王惠同带领五十多名战士在铁北左撇子沟附近被敌包围。我军虽英勇奋战，击毙日伪军三十多名，但自己也受到很大损失，突围时队伍被打散，王团长负伤被俘，赵一曼左手腕受伤。她和铁北区委宣传部长周伯学、战士老于、十六岁的妇女会员杨桂兰及交通员刘福生等五人，潜入小西北沟一间空房子里养伤。后被特务探知。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敌人包围了他们的住地，战斗中老于和刘福生牺牲，赵一曼左大腿骨被打断，昏倒被俘。敌人抓来两名群众，用一架梯子把她抬下山，然后换了一辆牛车运往县城。赵一曼躺在车上，棉裤都被血浸透了，大车每颠一下，伤口就是一阵剧痛，但她紧咬着牙不呻吟一声。车进城后，赵一曼抬起头，对街上的群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

敌人把赵一曼和杨桂兰临时关在伪县公署警务科里。赵一曼叮嘱杨桂兰，让她只说是赵一曼找她来侍候伤员的，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一切都由赵一曼承担。敌人查不到实据，在关押了二十八天后，小杨终于被释放出去。

当时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正在珠河县谋划搜捕我抗日人员，他见赵一曼伤势很重，怕她很快死去，就连夜进行审讯。赵一曼编造了一些话回答敌人。而当大野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时，她忍着伤痛，义正辞严地痛斥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中国人民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①大野没问出口供，就不断地折磨赵一曼，用马鞭子抽打她左腕的伤口，又用鞭杆狠戳赵一曼腿部伤处，赵一曼疼得死去活来。但不管敌人怎样威逼利诱，她丝毫没有动摇。每次审讯，她总是坚决地回答敌人说：你们不用多问了，“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会逮捕我们为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运动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②敌人感到对赵一曼这样坚强的人用刑是不会得到什么的，于是便加紧刑讯其他被关押的人，这才初步认定她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对这样一个重要人物敌人怎肯轻易放过！五天后，她被带到哈尔滨，关押在伪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看守所里。

①大野泰治：《日本侵略者杀害抗日英雄赵一曼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第89页。

②《满洲日日新闻》（日文）1936年5月20日。

逃走和再次被捕

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研究了大野审讯赵一曼的情况，知道赵一曼腿部伤口已经溃烂化脓，生命垂危。为了得到重要口供，他们于十二月十三日夜里把赵一曼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①监视治疗。为赵一曼治伤的张柏岩^②，是一位有爱国思想的医生，他对赵一曼的治疗特别认真。三个多月后，赵一曼的腿伤好转，已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敌人见她伤势好转，为了便于审讯，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旬，把她从人多的大病室转移到单人的第六病房二号室。赵一曼感到这个环境很有利，想利用这一条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同情者，万一有机会还可以逃出敌人的魔掌，继续从事抗日斗争。

赵一曼根据几个月的观察和接触，认为三个看守警察中，老实正派、有民族感的董宪勋是可以争取的。于是她便主动和他谈话，激发他的爱国心。赵一曼向他讲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事迹和革命道理，经过二十多天的时间，终于把他争取过来。同时，赵一曼对看护她的女护士、十七岁的韩勇义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很快也把她争取过来。然后他们三人到一块，誓约一定共同行动，一切听从赵一曼指挥。

这期间，敌人又对赵一曼进行审讯，不断地毒打她，折磨她。但赵一曼仍旧没有低头。她的坚强精神深深地教育着韩勇义和董宪勋，他们更加关心她，爱护她，决心帮助她早日逃

^①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部旧楼。

^②张柏岩建国后任哈尔滨市卫生局长、副市长，已逝世。

走。经过周密的研究和准备，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夜里，韩勇义和董宪勋把赵一曼背出医院后门，坐上雇来的小汽车，开到郊区文庙附近。下了车，赵一曼又坐上了事先等在这里的小轿子，于第二天早晨来到阿城县境内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董元策家里。经董元策帮助，当夜他们又坐上该村群众魏玉恒的马车，奔往山区寻找游击队。

六月二十九日早晨，敌人发现赵一曼逃走，立即撒开人马四处搜查。他们知道赵一曼腿伤未好不能步行，必定得坐车，于是对汽车、马车加紧盘查，总算找到了送过赵一曼的白俄司机。按照这个白俄司机的供述，特务又调查了道外轿铺的轿夫，终于知道了赵一曼逃走的方向。六月三十日早五时，赵一曼等乘坐的马车来到离游击区只有二十多里的李家屯（一说王永汉屯）附近，被敌人追上。刚离虎口的赵一曼，又落入了敌人魔掌。

从 容 就 义

赵一曼等被带回哈尔滨，关进市警察厅刑事科的拘留所里（今东北烈士纪念馆院内）。警察厅特务科的日本大特务、特高股长林宽重（外号林大头）亲自出马审讯赵一曼。凶手们施用了各种酷刑：用铁条刺她腿上的伤口，往她的嘴里灌汽油和辣椒水，……但赵一曼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受赵一曼影响教育的董宪勋、韩勇义，被捕后也都表现得很坚强，董宪勋受刑过重死于狱中；韩勇义在被审讯期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后被判了徒刑四个月，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期满出狱。

经过一个月的审讯，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七月末，伪滨江省警务厅决定把赵一曼送回她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八月二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心情反而更加平静。敌人在一份“报告”材料中记述了赵一曼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情景：

“在押送的中途，她虽然感觉到死亡迫近，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反而透露了‘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口吻。她希望给她的一个儿子写一遗言，从押送的职员处要了笔纸，写了如下的反满抗日之遗言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①

到了珠河县，敌人把赵一曼又放到一辆马车上“游街”，

^①敌伪档案：1936年8月11日伪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逃走前后的状况及其死》的报告。

妄图以此威胁我爱国群众。为了鼓舞人民的抗日信心，她激昂地唱起了《红旗歌》：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高高举起呀！血红旗帜，誓不战胜，终不放手。……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在小北门外敌人刑场上，人民的好女儿、杰出的爱国者赵一曼壮烈地牺牲了。她热血洒地，壮志烛天，以三十一岁年轻的生命火炬，为子孙后代照亮了永远前进的征程。

人民怀念赵一曼，永远赞颂女英雄。新中国诞生后，赵一曼的英名传遍全国。她的光辉事迹首先陈列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哈尔滨人民把她战斗过的一条主要街道“山街”，改名为一曼大街，以志永久纪念。朱德、宋庆龄、董必武、何香凝、陈毅等许多老革命家都为赵一曼题过词。郭沫若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也为纪念和歌颂赵一曼题写了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章：

蜀中巾帼富英雄，
石柱犹存良玉踪^①。
四海今歌赵一曼，
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

①此句指明末清初四川省石柱县抗击过清兵的女将秦良玉，是与赵一曼烈士相比拟也。郭老又解释说：秦良玉和赵一曼不能划等号，因秦良玉有消极的一面，打过农民起义军。

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首，
珠河亿载漾东风。

作者附记 本文除注明出处者外，主要参考以下资料：

1. 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的档案资料；
2. 东北烈士纪念馆有关赵一曼烈士生平事迹的全部档案资料；
3. 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的回忆材料；
4. 赵一曼的领导、同学郑则龙、邓可非、郑秀石、郑英如、甘棠、谭勤先、陈德芸等的回忆材料。
5. 郑佑之烈士的书信；
6. 赵一曼烈士的遗文；
7. 有关的敌伪档案、报纸。

杨 超

孙自诚 刘勉玉

(一)

杨超，字天真，号北海，一九〇四年十二月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南乡杨家店一个地主家庭。襁褓中，随家迁居江西省德安县木环垅孙家榨。

杨超八岁开始读书，先入木环垅陈氏私塾，一九一八年后因私塾失火而转学于德安县城郭氏私立沈毅小学。他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却同情劳动人民，并富有报国思想。在私塾读书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莫教桑麻困后人，
浮云富贵不如贫；
男儿志在安天下，
破旧河山再造新。

一九二一年，杨超毕业于德安沈毅小学^①。当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地大物博，为何不富不强，盖因未得改革之

^① <江西德安郭氏沈毅学校一览> 专刊。

道，我当竭力于此奋斗。”他怀着富国强民、改造社会的愿望，进入了南昌心远中学求学。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省城南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逐步深入，各种进步书刊广为流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各种报告会、讲演会和辩论会接连不断。杨超来到南昌后，内心感到无比兴奋。为了追求真理，他常常手不释卷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并热情向有志青年做宣传。他不但勤于阅读，而且坚持写学习日记，每日一篇，每月一册，几年间共写四十余册。通过刻苦学习，他逐步树立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

一九二一年，南昌二中学生袁玉冰、黄道等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改造社。改造社的宗旨是“改造社会”，“要使这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①改造社出版的《新江西》杂志，猛烈抨击旧文化旧思想和封建礼教，热情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江西先进青年中影响很大。方志敏和杨超等革命青年都先后参加了改造社，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尽管杨超“在校的成绩素为一般教员同学称许”^②，可是中学未及毕业，就被学校以“学潮中的滋事分子”的罪名开除了学籍。

一九二三年秋，杨超和友人何奎光、扶国权等奔赴南京，转入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附属中学。此时南京已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主动争取党团组织的教

① <创刊宣言>，载 <新江西> 第1卷第1号。

② 星月：<我们的死者——悼袁玉冰、杨超等>，载 <布尔什维克> 第75期，1928年7月10日。

育与帮助，思想进步很快，并于同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三年四月，由于反动军阀的迫害，改造社的负责人、共产党员袁玉冰被捕入狱，《新江西》被迫在南昌停刊，赵醒侗、方志敏等不得不转移上海，改造社在江西的革命活动遂告中断。十月一日，旅居上海、南京等地的二十余名江西先进青年和改造社社员，在南京创办了《新江西半月刊》，揭露批评政治社会状况，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新江西半月刊》第六期上，刊载了杨超写的《改造中国的一条大路——革命》一文，用事实尖锐地驳斥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荒谬主张。文章指出：“所谓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实业救国以至基督教徒们所谓人格救国，都是空话，都不足以救目前的中国。”他沉痛地写道：“事势既然已经这样危急，我们如果还采一种缓进手段，恐怕我们还没有动手而中国早已要沦亡了。”他认为拯救中国的唯一方法就是革命。他说：“现在唯一的急图，不是静坐空谈，而是要立起脚来，伸开拳头，大踏步地向前干去。干！干！干！”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大。它代表了江西广大革命青年和改造社社员对如何改造社会的主张和认识，表明了他们奋斗的方向。

一九二五年春，杨超参加了反对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学生运动——倒郭运动。由于郭秉文与盘踞南京的北洋军阀齐燮元相勾结，拥护段琪瑞执政，反对孙中山北上，所以南京的党组织与国民党左派就在东南大学发起了一个打倒郭秉文的运动，提出要国民党左派人士来当校长。那时，国民党左派也处于隐蔽状态。杨超作为秘密的国民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东南大学共产党人宛希俨的直接领导下，勇敢地投入了

这场政治斗争。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杨超结识了著名的革命宣传家和活动家恽代英、肖楚女。在他们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杨超积极地投身于这一伟大的反帝爱国斗争，“席不暇暖，奔走不息”^①。经过这场运动的锻炼和考验，杨超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当时东南大学的反动势力根深蒂固，倒郭运动最终失败了。但郭秉文也被迫离开了学校。杨超出于革命义愤，准备和同志数人一起离开学校，到革命风气盛行的北京大学就读。因为杨超的学习成绩冒尖，学校多方挽留，但杨超等仍坚持要走。校方又用扣发转学证的办法来刁难，杨超说：“你们不发转学证是违法的。发转学证，我们走，不发转学证，我们也要走。”最后，学校当局被迫发了转学证，杨超便到了北京大学。

在北大，杨超努力阅读马列主义书籍，聆听李大钊讲授革命理论，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北京的工人运动和學生运动。后来有人回忆说：他“每夜深冒寒回寓，不以为苦，革命情绪益烈”^②。“杨超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办平民夜校，以此在平民中扩大革命思想影响，他还和任卓宣合编了一本《平民千字课》”^③。

一九二五年暑假，杨超按照党的指示返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他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就是先革自己地主家庭的命。他家雇有十多个长工。他站在农民一边，反对家里虐待长工，要

①星月：《我们的死者——悼袁玉冰、杨超等》。

②朱企震：《回忆杨超》，藏江西省烈士纪念堂。

③胡风：《杨超在北京大学》，藏《德安县志》办公室。

求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还教育家里人说：“我们是人，长工也是人，不能这样虐待长工，以后应该让人家早些休息。”他还和长工们一起干活，长工们都很喜欢他。与此同时，他又向家人宣传革命思想，帮助他们转变立场，要他们支持和赞助革命。在他的教育下，他的四叔杨丕显捐钱支持他办起了“农民夜校”。

“农民夜校”招收长工和贫苦农民入学，杨超供给纸笔油灯，自任教员。他教他们识字、打算盘，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有一次，他用粉笔写了十个大字：“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然后教大家一个字一个字地认写，并要求大家懂得其含义。长工陈太康说：“太阳晒背，暴雨淋头，千辛万苦，得来粮食真艰难。”杨超说：“讲得对，但讲得不深。”接着，他用许多实际事例讲了地主阶级如何剥削压榨农民，说明农民穷困的阶级根源，最后号召大家起来实行彻底的革命，“打倒不合理的封建制度，打倒列强除军阀。”贫苦农民觉得他讲得在理，都说：“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见识多，他讲的话不会错。”在杨超的教育、引导下，在夜校学习的许多人，后来都参加了革命，成为德安农民运动中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骨干。杨丕显也背叛了封建地主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并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年冬天，杨超又从北京回到德安度寒假。在中共德安支部的领导下，他来到柴炭工人最集中的木环垅，在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组织了德安最早的一个工会——德安柴炭工人工会。在杨超的指导下，柴炭工会组织工人开展了反对军阀和豪绅地主的斗争。有一次，军阀部队来买炭，不但不付炭款，反

而无故殴打工人，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工人们便在工会领导下拒绝给军阀卖炭。军阀暗中勾结豪绅地主封山，禁止工人烧炭，妄图以此断绝工人的活路。组织起来的工人，不顾封山禁令，团结一致去砍柴烧炭。与军阀相勾结的豪绅地主熊子爱到县衙门告状，工人们据理驳斥，县官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开山放禁，准许工人们进山烧炭。这是杨超组织德安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一个胜利。

（二）

一九二六年夏，杨超根据党的指示离开北京大学，返回江西专门从事革命活动，任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委员。此时，中共德安支部因领导青年学生反对大劣绅、“保卫团总”郭守贞贪污旱灾救济款的斗争而暴露，敌人到处搜捕“赤色分子”，支部同志不得不疏散到外地甚至外省，德安党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江西地委遂派杨超回德安，恢复党的组织。他回到德安后，立即与在外地读书回乡度假的共产党员何奎光、袁亚枚、扶国权、甘霖沛等取得了联系。七月间，中共德安支部在木环垅重新组成，杨超任支部书记，何奎光为组织委员，扶国权为宣传委员。

中共德安支部恢复以后，根据北伐战争已经开始的新形势，提出“坚决打倒军阀和贪官污吏，拥护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行动口号，领导德安人民支援北伐战争，迎接革命高潮。杨超先前在木环垅组织的贫苦农民互助互济的“农业会”，此时改名为下木堡乡农民协会，选举陈太康为农会主席，开展农民运动，策应北伐军。

德安地处南浔铁路中段，南连南昌，北接九江，交通便利，地势险要。占领德安，对控制南浔铁路和整个赣北战场，关系极大。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和十一月三日，国民革命军两次攻克德安，都与杨超发动德安人民的积极支持分不开。在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一次攻打德安县城以前，杨超在河东砖瓦窑铁路棚召开工人和农民积极分子会，组织了侦察队与运输队。进攻县城时，杨超又派陈太康、杨丕显等带领群众在益南、九仙岭一带破坏铁路，锯断电线杆，阻滞敌人在南浔铁路上的兵力调遣，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络，为北伐军打下德安起了积极作用。几天以后，由于赣北战场形势的变化，北伐军撤出德安。十月二十七日，北伐军向南浔线发动第二次攻势，中共德安支部又派三个同志去武宁县箬溪与第七军政治部进行联络，担任向导，带引北伐军于十一月三日再度胜利地攻占了德安县城。

国民革命军第二次攻克德安后，德安党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为了扩大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政权，杨超在上级党的指示及第七军、第六军党的负责同志的协助下，很快地安定了人心，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曾率部在德安驻防一月之久，经常与杨超一起商讨德安党组织的工作及地方政权建设等问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德安县公署成立，由共产党提名，推选当时表示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肖文楼为德安县县长。接着，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组成了中国国民党德安县党部，杨超任监察委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同年十二月召开了中共德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德安县委委员会，杨超被选为县委书记。在杨超的具体组织领导下，紧接着成立了共青团德安县委、德安县农民协会、德安县总

工会、德安县妇女解放协会等革命群众团体，还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等地方武装。德安县的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向前发展。

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全国工农运动高涨的形势下，杨超特别重视德安的农民运动。为了给德安农民运动培养干部，杨超曾先后派人到广州和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与方法。他自己经常深入各乡讲演，揭露豪绅地主压迫农民的罪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讲演时，他理论联系实际，语言生动，吸引了广大听众。每当他讲到工农如何受剥削受压榨的时候，农民们听得流泪，而当他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时候，听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德安的许多土豪劣绅，如张肇桓、李子美、邱正增、王锡筹等，有的被抓来游街游乡，有的被投入监牢判罪，昔日的体面威风，一扫而尽。在农民运动的高潮中，杨超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一次去封锁官僚地主资本家袁子辉的住宅，有些群众有顾虑，他挺身而出，大声说：“怕什么？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还算什么革命？”贫苦农民称赞说：“杨超是我们的带路人”。德安有名的劣绅张肇桓，每年把持乡村中的祠堂庙产，侵吞劳动人民的果实，还无耻地说：“我这个在家的和尚未饱，你出家的和尚可别想吃一粒谷子。”杨超便派县委委员去发动群众，强迫张肇桓把几年来侵占的谷子如数交出，打击了豪绅地主的嚣张气焰。

杨超在开展德安农民运动的同时，又积极领导了德安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他常常深入到南浔铁路工人和码头工人中，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开展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他重视培养妇女干部，在德安办了妇女工读学校和女子青年社，并亲自担

任政治教员，向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宣传男女平等，提倡剪发放脚。为了开展妇女运动，他首先要自己的爱人李竹青带头剪发放脚，学习文化，出门开会，有力地推动了妇女参加革命斗争。不少妇女经过学习和斗争的考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成为全县妇女运动的骨干。

杨超善于做群众工作。他把德安的小商小贩组织起来，成立德安县商民协会和商民自卫团，派自己亲自培养介绍入党、在小商小贩中有威信的李清涛去任商民协会主席。接着，将全县各行各业的商业人员编成小组，进行教育，支援北伐战争，并在商民中开展反对大资本家郭美贵、邱正堦等人的斗争，从而使党的工作在商民中也得到了开展。

杨超很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干部。他常说：“革命的人，要有革命的人生观。要有革命的自豪感，要下决心将脑子里的反动的旧的脏的东西清洗出去，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装进来。对问题，眼光要放远些，嗅觉要放灵敏些，立场要放坚定些，多加分析，不能人云亦云。”^①在他的教育下，许多同志进步很快，成为德安早期革命活动的中坚力量。象何奎光、陈太康、甘霖沛、扶国权、李清涛、袁亚枚、杨丕显等，都是党的好干部，均先后为革命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德安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刘修竹等立即撕下了假面具，跟着

^①宋昌杰：《回忆杨超同志》，见德安县党史资料档案。

叫嚣要反共。杨超根据省委指示，及时地领导德安人民进行反蒋斗争，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五月一日，在德安县城召开了群众大会，杨超在会上怒斥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的行径，愤怒声讨蒋介石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号召德安人民起来反对蒋介石。会后，德安人民群众举着旗帜，拿着梭标，唱着“蒋介石是个大怪物”的反蒋歌曲，高呼着“打倒屠杀工农的刽子手蒋介石”的口号，举行反蒋示威游行。示威群众还拦住开往南昌的列车，在列车上张贴“打倒蒋介石”的标语，由青年学生组成的宣传队进入车厢，发表演说，散发传单，让旅客们把德安人民的反蒋怒吼带到南昌、上海等地。当晚，德安又举行了盛大的反蒋火炬游行。长长的游行队伍象一条火龙，农民们放土炮示威，显示了德安人民反蒋的力量和决心。紧接着，中共德安支部又领导全县人民斗倒了右派县长肖文楼^①，使德安的反革命活动一时消声匿迹。

六月五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在南昌宣布“礼送共产党人出境”，不许共产党人在江西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形势急转直下。党内有一部分人面对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产生了右倾动摇情绪。为了应付这一严重局面，保存革命力量，克服右倾动摇情绪，七月二十一日，中共江西省委在南昌松柏巷女子师范召开了江西省第一次党代会，杨超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他对党内的右倾错误极为愤慨，对右倾表现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会上，杨超被选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会

^①肖文楼是由于标榜拥护三大政策而上台，此时看到蒋介石的力量占上风，就跟着蒋介石反共。

议结束后，杨超立即返回德安。七月二十五日，他主持召开了中共德安县第二次党代会，贯彻省党代会精神，讨论时局应变问题。他着重指出，国民党已经背叛了革命，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和他们坚决斗争。他要求代表们向全县群众做宣传，及时注意时局变化和准备应变。当天晚上，杨超便将县委撤出县城。由于时局越来越紧张，杨超复于三十一日晚，在漚（音饭）塘寺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采取了应付时局的紧急措施，使德安的党和革命力量没有遭到严重破坏。

“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德安，杨超领导县委组织的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起义的伟大意义，到处张贴“欢迎起义军”、“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坚持斗争，举行武装反抗”等标语，积极声援了“八一”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德安和全国一样，白色恐怖严重。反动派在城乡进行反共宣传，四出张贴悬赏捉拿杨超的通缉令。杨超的四叔杨丕显等共产党员被捕，惨遭杀害。但杨超没有被吓倒。他带领德安的共产党人转入农村、山区，开展武装斗争，在木环垅、永丰桥一带，组织了贫雇农三十余人，拿起北洋军阀部队丢下的七条长枪和十支短枪，在铁石山组成了德安农军，举行武装暴动。德安农军和数千农民曾一度包围了县城伪县公署。伪县长吓得紧闭城门，龟缩在衙门里不敢出来。伪省政府闻讯，立即派一连士兵乘火车赶来进行弹压，但士兵们也被农军和农民的力量吓跑了。从此，德安农军活跃在铁石山一带，多次给敌人猝不及防的打击。后来，这支农军编入了红军赣北游击队。不久，杨超奉命去武汉参加一次党的重要会议，接受新的任务，前往河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杨超以党的特派员的身份返回江西进行党的工作。他从武汉乘船东下，二十三日到达九江，德安县委委员甘霖沛前去迎接。战友重逢，分外高兴。当晚，两人在旅馆共睡一床，倾诉惜别之情。甘霖沛说：“老杨啊，自你走后，反动派天天叫喊要消灭共产党，并说谁拿到你的头，就给光洋一千元，你的头为什么这样值钱？”杨超笑着回答说：“共产党人的头不值钱，难道反动派的狗头值钱？告诉他，共产党人的头，象泰山一样，千金难买。”^①第二天，杨超由甘霖沛护送，准备乘火车先到南昌参加省委会议，然后再返德安开展工作。杨超走在前头，甘霖沛挑着行李走在后面，两人保持一段距离。当行至九江招商局码头时，杨超被德安的反革命分子袁兴烈一伙发现。这些家伙立即追踪杨超不放，但并没有注意到后面的甘霖沛。为了让甘霖沛脱险，杨超毅然往前奔跑，把敌人全部吸引到自己身边。他就这样被捕了。

反动派抓到杨超以后，如获至宝。上海《民国日报》立即发表消息，大肆宣传：“据确实消息，江西德安共产党首领杨超等，最近由鄂潜赴赣省，希图扰乱，业在九江就捕……。”^②德安的反动派为了请功，马上将他押送国民党南昌卫戍司令部军法处。一路上，杨超泰然自若，并向押送他的国民党士兵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的罪行，指出国民党当兵的怎样受当官的压迫。“士兵们听后都哭了，还给他纸烟吸”。他说：“我不吸烟。我们共产党为人民，死一个人不要紧，可是我们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存在的”^③。到了南昌

①彭峰：《脱险》，载《德安县革命烈士传》第70页。

②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27日。

③陈太福的回忆，存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

火车站，他一下车又向群众做宣传。群众说：“杨超胆真大，到这时候还宣传共产党。”在监狱里，敌人对他严刑拷打，用火烧，用电触，企图迫使他投降变节。在敌人的酷刑面前，杨超无所畏惧，坚贞不屈。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午后四时，杨超和江西著名的共产党人袁玉冰、王环心、谢率真一起，被敌人枪杀于南昌德胜门外下沙窝^①。临刑前，杨超高声朗诵：

满天风雪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
三年归报楚王仇。

杨超这首就义诗，充分地体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气概。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新江西》第1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第1卷第3号（1923年1月15日）。
2. 《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3.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4. 《杨超烈士传略》，见《不朽的革命战士》，江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5. 《党的儿子杨超同志》，见《德安县革命烈士传》，中共德安

^① 《申报》布告，1927年12月30日。

县委编印。

6. 《德安地方革命史料》1—8期（内部刊物），中共德安县委革命史编委会编（1960年—1961年）。
7. 江西省土改展览会有关杨超材料，存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
8. 烈士父亲杨彩青及陈太福、朱企霞的回忆材料，存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
9. 《德安县革命烈士传》中杨丕显、郭家彬、陈太康、甘霖沛、何奎光、李清涛、扶国权传略。
10. 《德安县人民革命史》，中共德安县委编印。
11. 《江西人民革命史资料》，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12. 访问徐先兆、朱企霞、杨彩青、杨一平、杨裕胜、熊锄辛、童善彬、宋昌杰、杨爱金、王虚琼、陈太福、邓炳秀、易凤玉、刘修业、胡风、杨德昶等的谈话记录。

陈 浅 伦

胡民新 范均升 刘国元

陈浅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红二十九军和陕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一九三三年四月三日英勇就义。

(一)

陈浅伦，原名典伦，又名陈潜，字徽五，陕西省西乡县廷水竹园子人。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二日生于一个濒于破产的地主家庭。

陈浅伦的父亲陈敦行，一生在家务农，并兼行医，虽为绅士，但不愿踏入军政界。他为人敦厚、和蔼，在行医之中，不论患者有钱无钱，只要上门求医，从不拒绝，加之医术较高，因而深孚众望。母亲姚氏，出身农家，操持家务。由于军阀混战，土匪蜂起，地主豪绅之间明争暗斗，家庭生活并不安定，时有被人吞并的危险。为了维持家境，父亲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浅伦身上。一九一一年，浅伦开始在计家塆私塾启蒙。浅伦从小练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每逢年关或遇婚丧大事，有钱人请他作画写字，均为他拒绝。但他却常在街道的墙壁上画些乌龟、螃蟹之类的东西，借以讽刺作威作福的官僚、恶霸以及他们的爪牙。浅伦对穷人十分同情，逢年过节或遇婚丧之事，

时常主动用平时积下来的钱买纸写对联或作画送给他们，因而受到穷人的喜爱。

一九二一年，陈浅伦考入城固县天明寺高级小学。他聪颖好学，不仅熟读了“四书”、“五经”，还阅读了许多进步的书籍，初步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一九二一年，他在《实业救中国》一文中写道：“今天下之人，由务虚名而不求实际，飭于外而不善其内者大抵皆沽名钓誉之流也。且观居高位享大禄果皆为干城之寄乎？胡为盗起而无策，待之割地求和……。”猛烈地抨击了旧中国的昏庸腐败，主张以“实业救国”来挽救国家的灭亡^①。

（二）

一九二四年春，陈浅伦离开家乡，考入省立汉中第五师范。在这里他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

一九二七年二月陈浅伦考入西安中山学院。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建立的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陈浅伦入农运班。在党的教育下，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进化史、经济学概论、中国政治状况、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史等课程，阶级觉悟有了提高，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七年六月，由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开始反共，中山学院被解散，陈浅伦回到家乡。他深入西乡城关、杨河等地，

^①陈浅伦：《实业救中国》（1921年），抄本存陕西汉中汉台博物馆。

在农民中宣传新三民主义，控诉帝国主义侵华的暴行，鼓动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陈浅伦的革命活动，打破了豪绅地主的酣梦，于是遭到西乡地主豪绅阶级的强烈反对。他们联名诬告陈浅伦聚众闹事，图谋不轨，并企图暗中谋害陈浅伦。于是他不得不再次离乡，赴上海劳动大学就学。

在上海劳动大学，陈浅伦继续受到党的教育。通过学习，他较多地懂得了马列主义，深刻认识到，在中国，任何改良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只有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打倒蒋介石，中国才有出路。从此他坚定地树立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自己一切的决心，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〇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武装起义，陈浅伦也参与了宣传工作，因消息泄漏，他和许多同志被捕入狱。在敌人酷刑面前，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敌人无可奈何，只好将他释放。一年的铁窗生活，使他受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

一九三一年春天，党派陈浅伦回西北地区工作。到西安后，他担任了《西北文化日报》编辑，主编“浪涛”副刊，并在西安乐育中学任教，以掩护革命活动。在此期间，他还根据党的指示，先后办了两期讲习训练班，为党培养了干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陕西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年十月，数千名学生在陈浅伦等的带领下，手举抗日旗帜，高呼救亡口号，进行游行示威，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揭露国民党省党部破坏抗日救亡活动，使抗日救亡运动在古城西安蓬勃兴起。

(三)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陈浅伦回陕南任陕南特委书记。当时陕南特委建立不久，又遭到一次严重破坏，特委领导人大多离开汉中地区，个别人还动摇当了叛徒，广大党员思想混乱，各地组织也未完全恢复。陈浅伦回到陕南后，首先与特委其他同志一道努力恢复和健全党的组织，进行组织整顿，并把党的中心工作由城市转入农村，从而使党的组织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为了解决农民的迫切问题，陕南特委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抗粮、抗捐、抗拉夫的斗争。在特委领导下，一九三二年上半年，部分农民组织起来，在廷水、私渡河地区杀了罪大恶极的伪团总刘传兴等恶霸地主三十余人，打死了催粮委员数人，没收地主土地一万七千八百余亩，粮食一千二百余石，从而助长了人民的志气，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同年八月，陈浅伦和特委同志在张家坝、潘家坝先后召开干部会议，鼓励干部深入群众，发动群众，进行广泛地抗粮、抗捐、抗拉夫，使陕南的“三抗”斗争达到高潮。

在此期间，陈浅伦还利用他担任共立中学训导主任、兼任女师教员的身份，深入学生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学运斗争。陕南特委还翻印了大量革命理论书籍，供学生阅读；并组织进步师生在各校出版进步刊物，如五中的《前驱》、城固的《乐园》、洋县的《春雷》等。陈浅伦还亲自给一些刊物写稿，宣传革命理论。他在《孤灯》的发刊词中写道：“孤灯，孤灯，如日东升，打破黑幕，放出光明，警醒

了劳苦群众，准备武器，向敌人进攻！”由于从各方面进行了宣传，青年学生受到革命的鼓舞。一九三二年三月，城固学生集会纪念孙中山逝世七周年，陈浅伦在大会上讲话，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的罪行。会议正进行时，国民党当局派人捣乱，企图破坏会场，激起学生们愤慨万分，会后在陈浅伦率领下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捕捉了县党部书记长，并令其拿上大烟枪游街示众，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同年五月，陕南特委又在学界发动了“红五月斗争”，组织了汉中地区十三个学校千余学生的大游行。游行后，学生群众又在陈浅伦等带领下，捣毁了妄图镇压学生运动的公安局，赶走了反动局长谈栖山。

学生们的行动，震惊了反动当局。一九三二年六、七月，绥靖司令部调来大批军警镇压学生运动，搜捕进步教师和学生。陈浅伦不幸再次被捕。在狱中，敌人严刑逼供，他受尽折磨，但却一再鼓励大家坚定革命信心，坚持对敌斗争。在他的领导下，难友们团结一致，始终坚持斗争，直到取得很大胜利。他在狱中写了“给妈妈的十二封信”，充分揭露了反动派的惨无人道。由于学生们不断斗争和各方的营救，特别是反对克扣囚粮绝食斗争的发展，敌人深恐再次激起陕南人民更大的反抗，不得不释放了陈浅伦和其他被捕人员。

（四）

陕南特委自一九三〇年秋建立以来，就注意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的问題。陈浅伦到陕南特委后，更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四月，特委按照省委的指示，在陈浅伦主持下，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讨论，作出了创建革命根据地

和红军、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决定在川陕鄂接壤的西乡骆家坝一带创建根据地。会后，陈浅伦和早在那里开辟农村工作的刘传壁去西乡张家坝、骆家坝一带串联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了解当地情况，组织革命力量，准备发动农民武装起义。为了扩大革命力量，他不仅重视武装农民，而且深入到当地的神团组织中进行活动。经过陈浅伦等同志的艰苦工作，一支革命队伍逐步建立起来了。九月，陈浅伦带着这支有七百人枪的队伍，前去袭击陕南国民党驻军严沛霖部。因叛徒告密，消息走漏，队伍在中途遭到民团截击，刘传壁等遭敌杀害。这次武装斗争虽遭失败，但它为后来红军和游击队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红四方面军入川，路经西乡的私渡河、廷水、骆家坝、钟家沟一带时，这里的群众运动又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陈浅伦受特委之托，立即和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系，研究商讨了在陕南重建革命军队问题，得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持。四方面军当即抽调了部分枪枝弹药，并派吴述甫等十余名干部来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由陕南特委直接领导，一支近千人的游击队就很快建立了起来。经过整顿、改编，这支队伍逐日扩大，以后就命名为川陕边区游击队。川陕边区游击队的建立，标志着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阶段。为了加强游击队的领导，党中央和省委派来李艮、王大舜（刘瑞龙）、孟芳洲等人，四方面军又派来张显忠、陆树华等四十余人，充实了部队的骨干力量。第二年初，又在部队中吸收了一批成分好、立场坚定、斗争勇敢、工作积极的同志入党，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从而保证了这支队伍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

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特委进一步作出了“扩大西乡、城固新区，建造红二十九军的决议”。为了贯彻特委决议，陈浅伦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深入伪民团内部进行活动，利用他们和军阀的矛盾，争取他们投诚，借以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同时抓紧对游击队进行整顿，并发动农民群众积极参加这支部队。经过紧张的工作，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正式成立，陈浅伦被任命为红二十九军军长，李艮任军政治委员，王大舜任军参谋长，陈子文任军政治部主任，孟芳洲负责军事指挥部及苏维埃工作。红二十九军下辖两个团、六个营、十六个连共计八百余人，并成立了军党委。从此，一支新的红军在陕南正式诞生了。

陈浅伦在省委派来的李艮等帮助下，针对部队成分复杂、作风不纯问题，作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主动批评了不依靠群众而搞单纯收编的思想，纠正部队内部存在的军阀主义作风；在部队内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设立了连队政治指导员，清除了一些混入革命队伍中的不良分子；还规定了部队不得奸污妇女、不拿群众东西、住民房要搞好清洁、不打人骂人和拉夫等纪律。对于违犯纪律和损害群众利益的人，他坚决执行纪律，毫不留情。

陈浅伦积极贯彻民主建军原则，实行官兵一致，发扬民主，以自己的模范带头行动来感染战士。西乡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他许多动人的事迹。寒冬腊月，有一次部队作战转来，北风呼啸，大雪纷纷，战士们手脚都冻得麻木了，晚上宿营在某地，因房少人多，一百多个人挤住一个房子，陈浅伦把战士安排好后，自己没有地方睡，就找了个背篓放在火堆旁边，把连长叫来，一面靠一个，度过了这个严寒之夜。第二天清晨，战

战士们看到此情景，无不感动地说：“真是我们的好军长！”他经常要求和战士一样站岗放哨，有时别人站一柱香的时间，他却要站两柱香的时间。寒夜放哨，他把自己的皮大衣披在战士身上，战士不肯要，他总是说：为了革命，不少同志流血牺牲，他们能把自己的生命拿出来，我的一件大衣有什么了不起，穿破了，等革命成功以后，我们再做新的嘛！陈浅伦不仅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在战斗中也是一样。每次打仗，他总是冲锋陷阵在前。这种为革命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使战士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为了加强部队的组织建设，陈浅伦在马儿岩军部所在地办了一期业余学校，利用晚上组织干部学习政治和文化。他亲自讲解红军的性质、任务和党的各项政策，不断提高部队素质。

红二十九军的成立，使陕南革命斗争出现了新局面。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到次年五月，敌人对根据地进行了六次围攻。陈浅伦和其他同志一起，灵活地运用井冈山根据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发扬了艰苦顽强的战斗作风，以劣势装备战胜了数倍于我之敌。同时红二十九军还多次出击，打败了敌人的一些正规部队，缴获敌人一批武器和粮食。通过这些斗争，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到了二千余人，在西乡巴山一带开辟和扩大了面积达二百五十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和四百平方公里的游击区，建立了马儿岩工农民主政府和张家坝、红庙河、让水田、罗家坪、何家沟、壅家岩、八海坪等八个村工农民主政府，还建立了赤卫队、儿童团等组织。在根据地内，广泛实行了土改，镇压了土豪劣绅，贫苦农民扬眉吐气。

（五）

红军武装斗争的胜利，根据地的扩大，更加引起了敌人的仇视。陕南军阀、豪绅地主为了扑灭这支新建的人民军队，除武装“围剿”外，又采取釜底抽薪的伎俩，在红二十九军内部收买叛徒和一些没有改造好的民团头子，阴谋从内部瓦解红二十九军。

张正万原系西乡神团头子。一九三二年，革命处于高潮时，他投机革命，连同他的神团一起编入了游击队。为了争取神团里的基本群众，改造教育张正万本人，陈浅伦按照党的政策，一面批评其缺点，一面让他在游击队内担任一定的职务。但张的反动本性不改。一九三二年红二十九军镇压了他的干爸大恶霸熊振川，红军打到壘家岩时，群众没收了他的三十石包谷，引起了他对陈浅伦和红二十九军的仇恨。

一九三三年三月，红二十九军一部分在王大舜的领导下去四方面军驻地领枪。原驻军部的红军主力第九连剿匪未归，军部守备力量薄弱。张正万乘此机会与敌人挂钩，连续召开秘密会议，策划叛变。这时，叛徒黄朝汉又将军部兵力部署和我军召开干部会议的消息告诉给张正万。四月二日，红二十九军主要干部陆续集聚到军部——马儿岩。上午十时，会议正在进行，张正万突然带人将军部包围。这一伙亡命之徒，一边放枪，一边狂叫。与会同志听到枪声后，知道是内部叛变，立即持枪突围，但因寡不敌众，守卫部队大部牺牲，陈浅伦、李良突围出去，其余四十余名干部倒在血泊之中。这就是震惊陕南的马儿岩事件。

陈浅伦脱险转到了磨子坪，不幸被叛徒出卖又落入敌手。一九三三年四月三日，敌人将陈浅伦绑在西乡磨子坪扁家梁，以死来威胁陈浅伦。陈浅伦英勇不屈，慷慨陈词，愤怒揭露敌人的丑恶面目。他指着叛徒张正万说：“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杀了我一个，救不了你们的狗命。你能破坏二十九军，你搞不垮所有的工农红军。你可以打死我，但打不死所有的共产党人，总有一天革命要胜利！”接着他满腔怒火地痛斥敌人：“我们与你们的仇恨不共戴天，再过二十年，有人会替我们报仇的。杀死我吧！畜牲！”在场的有些群众呜咽抽泣，陈浅伦坚定地向乡亲们说：“兄弟们，不要哭，红军不久会回来的。大家要挺起腰杆，咬紧牙关，坚持革命，坚持斗争。”最后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七岁。

作者附记：本文参阅了中共汉中地委调查整理的陈浅伦烈士生平介绍；烈士之妻唐素珍的回忆报告；陈雨皋谈陈浅伦的有关情况；汉中行署民政科调查陈浅伦的有关材料；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有关陈浅伦的史略材料；南郑县调查访问整理的陈浅伦单行材料；西乡县调查整理的陈浅伦烈士传略；西安师院关于陈浅伦事迹的调查报告；以及汉山汉台区监狱有关陈浅伦的简介等。

黄立贵

陈学明 吴稚航 唐志全

黄立贵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北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历任闽北独立团团团长、闽北独立师师长、闽赣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共闽赣省委委员、闽中军分区党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七年牺牲。

(一)

黄立贵是江西省横峰县青板公社山脚黄家村人，一九〇六年九月十九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黄金冬，雇农出身；母亲张连香，也是贫苦人家的女儿。黄立贵是老大，下有弟、妹两人。全家除两亩薄地外，全靠租种地主田地过活。黄立贵小时只在本村私塾读过三年书，辍学后就给地主、富农放牛，十七岁时去洪家塘村李天保处做长工。

一九二五年八月，共产党人吴先民在青板桥等地建立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十九岁的小长工黄立贵在吴先民的教育下，首批加入了农民协会筹委会，并积极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

一九二七年春，青板桥正式建立了农民协会。吴先民、黄立贵等领导群众，把薛家村的土豪唐鉴贵，洪家村的土豪洪示

范捉了来，进行清算罚款。不久，他们便以王荆庙为基地，深入开展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赣东北的党组织和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积极领导赣东北人民进行弋阳、横峰暴动。黄立贵等也在青板地区组织农民武装——农民革命团。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楼底兰家起义获得胜利。吴先民、吴先喜、黄立贵等根据起义总指挥部的指示，于十二月十三日率领青板桥、上坑源、明山岗一带农民二千余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起义。在短短的二三天内，各村政权都转入农民革命团之手。不久，青板地区起义队伍向铺前、霞坊等地发展，连下数十村，直逼横峰县城。在暴动中，黄立贵觉悟迅速提高，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八年二月，敌人向弋阳、横峰起义区域大举进攻，革命受到严重挫折。这时，黄立贵在家乡任游击队队长，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靖卫团的斗争。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铺前靖卫团到青板地区“清剿”，他们见房屋就烧，见东西就抢，并且指名要捉拿黄立贵。黄金冬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赶到洪家塘去通知儿子赶快逃走。黄立贵因此脱险了，可黄金冬却被铺前靖卫团刺死在洪家塘的禾堆中。

铺前靖卫团撤走后，黄立贵回到老家，眼看父亲惨遭杀害，村子又遭受敌人这样残酷的摧残，不禁怒火满腔，决心为乡亲们报仇，为父亲报仇。七月中旬，他赶到横峰排留杨家，正式加入了红军。

黄立贵参加部队后，作战勇敢，不怕牺牲，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曾三次光荣负伤。往往伤未痊愈，就重返战斗岗位。在党的教育下，他迅速成长起来而成为红军的排长、连长、营长。

(二)

一九三〇年七月，闽北苏区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这年底，黄立贵率领原到赣东北活动的闽北独立团来到崇安。

当时，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闽北根据地和红军都遭受很大损失。苏区各乡镇几乎全被敌人占领，只剩下深山里的几十个小村落。黄立贵到闽北后，积极参加了恢复和发展闽北根据地的战斗。一九三〇年底到一九三一年初，黄立贵率领闽北独立团两次向广丰五都、二十四都进军，大大推动了广丰革命形势的发展。第一次，红军向五都进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不侵犯群众利益，扩大了革命影响。第二次，红军开赴二十四都，留下了三四十条枪武装群众。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广丰县苏维埃政府。广丰苏区建立后，经常受到地主反动武装大刀会的严重威胁。一开始，由于对大刀会的战术研究不够。用正规的散兵作战方法对付大刀会的集团冲锋，结果战斗失利了。黄立贵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针对大刀会用梭标和集团冲锋的两个特点，决定我军采用密集队形的作战方法，并下令各班各带梭标三支，与大刀会拚搏。一九三一年四月，闽北独立团与广丰大刀会激战于广丰南乡铜家板附近，终于将大刀会击溃。广丰苏区的局面得到了稳定。

一九三一年四月，红十军主力第一次入闽，闽北独立团协同作战，共打十一仗，仗仗皆胜。红十军主力回师赣东北后，闽北独立团在团长黄立贵的率领下，发动了解放崇安的战斗。按照战前黄立贵决定的“调虎离山”、“耍猴子”战术，先由团部几个领导同志各带一部分人分赴崇东、崇南、崇北等地分散

活动，把城内敌人主力引出来。接着，分散到各地的红军战士，利用一切机会袭击敌人，东放几枪，西放几枪，敌人追出来就跑，敌人一回去又打，弄得敌人精疲力竭，纷纷告急。与此同时，黄立贵率一百多人，一直住在坑口一带，养精蓄锐，待机奇袭崇安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深夜，乘崇安城内敌人兵力空虚，黄立贵率领指战员，冒着倾盆大雨，一举消灭了守城民团一百多人，活捉伪县长、民团团总、团副等反动头目，崇安县城第一次获得解放。

一九三二年，黄立贵率领闽北独立团积极活动于浦城、建瓯、建阳、上饶、广丰、铅山的广大地区。同年九月，红十军主力第二次入闽，闽北独立团继续协同作战。九月二十日攻打浦城时，由于城墙高达二丈多，墙上设有碉堡，敌人火力很猛，我军缺乏炸药，爬城墙梯子又太矮，因而两次进攻均未得手，闽北独立团副团长李金生壮烈牺牲。黄立贵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怒不可遏，自告奋勇要求率领敢死队，乘夜以长竹梯三次攻城。他率先攀上城头时，正和一队提着马灯的敌军巡逻队相遇，便迅疾地将一颗手榴弹掷向敌群。随后爬上城头的战士也立即向敌人开火，乘敌人乱作一团时，敢死队员打开城门，红军战士一涌而入，守城敌军抵挡不住，纷纷夺路而逃。浦城战斗，消灭敌军两个团，俘敌四百余人。

不久，闽北苏区开始了肃反运动。黄立贵批评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明确指出：“从前没有搞改组派，我们打一仗，胜一仗。现在我们搞改组派，打一仗，败一仗，这是为什么？”他还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护党的干部。当红军指导员陈仁珙被当作 AB 团抓起来时，他找到肃反的负责人，据理力争：

“我了解陈仁珙同志，一个年轻的指挥员，怎么会是 AB 团

呢？”从刀口下把陈仁珙救了出来。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闽北独立团扩大为闽北独立师，黄立贵任师长。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在瑞金召开的第四十次常委会，决定把以建宁为中心的根据地（包括黎川、泰宁）、以资溪为中心的根据地（包括光泽、邵武、金溪、贵溪）、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根据地（包括浦城、建瓯、建阳、上饶、广丰、铅山）合并，正式成立闽赣省，并建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黄立贵为省革委会委员。随即，闽北独立师改编为红七军团二十一师五十八团，仍由黄立贵任团长，调往中央苏区作战。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闽赣省苏维埃所在地黎川失守，邵（武）、光（泽）苏区被包围，闽北苏区与中央苏区已被切断。十一月，闽赣省委退往建宁县。一九三四年初，黄立贵率领在敌后掩护主力红军撤退的红军五十八团，重返闽北苏区。

黄立贵回到闽北苏区后不久，闽北苏区奉中央命令重新划归闽浙赣省委领导。一九三四年七月，他率领红军第五十八团，挺进建（瓯）、松（溪）、政（和）地区。当部队到达政和东平镇后，首先摧毁了地方反动政权和地主反动武装，然后组织大量干部深入群众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并开始分配土地，扩大队伍，迅速建立了建、松、政独立营等地方革命武装和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两、三个月以后，又建立了以西表为中心的九万多人口的建、松、政根据地。这次挺进建、松、政地区，既保存了实力，又扩大了革命影响，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军事行动。一九三四年冬，在黄立贵指挥下，红军五十八团与闽北独立团在大安南五里冯溪老鼠排打了一个歼敌一个营的伏击战。但是，由于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军事指挥，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也丧失了。到年底，闽北红军被压缩在武夷山下闽赣两省边界狭小的三角地带，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

一九三五年一月，闽北党政机关被迫退出大安，转入武夷山的崇山峻岭之中，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游击战争。

为了统一部队的指挥，中共闽北分区委决定，将红七军团五十八团、五十二团一部、闽北独立团、西南独立团、各县独立营或独立团、贵溪游击队、军分区警卫连约三千人，改编为闽北独立师，由黄立贵任师长。一九三五年二月底，在崇安长涧源成立的编师大会上，黄立贵一手举着一挺马克辛机枪，一边叫一个大个子战士站起来，对全师指战员说：“就是他，昨天晚上一个人出去，在雾中缴来一挺机枪，旁边有一个班的敌人在烤火，可是没有看住机枪，被我们的大个子一个人顺手抢来了。同志们！有些人在山上转的久了，看不到大部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说是国民党厉害。敌人有什么了不起呢？一个班都看不住一挺机枪，还有什么厉害。现在我们部队扩大了，力量强了，就要狠狠去打击敌人，大家要向大个子学习，要象大个子一样勇敢、机智。”黄立贵的动员，给全师指战员以很大的鼓舞。会后，独立师翻过七百五十五公尺高的铸铁岩，出温陵关，进入江西上饶，到雨溪乡时，歼灭了由甘溪前来袭击我军的一个连，缴获步枪六十多支、机枪一挺。独立师初战告捷，大大提高了军威与士气。

这时，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叛徒与敌人相勾结，把

黄立贵率领的部队骗到贵溪门房耳口寨附近。部队被敌十二师三个团包围在一个两面绝壁的山谷中。悬崖绝壁爬不上去，前面山谷口子已被一营敌人堵住，后面有敌人两个多团截住了退路。部队处境十分危急。黄立贵和往常一样沉着冷静地下达命令：“除哨兵外一律生火取暖，睡觉待命。”然后，他分析了敌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措施：向后突围。他认为，后追的敌人不会追到山谷里来，进入山谷后兵力会施展不开，前面一营敌人堵不住我们，敌人怕我们从前面突围，一定会调动后追敌人绕到前面去。结果，事情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第二天拂晓，当队伍从后面撤出山谷时，没有遇上一个敌人。敌人上了当，部队顺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包围。

但是，部队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敌人兵力远远超过于我，又倚仗着星罗棋布的碉堡，层层包围，反复“清剿”。加上采取移民并村的“隔离政策”，红军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几乎被隔断。同时，由于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的叛变，仅有的一部电台也损失了，使闽北党同党中央、中央分局的联系完全中断了。在革命遭受极大挫折后的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党和红军怎样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呢？

一开始，独立师仍然执行“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的方针，囿于坚持苏区原地的斗争原则，部队主要在老苏区范围内转。但是在敌人堡垒推进的情况下，部队活动地区愈来愈小，部队和群众的损失愈来愈大。黄立贵总结了这几个月的经验教训，认为：在自己家里打吃亏，不如打出去。因此，主张部队分散发展，打到外线去，挺进敌后建立游击根据地，由单纯防御转变到防御与进攻相结合。黄立贵这一重要决策得到分区党委书记黄道的支持。一九三五年四月，黄立贵亲自率领独立师

第二团到建（瓯）、松（溪）、政（和）地区活动，并进一步挺进到闽东北的宁德、屏南、古田等地。独立师挺进到建、松、政新区以后，对于遍布各地的大刀会采取又打又拉的政策，一开始同他们打过几仗，使他们知道红军的厉害。同时，积极利用他们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一边来。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终于使大刀会靠拢我们。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闽北分区党委举行会议，讨论对敌斗争策略。黄立贵在会上汇报了在建、松、政地区活动三个月来的情况，指出：敌人全部兵力都集中到根据地，后方非常空虚，许多重要城镇都只有少数保安部队，红军如能乘虚而入，就有办法解决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分区党委根据独立师的汇报，提出了“向敌后挺进，创造新游击区”的方针。同时，根据黄道、黄立贵的提议，在政治、经济政策上也实行大胆的转变。在政治上，将只让群众作硬性直接斗争的方式，改变为允许和教育群众实行“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政策，争取和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如大刀会、保甲长等。在经济上，改分田废债为减租减息，从打土豪转变为筹款^①。

分区党委会议之后，又举行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黄立贵作了关于闽北游击根据地和军事形势的报告，并部署独立师二团团团长饶守坤、闽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助率领独立师第二、三团，挺进建（瓯）、松（溪）、政（和）地区，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和邵武中心县委军事部长、邵武独立团政委刘文学率部沿武夷山脉，向西北方向资（溪）、光（泽）、

^①刘晓：《闽北三年游击战争》，载福建省《党史研究参考资料》总第26期（1981年8月10日）。

贵(溪)游击区出击，黄立贵亲率一团向邵(武)、建(阳)、顺(昌)方向挺进。黄立贵率一团出击后，连续拔除从黄坑到杜塘的敌人据点，在以建阳、邵武、顺昌三县交界的饶坝、书场、贵溪为中心地区，恢复和开辟了游击根据地，成立了邵(武)、顺(昌)、建(阳)县委。

从根据地打到敌后，黄立贵坚决执行分区党委提出的新政策，提出了一些新的做法。在部队中提出“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的生存”的口号，要求用一切办法接近群众，在群众中发展并且日益加强秘密活动，建立党的组织；对一般的地主豪绅，保甲长采取分化瓦解的方法，争取其保持暂时中立，利用其提供情况、筹款和购买物资。在战争指导上，当部队进入敌后以后，敌人的碉堡封锁线便破产了。于是敌人又采取了跟踪追击和分路合击的方法消灭我军。例如：发现你一个连，就用一个团跟在屁股后面打；发现你一点，就用几路来袭击。黄立贵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以拖对追，有条件时打一仗，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牵着敌人鼻子打圈子等办法，在“拖”中消灭敌人，用“伏击”消灭敌人。

一九三五年冬，黄立贵率领师部和一个营共百十来人，到达新区屏南县上楼村向土豪筹款。因为是新区，群众基础差，消息不灵通，第二天凌晨，当黄立贵完成任务率领第二批三四十个同志离开村子时，敌七十九师一个团就打了过来，部队被迫退到村中的一个大院子里。这是个地主庄院，前后都修了炮楼，四面筑有高墙。敌人看到我军退到院子里，高兴得直乱叫：“抓住共军头子领赏金呀！”敌一团人围着院子，一个上午发起十多次冲锋，几十挺机枪把土墙打得象蜂窝似的，手榴弹也把屋顶砸破。但我军守在两座炮楼里，多次粉碎敌人进

攻，打死敌人二百多名，打伤的就更多了。打到下午，敌人急得发疯了，竟将大院四周民房一起用火点着，一时浓烟弥漫，火天冲光。见到熊熊的火焰，一些同志很紧张，黄立贵却笑着说：“那好吗！周围房子烧掉了，敌人不是更不好接近我们吗？”到下午三、四点钟，敌人没有丝毫退走的意思，而我军子弹却已经不多了。黄立贵决定从敌人身上想办法。他在几个同志掩护下，突然冲出大门，用机枪对着敌人猛烈扫射，接着连跑带蹦地跳到敌人的机枪掩体上面，接连向敌人丛中投掷手榴弹。这一连串骤然行动，打得敌人昏头转向，四面乱跑。趁此机会，黄立贵等扛回敌人留下的两箱子弹。等敌人定下神再开枪时，黄立贵等已经回来关上了大门。天黑了，敌人已经精疲力尽，黄立贵便对大家说：该走了。他作好突围的部署后，自己在腰上插把快慢机，一手拿一支梭标，一手拿两颗手榴弹，带一班侦察兵首先冲出去，迅速地向敌人丢了两颗手榴弹，接着拔出快慢机一扫，逼迫敌人向两边靠，黄立贵率部队一下子冲过稻田，到了对面山上。这一仗敌人伤亡三四百人，红军只被俘去两个炊事员，无一阵亡。

一九三六年，闽北游击根据地已基本稳定。与此同时，叶飞等领导的闽东游击根据地也得到发展，并同刘英、粟裕等坚持在浙西南的游击根据地相联接。闽北分区委为取得同闽东、浙西南游击区的直接联系，便决定以闽东北为跳板向东发展。一九三六年二月，黄立贵率领三个连到了闽东北游击根据地王德洋村，与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闽东北军分区司令员饶守坤、政委王助，研究怎样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闽东游击根据地取得联系。这一天正有大雾，上午七时左右，住在迪口的敌人（离王德洋三十公里）一下子就冲到门口来，哨兵因雾大看不

见，被敌人摸掉，等敌人到了门口，才被警卫员发现。在这紧急关头，黄立贵立即赶到门口，与饶守坤一起，猛烈向敌人射击，掩护黄道及其他同志先走，待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安全转移后，他才和饶守坤边打边撤，一直打了四五里路，敌人终未追上。突围后，黄立贵继续率部东进，挥兵连克玉山、东峰、楼平等地，在宁德牙竹坑同叶飞率领的队伍会师，打通了两块根据地。

一九三六年四月，黄道、叶飞、黄立贵等在政和、周宁交界的洞宫山举行会议，成立中共闽赣省委，加强对游击战的统一领导。黄立贵任省委委员。自此，闽北、闽东以及浙西南三块游击根据地三足鼎立，紧密配合。

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爆发，大批敌人正规军调往西南。黄立贵乘各路敌军调防之机，率领闽北独立师主力西出将乐、泰宁、建宁一带，开辟了邵（武）、将（乐）、泰（宁）游击根据地。独立师其余各部也积极活动，扩大游击区域。

一九三六年八月，闽赣省委又决定成立闽北、闽中、抚东、闽东等四个分区委，黄立贵兼任闽中分区委书记。闽中分区辖邵光特区、邵顺建县委、邵将泰县委。一九三六年底，游击战争得到更大的发展。在北起信江，南至闽江口，东达洞宫山脉的闽赣边，形成了二十余县的闽北游击根据地。

（四）

一九三七年初，闽北形势急剧恶化。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一方面同我党中央进行停战议和的谈判；另一方面，却大量集结兵力，对南方各游击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在闽北

方面，敌以八个师的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进剿我各游击根据地。闽北独立师遭受很大损失，部队大量减员，根据地面积愈来愈小。敌人又继续采取堡垒政策和移民并村政策，妄图隔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部队经常被逼到大山上，住的是香菇篷，吃的是山粉、竹笋、野杨梅、鸟饭、苦椎等野菜野果，盖的是野草，红军指战员有时饿得头昏眼花，冻得手脚发麻。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和黄立贵加强了对部队的教育。黄立贵经常给部队上课，坚持部队的军事训练，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大家。他捧着一碗黑绿色的野菜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今天吃一次野菜，味道不如大米饭，的确很难吃。同志们！眼睛要看得远一些，吃了野菜才能狠狠地打击敌人，将来我们就会天天吃大米饭，到那时，想吃野菜也吃不到，还是趁热多吃几碗吧！”“眼睛要看得远一些”，差不多已成为黄立贵对指战员谈话时的一句口头禅了，每逢在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用这句话提醒大家。同时，他特别强调部队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他自己一贯同群众打成一片。在闽北苏区，黄立贵是群众极为熟悉的人物，他不管到哪里，都能和群众谈得来，和群众亲如家人，从不摆一点师长的架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更变本加厉地进攻闽北红军，闽北独立师的处境仍然十分险恶。黄立贵于七月中旬带了二三十人从顺昌出发到崇安去找黄道，准备同他研究在新形势下的革命策略问题。敌人发现了黄立贵的行踪，立即调大量军队搜捕。黄立贵带领同志们从敌人空隙中钻来钻去，虽然受到一定的损失，仍坚持向崇安进军。七月十三日拂晓，他们渡过了邵武的富屯溪，跳出了敌人的搜剿圈。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歇一下了，黄立贵却说：“不行，这里离邵武只有十五里路，不是我

们站脚的地方，继续往前走。”大家拖着极端疲乏的身体又翻过一座大山，爬过一座长岭，这时一些同志实在走不动了，腿沉重的抬不起来，眼皮直打架，再使劲也睁不开来，倒在地下就睡着了。黄立贵眼看战士们实在太疲倦了，也只好说：“好吧！到山脚下沙子桥去做顿饭吃了再走。”

由于当地伪保长的告密，从邻村路过的敌保安第五团一个连包围了村子，并摸掉了哨兵。正当黄立贵和战士们刚刚端起饭碗的时候，敌人一脚踢开门，打进屋里来了。面对着突然出现的异常情况，黄立贵立即抽出驳壳枪，打倒了进屋的两个敌人，并率领警卫员，跳到窗口和敌人对打起来。他大喊：“赶快走！我在这里顶住，你们冲吧！冲出去到光泽城外集合。”同志们都不肯走，黄立贵把脚一跺：“快！快冲！把房东老大爷带出去，不要担心我，快！快！快！”大家一阵风似的冲出大门，一直跑了五里路，还听得见村子里传来的激烈枪声。为了掩护战士们和老乡撤退，黄立贵和敌人拚杀到最后一分钟，终于为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黄立贵家谱，中央组织部、福建省民政厅、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崇安县民政局编写、收藏的黄立贵烈士传略。
2. 薛子正、曾镜冰、左丰美、黄知真、陈贵芳、饶守坤、王文波、马长炎、张波、宣金堂、林敏、毛彪、张诚学、黄长武、谢伊等烈士生前战友和邹细姘、黄荷香、黄义福、张任珍、邵春和等烈士亲属、同乡的回忆文章、口述记录、信札和访问记录。
3. 邵式平等著：《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 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 方志纯：《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 1935—1936年上海《申报》、福建《民报》、福建《江声报》。
7. 江西省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敌伪档案。

李子芳

郑山玉

李子芳是旅居菲律宾的华侨，回国后投身革命，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他英勇奋斗，不屈不挠，以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海外华侨的光荣与骄傲。

一九一〇年五月三日（农历三月二十四），李子芳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滨海侨乡——永宁岑兜村。父李兹螺，早年出洋谋生，在菲律宾先当码头工人，后与人合开小杂货商店。母施荷糖，在家务农，于子芳小时为瘟疫吞噬了生命。李子芳八岁入家乡的银江小学，学习成绩优秀，后因父亲海外营业破产而辍学。不久父亲又患病辞世，家境日蹙。为谋求生活出路，一九二四年，年方十四岁的李子芳，被迫随乡亲飘洋过海，侨居于菲律宾岷里拉，在店铺里充当学徒。后得亲友支持，以半工半读形式入岷里拉中西学校读书。在菲期间，李子芳接触到许多进步书报，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一九二七年初，正当国内大革命高潮中，李子芳回国继续求学，同时也开始了他寻求革命道路，反抗黑暗旧社会的峥嵘岁月。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李子芳先后就读于泉州的培元、晋中和黎明高中等校。他进一步攻读革命理论和各种进步书刊，诸如《共产主义ABC》、《向导》、《新青年》以及

他从南洋携回的唯物史观的哲学著作等等，逐步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思想。时值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但李子芳不畏风险，坚持斗争。他抨击时弊，组织学潮，传播进步书刊，甚至曾与几位同学计议刺杀驻泉州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二旅旅长林寿国。因此，他被学校当局认为是“过激派”，先后被开除和“劝退”出校。一九三一年，李子芳转到泉州东郊法江小学任教。他仍利用多种形式，继续向反动统治者挑战，在学生中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农村土地不均、贫富悬殊的罪恶现实。因而，更加触怒了反动当局，受到当地国民党党部的监视。一学期未满，又被迫离开。此后，李子芳前往南京中央大学旁听，不久即转回家乡。他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组织，在泉州、厦门一带从事地下革命斗争。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城，随后分兵于漳州城乡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扩大红军武装。李子芳于五月间经厦门互济会介绍，从鼓浪屿前往漳州石码参加红军，被分配在红四军政治部组织部任统计干事。从此，李子芳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六月，东路军回师江西，他随队进入中央苏区。年底，红四军政治部改编，他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在中央苏区，李子芳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激烈战斗。一九三三年四月，他由彭祐、谢有燊、钟衍英等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实行战略大转移。李子芳也随大军西去，参加了举世闻名

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他仍任红一军团组织部干事，其中一度调任军团直属队政治干事。在空前艰险恶劣的环境中，李子芳虽是知识分子出身，在部队中还被雅称为“大学生”，但他非常能够吃苦，始终以坚韧不拔的大无畏精神，战胜了前进路上的重重难关，并且尽力关心和帮助战友克服各种困难。当时部队大量减员和补充，干部调整变动频繁，他都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卓有成效地协助军团领导做好军中各项繁重复杂的组织、政治工作。由于他对革命的耿耿忠心和在斗争中显示的突出才干，在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一九三六年，被擢升为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并当选为军团党委候补委员。

一九三六年二月，我党组织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在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李子芳随军渡河，参加了著名的东征战役。当时，蒋介石、阎锡山以重兵阻我去路，并妄图消灭我军和陕北根据地。我党鉴于国难当头，以全国抗日为根本，决定将抗日先锋队撤回黄河西岸。五月初，抗日先锋队回师陕北。接着，李子芳又随红军的西征部队出师秦陇，参与了巩固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推动西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和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等一系列重大的活动。

西征期间，我们党为争取实现西北地区停战抗日的局面，对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开展了统战工作，战事稍缓。红一军团政治部抓紧时机，组织师以上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由军团政委聂荣臻和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邓小平亲自授课。每次考试（聂、邓出题，邓小平评卷），李子芳总是与一师师长陈赓同列第一；尤其是考世界知识，他俩都考上110分——因为成绩殊优，邓小平特给嘉奖10分。平时，李子芳还

给同志们讲解天文、地理、航海等常识，颇得同志们好评。一九三七年秋，李子芳调入抗大第三期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我党领导的南方八省游击队奉命组成新四军，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新四军的各级领导，李子芳也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奉调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十一月底，他与四十多名党政军干部告别延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于十二月初抵达武汉，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叶挺，随即投入了组建新四军的紧张工作。当时，军政治部正、副主任袁国平、邓子恢均未到职，李子芳除参与全军的组建工作外，还特别肩负起筹组政治部的一切事宜。在军部领导下，经李子芳的努力，军政治部及其所属的组织、保卫、宣传、民运、敌工等各部领导机构，不久都相继建立和完善起来。

李子芳有一句名言：“组织部是干部的家。”^① 在新四军组织部长任内，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干部对同志关心爱护，知人善任。他为人持重，处事严谨，严格要求部里的干部执行党的政策，努力做好党的工作；并且以身作则，处处模范带头。他身为高级干部，而且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才能，但毫无架子，平易近人，作风正派民主，有事总是与大家商量，尊重下级干部的正确意见，因而深得大家的尊敬和拥戴。他对干部很了解，并善于团结和使用干部，充分发挥干部的才干。对于来访、来谈工作的同志，他都热情接待，细心倾听干部、群众的呼声。对于原则问题，他从不迁就，对于错误也绝不姑息，但他也从不主观主义地给人家乱扣帽子，更从

^①据陈烙痕的回忆材料。

来没有发脾气训人；而是调查研究，弄清是非，耐心细致地帮助、教育同志。他生活简朴，喜爱运动，每天晚饭后，篮球场上总少不了他。在李子芳身上，充分体现出一个党的工作者所应有的高度党性原则和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他的领导下，新四军组织部有条不紊，充满生机，干部们到组织部，就好象到了家，亲切温暖，紧张严肃，心情特别舒畅。在皖南我军的创建中，组织部对于加强军中党的建设，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都发挥了重大的政治和组织作用。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国民党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发生前，军部领导决定先把老弱病残的指战员撤至江北。李子芳因阑尾炎刚刚开刀，且有严重肺病，也属军部指定的先撤人员，但他坚持与部队一起行动；同时又坚决贯彻军部决定，领导组织部迅速办理其他所有先撤人员的组织手续，使许多年老体弱的同志得以事先顺利渡江，安全撤至敌后。“皖南事变”爆发后，我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遭到国民党军队八万之众的重重包围，形势异常严重。军部领导再次决定李子芳与宣传部长朱镜我（胃病出血）先行撤出，但他俩都坚决不肯。李子芳表示：“我从来没离开过部队，要死，就和大家死在一块！”^①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临难不惧，革命到底的伟大献身精神！

在敌众我寡的恶战中，我军全体指战员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伤亡十分严重。李子芳也因极度疲劳，病情加剧，时时吐血，但他始终强扶病体，从容镇定地率领政治部机关随军冲

^①据陈茂辉的回忆材料。

杀。当战斗到了最后关头，叶挺军长决定部队分散突围，李子芳立即组织政治部机关和从各处阵地撤退下来的部队，进行突围战斗。他坚决指示所率人员：“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夺血路而走。”^①并且以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念，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突围出去后，“不管情况如何，对革命不要灰心丧气……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远的了。”^②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军经七昼夜的浴血奋战，弹尽粮绝，最后仅以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李子芳也因身体十分虚弱，行动艰难，不幸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李子芳被俘后，被皖南国民党部队监禁一个短时间，即与我军其他被俘人员六、七百人，分别被押送入人间的活地狱——江西“上饶集中营”。他们中还有叶挺军长，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新二支队司令员冯达飞，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敌工部部长林植夫等我军高级干部多人。

从被俘的第一天起，李子芳就置生死于度外，下决心为国捐躯，斗争到底。还在被押解途中，他就抓紧对同难战友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沉痛而坚毅地号召同志们不要悲观失望、丧失革命斗志。他说：“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原则，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抗战到底的立场。”^③并且深沉地勉励大家：“事情并未了结，我们还活着，要坚持气节，坚持斗争。”^④对被俘的女同志，李子芳更是关切地叮嘱

①徐峰：《我所经历的皖南事变前后的片断》，见《新四军在云岭》。

②李务本：《冲出重围》，见《皖南烽火》。

③据顾莲英的回忆材料。

④据邵宇的回忆材料。

她们说：敌人对你们更会使用各种卑鄙手段，拉拢、软化、威逼等等，“你们之间要亲密地团结，不要给敌人分化。同志们要坚持斗争，坚持团结，革命一定会胜利的。”^①他还严肃地暗示政治部被俘的同志：“不要忘记我们（政治部）应该做的工作，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②

在上饶集中营，李子芳起初与一批战友被囚禁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李村的一个牢房里。这个牢房与叶挺军长的单独囚室紧邻，两室中同敌人抗争、斥骂之声互可听见。李子芳与难友们经常利用机会与叶挺传递纸条，向军长报告牢中情况，表示同敌人斗争到底，直至胜利或牺牲的坚强决心。叶挺当时尚未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同志们的英勇斗争使他深为感动，也给他带来了党的关怀和力量，他殷切地勉励大家：“团结一致，斗争到底！”并且尽力设法从生活上、物质上关心、爱护李子芳等同志^③。

在李村约近半年。一九四一年七月，李子芳又被转押至石底监狱。这里仅有一幢房屋孤悬于三座小山之中，敌人为了隔离我军负责干部和其他被囚同志的联系，特在这里设了专门的禁闭室。同时被转押入这座监狱的还有黄诚、军部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五团团团长徐锦树、军部人事科长廖振文、敌工科长陈子谷以及指导员胡崇德、王传馥等我军重要干部十来人。

他到石底不久，便很快地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黄诚、徐锦树为支部委员。根据当时形势和变换了的斗争环境，他要求大家对于严酷的斗争“要有充分的思想准

①据顾莲英的回忆材料。

②据陈茂辉的回忆材料。

③据王聿先的回忆材料。

备”，强调“只能在斗争中求生存，放弃斗争就会落入敌人的陷阱。”^①他和黄诚、徐锦树一起帮助同志们正确认识和总结“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并且用长征的事迹，教育大家“学习当年红军那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红军一样，去向敌人进行百折不挠的斗争。”^②关于斗争的前途，他提出要力争越狱，“设法逃出去，使得我们能够为党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③；同时也要作好不能越狱的最坏打算——“斗争到底，准备牺牲。”李子芳估计到敌人不会放过他，而自己身体又不行，越狱跑不动，便慨然而安详地对大家说：“我从被捕开始就作了牺牲的准备的”，“敌人要下毒手就让他下吧，只可惜我为革命做的工作太少了！”^④李子芳的肺腑之言和他那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大家。

为迫使我军负责干部屈服、自首，敌人费尽心机，使尽解数。然而，在李子芳和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革命囚徒们顶天立地，英勇刚强。他们经受了敌人种种非人的折磨，痛斥了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等反动家伙的无耻谰言，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破坏抗战，诬害新四军的罪恶行径，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敌特们诱降、逼降的阴谋诡计，取得了狱中斗争的重大胜利。

这年深秋的一天傍晚，风雨大作。徐锦树、廖振文、胡崇德三位同志经李子芳和党支部批准，先行越狱。他们顺利地越出事先挖好的墙洞，迅速向预定地点奔跑。但不幸因天黑迷路，最终没能逃出虎口，徐锦树在与追兵搏斗中牺牲，廖、胡

^{①②④}据王津先的回忆材料。

^③据陈子谷的回忆材料。

二人也相继被重新投入囚牢。事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张超带着一帮爪牙来到监牢，杀气腾腾地威逼李子芳和黄诚承认是越狱事件的“指使者”，并要“交代”所谓的“阴谋计划”。李子芳愤然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痛斥张超：“徐锦树他们的越狱完全是正义的行动，也是狱中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意志！今天你们既不敢公开审判我们，监禁就是非法的，因而我们也有越狱斗争的自由和权利。我们在这里受尽你们的折磨和迫害，老实告诉你，我们要不是身体衰弱，也会越狱的。如果这样，那又是谁来指使的呢？”“你们别得意太早了！”他正告敌特们：“想威胁我们，办不到！真理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①在正气凛然的革命者面前，张超无言以对，气恼地滚出了牢房。

越狱事件发生后，敌人加强了镇压措施，刑讯逼供接踵而来，许多同志被打得皮开肉绽。李子芳和黄诚更被钉上脚镣，一举一动受到严厉限制。敌人为了进一步割断李子芳和黄诚对囚室战友的影响，又先后把王传馥、王聿先、陈子谷等调出石底，转移至其他监牢。当战友们分别之际，李子芳坚定地指出：敌人的怀柔政策、软化手段已经破产，凶残的镇压将更加残酷，斗争将会愈来愈艰苦。但是，不管情况如何恶劣，我们都必须坚持革命气节，决不妥协屈服。他指示战友们到新囚牢后，“要多想些斗争办法”^②，“只有斗争才是出路”^③。同志们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教育和期望，他们转到新囚牢后，更加

①据陈子谷、王聿先的回忆材料。

②据陈子谷的回忆材料。

③据王聿先的回忆材料。

英勇坚强地投入战斗，大大地推动了其他监狱的斗争。不久，王传馥、陈子谷与其他战友一起组织领导了震慑敌胆的茅家岭暴动；王聿先也随后参加了著名的赤石暴动。两次暴动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在监狱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战友们相继离去了，石底监狱只剩下李子芳和黄诚、廖振文、胡崇德四人。在敌人的淫威面前，李子芳始终泰然自若，坚贞不屈。一九四二年春夏之交，日寇大举进攻浙赣线，进逼上饶。一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国民党反动派不战而溃，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准备后撤，集中营也决定向福建迁移。刽子手们在匆忙逃跑前，竟然丧心病狂地杀害我军一批负责干部和革命同志。五月上旬，李子芳和三位战友被特务们秘密地毒杀于狱中，时年三十二岁。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局李子芳档案材料。
2. 陈子谷：《皖南事变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
3. 李兆炳：《和李子芳同志在一起的时候》，载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2期。
4. 《皖南烽火》，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10月版。
5. 《皖南一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6. 《新四军在云岭》，安徽省泾县文化局1981年5月编印。
7. 《上饶集中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
8. 李淑铭、朱汉膺、陈程芳、赵祖培、陈兆英、庄润英、吴清潭、张汉玉、何天松、李兆炳、汤光恢、王宗槐、肖华、聂荣臻、彭德清、张凯、陈子谷、邵宇、陈茂辉、夏征农、王聿先、顾莲英、陈烙痕、陈虹、吴越等的访问记录或他们撰写的回忆材料。

王 尚 德

董建中 张守宪 梁星亮

王尚德是陕西地区党团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也是当地知名的教育家。他为了培养革命的新一代，二十多年如一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无论在敌人的监狱中还是在白色恐怖的险恶条件下，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保持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风亮节，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一生。

王尚德，又名王璋峰，曾用名王存祖。一八九〇年九月一日生于陕西省渭南縣郭豪村一个贫农家庭。父亲郭兆清，前清秀才。尚德两岁丧母，因兄弟姊妹多，父亲便将他送给本县姚李村尚德的舅父王兴贵抚养，为过继儿子。从此，尚德由原姓郭改姓王，取名王尚德。

一八九七年，王尚德入本乡私塾。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颇得师生夸奖。一九一一年，入西安健本高小，继转政法专科学校。一九一八年，他怀着追求新知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满腔热情，奔赴辛亥革命的发祥地武汉，考入武昌中华大学。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运动。王尚德反复阅读刊载五四运动消息的报刊，深为北京爱国学生的革命行动所感动。他不畏武汉反动当局的威胁，积极投入了恽

代英^①、林育南等人领导的武汉地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主动要求恽代英、林育南给他分配任务。五月十七日，王尚德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六月一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军警三百余人包围了中华大学，不准学生上街散发传单和讲演。王尚德和其他同学一起翻越校墙而出，奔向街头继续散发传单，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六月三日，中华大学学生再次上街游行，遭反动当局的武力镇压，多人被捕。王尚德积极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

一九二〇年春，王尚德参加了恽代英、林育南创办的利群书社的活动；一九二一年夏，参加了林育南、李求实等发起成立的共存社，担任该社的营业委员^②，与张浩（即林育英）共同负责利群毛巾（实验）厂的工作。王尚德与共存社社员一起学习、讨论革命理论和国内外大事，逐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③。

一九二二年八月，党团组织和董必武派王尚德回陕建立团的组织。王尚德回陕后，在家乡渭南赤水镇，邀集友人张浩如、田涵荣一起，成立了乡村教育研究社，并在此基础上，集资办了赤水农职学校，以教师的公开身份，掩护团的活动。王尚德将自己家中力所能及的财物（如粮食、棉花）用来资助学校。起初，他的父亲王兴贵对他这一作法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因此常与他发生口角。王尚德的母亲则认为儿子为学校办

①恽代英时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与王尚德交往密切。

②《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302页。

③根据吴化之的回忆和王尚德1924年写给团中央的信。

好事是对的，因此每当父子发生争论时，她总是从中调解，说服丈夫。

王尚德以学校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二二年底，他与张浩如在赤水开始发展青年团员，建立团的组织。一九二四年春，王尚德与张浩如商议将在临潼任教的团干部刘建侯调到赤水职校任教，由他们三人负责赤水青年团的领导工作。同年五月下旬，团中央派武止戈到赤水巡视工作，指示要扩大和健全团的组织。王尚德于同年六月正式建立SY赤水支部干事会，由王尚德任书记，并对所属团员全面作了登记调查，填写了团员调查表^①。不久，团的赤水支部又扩大为赤水特别支部。

王尚德为了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和扩大团的组织，还在关中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经常和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教的党团员王复生、王懋廷联系，开展两校之间的友谊活动，成立了团的外围组织——青年励志社，咸中百分之二十的师生参加了这一组织^②。

为了贯彻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和扩大关中地区的团组织，王尚德邀请西安地区的团组织负责人张秉仁、高克林和三原县、华县等地进步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共十五人，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在赤水职业学校聚会。王尚德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介绍了赤水团支部和陕东各进步团体的活动情况，张秉仁传达了上级关于发展党团组织和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等指示，经过热烈讨论，决定：（一）由李

^①王尚德 1924 年给团中央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王尚德 1924 年给林育南的信，原信存中央档案馆。

维屏等四人成立华县支部，以青年勵志社为公开活动团体；（二）由姚志哲等四人成立三原支部，以青年同志共進社为公开活动团体；（三）赤水支部以平民教育服务团为公开活动团体；（四）各新成立的支部选举书记，报告团中央^①。会议还决定“联合华县、三原、赤水各同志成立陕东国民会议促成会^②，并发布宣言与通电，立即加入北京总会。

一九二五年，王尚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③。这期间他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驱逐了渭南县教育局反动局长王述道。

一九二五年秋，团中央和中共豫陕区委派吴化之来陕，整顿团组织 and 建立党组织。在吴化之的指导下，赤水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王尚德任书记。

一九二五年春，根据党的指示，王尚德在赤水农职学校发起并召开了陕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广泛开展支持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和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的活动。孙中山逝世后，王尚德积极组织和参加陕西各界的悼念活动，并领导赤水青年团组织，发动渭南群众，先后进行了驱逐直系军阀刘镇华（陕西省长兼督军）和吴新田（继刘镇华后任陕西督军）的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王尚德和其他同志一起，发起召集全陕学生代表大会，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并在《西安评论》上发表了《沪案秘密解决

①②王尚德 1925 年给恽代英等人的信，原信存中央档案馆。

③王尚德的入党时间说法不一，一说 1921 年，一说 1922 年。王尚德本人 1925 年 1 月 7 日给团中央的报告称，“我们均愿加入 CP，不知有其他手续否？若须经同志介绍时，代英、育南可以介绍我们加入，如何？”据此，我们认为王尚德的入党时间当在 1925 年，吴化之回忆也说，王入党是 1925 年。

与关税问题》一文，指出：“帝国主义之英日，自五卅后直接枪杀我无辜同胞，几遍全国各大商埠！这种惨无人道的野蛮行为，其责任犹须中国政府自负！”“果如此的解决沪案，则已死同胞之冤永沉地下”。文章还提出对沪案解决的要求，是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七条办法，并收回海关自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国民外交^①。同年暑假，王尚德和魏野畴、耿炳光等在三原县城举办了暑期讲学会，王尚德讲授马列主义基本常识和农民运动等课程。

一九二五年九月，陕西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设立或改组各地国民党党部、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王尚德在临时省党部里担任领导工作，同共产党员魏野畴、刘含初、赵葆华等一起，团结国民党左派，积极发展组织，大力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以焦易堂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

一九二五年十月，王尚德等成立了陕西最早的农民协会——渭南东张村农民协会，并重建了乡村教育研究社，以改进农村教育，发动农民对土豪劣绅和恶霸地主进行斗争。一九二六年春，刘镇华率匪军十万，再次入陕，下令通缉王尚德、赵和民、陈述善等共产党人。王尚德被迫离陕，前往上海。

一九二六年五月，王尚德秘密到了上海，在闸北区青云路与吉国祯（中共党员，上海大学学生）、党维荣（中共闸北区负责人）接通关系。然后便给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去信联系，要求去广州参加革命工作。恽代英立即回电，

^① 《西安评论》第20期，1925年11月24日出版。

表示热烈欢迎。王尚德到广州后，经恽代英介绍，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任科员，协助恽代英、王懋廷（宣传科科长、共产党员）等工作。王尚德还负责将赤水职校的共青团员张宗逊等送到黄埔军校学习。

同年七月，广州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不久占领了两湖广大地区。这时，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在苏联的援助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一九二六年秋，由绥远经宁夏向陕甘进发，解西安之围，以配合由广州出发之北伐军。为了加强党在冯部的工作，党组织派王尚德和刘志丹、唐澍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由广州出发，绕道北上到冯玉祥部任职。王尚德被派到第五路军政治处（处长方仲如）任宣传科长，并与方仲如一起，举办军官政治训练班，成立政治研究会。一九二七年春，王尚德到达西安，被调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负责筹备建立省农民协会^①。五月底，全省有六十多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三十多万人，广泛开展了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使陕西成为全国农运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同年四月，王尚德兼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印刷局局长。在他领导下的印刷局，出版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报刊，尤其对当时的陕西《国民日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机关报）、《新国民军报》（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主办）的出版和发行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还领导印刷厂成立了三十余人的童子劳动团，进行政治军事训练，每日训练二小时，同时进行“普通常识、革命知识”^②等课程的教育，促进了

^①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4月2日。

^②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4月17日。

工人运动的发展。

四月二十八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绞杀了著名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五月十六日，西安各界五千余人举行追悼李大钊、反对奉系军阀屠杀罪行大会，王尚德在会上发表演说，痛斥北洋军阀的野蛮暴行，号召人民支援北伐战争，消灭封建军阀的反动势力^①。为了支援北伐战争，在中共陕西区委的领导下，以中国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组织了西安各界慰劳宣传团，前往河南前线慰问参加讨伐奉系军阀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六月七日，召开了欢送慰劳宣传团大会，王尚德致开幕词，号召宣传团的同志们“行动要积极”，“要纪律化”，要“站在党的指导下”，实行“武力与民众相结合”^②。

一九二七年夏，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在陕西进行“清党”，白色恐怖笼罩了西安古城。王尚德按照党的指示，回赤水转入地下斗争。他以从事教育的公开身份，秘密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反动派指派匪特严密监视王尚德，他的处境十分险恶，遂于一九二八年春的一天深夜，秘密赴高塘，随即转赴洛南县三要司，参加了许权中、高克林等领导的新编第三旅的兵运工作。同年五月，许旅与渭华地区的农民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渭华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王尚德起草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③。起义中他随军协助当地党组织，发动赤水镇的农

①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5月22日。

②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6月8日。

③《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以军委主席刘景桂（志丹）、前敌总指挥唐澍、政治委员刘继曾的名义发布，原件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文物处。

民参加革命军和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斗争。他主办的赤水农职业学校的师生；许多人参加了这次起义；他亲自介绍入党的程养谦，在起义中壮烈牺牲。

渭华起义震惊了敌人，宋哲元派重兵“进剿”，革命军伤亡很大。王尚德与杨晓初、王云等同志，冒生命危险到激烈战斗的山沟里，将英勇牺牲的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和其他同志的遗体抬出山沟，进行安葬。

渭华起义失败后，由许权中率领革命军余部进入豫陕边地区。此时，因部队受挫，官兵情绪不稳，王尚德随军鼓励部队指战员要坚持战斗，不因一时失败而灰心。起义部队几经转战到河南邓县，又遭到当地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的袭击，最后失败。王尚德脱险后，化名汪琴声，匿居唐河，住在地下党员仝中玉家中，进行党的秘密工作。

同年七月，在唐河县源潭召开了豫西南各县代表会议，选举了中共豫西南新的特委，书记郝久亭，王尚德当选为委员。同年秋，特委遭敌破坏，王尚德等人被捕，不久经营救获释，但敌人仍对其进行监视，王尚德在当地难以立足。他按照党组织决定离开唐河到邓县，经友人郭绍仪（中共党员）介绍，在邓县县立小学任高小语文教师。他带领学生朗读岳飞的《五岳祠盟记》和鲁迅、郭沫若等五四以来写的优秀作品，绘声绘色，激昂慷慨。许多聆听过他讲课的学生，至今谈起此情此景，仍记忆犹新。王尚德经常带领学生一起劳动，整修教室，铺垫学校周围的道路，晚上到学生宿舍了解学生的家庭状况，进行社会调查。他生活俭朴，每月二十元薪金，除自己伙食费外，大都用于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学生对他很敬佩。

同年冬，王尚德调南阳工作，公开身份是南阳第五中学教

师。当时南阳驻军系杨虎城部，在杨部工作的我地下党员姚洗心（曾任豫西南特委委员）与尚德相识，经姚介绍，鄂豫边特委与杨部中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为杨部办了《宛南日报》，派王尚德任该报编辑，协助该报负责人共产党员宋绮云工作。王尚德到任后，又请各县县委的有关同志担任报社记者或通讯报道员，以此进行党的秘密工作。他和宋绮云按照党的指示，利用《宛南日报》宣传反军阀、反土豪劣绅、反苛捐杂税的革命思想，同时争取团结杨部官兵，收到了良好效果。为了培养一批进步的基层军政干部，特委决定帮助杨虎城办干部教导总队（每期三个月），王尚德、宋绮云积极推荐和选派人员，并利用报纸进行宣传。教导队的创办，为我党掌握该部部分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〇年，南阳党组织领导宛南中学师生，开展了驱逐反动校长王言等人的斗争，促使县长陈子坚撤销了王的校长职务。接着又赶走了教务主任张玉甫。为了加强党在宛南中学的力量，经协商由中共党员李寿青任校长，并聘请王尚德、陈振南等同志到该校任教。在王尚德主持下，把原校刊《青光》改名《红光》，大力宣传新思想；揭露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积极支持南阳三十里屯农民抗捐抗税斗争，还组织和领导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捣毁了南阳县反动的国民党县党部。

一九三〇年夏，宛中党组织决定，借南阳各校放假之际，由王尚德、陈振南、马骥远等发起举办宛中暑期补习班。在补习班中，王尚德讲授唯物论，作时事报告，教唱革命歌曲，介绍新书，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一九三〇年，党中央“左”倾错误领导者，指令党在杨虎城部的地下组织，搞军事暴动，从杨部拉出了几个连的兵力。

后暴动失败，组织遭到破坏。不久，杨部反动分子军法处长李连成和县长杜保田率领部队百余人，突然包围了宛中，逮捕了王尚德，同时被捕的，还有十名学生（其中九名是共产党员）。

王尚德被捕后，带上沉重的脚镣，关押在南阳监狱。在狱中，他秘密写信给关押在县政府看守所的被捕学生，鼓励他们要坚持斗争，保持革命气节。这封信，对被捕学生鼓舞很大。反动当局多次对他们进行“审问”，问他们“什么时候加入CP？”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听不懂你的话！”反动当局又问：“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大家早已统一口径，都说：“没有加入共产党。”一些受过王尚德教育的学生，不顾危险前往监狱探望他们的老师。王尚德面带笑容地说：“我很高兴，我的许多学生都参加了革命，革命力量壮大了！”又说：“我年纪大了，死了也安心了。你们年轻，要好好干革命！”学生们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决不辜负党的教育和王老师的培养。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驻守南阳的杨虎城部队撤离河南开往陕西。根据杨虎城释放政治犯的命令，在杨部开赴陕西的途中，王尚德获释返回家乡赤水。

一九三一年春，王尚德到当时驻扎在陕西凤翔县的杨虎城部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主办该军小报《军声报》，参加了党的陕西西区特委工作。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王尚德在西安先后任西安高级中学事务主任兼教师、西北文化日报社总务长等职。这期间，他积极参加领导渭南、华县群众控诉恶霸清乡团团团长王左（解放后被镇压）及郭玉章等反动分子的斗争，还参加领导了渭南

县人民反对反动县长强云成的斗争。强云成是个诡计多端、阴险毒辣、搜刮民财、贪污肥己的坏家伙。但是，表面上他却装出一副道貌岸然、“廉洁奉公”的正人君子的面孔。人民群众仇恨他，但又不敢惹他。王尚德一面支持和鼓励群众的斗争，一面联合与强云成有矛盾的绅士和知情人，组织了一个经济清算委员会，查出了强云成贪污二十多万元的巨额赃款，并在全县布告揭露，戳穿了强的伪君子的假面具，使他在渭南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狼狈境地，终于被驱逐出渭南县。渭南群众普遍称赞：“璋峰真正是敢于为大家办事的先生！”

一九三四年，王尚德回到赤水继续办学。为了解决办校资金，他联合地方有关人士，首先办起了赤水棉运合作社，购买了发电机、轧花机、打包机，规模逐渐扩大，不久又在三原、泾阳等县相继办起了棉运社、信贷社，使关中的棉花运销上海日益增多，生意颇兴隆。所得利润一部分归农校建筑校舍；一部分用于修筑赤水河堤，疏通慈惠渠，后来又修建了拦水坝、水力站，办起农丰面粉厂、轧花厂、皮滚厂、砖瓦厂等。王尚德亲自带领学生植树造林，绿化校园。现在赤水中学院内保存下来的两棵参天大柳，就是当年王尚德亲手栽的。

王尚德举办公益事业，使当地群众受益不少。棉运社以合理价格收买棉花，使棉农免受奸商盘剥；信贷社以很低的利息贷款给农民，秋后还棉花，免受高利贷剥削；开发水利不仅为学校的农场、工厂所用，而且解决了部分农民的灌溉；学校解决了当地群众子弟入学的困难。当地群众赞扬说：“璋峰挣的钱，可以盖所大洋楼，可是他把钱给学校盖了楼，自己还是住着祖上留下来的土房子。”

经过王尚德几年的辛勤奔波，赤水农职学校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成了关中地区一所比较有名的学校。王尚德为了扩建校舍，少花钱、多办事，利用课余时间，亲自带领学生运沙搬石，又用学校早年植的树和校办砖瓦厂制的砖瓦，盖起了两幢二层楼房，把节省下的钱，购买了一批教学用具和仪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发生了西安事变。事变后，王尚德被任命为陕西省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他迅即赶到西安，与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开展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党中央社会部的吴德峰以及西北特支的谢华、徐彬如等同志常有来往，也与红军联络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有过联系。一九三七年初，在红军中工作的张宗逊到西安看病，把王尚德介绍给叶剑英。张宗逊对叶剑英说，当年我去黄埔（军校）就是他（指尚德）介绍去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王尚德又回到赤水学校工作。

一九三七年八月，党的洛川会议后，尚德在赤水镇组织了抗敌工作团、抗敌后援会，广泛吸收一切抗日力量，包括社会名流、学校进步师生、当地农民等。在他的领导下，赤水农职学校全校师生，实行了军事化，全校编为一个民众抗日大队，王尚德任大队长，并聘请有经验的党员军事干部赵全璧任副大队长兼军事教官，宋泮贵（即宋玉亭，后改名蔚青）任军事教官。大队下面设三个中队，中队长由各班教师担任，中队下面设分队，分队长多由学生党员担任，全大队共一百余人。他利用统战关系，从县政府和地方上搞了一批武器，全大队每人一支枪。学生学习军事常识，进行军事操练，同时，增设政治课，以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为基本教材，主要由王尚德讲授。他讲得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

迎。他对学生说：“延安办抗大，我们要向延安学习，办赤大。”王尚德还组织学生到农民中去进行抗日宣传，办农民夜校，成立群众性的农民抗日组织。

赤水农职学校的许多学生，在王尚德的教育下，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一些人入了党，后来成为领导骨干。仅赤水农职学校二八级（即民国二十八年入学的班级）六十余人中，先后约有四十人参加了革命。王尚德还把他在河南邓县任教时的学生孟照莲及另一学生李克林（现名李振瀛）等同志介绍给陕北抗日根据地。同时，他把儿子王允端、女儿王铁送到延安。临行前，尚德给董必武写了信，信中说：“我把孩子交给党，托您培养教育他们。”董必武对王尚德时常怀念，直到全国解放后，还多次打听王尚德的情况，讲述一九二二年在武汉时，派王尚德回陕西建立团组织的一段经历。

王尚德利用职校和自己在当地的声誉，根据省委介绍，先后接待和安排了党的东路特派员刘庚、宋任远、赵希愚等同志，并配合渭南县委书记王杰开展党的工作。西北地区一些党政负责同志来往延安与西安时，也曾在赤水职校秘密停留。赤水职校成为党在陕东的重要联络点和交通站。

王尚德按照党的指示，通过社会活动，安排了一批地下党员到县、区、乡、保以及民团等单位，从事秘密工作。宋蔚青担任了渭南县自卫团团长，薛应忠担任了联保主任，何思杰担任了乡长。他们对于保护群众利益和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起了积极作用。有一次，反动政府向赤水镇的农民摊派了一大批“军粮”，地下党员、当地保长以群众代表的身份找王尚德商量对付办法。王尚德与大家研究决定：这批“军粮”主要由本镇四个大户（地主）负担，不足部分由农民分摊。群众认为这

个办法好，但是害怕地主豪绅和军政要人反对。王尚德说：“有事我来承担。”大地主李才俊不肯纳粮，并把他在外地当过县长的本家兄弟李德安搬来。李德安见了王尚德，先是称兄道弟，寒暄一番，接着就提出免缴“军粮”的问题。王尚德对李说：“目前是抗战时期，政府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贵府是全镇有名的富豪之家，理应多缴，况且老弟身居要职，致力抗日，更应以身效国，起楷模之作用。”王尚德又冷又热的一席话，弄得李德安很尴尬，只好连称：“是！是！是！”李回到家中，对其兄说：“你们不要再说了，以后派多少，就缴多少！”李才俊这个有钱有势的大户如数纳了粮，其他大户也只好乖乖地把粮缴出。群众赞颂：“王先生办事公道，为百姓着想，不怕财主和权势。”

抗战初期，国民党驻陕某部第一师的师部设在赤农职业学校，师长李正先得知王尚德是当地名人，深得民心，又看到“渭南私立赤水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的校牌，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校舍扩建又有省主席邵力子拨款，于是便与王尚德拉关系，想捞取政治资本。他特意给职校和职校办的农丰面粉厂各捐了五千元。王尚德洞悉李之用意，将计就计，说：“为了感谢李师长的资助，是否把职校附近的集成小学改为正先小学？”李正先乐在心里，喜在眉梢，但口头上还表示客气，说：“王先生办事多年，鞠躬尽瘁，大名鼎鼎，当用你我二人的名子为宜，即把校名改为先锋小学。”王尚德说：“我办学素不为名图利，李师长既亦有此好意，校名暂可缓改。”李正先无奈，只得说：“好！好！好！”^①

^①1979年6月访问姚璧池记录。

一九四一年春，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进驻渭南。该师一个姓高的副官在保长的带领下，要占用赤水农职学校的房子。王尚德答应给军队挤出十间房子。可是当号房子时，他们不限十间，几乎把全校房子都要占用。该校师生对国民党军队强占学校，破坏教学的野蛮行为，表示极大愤慨，与高副官发生了争执。王尚德闻讯赶到，当场痛斥了高副官强占学校的军阀作风。他说：“这里是学校不是兵营！不准驻兵！”该师终于未敢在该校驻兵。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王尚德被胡宗南匪部逮捕，先在华县关押月余，后解西安，关进太阳庙街至善巷国民党秘密设置的特别监狱——特拘所。这个拘留所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西安办公厅调查科设立的，是关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监狱，警戒森严，与外界隔绝；狱外有便衣特务，监视来往行人。王尚德在监狱里，遭到了匪特的皮鞭、老虎凳等残酷刑具的摧残，九死一生。他以坚强的革命毅力和必胜的信心，同匪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风亮节。敌人多次审讯，王尚德总是那几句话：“我过去是共产党，现在不是，多年来我一直搞公益事业，办学校，修水利，共产党的事我不知道。”敌人拿不到确凿证据，又捞不到什么油水，既不敢公开处决，又不肯释放，一直关押达四年之久。

王尚德身在监狱心向党，时刻怀念赤水农职学校的前途和命运。他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把自己的意见传达到赤农，鼓励教职员工同心同德，顶住敌人的压力，克服一切困难，把这块革命阵地保存下来。

在此期间，党的地下组织多方设法营救，转托于右任等保释，均未成功。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由

西北文化日报社具保，才得释放。

王尚德出狱后，身体十分虚弱。朋友劝他在西安住一时期，然后留西安工作，他不肯，旋即返回赤水。农职学校的师生，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欢迎日夜怀念的老校长。附近的男女老少也奔走相告：“王先生回来了！”“璋峰回来了！”当时正值日寇宣布投降，人们把“抗战胜利了！”与“王先生回来了！”叫做双喜临门，一时成了赤水镇乃至渭南一带的特大喜讯。王尚德回到学校后，表示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决心，为革命大干一番。他对师生们说：“我生平所办事业虽多，但以学校为中心，学校存在，其他不足虑也。”他还说：“国民党反动派虽不断破坏我生平所办的富国利民事业，但我相信，中国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的。”^①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使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大发展。王尚德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无比喜悦。他了解到当年经他介绍到延安去的学生和自己的子女在革命熔炉中大都成为革命干部，感到自慰和鼓舞，决心继续办好教育事业，为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材。他要扩大班级，但校舍不敷应用，于是亲自带领师生，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兴建了两层各九间的楼房。

一九四六年六月起，国民党反动军队先后向各个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加强法西斯统治。国民党反动派还准备对王尚德下毒手。为了谋杀王尚德，西安国民党特务机关“汇报处”专门召开会议，由国民党渭南县长刘衡、县党部书记长师仙洲、三青团干事长宋雪天、渭南特务长宋翔生

^①1979年6月访问黄有福记录。

等反动骨干分子共同策划，决定就地杀害。他们先派了一批特务分子，化装成摊贩和叫卖贩，有的在赤水职校周围摆摊，有的走乡串巷，日夜监视王尚德和赤职师生的行动。我地下党员李仲实得知敌特的阴谋，即转告王尚德转移隐蔽，赤农校长狄毓林亦督促王尚德从速离开赤水。王尚德临危不惧，仍然坚守岗位。一天晚上，他召集进步师生开了一个谈心会，语重心长地讲述了自己一生艰苦奋斗办学校的经过和目的，最后说，敌人可能再次抓我，这次抓了非同以前，可能长期坐牢，更可能立即处死。对此种种，我无所忧虑和畏惧，唯学校处境艰险，敌人可能要破坏，望你们坚持办学，保持革命精神，相信未来的光明！会间，王尚德激动流泪，在座师生无不感动泪下。

党中央获悉王尚德的处境十分危险，立即电示关中地委，积极设法从速营救脱险。关中地委书记汪锋和渭南县委书记王杰等，按中央指示，准备派人将王尚德接到边区，或者暂时隐蔽起来。但是阴险狡猾的敌人抢在了前面。是年七月下旬的一天，一个便衣特务闯入王尚德家中，自称请王先生给他找个工作。王尚德警惕地说：“你把地址留下，以后有了合适的工作告诉你！”这个特务分子来的目的是认人和认门，他就是十几天后杀害王尚德的刽子手之一。

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时左右，便衣特务十余人，乘一辆大卡车，由渭南县城向赤水飞驰而来，多数特务在农职学校门外监视，一个特务进入学校，扬言请王先生出来有要事商量。当时师生们正在上课，王尚德一人随之走出校门。等在门外的几个特务分子一齐上来，逼迫王尚德向学校西侧的水渠走去。王尚德满腔怒火，痛斥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卑劣行为。这时，特务段振武、段克贵（解放后均被镇压）等，在王尚德背后连开四

枪，罪恶的子弹从他的头部、肺部穿过，王尚德当即倒入水渠中，鲜血染红了渠水。尚德同志英勇牺牲了，时年五十六岁。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王璋峰：《共产党在陕西之起源》，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2.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4月至7月）。
3. 王尚德给团中央的两封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4. 王尚德给林育南的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5. 王尚德给恽代英的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6. 《五四运动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7. 李婉霞等：《武汉地区早期党组织概况》，载《楚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 齐心等：《陕西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初期活动》，《人文杂志》1981年“七·一”专刊。
9. 中共渭南县委：《对王璋峰同志生平革命活动的调查报告》（1979年11月）。
10. 中共渭南县委：《对王璋峰同志政治历史的结论》（1979年11月）。
11. 《魏野畴烈士传略》，《革命英烈》创刊号，1981年4月。
1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3. 《中共南阳地下组织调查汇编》（1927年至1929年），原件存南阳市委档案室。
14. 《中共南阳地区地下组织情况简要汇编》（1958年），原件存河南省邓县档案馆。
15. 《渭南王烈士璋峰先生史略》（1949年），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6. 郑殿华、田涵荣、全秉华、王杰、刘映胜、宋任远、高克林、赵伯平、赵和民、张中、方仲如、包云锦、全中玉、乔凌新、刘庚等写的回忆文章或材料。
17. 王尚德的亲属王铁、王允中、姚爱、王中霞、靖国藩和熟悉王尚德的张宗逊、高克林、吴化之、屈武、赵和民、包惠僧、严信民、

方仲如、张仲实、韩志颖、李波涛、米哲沉、刘贯一、王超北、杜松寿、李锦峰、梁俊祺、周益三、任致中、薛永寿、余海峰、姚璧池、张希祯、乔凌新、蔺奉璧、袁健、黄有福、张归仁、李豫章、郑殿华等的访问记录或信件。

方 方

陆永棣 刘子健

立 志 救 国

方方，原名方思琼，乳名瑶泉，曾用王大钟、释华、星星、野草等笔名，广东省普宁县洪阳镇人。一九〇四年四月十八日，方方出生在一个破产的小商家庭，父亲在一家布店兼书店当店员，母亲和祖母在家做手工。方方八岁入学读书，喜爱看小说，学习写白话文。他在兄弟姐妹十一人中是老大，从小受到父母勤劳、忠厚、耿直性格的影响和熏陶，特别是祖母对他的教育，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印记。祖母常对他说：“富要富得清，穷要穷得明”，“牙齿敲掉连血吞”，“人要有志气”。

二十世纪初期，普宁县和旧中国的广大农村一样，农民受地主恶霸的压迫欺凌非常残酷。就以与方方同族的方姓恶霸地主“方十三”为例，他依仗权势，用“敲铜锣”或“撒粗糠”的办法，肆无忌惮地霸占农民的田地，锣声响到哪里，那里的田就归他，粗糠飞到哪里，那里的田就属他。农民逼得生活无着，有的卖身当“猪仔”到南洋（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做“苦力”；有的惨遭杀害。有压迫就有反抗。这个县在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后，农民反抗恶霸地主欺压的斗争层出不穷。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家境的贫

困，失学的威胁，使得少年时期的方方就勤于思考社会问题，他日渐“仇视”旧社会，他想过要象“一个大炸弹”一样，把旧世界都“炸掉”^①。他对人吃人、人剥削人的现象愤愤不平，但又一时困惑不解。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给他带来了希望。这时，广东潮梅地区和全国一样，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日本货的斗争。方方受到五四运动革命洪流的影响，从积愤和苦恼中开始觉醒过来，以巨大的革命热情投身到爱国学生运动中去。在先进分子杨石魂等发动和组织下，潮梅地区成立了岭东学生联合会，各县也建立了县的学生联合会，方方被推选为普宁县学生联合会会长。在方方、伍治之等人的主持下，普宁人民积极投入了反对卖国贼、销毁日货的斗争。

一九二〇年，方方十六岁，在高等小学毕业。此时，父亲微薄的工资已挑不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方方被迫在家自修及帮助料理家务。他仍终日埋头读书，手不释卷，乡村中的游神赛会等娱乐活动，都吸引不了他。为此，人们称他为“圣人”，以表示对他专心致志、刻苦学习精神的敬重。十八岁那年，他在一个初级小学任体操和音乐教员，并和几位朋友合办一间平民学校，担任义务教员。

一九二三年六月，方方写了一条新闻稿，批评县政府所办的师资讲习所工作的腐败和不负责任，引起教育局官吏的怀恨，要捉拿他游街示众，幸得群众反对，教育局才罢手。事后，他被迫离开县城到乡村教书，并帮助农民反对民军（陈炯明收编的土匪军）的抢掠，帮助当地把初级小学改办为高级小学，因而

^①方方：《自传》（1944年）。

赢得了群众的爱戴，与农民建立了感情。年底，方方同杨石魂、方临川等进步青年组织了洪阳集益社，顾名思义，就是“集思广益”。这些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影响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一起学习科学，探索社会问题，追求救国真理。方方在该社被推为社会科长，在他的组织下，集益社的青年人下乡开展反对封建、灌输科学的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使普宁县的进步学生开始接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方方也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和启迪，于一九二四年暑假，应杨石魂的邀约，去投考第二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广州后，方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并被指定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农讲所学习时，他被编在“东江乡”^①，学习、讨论农民运动的方法问题，有时还往广东大学听孙中山先生讲演三民主义。他不仅受到政治教育，还参加了军事训练，学习军事知识。此时，他结识了彭湃、林甦、阮啸仙等一批共产党人，受到他们的教育和影响，认识到只有革命，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统治，穷苦大众才能翻身解放。农讲所结业后，方方立志走救国救民的道路，决心百折不挠地去实现自己的志向。

投身工农运动

一九二四年冬天，方方回到普宁，在小学继续任教，并从事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他组织农会，向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宣传，发动农民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斗争。此举得到农民的拥

^①方方：《自传》（1944年）。

护，却引起绅士的不满，学校不再聘他任教。他回到县城，和一些进步青年组织普宁县新学生社支部，任新学生社支部书记。支部成立后，即在青年中组织了一批读书小组，阅读《中国青年》、《向导》、《阶级争斗》、《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简史》、《陈独秀讲演录》等书籍及刊物，在青年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工作。

一九二五年二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中共广东区委派彭湃、杨石魂等到潮梅地区建立党的组织，派廖其清、陈醒亚、陈颂等建立团的组织及农民协会。五月，杨石魂、廖其清到达普宁，在普宁吸收共青团员，成立第一个团支部，方方由杨石魂、方临川介绍入团，任团支部书记。此时他写了一首述怀诗，表示他投向革命的坚定意志，诗曰：“欲抽越王弓，慷慨射潮汐；欲挥鲁阳戈，回首止落日。”团支部在党的领导下，乘军阀势力的崩溃，在各地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支援东征军，建立普宁县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公开进行建立国民党的工作，扩大革命力量。方方被推选为普宁县国民党党部筹备委员。

六月，驻扎在广州及其附近的军阀刘震寰、杨希闵阴谋叛乱，东征军回师广州。陈炯明乘机再次控制东江，刚兴起的潮梅革命运动，一度处于逆境。党指派方方负责联合国民党左派，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工作。他到潮安与方维精共同筹划，建立了一支约有百人的农民自卫军独立营，方维精为营长，方方任秘书长和团特支书记。独立营是潮汕地区党领导的最早一支农民武装。是年冬，这支农民自卫军根据党的决定，策应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在潮阳县关埠夜袭潮汕军阀洪兆麟，牵制汕头之敌。其后，农军又在潮汕铁路沿线，破坏敌人的交通

运输，有力地配合国民革命军取得了东征的胜利。当时上海《申报》对这支农军的英勇行动，作了报道。东征军进入潮汕后，方方又回到普宁，利用他负责国民党普宁县党部常委兼秘书长的职务，坚持农工政策，扩大农会组织，发动农民同地主恶霸欺压农民的罪行作斗争，迫使当局惩办其祸首，赔偿农民的损失。在这些斗争中，方方表现出他为民除害的无畏精神。当他抨击本族一个同姓的大恶霸地主时，他的一个好朋友即劝告说：“你是晚辈，又何必如此，你骂他一百句，他不在乎，他回骂一句，你就永世出不了头的！”但方方坚定地回答：“我就是讨饭也不到他家门口去，他又能奈我何呢！”^①由于方方勇敢地领导农民与地主阶级作斗争，因而被土豪劣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说方方“危害宗族”，对方方的父亲扬言要把方方开除出方氏族谱，并要杀掉他来“祭旗”。方方知道后，一笑置之，说：“我就是革他们的命！不给姓方，我偏要姓方，而且还要用方字来取名。”^②方方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以表示他对旧社会恶势力的反抗。

一九二六年春，方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更坚定对革命的信念，立下了革命到底、“为党牺牲一切”^③的决心。这时，党调他到潮安从事工人运动，以配合彭湃领导的东江农民运动。他先在潮安上蒲区任党的特支书记兼工农学校校长；夏天，调潮安庵埠任党的特支书记兼总工会秘书长；冬天，调潮州任县工委书记兼潮安总工会秘书长。这期间，他经

① 《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将军》，载《华商报》增刊1949年9月30日。

② 林西园：《方方同志轶事》，载《蛇岛》1980年第2期。

③ 方方：《自传》（1944年）。

常深入工人中去，同工人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疾苦，发展工会会员，在工人中开展反封建把头的斗争；还通过工会组织派出得力干部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协助组织农民协会，提出了“起来斗争，才能生存，工农团结才有力量”的口号。“五一”劳动节那天，潮安数万工人和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潮州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口号，响彻云霄，显示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

反抗白色恐怖

一九二七年，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的反动派也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四·一五”事变前夕，党组织通知方方转移。但方方考虑到革命工作的需要，乃毅然留下。就在反革命政变的那一天晚上，反动武装前来包围工会。在这危险的时刻，他得到工人掩护，脱险逃出；第二天，又在工人的帮助下，乘小船沿韩江而下，离开潮安。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各地，方方对敌人的反革命屠杀政策义愤万分，为自己的战友被捕、被杀而感到十分悲痛，决心要为战友复仇。这时，他奉党的命令，潜回潮汕农村，组织农军，反抗敌人的屠杀，率领农军以赤色“恐怖”来回答敌人的白色恐怖。这样做，虽然有些不够策略，但是他们敢于在敌人的屠刀下拿起武器英勇地进行反抗斗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则是难能可贵的。不久，队伍被打散，方方被潮、普两地反动派指名道姓，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于是逃到广州，

不久再转赴泰国曼谷避难。同年九、十月间，当方方得悉由周恩来、朱德、贺龙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到达潮汕，虽遭失败，但潮汕一带党组织已恢复的消息时，便立即筹集路费经香港回国。在香港，他与省委委员杨石魂取得联系。十月末，奉省委之命回潮汕工作，任潮安县委宣传部长兼赤卫军第三团（潮安）的党代表。革命失败后几个月的颠沛流离生活，给方方以深刻的教育，当时他曾给父亲写信说：“做工的苦，你比我知道得多，教书的生活，我也尝了几年，没有出路；溜乌水（俗语说过番）也已溜过，人们是如此无情。因此目前我所走的路，虽然危险，但是唯一的大路，唯一的出路。”^①此后，他在党的领导下，长期在闽粤赣边地区与广大群众一道同生死、共患难，不屈不挠地坚持革命斗争。

一九二八年初，革命处于低潮。敌人疯狂的屠杀所激起革命者的复仇心理以及对革命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很快在党内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在普宁一带坚持游击战争的方方也受到这种思想倾向的影响，到处乱打和组织暴动。他曾在潮安县委机关刊物《赤潮》上，写了一篇题为《死》的文章，说明中国人死的可能性很多，饥寒、兵刀、水火、盗贼……皆可致死，要死中求生，就只有杀死置人于死的统治者。他把革命斗争主要理解为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是年春，他奉党的命令去破坏潮汕铁路火车时，买了《水浒》一书，仿效吴用打大名府时调兵遣将的方法，结果没有打成功。夏天，他参加了彭湃在大南山主持召开惠州、潮州、梅州党的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由于敌人包围，与会者被冲散，他和其他同志只好回到各

^①方方：《自传》（1944年）。

自的岗位。秋天，省委书记李源到潮梅地区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指示停止暴动，恢复群众工作，党组织应从日常细小斗争做起，以恢复群众勇气，然后再待机暴动。方方通过斗争的实践，认识这一指示的正确，表示坚决执行。此时，白色恐怖严重，各地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革命斗争处于极端艰难困苦中。方方和游击战士们为了避免牵累群众，保护农民群众的利益，住在荒郊破房里，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但丝毫没有动摇对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一次，方方到舅父家，舅父母见他无衣无着，无处藏身，怀着怜爱的心情劝他回家，不要再在外面奔波了。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要革命，革命的道路没有走错，那怕骨头烧灰，我还是要做共产党！”^①他还勉励战士们，要有一颗不能屈服的雄心，战斗到底。在方方的带领下，游击战士们不怕艰难险阻，昼伏夜出，开展工作，在韩江一带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

一九二九年春，方方参加广东省委在香港举办的训练班，学习“六大”决议。夏天，他到八乡山参加东江特委召开的各县代表会议，讨论地方暴动和建立红军等问题；会后，任东江特委宣传委员、职工委员会委员。秋天，东江特委派他到普宁县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不久，又改任县委书记。在工作中，他认真贯彻“六大”决议精神，专心致力于日常细小斗争的发动，恢复各区群众工作，积蓄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努力，到冬天，普宁九个区都建立了农民协会，成立全县农民代表会议，组织了县和区的武装队伍，普宁县的工作迅速开展。

^①林西园：《方方同志轶事》。

一九三〇年春，方方调任汕头市委书记。夏天，东江特委执行立三路线，计划发动惠阳、潮洲、兴梅总暴动，提出“打到汕头去”等“左”倾冒险口号。方方认为暴动条件不成熟，搞暴动只有作无谓的牺牲，因而受到批评处分，并被调到潮阳县工农革命委员会任党团书记。

十二月，李富春和邓发到太南山，主持召开闽粤赣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主要讨论如何把三省边界根据地联成一片，扩大红军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选举邓发为书记。方方出席了这次会议，任大会秘书长。会后，他和肖向荣等同志一起随邓发赴闽西工作。

在 闽 西 苏 区

一九三〇年底，方方进入闽西苏区，任闽粤赣边区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红旗报》编辑。

一九三一年秋，方方到汀连县任县委书记。为巩固苏区根据地，他积极发动群众，参加苏区的各项建设活动。在肃反工作中，他发现一些负责肃反的干部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和阶级路线，主观逼供，犯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他意识到这样肃反只能葬送苏区，便立即召开会议，予以制止。方方认为要把肃反工作搞好，必须正确执行政策，依靠贫雇农，发动群众解决好土地问题，才能真正查出坏人。于是带领干部到各乡召集贫雇农开会，培训贫雇农的骨干分子，从中提拔干部，发展党的组织；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从而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肃清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坏分子，逐步巩固了苏区根据地。不少过去逃往白区的群众也纷纷回来，踊跃参加苏区的

各项活动。方方及时地总结了这一经验，撰写文章登在《红旗报》上，说明成绩的取得“是充分发动群众，明确阶级路线”^①的结果。

一九三二年春，闽粤赣边区省委召开党的代表会议，方方任大会秘书长，被选为闽粤赣边区省委执委。红十二军占领上杭后，省委即调方方任杭武县县委书记，加强前线的领导工作。四月，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打下漳州，消灭了张贞的四十九师。在回师途中，毛泽东指示闽粤赣边省委，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毛泽东接见了方方，并指示他要集中力量加强上杭河西的游击战争。这时，闽粤赣边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作为省委的全权代表，赴上杭白沙指导游击战争。方方在省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在上杭、永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反“围剿”的斗争，稳定了上杭、永定的局面，为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努力。这一年冬天，龙岩受敌进攻，我红军退出，省委调方方到龙岩敌后布置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他回到上杭任中心县委书记兼杭永岩游击队纵队政委。

一九三三年春，中央苏区中央局推行“左”的政策，反对毛泽东代表的正确主张，在福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当时罗明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主张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因而受到“左”倾错误执行者的打击，并把他的意见错误地夸大为

^①方方：《自传》（1944年）。

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①。这时方方在罗明领导下工作，赞成罗明的主张，也因此受到错误的批评，并从前线调回后方做扩大红军的工作。方方虽然受到错误的批评，但并没有气馁，而是以党的利益为重，一心一意把党的工作做好。在扩大红军工作中，他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疾苦，从关心群众生活入手，在发动群众生产支前，扩大红军工作上都获得优异的成绩，才溪乡一百个青壮年中就有八十八人参加红军，公债也销得很多^②。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表扬了方方的工作，赞扬他所领导的才溪乡是模范乡。

一九三三年冬，方方调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曾代表福建省军区与十九路军的代表谈判边界的划分问题，不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四年一月，他和张鼎丞代表福建省委参加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四月，中央苏区正处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紧张时刻，中央军委决定派几个独立团到敌人后方发动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他接到军委的通知，到瑞金接受新的任务。在那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指示他带领独九团到永安、连城、宁洋、龙岩、漳平一带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宁（洋）漳（平）筑路计划，然后向泉州推进，以拖住敌人的后腿。于是，他带着约二百人的队伍从汀州向永安进发，到永安和独九团会合。鉴于独九团是远离苏区单独作战的队伍，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33），《毛泽东选集》第1001—1002页。

②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32页。

会合后，他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兼独九团政委。独九团在他的领导下，紧密团结，在军事上采取了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很快就肃清了周围的地主反动武装，在连城、宁洋、龙岩三县的边界，建立了一个方圆三百余里，有四、五万人口的游击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开展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举办干部学校，加紧练兵，发展游击战争，取得新的胜利。同时，他还组织队伍向漳平、宁洋出击，破坏敌人漳宁筑路计划，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

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独九团的工作也受到影响。“左”倾错误的执行者认为，方方搞小块根据地是闹独立，因而撤销了他的独九团政委的职务。此刻，方方首先考虑的是党的工作，全局的利益，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团结同志，用正确的方法，旗帜鲜明地开展斗争。他冷静地说：

“一个红色军人，绝对服从命令，准备交代。至于争论问题，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①他把工作交代后，要求去地方工作，以指导游击队和基层党政建设，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巩固党的组织。他的部下关心他，打算派一连兵力护送他回苏区。他坦然地对同志们说：“你们在这里，我想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担心你们和朱森（三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方方的独九团政委职被撤后，独九团由他领导）的团结问题。至于我，随处都是工作，如果朱森能同意你们派一连人送我回去，我可以一路打游击回老家，就是路不通，也会到处播种生根，横竖这里一带一直到苏区，我都有群众关系。”^②

^{①②}方方：《三年游击战争》，载《红旗飘飘》第18集第92、93页。

三年苦斗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军队闯进了各根据地，进行疯狂的烧杀。一九三五年春，敌人以一个师四个团的兵力，围攻连城、宁洋、龙岩三县交界的根据地和独九团，形势非常险恶。而独九团的领导人在军事上又采取了硬打硬拚的“左”的战略战术，使部队伤亡严重，几乎搞垮。这时方方虽被调离了指挥岗位，但在这关系到部队存亡的紧要时刻，他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当时军事上的错误决定，要求召开会议，让他发表意见，正确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当部队向闽南突围时，由于指挥上的错误，又损失了二百多人，部队思想更加混乱。独九团的主要领导成员还闹不团结。方方严肃地对这些干部说：队伍是党与工农的，“你们尽管有意见，但不能把队伍放在这里置之不理，如果你们不指挥的话，我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资格，对阶级负责任来指挥。现在我已经找到张（鼎丞）主席，我主张向他靠近去解决问题。”^①经过方方的耐心工作，独九团的干部同意他的意见。就这样，方方率领独九团突围出去与张鼎丞的部队汇合。在张鼎丞、方方的主持下，部队在闽西金砂召开了会议，独九团的干部在会上检查了军事行动的缺点和错误，促进了干部相互间的团结。为了统一行动，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委员由张鼎丞等十三人组成，张鼎丞为主席，方方为政治部主任。

这时候，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部先后从江西中央苏区

^①方方，《三年游击战争》，载《红旗飘飘》第18集第97页。

突围南下，几路队伍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终于在闽西与张鼎丞、方方的部队汇合。一九三五年四月，苏区中央局陈潭秋在闽西永定县溪南区赤寨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闽西南地区党政军会议，大家兴奋地听取了陈潭秋传达关于遵义会议的决定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扩大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闽西南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会议还根据主力红军已经北上，中央苏区根据地已经沦陷，红军和游击队失去了依托，部队不断减员的情况，确定闽西南红军和游击队的行动方针，已不再是执行牵制敌人、掩护红军长征的任务，而是发展广泛的、胜利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而游击战争的目的是保存精干，打击敌人，保卫人民，尽可能保卫土地以待机恢复苏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会议一致补选邓子恢、谭震林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方方仍为常委和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第一作战分区政委，领导第一作战分区的武装斗争。从此，闽西南的游击战争在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一九三五年四月至七月，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已转过头来对付闽西，以九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对闽西游击区进行“清剿”，叫嚷“要在三个月内肃清红军游击队”。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战参谋朱森则于此时叛变投敌，并带领敌人进攻我游击队。闽西游击队不仅要同数十倍于我军的敌人作战，还要对付叛徒。面对这样严重的敌情，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作出分散活动，独立作战，以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渡过难关的决定。方方乃一面以朱森叛变投敌事件对部队进行教育，布置机关和同志转移，以防敌人破坏；一面带领部分武装准备打回连、宁、岩去开展工作，但遭到敌人前堵后追，计划无法实现，一时又失去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联系。这时，敌人在我游

击区不仅实行反动的保甲制度和连坐法，而且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并村、计口售粮、计口售盐等最毒辣的手段，强化其反动统治，使我游击队与群众隔离，妄图置我游击队于绝境。我部队供应遇到严重困难，既缺弹药又缺粮，战士们在深山密林中有时十天半月无饭吃，半月无干衣穿，常以野果野菜充饥，常是“大树遮身待天明”，有病无医药治疗，不少同志英勇牺牲了。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方方不畏艰险，顽强战斗，他下定决心，不粉碎敌人的“清剿”不剃须。日久天长，他的须长及胸，所以大家都叫他“老头子”。在他坚定的革命精神影响下，部队指战员增强了斗志，促进了团结，大家同生死共命运，共渡难关。他发动大家分散联系群众，分化、争取敌乡、保、甲长，取得粮食，使战士们的生活获得基本保证；对敌斗争则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常与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敌人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他还根据红四军《告绿林兄弟书》的政策精神，与绿林兄弟交朋友，阐明我党的土地政策，以诚相待，使绿林兄弟愿与我歃血为盟，配合我军牵制敌人。就这样，方方带领游击战士既同敌人打军事仗，又打政治仗，给敌以沉重打击，并把周围百余里数十个大小乡村和几个高山的群众工作建立起来。在绿林兄弟的帮助下，建立了卫生院，建立了部队休息的总后方，使伤病员获得治疗，队伍得以休整，并抓紧机会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这样，我军终于在远离主力、十分孤立的环境下，击退敌人的多次“围剿”，建立和扩大了游击活动据点，扭转了斗争的局面。

一九三六年春，方方从报上看到红军东征、提出抗日救国的主张等消息，得悉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动，于是立即率领队伍转向龙岩、永定一带，寻找我军政委员会。经过艰苦转战，终

于在是年夏天，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重新汇合。队伍汇合后，方方任军政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冬天，闽西南的游击战士又战胜了广东军阀余汉谋三个师的包围进攻。从此，闽西南的游击战争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

在闽西南的三年斗争中，方方极力主张统一领导，加强团结和依靠群众。他所率领的部队，无论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总是保持着共产党的鲜明旗帜并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一天，方方和张鼎丞等在一座高山上，俯瞰四周的无际田畴，河流交错，感慨地说：“如此米多鱼肥，假如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还不是个山大王吗？”^①大家相视而笑。事实正是这样，当时闽西南的游击队能在远离党中央的孤立环境中，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击退国民党十师之众的五次“围剿”，保护闽粤赣边区老百姓已经获得的革命利益，靠的正是共产党的旗帜和党的路线。关于这段艰苦斗争生活，后来方方在一九四八年以“野草”的笔名，写成《三年游击战争》一书，在香港《正报》周刊连载。郭沫若为这本记录历史真实的书写了“序”，其中说到：“中国近三十年来是旋乾转坤的大时代，无数伟大的历史事件比太平洋的波涛更加壮阔地层现叠出，一波盖上一波。然而可惜的是差不多每一个伟大事件都没有一部详细的记录。象本书的作者这样，以历史创造者而兼历史的记录者，这是很少有的事，因此，也就是弥足珍贵的事。”“水有源树有根。读了这部书，你才更能了解新四军和八路军。读了这部书，你才更能了解工农阶级子弟兵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丰功伟绩，的确是革命斗争史上不可磨灭的一

^① 《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将军》。

页。”^①

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抗日战争即将爆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仍然企图削弱以至消灭我们的力量，拔去我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据点。为此，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派方方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向党中央请示在新形势下的工作任务。

方方接受了组织的委托后，从永定经大埔、汕头、上海辗转到达延安。在延安期间，他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受到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的接见，并列席了中央召开的一些会议。党中央、毛泽东等对闽西南游击战争非常重视，请方方到党校、抗大作“三年游击战争”、“三年群众斗争”的报告。毛泽东对方方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二十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②“你回去问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各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③。一九三七年九月，方方回到了闽西，带回中央关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传达了党中央对闽西南革命斗争的高度评价与关怀，给闽西南坚持斗争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

一九三七年冬天，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闽粤赣边区党代表会议，决定取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闽粤赣边区省委，张鼎丞为省委书记，邓子恢为宣传部长，方方组织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负责领导闽粤赣边区党的工作，

^①方方：《三年游击战争》，载《红旗飘飘》第18集第75、77页。

^{②③}魏金水：《光明磊落，奋斗终生——深切怀念方方同志》，载《南方日报》1979年9月16日。

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华南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与我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在西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南方八省的红色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闽西南和汀瑞红色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并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开赴苏皖前线抗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随军北上，方方则留下，担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后对外则称为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负责领导闽西南、潮梅等地区党的工作，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在抗日斗争的新形势面前，如何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是个新的课题。此时，闽西南长期的内战虽告结束，然而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在千方百计地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既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又要对它的反共反人民行为作斗争，环境错综复杂，工作千头万绪。但是，方方却能应付自如。他首先具体分析了当时闽西南形势的特点：（一）部队开走了，国民党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我们是相对的孤立；（二）日寇未侵入闽西南，不是沦陷区而是国民党统治区；（三）闽西南老区群众多年反复受摧残，大的乡村虽然能掩护我们，但群众困难很大。在潮梅，则有广阔的地区可以发展，有我们曾经广泛地播下的革命种子。根据上述特点，他提出了“巩固闽西南、大力发展潮梅新区”^①的方针。

一九三八年这一年，国民党对日正面战场的大溃退，使国

^①魏金水：《光明磊落，奋斗终生——深切怀念方方同志》。

国民党统治集团更加恐慌与动摇，亲日派散布失败主义论调，亲英美派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在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反对我党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取得速胜。在抗日战争问题上种种错误思想，也反映到闽粤赣边地区来。这时，方方常常以穉华的笔名在《前驱》这个公开出版的党刊上写文章，分析闽西南、潮梅地区的形势，批判错误论调，明确地提出战斗任务。在日寇占领厦门后，他写了《闽西南目前形势与我们应有的努力》^①，提出保卫闽西南的任务。他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结合闽西南的情况，又以穉华的笔名写了《从目前战局说到闽粤边军事上应有之部署》，文章说：“我们应该清楚，战争长期性与残酷性因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是早已决定了的。怎样在这长期性与残酷性的战争中来消耗敌人，削弱敌人，我们是不能不早为准备的。唯有这样充分的准备，充分的动员，才能够不断打胜仗，才能够削弱敌人，才能够转变我的有利形势，才能够把战争的时间性缩短起来。谁想我们不抵抗日寇的进攻，就会‘适可而止’，那是痴人说梦而已。”^②

一九三九年二月，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举行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方方在会上作了《为实现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而奋斗》的政治报告。他分析了抗战形势和闽粤边政治形势，并结合闽西南、潮梅地区的特点，阐明如何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他向党的干部指明，今后的斗争是长期的、

① 《前驱》第9期，1938年6月15日。

② 《前驱》第2卷第2期，1938年9月1日。

残酷的，要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有利的斗争形式，壮大革命力量，为保卫乡土，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奋斗。

在闽西南、潮梅特委的领导下，我闽西党组织冲破了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公开合法的形式，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普遍建立了各种抗日团体，发动群众慰劳募捐、义卖，制慰问袋送给新四军及前线抗日友军，把各阶层人民都组织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使我党所领导的地区和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潮梅地区，我党则利用国共合作形势，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梅县和潮汕两个中心县委，其余各县都相继建立党的组织。党的工作通过领导各种抗日团体，如“青抗”、“学抗”、“妇抗”等，发动大批知识青年、学生、教员、工人、农民、妇女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各地区党的组织还通过出版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动员人民奋起抗战，如特委公开出版党刊《前驱》，梅县党组织领导出版《梅县民报》，潮汕党组织领导岭东青抗会通讯处出版《抗敌导报》等。

此时，方方不仅注意放手发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投入抗日运动，而且对国民党方面的统战工作也非常重视。如对国民党在各地的抗日自卫团，我党则派出人员进入这些组织做工作；对国民党政府官员、乡绅则推动他们进步；对国民党的地方军队则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总之，尽一切努力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站到抗日斗争的行列。由于我党提出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及各地党组织的努力工作，兴梅、潮汕、闽西南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

在壮大革命力量的同时，方方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分裂阴谋，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击。

新四军二支队北上后，国民党福建省当局即下达了一系列的反共密令，在各地制造摩擦，迫害我党我军工作人员、复员老战士、革命家属。在龙岩设立的“新四军办事处”被取消，改为“新四军后方通讯处”，随后该处又被解散；在白土设立的“新四军后方留守处”也被取缔。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的反共行为，方方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前驱》刊物上，他以穉华的笔名写了题为《由“不服从命令”，说到“视为土匪严予惩办”》^①的评论文章，提出希望国民党统治当局，站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立场上，建立亲密的互信，并严正地要求国民党当局迅速交还我闽中被缴武装，释放被俘人员，给予抗日党派更多的活动机会。在闽西南，当时我们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一个焦点是土地问题。新四军二支队北上后，国民党六区专员公署立即推翻“和平谈判协议”，策划反动地主组织“业主团”向农民收租夺佃，企图夺回农民在土地革命时期分得、而在长期斗争中保留下来的土地。在这个问题上，方方坚决捍卫农民群众利益，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他说：“不要小看这十几、二十万亩土地，其意义是很大的。”^②为此，他亲自领导了这一斗争，采取了争取开明的中小地主，中立中间动摇分子，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顽固的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策略；并开展广泛宣传，向社会公开揭露顽固派破坏协议、强夺土地的阴谋，取得了社会的同情。这场斗争持续了几年，农民始终保住了苏维埃时期分得的土地，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现这样的事情，真是一件奇迹。

①《前驱》第6期，1938年4月1日。

②魏金水：《光明磊落，奋斗终生——深切怀念方方同志》。

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和“巩固闽西南，大力发展潮梅新区”方针的贯彻，使我党领导的闽粤边区，冲破了多年辗转山区基点的狭小圈子，扩大到漳、厦、潮、汕和兴梅一带，形成了一个在西与广东的东江接壤，在东与福建的永安、泉州毗连的大片地区。

一九三九年十月下旬，特委在梅县松源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会议选举了方方、王维、伍洪祥、苏惠等为边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一九四〇年秋，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指示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直属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南委负责领导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区党的组织，由方方任书记，张文彬任副书记。南委机关设在广东省大埔县白区。南委机关在方方的领导下，出版党内刊物《学习》，以指导各地的斗争。这时，蒋介石国民党在日本侵略者的诱降下，加紧进行反共活动，布置其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多的破坏和压迫。潮梅各县的“青抗”、“学抗”先后被解散，由我党领导编辑出版的《梅县民报》、普宁《青报》被取缔。南委根据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①这一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方针，立即撤退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并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把党的组织由原来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采取个别单线联系。“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向我进攻，

^①《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752页。

逮捕、杀害我党干部及革命群众，环境日趋严重。但在南委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粤、桂、闽、赣几省的抗日斗争仍有很大的发展，打击了华南的日寇和伪军。

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二年五月，江西、粤北等地党的省委领导机关相继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长饶卫华等一批重要干部被捕，叛徒郭潜带着敌人疯狂地到处搜捕我地下党领导人，我地下党组织处在严重的危急状态中。当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获悉粤北省委被破坏的消息后，即于六月八日发出《对南委行动指示》，指示南委与江西、粤北断绝一切联系，南委负责同志立即分散隐蔽，属下组织暂作静止，不作声息，不做任何活动。八月，又指示广东党组织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在白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以及撤退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其余干部则利用社会关系，实行勤学、勤职、勤交友活动。南委和各级党组织迅速传达和贯彻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方方镇定而果断地组织干部撤退和隐蔽。他首先考虑的是战友的安全，为战友的转移布置了安全的路线以及保护工作。在机关人员和电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后，当敌人正向高陂镇包围的危险时刻，方方才与一机要员化装成父女关系，由一老妇人和一交通员掩护转到埔北隐蔽，并继续领导各地党组织撤退。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和宣传部长涂振龙，由于没有按规定的路线撤退，不幸在大埔高陂遇叛徒而被捕。在敌人疯狂的搜捕面前，一些干部惊慌失措，只顾自己撤退不顾党的工作，甚至说“南方工作可有可无，无也无关重要”。方方则认为，通过职业化在南方隐蔽下来是可能和安全的，他严厉地批评了那

种动摇慌乱的错误思想，指出，撤退是必要的，但并非溃退，在撤退时要做好准备工作，要安顿好下层干部。由于方方坚决执行了南方局的指示，镇定地组织撤退工作，迅速克服一些地方在撤退时出现的混乱现象，使党组织免受更大的损失。

在特务满布的艰险斗争环境里，方方化装成商人经常往返闽粤边区乡村指导工作。一九四二年九、十月间，方方被当地土匪绑票。周恩来获悉后，立即指示潮梅地区党组织，要不惜代价营救。经过党的营救，方方终于脱险。一九四三年五月，他到达重庆。周恩来见到方方，热情地和他拥抱，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到延安学习

一九四三年八月四日，方方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参加整风运动。

二十年来，方方大部分时间都在激烈的斗争中度过。戎马倥偬的生活，连年征战的奔波，使他没有能够“静静的坐下思考问题”，初到党校，虽有些不习惯，但很快他就感到学习革命理论，对他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他说：我对学习感到“异常的有兴趣”，“对问题的认识，思想改造，是日见增进与提高。”^①在党校的两年期间，他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马克思、列宁著作，毛泽东著作及整风文献，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总结自己二十年来的斗争经验，特别是与战友们一道总结了抗战六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把斗争的实践

^①方方：《自传》（1944年）。

提高到理论上认识，他自觉地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了思想根源，明确了改造思想的努力方向。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方方出席了党的“七大”。他学习毛泽东等同志的报告及有关文件，更深刻体会到狭隘的农村工作经验不足以搞好工作，中国革命必须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深深认识“七大”路线的正确。他衷心拥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对党的事业和未来的斗争更坚定必胜的信念。他说：“二十年来，由于我的出路，我的利益已经和党的利益不可分开，由于我已尝过了旧社会残酷的滋味，我在工农革命运动的熏陶与教育下，看见了已经胜利（苏维埃）和将要更大的胜利（新民主主义社会）。真理何在，已由历史告诉了我，故我人生观是确定了的，不是一时的成败和利钝所能动摇了的。”^①在延安两年的生活，使方方思想理论水平提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他尔后做好党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北 撤 谈 判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竟然丧心病狂地加紧策划内战。霎时间，内战的阴云密布。为了使人民免受战争的灾难，为了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实现全国人民迫切期望的和平，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准备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粉碎其军事进攻。

^①方方，〈自传〉，（1944年）。

这时，方方奉党中央的命令于一九四六年一月随周恩来、叶剑英乘机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参加国共和谈，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的政治顾问。

《双十协定》和《停战令》签署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即密令其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令国民党广东当局在最短时间内消灭华南中共部队。广东当局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以强大的兵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队。在这严重的时刻，方方被任命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以少将身份到广州执行停战协定和解决华南抗日游击队北撤的问题。他深知这项工作的艰巨与复杂，但想到人民在内战中所受的灾难，就坚定地说：“我决心来替家乡做一件事。”^①此后，他把自己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这项工作上。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方方和军调部第八小组成员（简称第八小组）乘机到达广州。在欢迎他们的鸡尾酒会上，国民党的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假惺惺地表示不愿打仗，欢迎和谈。会后，当许多记者纷纷要求美国代表和中共代表就和平问题表示意见时，方方针对张发奎的讲话向记者指出：“共产党人一贯主张言行一致，张将军既已表示愿意和谈，今后就要看行动了。”^②方方以其敏捷的思想，锐利的言辞，与国民党广东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和谈一开始，国民党广东当局就设置了重重障碍。他们拒绝承认我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污蔑我游击队为“土匪”，

① 《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将军》。

② 凌志明：《疾风知劲草，斗争见忠贞——回忆方方同志在和谈斗争中给我的教育》，载《劲松赞——方方纪念文集》。

使调处工作陷于僵局。他们阻拦第八小组我方代表与外界接触，使我方代表一时无法与广东区党委取得联系，局势非常严重。方方机智地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封锁，用“方旭”的名字写信给我党公开出版的《正报》，说：我在广州无法看到贵报，希望贵报把出版的各期寄几份给我。《正报》社收信后，即通过地下党的同志按地址送去给他，取得了联系。随后，方方又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华商报》驻广州特派记者邬维梓等同志，公开揭露国民党政府无视中共抗日部队的抗战功绩，揭露国民党政府诬蔑东江纵队是“土匪”的阴谋，揭露国民党政府阻挠军调部第八小组调处工作的罪行。

此时，国民党广东当局一面拒绝调处，一面调集重兵猛烈进攻我东江纵队和琼崖独立纵队。他们企图迅速占领该区，将我部队一举歼灭，以证明他们“东江无中共军队”的谎言。方方为挫败国民党广东当局这一阴谋，一面电请北平军调部制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一面向国民党广东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经我广东区党委、东江纵队司令部发言人发表重要谈话，对国民党广东当局玩弄阴谋，发动内战的罪行进行有力的揭露后，各阶层人民和海外华侨纷纷呼吁制止内战。方方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暴行，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主张的大批电报、信件。

在我人民武装的反击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广东当局不得不承认以曾生为司令的东江纵队为中共部队，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谈判刚要恢复，张发奎又横生枝节，来电要方方到香港会晤。方方看电报后，气愤地说：“怎么叫我去香港？现在应该叫他来！如我去须有两条，一是毛泽东叫我去，二是

东江纵队安全北撤。”^①有一回，美国的代表说：“你们共产党是拥护‘蒋主席’的，为什么不可以多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呢？”方方郑重地回答：“我们和蒋介石谈和平民主，但他如违反和平民主，我们就反对他。请你认识清楚，我是毛泽东的将军，不是蒋介石的将军！”^②在会谈时，国民党代表黄维勤再度攻击中共部队，污蔑中共部队破坏停战协定。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方方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和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高贵品质，在黄维勤的发言尚未结束时，他就把来自各方面的千百封电报、信件摆在会议桌上，向张发奎派来的代表严正指出：“桌上的电报信件是事实的见证人，请政府代表转告当局，如果尊重事实，我们就坐下来，老老实实谈个结果。如果要打，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怕。”^③

三月三十一日，重庆军事三人会议派出三人小组（中共代表为廖承志）到广州会同第八小组解决华南抗日纵队北撤问题。国民党广东省行辕主任张发奎才被迫与中共代表廖承志、方方、曾生、林平等就北撤问题进行谈判，几经周折，终于在四月二日签订了北撤协定的三条原则。

四月六日，三人小组回重庆，第八小组留在广东监督运送东江纵队北撤人员。廖承志在离开广州前夕，对方方率领的中共和谈代表团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对他们在广州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给予赞扬。

五月二十一日，北撤达成最后协议。二十三日，军调部第八

①赖仲元1981年10月的回忆。

②《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将军》。

③凌志明：《疾风知劲草，斗争见忠贞——回忆方方同志在和谈斗争中给我的教育》。

小组公开在广州召开全市记者招待会，发表最后的协议公报。方方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庄重地指出：“中共武装北撤，是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执行长江以南撤走武装人员的诺言，是顾全大局，是说话算数的。中共方面以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一撤退，以取信全国人民，告慰广东父老。”^①他的讲话，有理有节，光明磊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天下午，中共方面的代表举行答谢晚会，方方在会上讲话，含蓄地说：和平不能乞求，邪恶未除，斗争不止。

北撤协议的达成，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协议达成后，从遥远的粤北山区到滨海的大鹏湾，国民党都部署重兵，酝酿新的破坏阴谋。他们竟然开动五个团的兵力，进入东江地区，妄图破坏中共部队的集结。我在增江河畔沙塘圩的部队遭国民党军队袭击，牺牲了八位同志；我粤北部队在南下过程中，遭国民党军队尾追截击。方方对此气愤不已，并提出严正抗议，他迅即约见报社记者，呼吁舆论界对国民党的军事阴谋予以揭露。六月十五日，当军调部第八小组到大鹏湾执行监督北撤工作时，国民党军队违背协定，在距沙鱼涌不到一天路程的横岗和距大鹏镇约二十里的虾涌，忽然增设重兵，并从坪山、淡水、横岗等地向我军驻地压过来，使我集结在大鹏湾的中共北撤部队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方方向国民党驻军一再提出强烈抗议，并会同东江纵队司令部，组织部队作好自卫反击的准备，这才使国民党的阴谋未能得逞。

经过我方反复的斗争，六月三十日，东江纵队二千四百多

^①温流：《谈判忆旧——我所见到的方方同志》，《羊城晚报》，1981年3月20日。

名指战员集中于宝安大鹏湾沙鱼涌登船北撤。为欢送东江纵队北撤，方方代表中共中央军委给全体北撤同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使北撤健儿受到极大鼓舞。七月五日，北撤健儿胜利到达山东烟台解放区。北撤的胜利，凝聚着方方的一份心血。

重新点燃华南游击战争的烈火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它要把广东变为其战略后方基地，乃强化法西斯统治，违背北撤协定，到处设立集中营，捕杀我复员人员，迫害爱国民主人士、进步学生，摧残民主运动，大肆推行“三征”（征兵、征粮、征实）苛政，把人民群众重新推入苦难的深渊中。

为了加强华南党组织的领导，开展华南游击战争，发展民主人士、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反美反蒋统一战线，在东江纵队北撤后，党中央调方方到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不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领导广东、广西、云南和闽粤赣边党的工作。在华南地区，党的工作既要进行武装斗争又要进行政治斗争；既要进行非法斗争又要进行合法斗争。方方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艰巨。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和战友们一道迅速地把华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开展起来。

方方一到香港，就以东纵北撤代表曾生名义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残酷杀害我复员人员和革命群众的罪行，号召广大群众进行自卫斗争。同时，与林平领导了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广东党组织在东江纵队北撤后，曾一度出现了混乱现象，对形势估计过份强调黑暗，党的组织涣散，

有些党员看不清前途。方方认为，要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解放战争，必须要有坚强的党，必须使人民群众知道党仍然在领导他们战斗。于是提出“整理组织，审查干部，防止奸细混入；教育干部克服悲观情绪，提高政治认识，加强斗争信心”^①。并发出了《整风审干学习计划》与《审干的意义与步骤提纲》，成立审干机构，对干部进行审查，对组织机构进行调整，选派干部到各地建立工委或县委，恢复党的工作。

这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民变的急剧发展，广东省内就有二十七个县爆发了群众的自发斗争，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日渐高涨。方方认为形势发展对恢复华南的武装斗争是有利的，根据党中央《给南方各省工作的指示》，于十二月与林平等作出了恢复广东武装斗争的决定，积极策划在华南地区全面恢复武装斗争。

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作出以后，统一党内干部的思想认识是个突出的问题。当时党内有些同志，怀疑广东游击战争是否搞得起来，担忧搞得起来之后又再一次撤退。针对这些思想情况，方方和林平等在香港召集各地区负责干部会议，随后又连续举办了五期干部训练班，组织干部学习中央指示，总结经验教训，为恢复武装斗争准备干部力量。在干部会议和训练班上，他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南方的斗争形势和特点，向干部作了《当前时局的特点》、《关于广东形势和赤色割据问题》等报告，指出了问题的所在，就是敢不敢开展武装斗争，造成“赤色割据”，并指出在广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有利条件。经过学习，干部认清南方武装斗争的形势和前途，

^①香港分局：《两年来组织工作概况》（1948年）。

明确了广东革命胜利应走的道路，从而增强了斗争胜利的信心。随后方方派出大批干部赴各地开展武装斗争。一九四七年五月，香港分局在方方的主持下，根据党中央二月一日关于《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作出《关于接受中央二月一日指示的决议》，明确指出，南方党的当前中心任务是：“一切都应为着武装斗争、群众斗争的发展与党及群众组织的巩固。”进一步在党内确立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

至于如何使武装斗争的战略方针符合客观的实际，这是关系到华南及广东革命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问题。方方根据党中央关于“不要急于打大仗，也不要过早集中武装建立根据地，而应分散武装发动群众，先从多消灭乡村的反动势力及地主联保武装做起，在广大乡村中站稳，为建立根据地奠定基础”的指示精神，以及华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这一实际情况，提出了“实行小搞，准备大搞”^①的方针，即先把武装星罗棋布地分散发展，播下发展武装斗争的“种子”，为普遍发展武装斗争扎下根，然后再发展。同时，他又总结了各地的斗争经验，号召各地要建立反蒋、反“三征”的统一战线，用适合当时农民群众迫切利益的反“三征”口号，发动农民群众，组织群众武装。他特别强调必须把武装斗争与群众反“三征”、求生存的自卫斗争结合起来，把农村的反“三征”斗争与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结合起来，使其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他吸取广东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指明今后割据的方向，应是依靠山地发展平原，依靠广东发展邻省。方方这些思想和主张，正确地指导了奔赴武装斗争第一线的干部。

^①香港分局：《华南部队数量武器与战斗力》（1949年2月）。

为了贯彻上述的战略方针，提高干部的战略战术思想，方方强调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他把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翻印出来，发给武装干部和党员学习。他亲自撰写文章，阐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先后写了《略论目前时局》、《略论当前农村武装斗争的几个问题》等文，分别在《正报》、《群众》等刊物公开发表。他还多次组织和举办学习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训练班，并亲自授课，提高干部领导游击战争的艺术。

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由于大多数地区党的组织和武装队伍，在军事上执行了“实行小搞、准备大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稳步前进”的战略方针，在政治上建立反蒋、反“三征”的统一战线，带领群众与反动统治的苛政作斗争，因此，华南地区的形势越来越好。广大农村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征、抗暴斗争，城市掀起了反内战反饥饿的爱国民主运动。华南地区的游击战争也如火如荼地迅猛开展，各地武装力量十倍、百倍地增长。如东江南岸的人民武装由一九四七年初的三十人发展到约一千人；粤北的武装队伍发展遍及各县；闽粤赣边分散的游击队则成立了主力队伍；南路、粤中、西江的人民武装也先后活跃起来，不断袭击国民党的乡公所及反动地主武装；琼崖纵队则取得了反“全面清剿”的重大胜利。到一九四七年九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广东各地武装得到迅速恢复和壮大，武装人员由北撤后不到二千人增至一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张发奎、罗卓英妄想把我在北撤后留下的力量消灭掉的所谓“拔钉”计划，打下了我在华南地区游击战争普遍发展的基础。

粉碎蒋、宋美梦

当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强渡黄河，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为把广东变为它最后的内战基地，一九四七年九月派宋子文到广东任省主席。他一到广东，就叫嚣“广东治安三个月有办法，六个月见成效”，“建设新广东”，以支撑蒋介石已濒临崩溃的反革命内战，并即策划向广东人民武装发动进攻。方方同分局其他领导人分析研究已经变化的情况后，于一九四八年初召开高干会议。会上，方方根据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转入大反攻的形势，以及广东地区游击战争发展的进程，作了《刘邓大军渡黄河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布置各地大搞武装斗争。二月，香港分局发出了《粉碎蒋、宋进攻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的指示》，提出“普遍发展，大胆进攻”的方针，及建立地区主力，向新区发展的新任务。同时，又提出了“和宋子文做力量发展的竞赛”、“走在宋子文前头”的响亮口号，以动员群众，粉碎蒋、宋的“清剿”，壮大我军力量。四月，香港分局又发出了《对二月指示信的补充指示》，进一步肯定大胆发展的方针。方方并先后撰写了《迎接大反攻》、《把反蒋统一战线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迎接新年，面向人民的彻底解放》、《正视新形势》等文章，深刻阐述了我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动员群众，挫败蒋介石变华南为其最后挣扎的基地的企图。在这个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我各地党组织迅速建立地区主力，并主动出击敌人，攻城陷镇，使宋子文等反动头目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半年内，全省武装部队人数增至三万

五千九百多人，活动地区扩大了三分之一，取得了粉碎宋子文的第一期“绥靖”计划的胜利。

宋子文的第一期“绥靖”计划被我粉碎后，转而采用“肃清平原、围困山地”的所谓第二期“绥靖”计划。一九四八年六月，根据敌情变化，在方方领导下，香港分局及时发出《工作指示》，提出“坚持平原游击战，以掩护山地边区之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作为粉碎宋子文第二期“绥靖”的对策。方方为了帮助干部领会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思想，还邀请了从北方解放区来的一些干部，讲述北方解放区战场的形势和战例，致使不少干部后来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掌握了这个方法，仗确实打得漂亮多了。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广东一些解放区在北方老区土改高潮的影响下，开始了土改。分局的二月指示中，也提过“一切为了土改”的口号，这实际上是批准了这种做法，致使一些地区过早地实行了土改。虽然它为时仅二、三个月，但这样做，犯了“左”的政策错误，扩大了打击面，脱离了群众，影响了这些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这时，方方深感一个领导者，不仅要坚持真理，还要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八月，香港分局认真总结了一九四八年开展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的经验教训，向各地发出了《半年工作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指示（简称八月指示），明确地指出：“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制度是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总政策。但在南方，由于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尚未充分具备，要完全实施这一政策，还要经过一段艰苦的斗争过程。因此，我们暂时还只能采取一般的削弱封建势力的方针，不能够马上执行彻底的消灭政策。”并强调指出，反“三征”与减租减息是南方革命斗争现阶段所采取的具体中

心政策。方方还一再提醒同志们力避重犯内战时期非群众路线、取消统一战线的错误，使过早实行土改的偏向和一些过“左”的政策得到及时纠正。十月，香港分局向华南人民宣布《华南人民武装当前行动纲领》，规定了“集中火力打击反对我军反动头子、地主恶霸、首要特务，并消灭其武装组织，联合与中立不反对我们现在政策的地主富农与一切可能联合与中立的社会力量。”方方还提出，“和宋子文打政治仗。”他说：“军事的胜仗和政治的胜仗，互相配合，不断发展，不断胜利，南方人民解放的日子便更加接近了。”^①方方和分局的同志为贯彻上述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作了巨大努力，从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斗争的积极性，团结了大多数，孤立打击了最顽固之敌，促进了各地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的蓬勃发展，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到一九四八年底，我粤赣湘、闽粤赣等几个大边区已建立起主力部队，武装人数发展到四万五千九百多人，战斗力显著提高，根据地和游击区不断扩大，由山地向平原发展，逐渐逼近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带，取得了粉碎宋子文的二期“绥靖”计划的辉煌战果。这时，宋子文只好无可奈何地“自叹唱完最后一曲”^②，悄悄下台。

团结爱国民主人士

在不断粉碎蒋、宋向我进攻的同时，方方又和林平、潘汉年、

①《和宋子文打政治仗》，《正报》1948年第110期社论。

②方方：《广东情况介绍》（1949年9月21日在赣州高干会上的报告）。

章汉夫、连贯、饶彰风、许涤新、夏衍等一起，大力开展争取和团结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疯狂地镇压人民，迫害民主人士，致使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处境非常困难。这时，方方和分局的其他领导成员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主动配合上海、南京、重庆等地的地下党，帮助爱国民主人士脱离虎口，安全地转移到香港。到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多数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都云集香港。怎样做好争取和团结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是当时香港分局面临的突出课题。方方十分重视这一工作，常常认真考虑和研究如何贯彻执行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当时，在一部分上层的民主人士中，有的政治上靠拢我党，也有对我党还不够了解，个别的甚至还反对我党。方方认为这一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灵活的方针，他用吃豆腐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统战工作不能太硬，要软些和灵活些。他说，只要他们反蒋，我们就团结，“求同存异”，我们要努力带领他们前进。为做好上层民主人士的工作，方方常常会见其中一些著名的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与他们一起座谈，或亲自登门拜访，亲切地和他们个别谈心，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政策和主张，解释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帮助他们认清形势，鼓励他们进步。由于方方诚恳待人，因而得到许多民主人士、爱国华侨的敬重和爱戴。不少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在方方和其他同志的启发和引导下，向往解放区，要求参加人民的解放事业。

帮助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建立和发展组织，说服他们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下统一起来，这有助于增强革命力量，孤立美蒋反动派。方方对待这一工作也费尽了苦心。如当时国民党民主

派别内部思想不够统一，方方和分局的其他同志针对这一情况，耐心地做好各派的工作，还依靠革命老人何香凝找各有关人士谈话，终于使他们作出了建立组织和重整领导机构的决定。国民党的民主派别由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等出面组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由沈钧儒、章伯钧、邓初民等领导重建民盟领导机构。他们发表宣言，公开提出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为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而奋斗。其他民主党派也在我党工作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了反蒋的爱国运动。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取得伟大的胜利，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发出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知名人士迅即响应。一个以香港为中心的新政协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在开展新政协运动中，方方从香港这一复杂而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大多数民主党派领袖云集之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带领分局的同志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做了大量的争取和团结工作。他亲自撰写题为《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的文章，在《群众》周刊发表，指出，中共所发布的“五一”口号，向全国人民指明的奋斗目标，不仅适合于当前时局发展的需要，而且也具备了主客观上成熟的条件。他还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王绍鏊、谭平山、茅盾等参加的讨论有关新政协召开的若干问题座谈会，征询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促进他们为政协会议的早日召开贡献力量。他又十分注意做好个别知名人士的工作，同

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解释我党的各项政策，促使一些民主人士放弃幻想，转而寄希望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下，新政协运动迅速由讨论阶段进入实际行动。这时香港分局又接受中央的任务，把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安全送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会议。这一工作十分艰巨，不仅要使他们摆脱敌人的监视和陷害，又要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一切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都得秘密机警地进行。方方和章汉夫、连贯、潘汉年、饶彰风、夏衍、许涤新等同志，为完成这一任务，废寝忘餐地进行了反复研究，并作了周密的布置，对这些民主人士如何顺利地离开香港，走哪条路，租用哪个国家的船、谁来负责护送等等，都作了严密的巧妙的安排，从而使民主党派领导人及爱国知名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近百人得以安全离开香港，到达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和新政协会议。

重视党的建设

方方在领导华南人民发展武装斗争，开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繁忙工作中，对我党的建设非常重视。他认为，在蒋管区，我们的党员一面处在分割开来的农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一面又处在灯红酒绿的城市环境下进行地下工作，因而，蒋管区的党的思想建设较之解放区来说更为迫切和重要。他把提高干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为此，香港分局经常举办训练班，或召开会议，组织干部

学习。他常亲自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亲自审定教材，辅导干部学习。他撰写的《漫谈中国革命发展过程》、《毛泽东与农民运动》、《怎样读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都是指导和帮助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他还针对当时干部队伍的思想倾向和斗争实际，以星星的笔名经常为《正报》杂志撰写论述思想修养等方面的文章。后来，《正报》出版社把他所写的《谈团结》、《谈预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谈精通业务》、《论立功与贪功》等十二篇文章，汇集成册，题为《献给人民团体》（人民团体即党的代号），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在香港出版发行。这些文章成为当时华南地区党内思想教育的好教材，对加强我党的思想建设起了良好的作用。

方方对党的宣传工作也抓得很紧。为着占领和发展我党在香港的宣传阵地，他对我党领导的《正报》、《群众》周刊、《华商报》的工作常常提出改进的建议。为加强我党对报纸的领导，分局决定在香港工委属下成立报纸工作委员会，并设立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及时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加强对解放区的报道。他对办报的同志非常关心，常和他们分析形势和任务，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一九四七年九月，《华商报》经济发生困难，有些同志提出停办，方方则认为应该办下去，并建议发起一个群众性救报运动，充分依靠群众，克服困难，把报纸办下去。他的救报运动的建议，很快得到香港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响应，各进步工会会员纷纷踊跃参加救报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阶层人士捐款约十八万元港币。这个救报运动，不仅提供了经济资助，解决了经济困难，使《华商报》得以继续办下去，而且征得了不少改进报纸出版的宝贵意见，使报纸办得更受群众欢

迎。在方方等同志的努力下，我党在港宣传工作的加强，不仅使国内外人士了解我党的主张，还争取了国内外舆论对我人民解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

方方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关心，还表现在他经常为《正报》、《群众》杂志和《华商报》撰写文章，他曾经用“星星”、“野草”等笔名写过许多文章，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政治的，有军事的，有党的建设的，有党的方针政策的，有农民运动的，有革命回忆录，有介绍党的历史的等等。尽管他在解放战争年代挑的担子很重，工作很忙，仍然奋笔疾书，努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革命的真理。

迎 接 解 放

一九四九年初，人民解放战争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这时，华南的敌人极度动摇和混乱。国民党中央换上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东省行辕主任”，妄想赖在广东作垂死挣扎，再向广东人民武装发起进攻。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对南方工作的指示，方方同分局其他领导人研究制定了“全面发展、重点巩固”^①的方针，来完成大块革命据根地的建立，以迎接南下大军，准备胜利解放华南。方方在香港分局召开各地负责同志的学习会议上，作了《关于华南党的工作问题的报告》，分析了华南及广东形势，阐明“全面发展、重点巩固”的方针，并对各条战线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在军事上要求各地人民武装迅速发动春季攻势。在会议上，他又作了《关于

^①香港分局：《我们当前的方针和任务》（1949年）。

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学习与反省》的总结报告，针对党内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分析了造成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思想根源，指出了改进的办法，为迎接华南地区的解放准备思想条件。

在我军节节胜利的进军中，方方很重视做好争取国民党军队、地方实力派的起义工作。香港分局先后发出《关于对付起义事件的指示》和《关于瓦解地方反动武装工作的指示》。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军队中一些将领及地方实力派纷纷与我搭线联系商讨起义，他在港亲自先后接见了国民党闽西专员练惕生和傅柏翠，粤东国民党保安十二、十三团李洁之、曾天节、魏鉴贤等将领，鼓励他们站到人民一边来，并就起义的具体事宜作了周密的部署，保证起义人员生命财产的安全，从而坚定了起义将领的决心和信心。在方方的关怀下，粤东及闽西的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都获得成功，大大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加速其统治的崩溃。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进军。为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华南，香港分局改称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方方仍任书记。五月，分局领导机关从香港迁到梅县。此时，方方更是日夜奔忙，废寝忘餐地工作。针对当前的形势，华南分局发出了《对大军渡江后华南工作的布置》，提出在大军未到之前，必须将农村完全解放，以便大军可集结力量解放城市及追歼残敌。各地人民武装在取得春季攻势的重大胜利之后，又加强了对敌的总攻击，斗争发展势如破竹。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广东已有一千三百五十万人口获得解放，占全省人口百分之四十以上，有三分之一地区已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武装队伍发展到

八万多人，先后建立了粤赣湘、闽粤赣、滇桂黔、粤桂边纵队和粤中纵队，琼崖纵队更加壮大^①。此时，国民党军队只能把主力驻守在粤汉路沿线、广州附近四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两阳（阳江、阳春）和直通雷州半岛的公路沿线。这就为南下大军进入广东作战大大扫除障碍，为最后解放华南追歼残敌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八月，方方接中央通知，赴江西赣州与叶剑英率领的南下大军会师，商议和部署解放华南等问题。九月初，方方抵赣州，参加了由叶剑英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他在高干会上作了《广东情况介绍》的报告，介绍了广东情况和广东党及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发展状况。在赣州会议上，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作出了《关于过去华南及广东工作的决议》，肯定了“以方方同志等领导的华南分局和各地党委，自一九四六年以来领导广东及华南各省人民武装斗争各项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缺点是有的，但缺点是次要的”。会议通过组成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讨论和制订了进军广东、支前、会师、组织机构及各项政策等问题。

赣州会议后，在方方、林平等同志的领导下，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部队，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和贯彻赣州会议的精神，以巨大的政治热情发动和组织全省人民群众开展迎接大军的支前活动，同时积极策应南下大军作战，在城市中则发动群众参加护城、护厂、护校等方面的斗争。这对加快广州、广东战役的取胜和大量围歼残敌，为南下大军最后完成解放华南

^①方方：《广东情况介绍》。

的任务，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年代

赣州会议后，方方即随南下大军回到广东。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二十二日夜里，他和叶剑英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到达广州。十一月六日，中央任命他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协助叶剑英主持广东省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夏天，华南分局领导对方方开展批判，说他犯了“地方主义”错误。实践证明，这一批判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对这一批判，他有想不通的地方，却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严格要求自己，听从党的指挥，坚持工作。

一九五四年，方方被任命为华南分局交通运输部长，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五年，他接受党的新任务，到北京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等职。方方生长在侨乡，长期在南方侨乡从事革命活动，对华侨有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他到侨委后，积极地协助何香凝、廖承志主持中侨委的日常工作。为了团结广大华侨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他亲自深入侨区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每年到基层为时长达三、四个月。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广泛地接触各阶层华侨、归侨、侨眷、侨务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他总是根据国务院有关侨务政策的精神，从侨务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推动侨务工作

的开展。

建国后，有几十万华侨和华侨学生陆续回国学习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一九六〇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的指示，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负责统筹归国华侨的接待和安置工作，任命方方为委员兼办公室主任。为做好这项工作，他遵照国务院关于安置华侨的方针和政策，到南方各省，亲自领导，具体部署，推动各省增办了几十个国营华侨农场、林场、华侨投资的工厂企业，增办华侨中等补习学校以及暨南大学、华侨大学，既使归侨得到妥善安置，又使归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所长。他在工作中非常注意把祖国对华侨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宣传党的侨务政策，使归侨感受祖国处处无限温暖。由于他时时处处作华侨、归侨、侨眷的贴心人，因而深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

方方在中侨委工作期间，曾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和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十年内乱期间，方方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被非法关禁五年。他身陷囹圄，还对人说：“只要党的工作不受损失，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我个人算不了什么，纵使死了也心甘！”^①他这种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谄过于人，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尚风格，受到人们的敬重，也实践了他平时常说的“功归人，过归己”的名言。他不止一次地说：“我这个人犯过错误，但我是在光天化日下犯了错误的，到了我

^①连贯：《侨务工作的忠诚战士——怀念方方同志》，《人民日报》1979年8月22日。

去见马克思的时候，我墓碑上可以刻上‘犯了错误的共产党员方方之墓’。”^①当他自知不起时，对其儿女一再说：“坚信党必有为我昭雪的一日。”快临终时，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悲愤交加，泪流不止。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他痛含重大冤情离开了人间。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为方方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宣布为他平反昭雪。廖承志在悼词中，全面地、正确地评价了方方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方方许多生前友好、港澳知名人士、海外华侨、华裔团体纷纷发来唁电或赋诗填词，对他表示诚挚的悼念。

^①连贯：《侨务工作的忠诚战士——怀念方方同志》。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108

定 价： 1.10 元